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

#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日〕野村浩一 著  
张学锋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在实现了“富国强兵”，保持了国家的独立，登上了自封的“东方世界的指导者”的宝座之后，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它所应该担负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比这更重要的是，日本人自身是在一种什么样的伦理逻辑之上来认识自己富强起来的原动力、摸索自己民族的前进道路、探求自己民族应该担负的使命的呢？这就是本书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近代中国的认识、中国观，特别是知识阶层的中国观，其主要类型有哪些？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在这些中国观的形成过程中，其主体——人的思想、行动的轨迹是如何的？这种种的中国认识中，其缺陷、误区又在哪里？这也是本书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

ISBN 978-7-214-12772-2



9 787214 127723 >

定价：32.00元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

# 近代日本の中国认识

〔日〕野村浩一 著  
张学锋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日)野村浩一著;张学锋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5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12772-3

I. ①近… II. ①野…②张… III. ①汉学—研究—  
日本—近代 IV.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4334 号

Kindai Nihon no Chugoku Ninshiki

Copyright © 1981 Koichi Nomura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Kenbunshuppan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3-600

书 名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

著 者	[日]野村浩一
译 者	张学锋
责任编辑	张晓薇
装帧设计	黄 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jspph.com">http://www.jspph.com</a> <a href="http://jspph.taobao.com">http://jspph.taobao.com</a>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mm×960mm 1/16
印 张	16 插页4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214-12772-3
定 价	32.00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

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 中文版序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一书在中国公开出版，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高兴又非常光荣的事。

正像本书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我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特别是近代、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从事着自己的研究。在这期间，我同时对近代的日中关系史也极其关心。若要问其理由，不用说，这是因为在 19 世纪末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中，日中关系给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超过了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在这种一般性的理由以外，在我看来，还有一些更加切实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解决。这就是，在从“日清战争”、“对华二十一条”、“满洲事变”（九一八）直到“日中战争”这一日本对中国的渗透、侵略的过程中，日本人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中国认识观走完了这条道路的？那些亲自从事着中国问题研究，或者深深地认识到与亚洲的邻国——中国保持安定关系的重要性并为此作了努力的人们，面对近代、现代中国的动向，他们是怎样认识，并在这样的时代里度过他们的生涯的？然后还有，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其中又包含着什么样的历史教训呢？这些问题，对我这个从事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研究的人来说，实际上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重

要问题。这是因为,在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中,存在着一些很大的缺陷或者误区,对于战后才开始从事研究的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对这些问题进行点检、将之意识化,我觉得这才是推动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试着对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各种类型的中国认识观顺着时代作了追究。在本书中,我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意识或感情,而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们的中国观。这些知识分子,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想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对中国问题、亚洲问题积极地展开探讨的人们。我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些群像的思想苦斗的分析,才能究明战前日本的中国观或者日中关系中的本质性问题。固然,活动在历史时期的所有的人们,都逃脱不了那一时代的历史性制约,战前的历史,不能就此应用到战后来。但是,只有看清历史上连续的契机和断绝的契机,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现在,再一次回头阅读收入本书中的论文,感到内容上尚不充分的地方太多太多了。这些不充分的地方,不仅仅请日本的读者,也恳请中国的读者不吝提出批评。尽管如此,本书可以说对近代日本所产生的各种类型的中国认识观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如果它能够成为中国读者学习研究这一问题的一个辅助的话,那对作者来说,是一个望外的喜悦。

今后,为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充实,我想在这一领域继续从事研究,同时,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我愿意在日、中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学术性对话方面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最后,对以精当的笔致翻译了本书的张学锋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野村浩一

## 凤凰文库书目

###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 《走进马克思》 孙伯鍈 张一兵 主编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张一兵 著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 任平 著  
《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 张一兵 著  
《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 胡大平 著  
《国外毛泽东学研究》 尚庆飞 著  
《重释历史唯物主义》 段忠桥 著  
《资本主义理解史》(6卷) 张一兵 主编  
《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 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张亮 著  
《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 谢永康 著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景源 主编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 李景源 吴元梁 主编  
《科学发展观:现代性与哲学视域》 姜建成 著  
《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周穗明 王玫 等著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 张文喜 著  
《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 孙伟平 著  
《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阐释》 唐正东 著  
《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哲学阐释》 欧阳英 著  
《正义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研究》 王广 著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英]斯图亚特·西姆 著 吕增奎 陈红 译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理论、政治与介入》 [英]保罗·鲍曼 著 黄晓武 译  
《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 王浩斌 著  
《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理论》 陈新夏 著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 [荷]马歇尔·范·林登 著  
周穗明 译 翁寒松 校  
《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 刘森林 著

### 二、政治学前沿系列

-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 孔繁斌 著  
《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 王海洲 著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 [美]迈克尔·桑德尔 著 曾纪茂 译  
《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 [英]斯蒂芬·卢克斯 著 彭斌 译  
《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译  
《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 [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 毛兴贵 等译  
《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 [意]诺贝托·博比奥 著 陈高华 译  
《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 [美]布鲁斯·阿克曼 等著 应奇 编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英]T. H. 马歇尔 等著 郭忠华 刘训练 编  
《当代社会契约论》 [美]约翰·罗尔斯 等著 包利民 编

- 《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 [英]G. A. 柯亨 等著 吕增奎 编
- 《美德伦理与道德要求》 [英]欧若拉·奥尼尔 等著 徐向东 编
- 《宪政与民主》 [英]约瑟夫·拉兹 等著 佟德志 编
- 《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 [美]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苏宝俊 译
- 《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 [美]赫尔曼·M. 施瓦茨 著 徐佳 译
- 《税收政治学:一种比较的视角》 [美]盖伊·彼得斯 著 郭为桂 黄宁 葛 译
- 《控制国家:从雅典至今的宪政史》 [美]斯科特·戈登 著 应奇 陈丽微 孟军 李勇 译
- 《社会主义原则》 [英]戴维·米勒 著 应奇 译
-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 [澳]安德鲁·文森特 著 袁久红 译
- 《新社会主义》 [加拿大]艾伦·伍德 著 尚庆飞 译
- 《政治的回归》 [英]尚塔尔·墨菲 著 王恒 臧佩洪 译
- 《自由多元主义》 [美]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庞金友 译
- 《政治哲学导论》 [英]亚当·斯威夫特 著 余江涛 译
- 《重新思考自由主义》 [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 王萍 傅广生 周春鹏 译
-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 [英]约翰·格雷 著 顾爱彬 李瑞华 译
- 《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 [英]乔治·克劳德 著 应奇 译
-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美]迈克尔·哈特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著 杨建国 范一亭 译
- 《反对自由主义》 [美]约翰·凯克斯 著 应奇 译
- 《政治思想导读》 [英]彼得·斯特克 大卫·韦戈尔 著 舒小昀 李霞 赵勇 译
- 《现代欧洲的战后与社会变迁:大转型再探》 [英]桑德拉·哈尔珀琳 著 唐皇凤 武小凯 译
- 《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 [美]约翰·西蒙斯 著 郭为桂 李艳丽 译
- 《政治经济学理论》 [美]詹姆斯·卡波拉索 戴维·莱文 著 刘骥 等 译
- 《民主国家的自主性》 [英]埃里克·A. 诺德林格 著 孙荣飞 等 译
-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英]乔·米格德尔 著 张长东 译
- 《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 [美]彼得·霍尔 著 刘骥 刘娟凤 叶静 译
- 《社会契约论》 [英]迈克尔·莱斯诺夫 著 刘训练 等 译
- 《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 [澳]菲利普·佩蒂特 著 刘训练 译
- 《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 [美]罗纳德·德沃金 著 冯克利 译
- 《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著 张国清 译
- 《社会正义论》 [英]布莱恩·巴利 著 曹海军 译
-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美]汉娜·阿伦特 著 孙传钊 译
- 《作为公道的正义》 [英]布莱恩·巴利 著 曹海军 允春喜 译
- 《古今自由主义》 [美]列奥·施特劳斯 著 马志娟 译
- 《公平原则与政治义务》 [美]乔治·格罗斯科 著 毛兴贵 译
- 《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 [美]罗伯特·A. 达尔 著 范春辉 等 译
- 《论伦理精神》 张康之 著
- 《人权与帝国:世界主义的政治哲学》 [英]科斯塔斯·杜兹纳 著 辛亨复 译
- 《阐释和社会批判》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段鸣玉 译
- 《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 [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 郭忠华 编
- 《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 应奇 主编
- 《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 [美]安娜·M. 史密斯 著 付琼 译
-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张亮 编
-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英]迈克尔·肯尼 著 李永新 陈剑 译

- 《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 [美]珍妮弗·皮茨 著 金毅 许鸿艳 译  
 《论战争》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段鸣玉 译  
 《现代性的谱系》 张凤阳 著  
 《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 阎小波 著  
 《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 [美]塞瑞娜·潘琳 著 张云龙 译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著 郭为桂 林娜 译  
 《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 [美]乔尔·S.米格代尔 著 李杨 郭一聪 译 张长东 校  
 《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 张亮 熊婴 编

### 三、纯粹哲学系列

- 《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叶秀山西方哲学论集(1998—2002)》 叶秀山 著  
 《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 黄裕生 著  
 《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 谢地坤 著  
 《从胡塞尔到德里达》 尚杰 著  
 《海德格尔与存在论历史的解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引论》 宋继杰 著  
 《康德的信仰:康德的自由、自然和上帝理念批判》 赵广明 著  
 《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 黄裕生 著  
 《理念与神:柏拉图的理念思想及其神学意义》 赵广明 著  
 《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 王恒 著  
 《意志及其解脱之路:叔本华哲学思想研究》 黄文前 著  
 《真理之光:费希特与海德格尔论 SEIN》 李文堂 著  
 《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 尚杰 著  
 《胡塞尔直观概念的起源:以意向性为线素的早期文本研究》 陈志远 著  
 《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 方向红 著  
 《形而上学与社会希望:罗蒂哲学研究》 陈亚军 著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 刘永谋 著  
 《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 叶秀山 著  
 《学与思的轮回:叶秀山2003—2007年最新论文集》 叶秀山 著  
 《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 户晓辉 著  
 《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 倪梁康 著  
 《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 王齐 著  
 《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 黄裕生 著  
 《道路之思: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思想》 张柯 著  
 《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 叶秀山 著  
 《自由、心灵与时间:奥古斯丁心灵转向问题的文本学研究》 张荣 著  
 《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 王树人 著

### 四、宗教研究系列

- 《汉译佛教经典哲学研究》(上下卷) 杜继文 著  
 《中国佛教通史》(15卷) 赖永海 主编  
 《中国禅宗通史》 杜继文 魏道儒 著  
 《佛教史》 杜继文 主编

- 《道教史》 卿希泰 唐大潮 著  
《基督教史》 王美秀 段琦 等著  
《伊斯兰教史》 金宜久 主编  
《中国律宗通史》 王建光 著  
《中国唯识宗通史》 杨维中 著  
《中国净土宗通史》 陈扬炯 著  
《中国天台宗通史》 潘桂明 吴忠伟 著  
《中国三论宗通史》 董群 著  
《中国华严宗通史》 魏道儒 著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3卷) 潘桂明 著  
《禅与老庄》 徐小跃 著  
《中国佛性论》 赖永海 著  
《禅宗早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洪修平 著  
《基督教思想史》 [美]胡斯都·L. 冈察雷斯 著 陈泽民 孙汉书 司徒桐 莫如喜 陆俊杰 译  
《圣经历史哲学》(上下卷) 赵敦华 著  
《禅宗早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洪修平 著  
《如来藏与中国佛教》 杨维中 著

## 五、人文与社会系列

- 《环境与历史:美国 and 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 [美]威廉·贝纳特 彼得·科茨 著 包茂红 译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著 刘北成 刘小鸥 译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等译  
《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 [美]A. 麦金太尔 著 宋继杰 译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美]R. M. 昂格尔 著 吴玉章 周汉华 译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 [英]约翰·凯里 著 吴庆宏 译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著 韩震 等译  
《社会行动的结构》 [美]塔尔科特·帕森斯 著 张明德 夏遇南 彭刚 译  
《文化的解释》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1)》 [美]埃里克·沃格林 著 霍伟岸 叶颖 译  
《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2)》 [美]埃里克·沃格林 著 陈周旺 译  
《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 [美]理查德·塔克 著 罗炯 等译  
《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 [英]基思·托马斯 著 宋丽丽 译  
《男性气概》 [美]哈维·C. 曼斯菲尔德 著 刘玮 译  
《黑格尔》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著 张国清 朱进东 译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美]罗伯特·K. 默顿 著 唐少杰 齐心 等译  
《个体的社会》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翟三江 陆兴华 译  
《象征交换与死亡》 [法]让·波德里亚 著 车槿山 译  
《实践感》 [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 蒋梓骅 译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 [美]利奥·施特劳斯 著 申彤 译  
《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褚松燕 译  
《传统的发明》 [英]E. 霍布斯鲍姆 T. 兰格 著 顾杭 庞冠群 译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美]海登·怀特 著 陈新 译

- 《卢梭问题》 [德]恩斯特·卡西勒著 王春华译  
《自足语义学:为语义最简论和言语行为多元论辩护》 [挪威]赫尔曼·开普兰  
 [美]厄尼·利珀尔著 周允程译  
《历史主义的兴起》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 陆月宏译  
《权威的概念》 [法]亚历山大·科耶夫著 姜志辉译

## 六、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英]王斯福著 赵旭东译  
《王弼〈老子注〉研究》 [德]瓦格纳著 杨立华译  
《章学诚思想与生平研究》 [美]倪德卫著 杨立华译  
《中国与达尔文》 [美]詹姆斯·里夫著 钟永强译  
《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美]韩书瑞著 陈仲丹译  
《中华帝国后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 黄卫总著 张蕴爽译  
《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词中的园林与玩好》 [美]王晓山著 文韬译  
《六朝精神史研究》 [日]吉川忠夫著 王启发译  
《中国社会史》 [法]谢和耐著 黄建华 黄迅余译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美]彭慕兰著 史建云译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日]佐藤慎一著 刘岳兵译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美]王国斌著 李伯重 连玲玲译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 [日]岛田虔次著 甘万萍译  
《为权力祈祷》 [加拿大]卜正民著 张华译  
《洪业:清朝开国史》 [美]魏斐德著 陈苏镇 薄小莹译  
《儒教与道教》 [德]马克斯·韦伯著 洪天富译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美]德里克著 翁贺凯译  
《中华帝国的法律》 [美]D. 布朗等著 朱勇译  
《文化、权力与国家》 [美]杜赞奇著 王福明译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美]拉铁摩尔著 唐晓峰译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美]史华兹著 程钢译 刘东校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明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 [日]滨下武志著 高淑娟 孙彬译  
《中国美学问题》 [美]苏源熙著 卞东坡译 张强强 朱霞欢校  
《翻译的传说:构建中国新女性形象》 胡纓著 龙瑜成 彭珊珊译  
《〈诗经〉原意研究》 [日]家井真著 陆越译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美]高彦颐著 苗延威译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美]杜赞奇著 王宪明 高继美  
 李海燕 李点译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 [美]韩森著 鲁西奇译  
《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 [荷]安国凤著 纪志刚 郑诚 郑方磊译  
《毁灭的种子:二战及战后的国民党中国》 [美]易劳逸著 王建朗 王贤知 贾维译  
《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 [美]李丹著 张天虹 张胜波译  
《18世纪的中国社会》 [美]韩书瑞 罗有枝著 陈仲丹译  
《开放的帝国:1600年的中国历史》 [美]韩森著 梁侃 邹劲风译  
《中国人的幸福观》 [德]鲍吾刚著 严蓓雯 韩雪临 伍德祖译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 [日]中岛乐章著 郭万平 高飞译

- 《朱熹的思维世界》 [美]田浩 著
-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建构》 杨美慧 著 赵旭东 孙珉 译 张跃宏 校
- 《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 [美]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 著 姜智芹 译
- 《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 [日]松浦章 著 董科 译
- 《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 [日]顾琳 著 王玉茹 张玮 李进霞 译
- 《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 [日]松浦章 著 郑洁西 译
-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科大卫 著 卜永坚 译
- 《中国善书研究》 [日]酒井忠夫 著 刘岳兵 何莺莺 孙雪梅 译
-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 [日]城山智子 著 孟凡礼 尚国敏 译
- 《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 [美]马立博 著 王玉茹 译
- 《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 [美]卢苇菁 著 秦立彦 译
- 《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 [美]韩书瑞 著 刘平 唐雁超 译
- 《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 [美]易明 著 姜智芹 译
-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美]林郁沁 著 陈湘静 译
- 《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 [美]戴维·艾伦·佩兹 著 姜智芹 译
- 《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 [日]增田涉 著 周启乾 译
- 《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饿的文化反应》 [美]艾志端 著 曹曦 译
-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美]巴菲尔德 著 袁剑 译
- 《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 [德]狄德满 著 崔华杰 译
- 《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的妇女问题》 [美]季家珍 著 杨可 译
- 《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 [美]艾米莉·洪埃格 著 韩慈 译
- 《钱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林满红 著 詹庆华 林满红 译
- 《寻求中国民主》 [澳]冯兆基 著 刘悦斌 徐础 著
- 《中国乡村的基督教:1860—1900 江西省的冲突与适应》 [美]史维东 著 吴薇 译
- 《认知变异:反思人类心智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英]G. E. R. 劳埃德 著 池志培 译
- 《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 [美]韩瑞 著 袁剑 译
- 《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 [澳]雷金庆 著 [澳]刘婷 译
- 《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 伍跃 著
- 《文书行政的汉帝国》 [日]富谷至 著 刘恒武 孔李波 译
- 《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美]张骝 著 袁长庚 译
- 《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 游鉴明 胡缨 季家珍 主编
- 《跨太平洋位移: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民族志、翻译和文本间旅行》 黄运特 著 陈倩 译

## 七、历史研究系列

- 《中国近代通史》(10卷) 张海鹏 主编
- 《极端的年代》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马凡 等 译
- 《漫长的20世纪》 [意]杰奥瓦尼·阿瑞基 著 姚乃强 译
-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钱乘旦 陈晓律 著
- 《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 钱乘旦 主编
-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6卷) 杨栋梁 主编
-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 卢勋 杨保隆 等著
- 《明治维新》 [英]威廉·G. 比斯利 著 张光 汤金旭 译



《在垂死皇帝的王国:世纪末的日本》 [美]诺玛·菲尔德 著 曾霞 译

《戊戌改变的台前幕后》 马勇 著

《战后东北亚主要国家间领土纠纷与国际关系研究》 李凡 著

## 八、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世纪末的维也纳》 [美]卡尔·休斯克 著 李锋 译

《莎士比亚的政治》 [美]阿兰·布鲁姆 哈瑞·雅法 著 潘望 译

《邪恶》 [英]玛丽·米奇利 著 陆月宏 译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 21 世纪的庸人主义》 [英]弗兰克·富里迪 著 戴从容 译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美]丹尼尔·贝尔 著 严蓓雯 译

《流动的恐惧》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谷蕾 杨超 等译

《流动的生活》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徐朝友 译

《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谷蕾 武媛媛 译

《未来的形而上学》 [美]爱莲心 著 余日昌 译

《感受与形式》 [美]苏珊·朗格 著 高艳萍 译

《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一种批判的历史》 [美]道格拉斯·多德 著 熊婴 译 刘思云 校

## 九、教育理论研究系列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美]梅雷迪斯·D.高尔等 著 许庆豫等 译

《教育基础》 [美]阿伦·奥恩斯坦 著 杨树兵等 译

《教育伦理学》 贾馥芝 著

《认知心理学》 [美]罗伯特·L.索尔索 著 何华等 译

《现代心理学史》 [美]杜安·P.舒尔茨 著 叶浩生等 译

《学校法学》 [美]米歇尔·W.拉莫特 著 许庆豫等 译

## 十、艺术理论研究系列

《另类准则:直面 20 世纪艺术》 [美]列奥·施坦伯格 著 沈语冰 刘凡 谷光曙 译

《弗莱艺术批评文选》 [英]罗杰·弗莱 著 沈语冰 译

《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 年以后的视觉艺术》 [美]简·罗伯森 克雷格·迈克丹尼尔 著 匡  
挠 译

《艺术与物性:论文与评论集》 [美]迈克尔·弗雷德 著 张晓剑 沈语冰 译

《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 [英]T. J. 克拉克 著 沈语冰 诸葛沂 译

《自我与图像》 [英]艾美利亚·琼斯 著 刘凡 谷光曙 译

《艺术社会学》 [英]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 著 章浩 沈杨 译

## 十一、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系列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制度变革与结构转型》 肖耿 著

《世界经济复苏与中国的作用》 [英]傅晓岚 编 蔡悦等 译

《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之路》 《比较》研究室 编

# 目 录

中文版序 1

## 第一部

- 第一章 近代日本国民的使命观,其诸类型及特质——大隈重信、内村鉴三、北一辉 3
- 一 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方法 3
  - 二 日英同盟和大隈的东西文明融合论 5
  - 三 内村鉴三 12
  - 四 北一辉 25
  - 五 结语 33
- 第二章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大陆问题”的构想及其实态 37
- 一 问题之所在 37
  - 二 国权主义空想家——以内田良平为中心 41
  - 三 支那学者内藤湖南世界里的“中国” 46
  - 四 开放性的中国认识——吉野作造 54
  - 五 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洞察——北一辉的眼睛 64
  - 六 大正知识分子周围的“中国” 70
  - 七 社会主义者与中国革命运动 77
  - 八 尾声 84

## 第二部

- 第一章 走向亚洲的航踪——宫崎滔天的思想和行动 93
- 一 问题的所在——滔天的悔恨 93
  - 二 宫崎家的人——混沌的能量 95
  - 三 滔天的出发——前进与诀别 98
  - 四 世界革命与社会革命 105
  - 五 对近代文明的控诉 110
  - 六 滔天的“欣慕”与“悔恨” 113
  - 七 从辛亥革命到大正时代 116
  - 八 愤怒与警告 118
  - 九 “支那革命”与日本的改造 124
  - 十 日本的改造与民藏的轨迹——日中两国的关系性构造 127
  - 十一 情念的亢进——亚细亚主义与翻译社会主义 131
  - 十二 滔天的回归 134
- 第二章 尾崎秀实与中国 136
- 一 序言 136
  - 二 中国研究的方法论 138
  - 三 日中全面战争的爆发——亚细亚与日本的构想 147
  - 四 日中关系的夹缝之间——日本、中国、世界 154
- 第三章 橘朴——亚细亚主义的彷徨 159
- 一 序言 159
  - 二 问题的所在——橘朴与中国 161
  - 三 走向中国研究——来自民众世界的观点 166
  - 四 从“中国社会论”到“中国革命论” 179
  - 五 对“国民革命”动态的分析——其高涨与结论 186
  - 六 “国民革命”的冲击 197
  - 七 “方向转换”——向亚细亚主义的转折 201
  - 八 “日中战争”——光与影 214
  - 九 亚细亚主义的彷徨与寿终——代结尾 223
- 后记 229
- 译后记 235

# 第一部



# 第一章 近代日本国民的使命观，其诸类型及特质——大隈重信、内村鉴三、北一辉

## 一 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方法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是由国民使命(national mission)、国民传统(national tradition)、国民利益(national interest)这三个因素构成的(例如 F. Hertz, *Nationality in history and politics* 1946 . chap. I. esp. p. 18)。传统与一个民族的过去相连，利益与一个民族的现在相关，而“国民使命”则与一个民族的未来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国民使命”这一理念，对一个民族在认识自己民族之所以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因，在寻找自己民族将来的奋斗目标时，有着有形的或无形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力还非常强大。因而，当讨论近代日本“国民使命”时，我们不得不在考察国民传统和国民利益的同时来分析“使命”观的意识形态上的构造，以及它的机能或者它的历史变迁。对于这一课题，完全可以针对以上提出的各个方面从正面来进行论述，但是，我却想避开这种从正面来进行讨论的做法。在本稿中，我将采用紧扣“国民使命”观这一主题，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问题的方法，想对近代日本的“使命”观的特质加以若干考察。

非常笼统地来看,亚洲的近代可以说是因近代欧洲的侵略而开始的。18、19世纪,西方诸列强的殖民地争夺战,其结果是将欧洲以外的世界——无论其愿意还是不愿意,都纳入了欧洲这个世界体系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洲是被欧洲强制性地拉入到欧洲世界中去的。所谓亚洲的近代,讲得极端一点,甚至可以说是欧洲近代的一个反射。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可以这么说,亚洲的近代化即是近代西方逻辑在全世界被不断贯彻过程中的一环。反过来说,亚洲成为欧洲殖民地这一事实本身,也就证明了近代西方逻辑被贯彻这一史实。不管怎么说,亚洲的近代,不外乎是亚洲不断地失去自我的时代。

然而,在这样的亚洲近代史中,形成了一个唯一的例外,不用说,这就是日本。明治以后的历史,显示了我国近代国家的形成、完善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只有我国,才从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危机中逃脱了出来,并且,虽然较欧洲迟了一步,但毕竟还是以近代国家的形象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登场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国也就成了亚洲唯一的一个近代国家。

不过,如果根据上面所说的亚洲近代史的一般背景来考虑问题的话,这不用说,会有异常的危险和困难。堀田善卫氏极其简单地将这一背景模式化了。他说,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我国为了保全国家的独立,致力建设近代国家,从而成为亚洲的先驱,现实中也只能踏上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这条道路,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这样一来,这一近代化过程,终于使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以帝国主义国家的面目,向亚洲诸国扩张自己的势力,走上了侵略之路。(堀田善卫的原话是:“如果不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的话,怎样才能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呢?怎样才能成为亚洲民族的盟友呢?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或盟友,在19、20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保持本国的独立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吗?”见堀田善卫著:《日本的知识》,载于《现代思想》讲座第11卷,岩波书店版。)

换言之,为了建设日本的近代化,我们就不得不学会近代西方逻辑——与之相关的逻辑,即19世纪至20世纪的弱肉强食时代的西欧帝国主义逻辑——此外别无他法。这就是意味着用近代西方逻辑来否定亚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潜藏在近代日本国家命运中的一个基本矛盾。那么,潜在于近代西方与亚洲、亚洲与日本之间的这种矛盾,赋予了我国的国民使命感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同时为了超越、克服这一矛盾,我们又作了怎样的努力和尝试呢?本稿大体上想从这个视角来接近前面所提到的课题。当然,问题是极其复杂困难的,这里,我们可能最多只能找到一个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的线索而已。下面,我首先想从近代日本的国民使命感(我想这一使命感已经基本形成)的主流,即吸收“近代西方逻辑”这一方面来进行探讨。在分析这些问题以后,再想从与这一主流相反的方面,即对这种国民使命观的批判这个侧面来进行考察,可以说,想将这一课题限定在一个极其特别的视点里来展开。故而,想不完全受时代变迁的束缚,通过几种不同的形式,将重点放在这一使命感思想的形成过程上来对这一课题进行探讨。关于这一研究的方法,我想事先在这儿阐明一下。

## 二 日英同盟和大隈的东西文明融合论

明治时代的后半期,连续发生了日清战争(1895—1896)<sup>①</sup>、北清事变(1900)<sup>②</sup>、日英同盟(1902)、日俄战争(1905—1906)<sup>③</sup>等重大历史事件,通过这些历史事件,我国在远东地区外交舞台上的稳固地位已基本确立。日清战争,将亚洲的大国中国打败,日俄战争,将欧洲的强国俄国击溃,至此,我国从幕府时代末期以来的紧张感中渐渐地被解放了出来。

---

① 指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译者注

② 指1900年八国联军进军北京事件。——译者注

③ 日俄战争时间应为1904—1905年。——译者注



明治时代前半期,我国外交上的最中心的课题是修改各种不平等条约,在这个外交交涉过程中,日清战争成了一个重要的机缘,由于这个机缘,我国实现了这一夙愿,成为亚洲最先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家。接着,又战胜了俄国,这一胜利,给亚洲各民族带来了强烈的震动和觉醒感,日本一跃成为东方的冠军,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幕府末期的紧张感中摆脱了出来,这种解放感,唤起了各种各样的与“国民使命观”相关的议论,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以日俄战争为界,战争以前,可以说是为了维持自己国家的存活而拼命奋斗,战争以后,我国渐渐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宽裕,到了可以来考虑自己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理由的时候了。位于远东地区的一个小国,废止闭关锁国以来仅仅过了半个世纪,现在一跃成为东方的冠军。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全面肯定明治以来的近代化过程的基础上,设定未来行动的目标,这恐怕是很容易想象的事吧。当然,由于日本近代化的早熟而出现的各种不合理的东西,在明治末年,已经引起了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怀疑。但是,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国在世界史的舞台上一步一步登场的实感,使得人们更加斗志昂扬。像“开国进取”、“取长补短”这样的明治初年的口号,在新的时代里,被更加具体地发展了。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从日本的指导层口中,可以经常听到“日本国的天职”、“新日本的使命”等语句。这里,我们可以把大隈重信(1838—1922)的“东西文明融合论”作为典型的例子举出来看一下。

大隈重信是明治维新以来“开国进取,取长补短”主义的代表者,其实,在他的心目中,“开国进取,取长补短”已极其卑俗化,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这位政治家,在确信了“日本早非日本之日本,实已是世界之日本”以后,这样说:“代表东方文明,同时又将西方文明介绍至东方,我国即处于此等地位。”(《新日本论》,载于《经世论》大正元年版)据大隈之言,日本在明治以后,已经是“足能经受(国际性的)生存竞争”了。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之所以能获得大胜,完全是“得力于我们过去数千

年之民族素养及……遵守开国进取之大方针,锐意学习欧美文物制度,取其之长,补己之短”的结果。这个结果,使我们国家顿时登上了“对东方,我们乃西方文明之说明者”,“对西方,我们乃东方文明之代表者”的宝座。也就是说,日本占据了东、西两个文明的媒介者的地位。那么,日本的这种特殊的地位,赋予了日本一种什么样的使命呢?“成功地调和东西文明,使世界文明更加醇化,迎来人类之和平,谋求人道之完美,此乃我国国民之理想,日本帝国之天职也。”大隈几乎可以说是用这种天真的态度来唱说了他的东西文明融合论的。在大隈看来,只有这,才是我日本国的使命。时代赋予这个“世界之日本”的使命,就是融合西方文明的“文化革命”(Kultur Mission)。

这一使命之所以成为日本的使命,是因为它是“西方文明之说明者”。然而,日本同时又是“东方文明之代表者”这一点,在使命观的意识构造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里我们有必要将这一问题再稍微挖得深一点。如果要问为什么有这个必要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因为这样做能够把与“国民使命”相关联的一些常用词,比如,“文明”、“文化”或者“东方”、“西方”等词语中所包含的内容,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的一部分使之明确化。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大隈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西方的,而又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东方的?怀着这样的兴趣来看待当时的大隈时,“日英同盟”和“支那保全论”这两个紧密相关的素材便浮现了出来。

众所周知,日英同盟是三国干涉还辽以后,在远东地区孕育着危机的政治形势下,在与所谓日俄间进行协商这一外交路线进行了不断的较量,控制了局势以后,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缔结的。对于日英两国的结盟,大隈始终非常积极。其实,早在日清战争结束的时候,大隈就表露出了这一构想。明治三十一年,隈板内阁时,任命加藤高明来担当这一交涉。在眼看这一同盟就要结成时,高兴之余,大隈冒着大雪,“首先拜访了外交大臣小村,祝贺大功告成,在归途中,又拜访了英国驻日公使麦

克唐纳(Sir Claude M. MacDonald)<sup>①</sup>,争先献上了祝词”,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大隈侯八十五年史》第二卷)那么,他对这一同盟抱着什么样的期待呢?对于作为政治家的大隈来说,其最大的企图大概是,在英、俄、德、法利害错综复杂的远东地区求得日本自己的安全吧。然而,在诸国中,大隈尤其想求得英国的提携。从这一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隈的企图首先在于对中国的关系上。大隈针对日英同盟,这样说:

(如今,英国)极爱和平,已达到文明之最高点。(日英同盟就是)英国与东方勃兴之国日本以同等之权利,维持东方之和平,不使支那灭亡,无论如何将维持其现状,欲使支那之大市场均等面向世界——并非日英独擅其利,乃均等面向世界——开放之条约。为世界之文明,为世界之利益,此乃最有力、最有效之方策。(明治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东邦协会上的演说词)

在大隈看来,“日英同盟”的效力只在于“支那保全”,而且被看成是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手段。从这个构想中,可以找出潜藏在大隈心灵深处的几个理论根据来。这就是:(一)“东方勃兴之国日本”追求“近代西方”文明,其结果是,现在的日本在东方已经取得了能与英国比肩的地位;(二)与此相反,中国因为“无视世界文明”(《东西的文明》,收录于《经世论》),眼下,已面临亡国之深渊;(三)并且,在大隈看来,“世界之骚乱,一言以蔽之,乃为文明之不均衡所引起”,“高度文明国家之势力”,“通过诸种形式侵入低度文明国家”,由此而产生的抗争,“将激起波澜,亦会演化为战争”。从而,“协调文明高低之差,使世界各国国民之势力均衡”,此举“方为确保世界和平之良策”。(同上)这样,在大隈的理论体系里,日本与英国的结盟,直接与“支那保全”联系在一起,把东方问题的处理放进了日本与西方二者之间所缔结的关系中去了。

但是,这一构想与前面所叙述的使命观的构想不矛盾吗?大隈的图

---

<sup>①</sup> 括号内的西文姓名为译者所加,下同。——译者注

式要想成立的话,就不得不将文明一元论作为前提,也就是说,文明这个东西,就像“如水就低”一样,从“开明国”流向“半开明国”,并且,这才是真正的“文明进化”。这里,如果更加历史地、具体地来说的话,那就是,只有西方文明才是文明。因此,在这种场合下,面对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东方文明”,在大隈鼓吹日本国使命的一瞬间曾被利用过,但是,在面对“日英同盟”和“支那保全论”这些牵扯到东、西两方的现实问题时,“东方文明”就在他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当初强调日本的“文明的媒介者”这一地位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也许就是明治以来日本所采取的路线以及作为这一路线的投影——使命观的一个典型事例。

大隈从英国那儿学来的东西,就是完全根据“近代西方”的模式来进行文明开化,“白人之负担”(white man's burden)这个词能够代表他的这种文明开化方式。所谓日本是“西方文明之介绍者”,这句话的意思无非就是,日本最完美地吸收、消化了西方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成了“东方之代表者”。也就是说,在依照近代西方的逻辑而设定的坐标轴上,日本,是能够占得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个东方国家。正因为如此,日本才是作为“西方文明之介绍者”的同时,又成了“东方之代表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日本即使能成为东方的代表者的话,也绝对成不了“东方文明之代表者”,倒不如说,日本不过是东方世界中西方文明的代表者而已。从而,我们把“日英同盟”与“支那保全论”这二者的结合,看成是想完全模仿西方的方式来向中国渗透,看来并不过分。主张为了世界的和平而“保全支那”的大隈,最终走向了把“对华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的道路,这太具象征性了。当然,在国际关系这个真正的政治舞台上,日本其实很早就采用了西方人的手段,一方面还在努力争取修改本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同时,一方面就将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了朝鲜(《日朝修好通商条约》),这些史实,至今尚被人们屡屡提及。在这里,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大隈一边站在当时日本的立场上谋取国益,一边

又把“东西文明融合”的使命作为日本国的天职，这与其说是他超越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悖离这一高度，倒还不如说这是他难以隐瞒的虚伪或伪善。大隈所谓的使命观的本质，在这儿渐渐地显露了出来。

正像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吸收西方文明成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明治以来，日本在东方殖民地化的危机中，一心追求自己的“生存逻辑”，最后，日本把西方式的“生存逻辑”完全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因而成了西方文明在“东方之代表者”。但是，将所谓的西方文明的“生存逻辑”就这样拿来作为东方国家日本的“生存逻辑”，不用说，是不可能的。弱肉强食的逻辑，即使在近代西方的逻辑中能站得住脚跟的话，在正因为这一逻辑而日益受到生存威胁的近代东方世界里，却是行不通的。近代东方，必须有自己的生存逻辑。然而，正是日本已经成了“世界之日本”，在这个世界里，日本的使命——日本的生存逻辑被提出时，大隈用最容易的方法，简称“东方文明之代表者”，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自己的“生存逻辑”。这时的日本的“生存逻辑”，说到底，仅仅是借用了“东方文明”这个词，这不过是一件饰物而已。说到这儿，“东方文明”是什么？不，“文明”到底是什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一个中国人的强烈批判中，潜伏在文明中的悲惨、虚伪就再也明白不过了。

日本无趾人大隈重信(大隈曾遭武装袭击失去一脚，故言。——著者注)尝演说亚洲事，支那人、印度人皆往听。无趾曰：“亚洲文明之国，今以日本为第一，次即支那，若巴比伦、印度辈，往日文化虽可观，今则不足比较。”……夫怀势利之心，以观文化，固无往而不抵牾。假如印度得独立，一战遂胜英人，文化高下，未必遽胜于昔。窃以无趾闻之，其论意当与今异矣。人性固多有侈慢者，亦多有猥贱者，侈慢、猥贱，二者兼存，令得良医诊其神经，不知作何形状也。(《印度人之观日本》，《太炎文录初编》。岛田虔次著：《关于章炳麟》(下)，收载于1958年6月《思想》。此文后收入岛田的《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筑摩书房1965年10月版。着重号为著者所加，下同。)

当时,正住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家章炳麟(1868—1936)称,大隈嘴里的“东方文明”,其与真正的“东方文明”名不副实,而且,大隈所理解的“西方文明”,根本就配不上“文明”之称。章炳麟的“夫怀势利之心以观文化”一句,就是最尖锐的揭露。

我们也许把话题过多地集中在政治家大隈的身上了。大隈被中江兆民(1847—1901)讥为“投机商”(《一年有半》),在知识阶层中,大隈屡屡被贬为“肥后之俗物”<sup>①</sup>。对于这样的一位政治家的使命感,若要求他有严密的理论或坚强的信念什么的,或许反而是不妥当的。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大隈给日本提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因而,探讨大隈的使命观的实质,说不定比我们预想的要重要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展现当时日本人使命观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日本的使命观中的误区。对于战前的日本人来说,在考虑中国问题时,能完全突破“文明国家日本将文明传播到非文明之支那去”这个框框的人有吗?同时,把“这对中国具有何等意义”,“日本对东方担负着何种使命”这样的课题追究到底的想法,真的存在吗?当时,放弃了自己寻找自己的“生存逻辑”的努力,简单地借用“东方文明”的日本,或多或少,没有一天不被这种虚伪的意识带来的矛盾所困扰着。<sup>[1]</sup>

那么,抛却这种伪善和虚伪,寻找“世界之日本”独自の使命,这条道路在哪儿呢?如果一开始就将日本的近代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独立完全看成是吸收近代西方文明的结果的话,再想要寻找这条道路是极其困难的。在这儿由于文明被一元化地浓缩成“西方文明”,因而,“近代东方”被视为非文明的地域。西方和东方,在单纯的地理、人种上被区别开来的同时,又被“文明”和“非文明”这个尺度划分了开来。要想将这盘根错节解开,要想抛却伪善,找到奠定“世界之日本”的的使命的方向的话,非常

---

① 肥后,日本古藩国名,今九州熊本县,大隈的出生地。——译者注

有逻辑性地说,大概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也就是,敢于代表东方的“非文明”,向西方的“文明”挑战,或者由此成为东方的代表性,或者使自己处在西方“文明”的海洋之中,不断地对之进行彻底的批判,由此而打开一条新的道路。这个困难的课题,我们可以从北一辉和内村鉴三的事例上来考察,从这两个人的生涯中就可以预想得出来,这是一条艰险的道路,而且,北一辉、内村鉴三的这种尝试并不能说就取得了十分的成功。但是,无论如何,作为第三者的北一辉与内村鉴三,在近代日本的命运中,将“生存逻辑”和“伦理”这一课题追究到了极限,通过对这一课题的追究,作为一个亚洲国家的日本,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使命应该是什么,他们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

接下来,我们想从内村开始讲起。

### 三 内村鉴三

内村鉴三(1861—1930),作为近代日本的绝对非战论者而闻名,同时,又是将“日本之天职”、“日本之使命”与非战论紧密结合起来作了深刻思考的为数不多的思想家之一。(与之相关的主要著作有:《日本国之天职》,明治二十五年版;《失望和希望——日本国的前途》,明治三十六年版;《日本之天职》,大正十三年版;等等)针对上述问题,作为基督教徒的内村的立场是,“世界之日本”,凭着自己伦理上、思想上的伟大,应该将为世界作出贡献作为自己应尽的使命。(《世界之日本》,明治二十九年版)内村的这一立场,不单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才产生的,他为了贯彻自己的这一立场,不用说,“为国人所抛弃”是理所当然的事,甚至还被基督教会所抛弃。(《基督信徒的安慰》,明治二十六年版)在近代日本社会中,为了不断地注视“日本之天职”,内村也就不得不在东方与西方、世界与日本这种地域和国别的宿命论的瓜葛中无休止地进行肉搏。在讨论内村时,为了使问题的所在更加明了,我们想采取与讨论大隈时同样

的方法，首先将日英同盟这一现实性的政治课题作为线索，来展开我们的考察。

明治三十五年二月，内村在《万朝报》上，以三回连载的形式，发表了《日英同盟之所感》。文章一开头，就用了这样一段话：“国人皆悦，唯余独忧，此或许被视作好奇。然悦不应悦之事，窃以为此乃对国家有欠诚实之举。”这一首题，可以将它看成是内村对日英同盟所持的态度以及向世人鼓吹自己信条的最为明白的表白。内村认为，英国这个国家，在信、义上都是“不足以信赖之国”，最近，又在南非战争中镇压了争取自由独立的战士，因此，与英国缔结盟约，就是意味着引不义之国为同盟。内村接着说：

俗人辈或云，与南非亡国之民为敌，又有何害？是乃九州人大隈伯所言乎？抑或俗人辈集合体之进步党之舆论乎？……然真正之日本人则不信此。真正之日本人确信，与有义之人为敌者最为可怕，盖与义人为敌者是与天为敌也，其恶果则将延及至永远。……天，于为利益而逞强欺弱，陷弱于悲境者，无有不罚之理。今日，明治政府下之日本，将力量微弱之南非义士所期望之唯一希望扑灭，于是，天绝无忘却日本国此无情举动之理。日本国不止以其无慈悲之故为天所罚，既于朝鲜，于台湾，于辽东犯下大罪之日本国今又与英国结盟，此实罪恶之上更加罪恶。余辈每思此事，则觉如冰水灌顶。

是故，自今日起不消五年，日本人赞赏英国之声，定会变成咒诅之声。于今，相信不庆祝此同盟则显落伍之日本全国之新闻记者，不消五年，亦会掉转笔锋痛责英国之无情，亦会大声疾呼，痛斥曾经迫害余辈无罪教徒之基督教国英国之非行。然余于今日在此断言，当其之时，余则不当被责，余既已于今日在此历数日英同盟之罪恶故也。余下此预言，因此同盟，日本将陷入非常之悲境。余虽乃与政治无关系者，然余以信奉基督教之故，出此预言之时，丝毫无踌躇



之意。后日当有欲余责难基督教国英国之非行者，余为不应其时其要求，故于此时此处略放一言以表余意。

在内村的这一“所感”中，大凡生活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的人的形象，几乎被完美地、纯粹地刻画了出来。从这儿开始，会有各种各样思想上、信仰上的问题向我们活生生地逼来。但就与内村“所感”相关联的来说，内村断然反对日英同盟，是因为英国是不义之国，确实内村想到的就是这一点而已。与大隈完全相反，内村从“义”的世界来眺望这个先进的西方文明国家英国，把英国的价值剥夺一空。

那么，内村到底是将西方文明放在什么位置上来看待的呢？我们想把时代再稍微往前推一点，来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正如为众人所共知的那样，在日清战争期间，内村主张这场战争是“义战”，用“义战”来向世界表明，“日、支两国之关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关系”（《征诸世界历史论日、支关系》，明治二十七年版）。他一直把日本和中国比喻成希腊和波斯，根据这两国的历史，认为他们各自代表了“自由与压制，希望与回顾，进取与退守，欧洲主义与亚细亚主义等正反面”，并且，这二者是不可能“保持和平共存”的，“日、支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如是日本败北，于东方，则个人之发展将受防阻，自治制度将归废灭，美术将失，文运将颓，亚细亚固有之旧态将使东方五亿生灵沉迷于梦中”。在内村眼里，这时的日本是东方新文明——自由、希望、进取、欧洲主义——的唯一的代表，战争的目的正是“在使支那惊醒，使其知吾之天职”（《日清战争之意义》，明治二十七年版）。也就是说，已经觉醒了的日本，向亚洲传播新文明，这就是天职。在明治二十五年的《六合杂志》上发表的论说里，他这样写道：

余坚信，欲使器械性之欧美介绍于理想性之亚细亚，欲以进取性之西方打开保守性之东方，是东、西两方之仲裁人之职，乃吾日本帝国之天职也。（《日本国之天职》）

从内村的日本是“西方对东方之先驱者”,又是“东方对西方之辩护者”(《大日本》,明治三十年版)这一论说中,可以看出他的“国民使命”观来。虽然,在这一点上,内村的国民使命观与大隈的“西方文明之介绍者”、“东方文明之代表者”相比,包含着大隈所说的使命观无法比较的严密的伦理性。但是,他所说的“东、西两方之仲裁人”,是这一时期内村要求日本国民担负的使命,再者,日清战争的“义战”性,也正是在这一路线的基础上产生的。内村又在另外一个场合,针对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立这一课题,进一步进行了追究。他这样说:

而日本立于东方西方之间,当取何种战线,现今尚不可决定。既已西洋化之日本,应援助西方使东方西洋化?抑或固执自己之东方主义,筑成对抗欧洲前进之防塞?新装备之陆军、新造之巡洋舰、战斗舰,可用于保护印度之种姓制度乎?使西藏之喇嘛教、支那之先祖崇拜来对抗康德、黑格尔之哲学,或来对抗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伯克(Edmund Burke)、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之思想而创立之政治制度乎?抑或以此为武器,打破亚细亚专制主义之外壳,拯救万民,使西洋诸国历经数世纪之斗争方赢得之自由之光普照大地。(《短言录》,明治三十年十月十七日《万朝报》)

在这一时期的内村看来,能代表西方文明的首先应该是英国。产生了弥尔顿(John Milton)、克伦威尔的英国,在这一高度上能被高高地评价的同时,那么,在现实政治上,也应该是最值得信赖的国度。例如,在劝说陷于财政困境的中国向英国借款时,他说:

支那向英国借款,支那可因此为接受各种近代文明之福祉而作准备,得世界最强大之和平爱好国如此慷慨之援助,于此点即可言之受惠也。……她(指英国)应尽凡有之手段以保护,保证支那之独立。(《英支借款》,明治三十一年版)

在这里,再明白不过了,英国,是他希求的新文明的代表者,因为,这

个文明的领袖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和平爱好国”。故而，以“西方对东方之先驱者”自居的日本，与英国的结盟，甚至可以将其看成是实现自己使命的最忠实的做法。

内村接着说：“余辈坚信，依吾等所考虑之日英同盟，此方策（英支借款）乃远东和平维持之最本质之援助，此乃使支那成为幸福，文明国之大大所为也。”（同上）这个时候的内村与数年后完全相反，认定日英同盟是我国应该采用的唯一的前进道路。他之所以希望采用这条外交路线，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受到了当时沙皇俄国这一现实的政治形势的左右。如果完全是这样的话，那么，针对野蛮、专制的俄国的日英同盟，就更值得期待了。内村在接受与日英同盟相关的报道时，真如字面上所示的那样一喜一忧。（《短言录》，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八日《万朝报》）

但是，内村的这种构想——“西方对东方之先驱者”日本→“西方文明之代表者”英国→“日英同盟”——很快就被打破了。很快就被打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应该是正义之战的日清战争，在战后的善后处理中，单是眼睛看得到的就显露出了太多的残酷的“不义性”。另一则是，几乎与日清战争平行，爱好和平的国家英国在南非强硬地发动了“不义之战”。日清战争的善后处理与南非战争的爆发，内村的期待完全被背叛了。明治三十三年，以这场战争为契机，内村不仅仅是在对内方面，并且连对外方面，都笼罩上了一层强烈的失望感。日清战争正在进行之中时，内村断言这场战争是一场义战，其义战的性质在“战争结束之后自会明白”（《日清战争》，明治二十七年），但终于，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我国口中“宣言义战而实行掠夺之实”的“伪善”（《世界之日本》，明治二十九年版）。同样，在南非战争中，“西洋主义”的旗手英国，蹂躏了要求自由、独立的两个共和国，这是想避也避不开的事实。

由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而导致的这场战争，其对象均是共和制的基督教国家，仅此一点，就会给内村带来非常沉重的打击。内村揭露道：“英国之基督教，不过是英国之国教会教而已，其自由，无非是利己主义

而已。史上,如斯之欺瞒,稀有其例。”(《两共和之死》,明治三十五年版)对于这两国的灭亡,内村送去了多么同情和安慰的言词,在这儿,我就没有必要详说了。但是,时至今日,在内村看来,日本已绝不能再与英国结盟了。曾经寄予了内村无限希望的“日英同盟”,至此,已经只是一个不义的“野合式的同盟”了。(《杜军之大胜利》,明治三十五年版)在大隈扬言“日英同盟”的成功能使“支那”得以“保全”,能确保世界和平之时,内村却从这一同盟的不义出发,对将来的路线下了完全相反的预言。“……英国与其同盟国日本,自今将日益扩张其军备,……瓜分支那,割取朝鲜,积黄金于其国库,以富强夸耀于万世。君不见,其议会日日腐败,其道德月月堕落,其民众全绝天之光明,甚至白昼尚有黑暗之感。”(《慰布尔人》<sup>①</sup>,明治三十五年版)这一预言,一语道破的惊人之处,恐怕谁也不会否定吧。在这儿,内村完全是以一个预言者的风貌登场的。

不过,我们在此还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英国在实行这种“欺瞒”时,内村对“西洋文明”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像大隈那样,恬不知耻地把西方的“欺瞒”乘上一个平方来鼓吹“虚伪”的例子,当不在讨论的范围之中。但是,在内村的面前,应该有着一种对西方文明难以名状的幻灭感。一般说来,碰上了这样的挫折以后,或许会回到东方的立场上来,也或许会反过来产生深入到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之中去,将事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志向。这种转换,或多或少,在面临东方抑或西方的选择中决定我国的前进道路时,在知识阶层中间,是屡见不鲜的。然而,内村所找到的路,却与上述二者均不相同。内村并非在同一个高度上单纯地回归或排拒,而可以说,他是进一步深入到西方文明之内层,再将之突破,由此而获得了批判西方文明的视点。在内村的突破中,不用说,《圣经》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

<sup>①</sup> 布尔人为南非荷兰殖民后裔。——译者注

内村的思考过程,首先是从将基督教从西方文明中剥离出来开始的。明治三十五年的论说《世界之状态与吾人之希望》中,可以说将这一思想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在他的论说中,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世界的文明国家,虽说几乎都是基督教国家,文明、进步,看起来就像要将这个世界一步一步地变成乐园。但将眼光转向其内部,看一看其实质的话,毋宁说是一派值得悲哀的退步。南非战争中,英国采取的却是什么行动呢?“向世界夸耀‘圣书乃吾国建国之基础’之英国人,将力量微弱,不足可取之二基督教国灭亡,乃至以此向神圣奉上特别感谢之祈祷,此世不亦同回至太古之野蛮无异乎?”北美合众国又是如何呢?“其国民口之所言者唯金钱”,“金钱乃彼等之真神”。从而,“完全无法期待这些国民对他国之自由、独立寄予同情”。在内村看来,如果对照《圣经》来看,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均非基督教国家。这时,内村给这些文明国家下的定义是,“彼等乃贴上金箔之伪善国家”(《和平之福音》,明治三十六年版),用这些猛烈的语句进行了批判。曾经在内村的心目中是进步与自由的象征的这些文明国家,内村根据《圣经》——基督教真正的教义,给他们断了罪。内村将摆在日本面前的西洋之基督教与基督教文明这二者截然区别开来。

那么,以西洋新文明的介绍者而自居的我国又怎么样呢?基督教与基督教文明这二者的截然区别,在日本决定自己的前进道路时,当然也是清晰可见的。内村说:“欲问日本之大困难中之最大者,余在此即可明白申答,乃日本人所采用的是基督教文明而非基督教。”(《日本国之大困难》,明治三十六年版)内村在找出了基督教文明国家的“欺瞒”行为时,他选择的道路,不是置之不问,也不是立刻将这一文明抛弃,而是反过来,采取断然的决意,“应为今日之事”考虑,日本国“自今日起,仅采用成为西洋文明真髓之基督教即可”。

因为内村是基督教教徒,他下这样的决心,或许可以看成是当然的事,甚至将它看成是基督教徒的义务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一决心是内

村在考虑日本国今后的前进道路时所下的，这样，料想不到的是，“生存逻辑”和“伦理”这一使命观的最根本的课题，从正面摆到了他的面前。从此，内村的使命观的核心问题就浮现到了我们的面前。

正像我们已经论述的那样，日本的独立是吸收西洋文明而获得的。日本在西方优胜劣败的帝国主义伦理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逻辑。在伦理方面，西方的伦理也不可抗拒地呈现在日本的面前。然而，在这种场合下，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逻辑，并不单单是生存的逻辑。西洋以其进步的象征以及绝对的优越性出现，可以说，在这儿，以两种姿势投影到了我国的面前。以大隈为代表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西方的“文明化方式”（白人之负担），没有任何抵抗地就被接受的理由，可以说，其一半也就在这儿。内村的情形也绝非例外。内村在主张义战时，他的日本国生存逻辑也是从西方主义所显示的进步理念中找来的。换言之，在这里，日本从成为强国的生存逻辑，发展到在这之上的东方之文明化这一生存伦理，比较顺利地接续了起来。故而，内村对日英同盟所下的论断，不用说，无疑是他对这个命题产生了根本性的疑问的结果。如果世上的所谓文明国家均是贴上金箔的伪善国家的话，那么，“所谓进步，难道就是成为文明国家吗”？还有，“所谓进步主义战士之使命，难道就是主张义战，将非文明之地域文明化吗”？内村从这种怀疑与理智的格斗中，终于在采用真正的基督教这一理念中找到了日本前进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内村面对日本比较顺利地得到的生存逻辑与伦理，以及日本的近代化过程，站到了针锋相对的立场上来了。但是，如果日本的前进道路应该被如此地决定下来的话，那么，我国对东方，还有，对世界，应该负有什么样的使命呢？不，在这以前，我国是想在什么样的路线下寻求自己的生存逻辑的呢？在这里，恐怕是已经要超越单纯的东方与西方的对立或融合这一高度，而不得不将问题凝聚到一个国家的生存逻辑与伦理——或者说是权力与道德——这个最根本的课题上来了吧。在决定日本前进道路的背后，内村不可避免碰到的问题，也正是这一课题。内

村的从日清战争时期的“义战”主张到日俄战争时期的“非战逻辑”，这一转换，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在向这一课题接近的过程中结出的果实。

在这里，关于众所周知的转换，再作详细的叙述我想大概已经没有必要了。为了紧扣本稿的主题，我们想把话题只局限在一个问题上。内村曾经在叙述“日、支之冲突不可避免，二者冲突而日本之胜利，乃人类全体之利益世界进步之必要”时，对他来说这是“历史之所保证，人类进步之所促”。（《征诸世界历史论日、支关系》，明治二十七年版）这样，内村仅根据这一“进步之逻辑”，得出了国家权力的对外行使是“义”这个结论，在这个范围内，被赋予了逻辑性。生存的逻辑与伦理的连续性，当然，是从这些方面而来的。但是，二者的如此这般的连续性，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在此，如果我们再一次回想一下近代日本的命运的话，其中所包含的问题，恐怕就能很容易地想象出来了。我国在亚洲诸国中最先实现了独立，在这一过程中，求得了亚洲的觉醒或者亚洲的解放。在明治以后的日本，大凡追求我国之使命者，不首先从这一点出发的人，可以说是极其稀少的。然而，这一国民的使命感，随着不同的形势而容易地转化成一种虚伪的意识，这是什么原因呢？虽然，与其他的亚洲诸国同样，日本在为摆脱危机而苦恼时，可以说，因为各国的情况有着直接的同—性，因此，这一使命观还能受到“亚洲提携”的这一伦理性的支持而存在。但是，一旦日本爬上了强国的地位后，在同样的伦理下，没有任何阻挡地把“解放亚洲”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使命，在这使命感的名义下，适行其反，对亚洲进行了实质性的侵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有一个潜藏在日本社会中的最困难的课题，内村在其非战论中，对这一课题作了执拗的追求。

作为基督教徒的内村，他的非战论的根据——和平的福音，不用说，自然是《圣经》中找来的（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五十二节）。当他展开这一思索时，同时对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近代西方逻辑进行了挑战。内村的《非

战论之原理》(明治四十一年版)中展开的思考过程,绝不是一种说教者的口吻,他展示的是从与日本的命运密切相关点出发追求前进道路的原理性的思索。他首先设问:“战争乃自然之规律,进化之原理乎?”如果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斗争是“进化之原理”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就能保有一定的伦理性。然而,针对这一设问,内村说:

诚然,战争于广阔之自然界展开,优胜劣败之原理,于自然界亦无处不存。吾承认自然界战争之存在,于某些方面而言,亦承认其利益性,然于此有一值得注意之事,亦即自然界之法则不仅限于战争。于自然界,与战争共存者,尚有协同、一致,尚有爱怜、牺牲,万物进化至今,非皆由战争也。将优胜劣败只限于战争一面,是为极浅薄之自然观也。

譬如,狮子与鹿相争,无疑狮子取胜。然鹿有狮子不具备之“群居性”、“相互共济性”。若言之于战争,则鹿定负于狮子,若言之于繁殖,则狮子远负于鹿。若于力量而言,原始人则远劣于大猩猩、黑猩猩等动物,然弱小之人类终成世界之主人公,这是为什么?“设使战争之优胜劣败乃支配自然界之唯一最大势力”,则今日之世界何以存在,“自然界绝非强者必胜,劣者必败之世界”,“毕竟,爱与正义乃是一种占最后胜利之家族”,“主战者宣传此为自然界之事实,其说定难以维持”。在内村看来,越是向自然界学习,人类就越应该是和平的宣传者,只有“爱与正义”,才是“进化之原理”。内村的这一论说,具有何等的实证性和说服力这一点我们先不问,我们只要确认了内村是怎样把优胜劣败的“进化原理”的含义转换成“爱与正义”是“自然之法则”的,这就足够了。

内村接着又设问:“若自然教会我们和平,人类历史则无休止地告诉我们战争之必要”吗?“人类之历史实则战争之历史”吗?无须赘言,他在此将“战争与自然”这一问题更加升华,想进一步追究“历史上之战争”,亦即营建社会生活、建立国家的人类世界的战争的意义。他说:“诚



然，因战争，国家由此兴盛，然其灭亡者，亦由战争也。战争固为破坏性之事，故而，破坏他人之同时亦破坏了自己。欲以战争破坏他人而使自己避免破坏，此举似能而实不可能。……此既为上帝之教诲，亦为自然之规律。”按内村所说，以剑兴者必以剑亡——亚述、巴比伦、马其顿、罗马、西班牙，无论哪一个，都没成为例外。如果像观察自然那样，“不从狭处而从广处，不从眼前而从长远”来看历史的话，这一事实就太明白不过了，这不单单是上帝的教诲，也是自然的规律。如果一个国家想生存下去，那它就绝对不能挥起它的剑来，“征服支那之危险在于终究为支那所征服”。因此，日本想生存下去，就不能战争。换言之，内村在这里否定战争，主张这就是国家的“生存逻辑”，这个“生存逻辑”就是非战，而不是其他。如此，他断言，战争，不仅在“生存伦理”中，而且在“生存逻辑”中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战争之休止，并非吾等非战主义者高唱非战论之结果。有上帝命令之，有自然要求之，故战争终将休止。进化之原理于今日是否即刻归无，此事姑且不论，即若单循宇宙与人类演变至今之经路而进，则战争终将休止。

我们大概从中已经可以看出内村作为非战论信仰者的热情了吧。在这里，他同时有一种把日本命运中的生存逻辑与伦理这个课题追究到极限的思索。“进化原理”，不是优胜劣败，“生存逻辑”，不是弱肉强食。反过来，“爱与正义”，是自然的规律，是神的教诲。这时，在内村的眼里，日本的前进道路是再也明白不过的了。这就是，在否定一切权力的基础上，形成伦理，以这一强大的伦理成为世界之强国。他在明治三十八年，听到战争终结的报道后，写下了《和平到来》这样一篇文章，文中说，“吾等……不得不图画我邦和平膨胀之事”，“所言和平膨胀之策，乃是以人类之观念为基础之教育普及”，“欲使世界日本化，则日本终将灭亡；若将日本世界化，则日本终将为世界之强国”。

当然,日本的世界化这个命题,并不是内村至此时才提出来的。早在否定优胜劣败,甚至还是在日清战争之际,内村就提倡了。他在那个时候论道:“由日本国之奋起,历史将转向新方向,劣者不因优者而灭亡,败者将依胜者而更起。”(《日清战争之目的如何》,明治二十七年版)示意了历史的转变。但是,在他体验了日清、日俄战争以后的日本与世界的动向以后,通过对这一课题最原理性的追求,最终从“生存之伦理”中找到了“生存逻辑”。

在这里,我们对内村使命感所具有的意义,似乎已没有详言的必要了。一句话,这是在维新以后的日本,实现独立,成为东方冠军的历史过程中,对我国应担负的使命这一课题作出了解答,树立了一个典型。东方的先驱者,不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追随者。如果一旦成了追随西方帝国主义的先驱的话,那么,他只能是走上灭亡之路的先驱者。世界之日本,只有凭借其伦理的伟大,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样做,反而是找到了自己能够在世界上生存下去的道路。内村的这样的思索,本来是过激的。虽然如此,但这里内村所提出的路线,却是针对日本应该为了东方成为先驱者,并且,由于这一特点,日本还应该为世界作出贡献,为了实现这一使命,路在何方这一问题作出了最原理性的指示。如果用现实的历史推移来对照的话,可以说,内村的这种使命感——当然,与日本所走的路相差得太远了——成了完全被忽视了的少数派。不仅日本是这样,而且,世界的大势也与内村所期望的方向完全相反。但是形势越是这样,内村就越是抱着末世论式的期待,依据“不从狭处而从广处,不从眼前而从长远”来看历史的信念,不断地向人们提示日本的使命。

明治结束,迎来了大正。第二次日英同盟的缔结,日韩合并,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日本的前进道路也发生了几重变化。在这期间,内村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向日本今后的前进道路问题投出了尖锐的批判性眼光。在《和平到来》一文中,他说:“吾等之子弟……不得不于印度、阿富汗国境流血这一惊恐之时或许即将来临。然今日之所言今日,虽暂时

已刀剑入鞘，然我等仍需极力大唱和平。”在美国公布排日法、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在这沉重的冲击之中，内村时而排击美国的伪善（《美国之消亡》，大正二年版），时而将欧洲大战喻为“诺亚之洪水”（《忆诺亚之大洪水》，大正四年版），悲痛地向世人发出了世界性危机的警告。这固然是内村从自己的使命观的深处发出来的呼唤。

这里，与之相关，还有一个不得不注意的是，内村给日本规定下了使命，在高涨的末世论的紧张中期待其实现时，西方与东方，以一种全新的意义展现了出来。曾经被认为是进步与保守相对立的西方主义与东方主义的相克，由于基督教国的伪善，更由于眼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文明的没落，在内村的面前，呈现了异样的相貌。世界大战，由所谓的最进步的西方文明国家挑起，表明了这是“西方文明之精神”在“享受征服全世界之快乐”。（《基督教与西洋文明》，昭和二年版）至此，西方文明不仅早已不是基督教，而且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是“基督教之敌”了。（同上）

与西方的精神没落过程并行，东方以其全新的姿势出现了。内村这样说：“国家主义或是帝国主义，绝非于东方兴起之主义”（《基督教与东方文明》，昭和二年版），“基督教乃于亚细亚兴起之宗教……特别适合亚洲人之宗教”（《日本国与基督教》，大正十四年版）大正十三年，内村在一次就“日本之天职”问题撰文时，他认定，日本民族是“宗教之民”，“佛教于印度灭迹后于日本被保存，儒教于支那衰落后于日本被阐明”，与之相同，这次“为欧美诸国所抛弃之基督教，于日本保存、阐明、复兴，再使之以新貌传播于世界”。从中可以见到这一时期内村的日本使命观。内村的这样的发言，可以容易地察知其对世界及日本现状的激愤。为了这一现实，日本有必要兴起文明，这里的文明当然不是“既经实验以失败告终”的旧东方文明，而是“全新之文明”。（《基督教与日本》，昭和三年版）然后，日本为此恐怕有脱胎换骨的必要，这一想法是通过内村的弟子（矢内原忠雄）的口喊出来的，“日本哟，你死吧！然后复生！”在追崇耶和華、

基督的同时,尚对“J”——亚洲中的日本一直追求不息的内村的形象历历在目。

内村的使命感,因其过分严厉,常常使我们向后退缩。特别是到了晚年,对世界与日本的绝望度越是增加,他的期待感就越是亢进,最终,到了自己也想从自己的所谓使命观的范畴里脱身欲出的状态。可以说,这在他从“生存伦理”中找到了“生存逻辑”时,这种最终结果就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了。但是,从“西方对东方之先驱者——东方对西方之辩护者”这一认识开始,到最后“由宗教性之日本创造新文明”这一设想结束,内村使命感所经历的波动,可以把近代日本发展过程中派生出来的其他一些使命观中究竟在哪一点上会陷入决定性的虚伪这一问题,非常清晰地反映出来。

#### 四 北一辉

正当内村指责英国之伪善,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诺亚之洪水”,鼓吹日本的使命时,另外一位思想家北一辉(1883—1937)则从完全相反的侧面接近这一课题,为寻找我国今后的前进道路作了尝试。被说成是日本纯粹的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的北一辉,也正好在这一时期,与内村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比喻成“诺亚之洪水”、寻求“和平之福音”的同时,鼓吹的是穆罕默德的“剑之福音”(《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序言)。当然,对法西斯主义者的北一辉来说,在武力扩张中制定日本今后的前进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是极其当然的事。但是,仅限于这一点而言,北一辉所设定的路线,固然与大隈式的路线不同,也与其他日本式的法西斯主义路线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一区别在于,在北一辉的世界里,面对日本的“生存逻辑”,无论从哪一点来说,他没有披上“伦理”的面纱。换句话说,北一辉与内村相反,是从“生存逻辑”之中寻找“生存伦理”的。正因为这样,作为第三者,他揭露出潜藏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一种伪

善和虚伪,尝试着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超越这种伪善和虚伪。当然,北一辉的方法中所包含的严重错误,在今天,谁都能清楚地看得出来。并且,正像已经指出来的那样,在北一辉的思想中,有着某种思维上的跳跃。但是,北一辉试图树立的使命感中,很明确地显示了一个理论,这一理论是每一个想在近代日本的政治状况中彻底探求使命感这一课题的人难以避免的。那么,北一辉是在什么样的思索过程中接近这一问题的呢?在这里,想再一次回顾一下大隈式的路线,从这儿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大隈的“东西文明融合论”这一思想,在现实中,被所谓的“日英同盟”和“支那保全论”的对策所保证。还有,因此而弥漫的“令人作呕的道德化”,这里,我想似乎也没有必要再重复了。针对大隈式路线,北一辉首先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即从日英同盟与支那保全论二者绝不可能两立这一认识出发,开始发难。“以吾之不肖,坚信支那保全主义与日英同盟绝无两立之理。”(《支那革命外史》第十章)那么,他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呢?北一辉说:“吾等对五年前之支那怀亲近之感,于支那,则将两国同盟视作英国权益之保护,非视为日本之正义。以正义为根本之日本支那保全主义与保持权益之英国资本侵略政策二者之间,即使处于与俄国侵吞势力相对抗期间,外见之上似乎相似,然从其根本精神而言,乃水火之不相容也。”(同上)

也正好是这一时期,邻国的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1911),北一辉表示了异常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旋涡之中。这场革命,给东亚全局的形势带来了复杂而微妙的影响,尤其是对以“东方之代表者”自居的日本来说,今后采取什么样的前进道路这一点,给予了极大的影响。清王朝崩溃后的中国将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与之相关的还有,列强诸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应政策,这一重要课题,可以说对今后的历史进程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此时,在革命的旋涡之中,北一辉看到的是日本的外交路线中极其悲惨的英国追随主义。众所周知,在中国辛亥革命之

际,日本的对中政策陷入了极度的混乱,甚至陷入了所谓形势追随主义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存在着愿意支援南方革命派的以犬养、头山等人为中心的小团体。同时,另外一方面,也存在着以山县为代表的元老派,他们对邻国出现的共和制感到恐慌,蠢蠢欲动,想以清帝为中心,在清帝与革命党之间进行妥协。然而,一旦南北交涉成立,袁世凯(1860—1916)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马上又与英、美、德、法、俄诸国为伙,成为六国借款团的一员,一步一步地介入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战中。北一辉面对日本的如此混乱不定的对中外交政策,日本的“支那保全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再次成了他的设问对象。如果我国希望的是“单纯的权益保护”的话,那么,无论是“使清帝继续存在”,还是“拥立袁世凯”,还是“尽力扩展自己之利益权”,这不都是自我“损害其所谓保全主义”吗?如果“日本诚望支那之复活而力主保全支那”的话,介入六国借款团,“学欧洲各国之经济瓜分,……成为分我一杯羹之要求者,唯恐落人之后”的做法本身,不就是对“以正义为根本之日本支那保全主义”这一理念的背叛吗?北一辉将日本的外交路线定性为“于保全之名义下,扮演走狗,行瓜分之实”。从这些语言中,我们可以容易地看出,北一辉的主张与大隈路线是朝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的。正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大隈的“保全主义”,是与“日英同盟”直接连接在一起的,东方与西方两个文明国家共同协力来开发中国,这就是大隈的“保全主义”。这固然象征了大隈路线的西方式文明进化论的立场。但是,北一辉面对这样的一条路线,向它作了针锋相对的挑战。

无论以何种善意来解释,英国之保全政策<sup>①</sup>,无非为其确保扬子江流域之权益而已,此举明了至极。(同上)

在北一辉看来,英国对中国的保全主义政策,无非就是在文明的美名之下,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副假面具。也就是说,这是西方势力

<sup>①</sup> 指英国对中国的保全政策。——译者注

对中国进行直接瓜分的信号。从而，日本一方面不断高唱“保全”，另一方面，与“中国之吞并者”的英国结成同盟，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乖戾。北一辉揭露了存在于这二者之间的相互排斥的基本矛盾。

不用说，北一辉的这样的言论，并不仅仅是向大隈式的外交方针进行挑战，毋宁说是对潜藏在这一外交方针深处的欺瞒的一个猛烈的抨击。以东方的代表者而自居的日本，却模仿西方的方式侵略中国，从这一充满矛盾的现象中，北一辉看出了它的彻头彻尾的欺瞒性。“拜倒于白人国家卑鄙之高利贷政策之下，而欲求得支那之信赖，此乃发狂之亚细亚之盟主也”。如果日本是“亚细亚之盟主”的话，口中唱着“保全”，手中干着“瓜分”，这不单单是对中国的背信弃义，而且还是对自己的一种欺瞒。北一辉正是因为对这一欺瞒有了最锐利的观察，所以，他才对日本的外交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抗争。

从而，他对日本在中国的权益追求，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正好这时，日本的财阀，借汉冶萍借款等问题在全国各地进行活动，积极地想在国际性的对中国经济战争中插一手。北一辉面对这样的形势，说：

吾等否定所谓英国于扬子江流域之优越权，是不能容忍英国及诸列强以保全主义为名行经济侵略之实。而非三井大仓等“恶用”资本，替而代之，以颠覆国家正义耳。（同上）

在北一辉看来，权益的追求——经济侵略，对“以正义为根本之日本支那保全主义”而言，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在这里，北一辉有一个极值得注意的思想，那就是，要实现中国“保全主义”，其最终最理想的方法在于求得中国自身的自立。任何一个国家，要生存下去的话，其最终的挽救者，除了这个民族自身以外，别无他者。一句话，国家的存续，只有靠民族的觉醒才能达成。从而，日本在以保全主义的态度与中国交往中，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使中国觉醒，帮助中国自立。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北一辉称，凡是向亡国亡种的军阀提供借款的政策，完全是一种倒错的政

策。在这一点上,北一辉的批判淋漓尽致、痛烈至极。“傲慢而愚呆之日本朝野,欢呼支那之财政受六国财团之监督一事即为支那人之幸福,而对于白人投资下沦为卑下役吏之耻辱,则无所反省,道义丧尽。”北一辉把日本对中国所起的作用以及包含在其中的自我欺瞒,毫不留情地揭发了出来。对于当时的这种对中政策,北一辉与之相反,提出了与“革命派新兴阶级”联合的方策,认为也只有在这一方策之上,日中之间的真正友好才能成立。正在大隈叱责中国拒绝“二十一条”抵制日本是忘恩负义之时(《日支民族性论》,大正四年版),北一辉则从完全相反的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下了如下之判断:

所谓日支亲善,之所以仅停于口边唇头,并非对革命派新兴阶级无道义之感,而是日本之支那保全主义仅是英国财政并吞之走狗,其道义全无活力,徒具空虚之名故也。(同上)

那么,北一辉是怎样设想日本今后的前进道路的呢?在此,他设定了这样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并不困难,也就是,日本作为名副其实的东方的代表者,为了东方而保护中国。此后,北一辉对自己提出的这一路线进行了彻底的追求。日本从沦为殖民地的危机中摆脱了出来,成了东方诸国之冠,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北一辉是从历史事实出发的。从而,作为亚洲民族主义先驱的日本,自始至终都应该忠实这一立场,以东方诸民族的独立为己任。在此,北一辉认为,日本的地位应该是“支那及其他黄种人独立自强之保护者、指导者,是亚细亚之盟主”(《支那革命外史》第十二章)。日本的中国“保全主义”,不用说,是意味着“保护四亿人民之独立”。换言之,北一辉在这里严正拒绝了大隈式的路线,从追求日本是亚洲的一员这一立场出发,极力试图树立与这一立场密切相关的使命观。正视西方对东方的侵略这一现实,北一辉鲜明地打出了“亚洲解放”、“亚洲人之亚洲”这一旗号。这样,北一辉在与大隈式路线的格斗中,从“亚洲解放”中找到了日本的使命。



可是,在这里,我们仍然有必要再次追究北一辉使命观所含有的意义。所谓的“亚洲盟主”——东方的代表者,北一辉赋予了它什么样的内涵呢?还有,具体说来,“亚洲盟主”这一理念是靠什么样的构想来支撑的呢?考察这一问题时,北一辉的西方与东方、“生存逻辑”与“伦理”这些复杂的关系自然地就浮现了上来。

首先,从西方对东方的侵略,并由此而激发的亚洲诸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一点出发,北一辉对西方采取的是完全对立的态度。从而,他对明治以后日本的发展,想将它解释成彻底的内发性的变革。按北一辉的想法,日本近代的发展,并不是吸收了西方文明以后才得以实现的,而是得力于日本自身的“兴国精神”。大凡一个民族没有觉醒时,无论有什么样的外部因素的刺激,国家的独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北一辉的根本信念。可以说,他认为中国的“保全”,归根到底要从中国自身的自立中去追求这一想法,也是与他的这一根本信念相关联的。故而,在北一辉眼里,西方诸国,绝不是日本所应该追崇的先进国家,相反,“崇拜欧美,侮蔑自身所在之东方而不觉为耻之日本人”只能沦为欧美的奴隶。日本是靠着自己的“兴国精神”,完成明治维新,一跃成为东方的代表的,而不是靠其他别的什么。北一辉的看问题的方法,在拒绝一切西方文明这一点上,是极其标新立异的。这样一来,当然否定了大隈式的取长补短主义,也否定了所谓的文明开化这一共识,而想将日本的近代化放置到“国民自卫的本能性发挥”这一基础上来。在这里,北一辉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倾向就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北一辉的这种国家民族主义倾向,即对日本的近代作如此这般的解释,完全否定西方-东方的价值序列,将此二者一味放到民族觉醒的高度中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北一辉将东、西两方的对立仅仅只放到民族存亡的立场上来考虑,因此,在这样的立场上,要想解决这一对立,那只有靠赤裸裸的“强力”。在他看来,除了赤裸裸的“强力”以外,别无他策。日本作为“亚洲觉醒史”的先驱者,获得“亚洲

盟主”之地位,正是源于通过武力击破俄国这场战争。在北一辉眼里,东方的代表者,只能与西方进行彻底的武装对立,通过抗争,才是取得权益的根据。从而,在北一辉看来,“亚洲盟主”,也必须以与西方进行武力斗争的“亚洲门罗主义之盟主”的形象出现。他为此设定了一个策略,以发动日英战争以及俄中战争来取代日英同盟。

在北一辉的这一主张中,明显地刻印着他的使命感构想中的一部分内容。正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他通过与大隈式路线进行彻底的决裂,试图树立与作为亚洲之国日本相称的使命感。然而,北一辉寻找的方向又是与内村完全相反,即他在彻底拒绝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将东方的文明丢弃了。他在涉及“东方精神”、“东方魂”的时候,只是从一点上来理解它的,也就是,他只相信民族的觉醒以及随着这种觉醒而应该产生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一辉为了否定西方的文明,大胆地选择了东方的“非文明”成分,试图用它来向西方挑战。北一辉将东方的代表者看成是势力、权力的代表者,这一点,在他的言语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然而,北一辉设想的这种使命感,是在充分认识了东方一步一步受到生存威胁这一现状的基础上产生的,这里,我们似乎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对北一辉来说,英国对印度的领有,俄国对西伯利亚的独占,都是“侵害他人利益以攫为己有”(《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卷八)的行为,这种行动,只能称之为不义,而无其他可评者。因而,为了东方的生存和发展,将这些势力驱逐出东方,在北一辉看来是一种正义的伸张。

日本为积极进取而战,非为单纯之我利私欲,乃为其他民族之觉醒,排除占有者及侵略者耳,应将打破此种现状之行动视作正义。  
(同上)

北一辉从这一生存逻辑中导出了“正义”这一伦理,并对此作了彻底的追求。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日本,要“匡正国际性之非正义”,对于这

一行动，北一辉将之全面地冠上了正义之名。北一辉对这一伦理进行了证实，断言道：“若此即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日本则应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欢呼声中，将之作为黄金之冠，加于自己头上。”北一辉在希望使这一使命全面实现时，称：“于强取他人寸土之同时，……若有必要，应有夺取全地球之远大抱负”，要以“革命之大帝国主义”的形式出现。

还有一点，我们在考察时不能放过，即，北一辉从发表《国体论》（明治三十九年）以来即形成的历史观仍然对他的使命观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北一辉将国家的发展理解成是一种从君主制国家经过贵族制国家向民主制国家（公民国家）演变的进化过程。不仅如此，而且，他还想将这种进化理念推而广之，使之亦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他将当时的国际关系比喻成战国时代<sup>①</sup>封建诸侯的兼并统一战争，世界性的战国时代过后，随之而来的只能是在世界最强的国家领导下的封建性的和平。从而，“全世界所面临之问题，乃世界诸国、诸民族中何者为德川将军，何者为神圣皇帝一事而已。”（《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结语）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委身于进化的必然性，在所谓“权力之中藏着真理”（黑格尔语）的历史哲学中替日本今后的前进道路寻找根据。这样，北一辉的这种历史认识与“匡正国际性之非正义”这一伦理性微妙地交错在一起，使他的使命观有了声色。

击破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让日本之旭日旗给全人类以光芒。敢向世界作此预言，所言基督之再显，实乃以穆罕默德之形象展现于世界之日本民族之经典与长剑也。（同上）

我们通过以上的考察，大概可以察知到北一辉使命观的特异性以及潜藏在这一使命观中的问题了吧。在北一辉看来，大隈式的路线，只要日本还是一个东方国家这个现实不变，终究是不能接受的。然而，北一辉为了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将东、西两方的对立还原成势力、权力的对抗时，他只是将日本的使命——生存逻辑，在生存的伦理中寻找根据，别的

<sup>①</sup> 此处系指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室町时代后期的 1467—1590 年。——译者注

他什么都没想。北一辉在这条道路上根本就没考虑过什么妥协,而是一味地突飞猛进,往前冲刺。在这儿,什么“道德之力量”,什么“世界之全局”,都不存在。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使命感在某种意义上倒可以说是一贯性的。但是,北一辉在剑和福音中,拼命追寻东方盟主日本的使命时,终于,自己的近代西方认识,即用东方的逻辑来超越、克服西方逻辑的认识彻底失败了。对于西方的侵略,北一辉要求东方民族的自我觉醒,至此他的追求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觉醒以后的东方,是不会将这一剑和福音的宣传者看成是自己的盟主的。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引用章炳麟的文章,简单地看一下同时代中国人对使命观的看法。

他日吾二国扶将而起,在使百行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作为先觉之二国。——著者注)之责已!  
(《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出典同前)

不限于章炳麟一人,孙中山、泰戈尔,他们对东方的先进国日本的批判,其实都与这一点相关。这样看来,他们也都是东方应该利用自己的文明的力量来超越、克服近代西方逻辑这一点上寻找着自己的使命的。

## 五 结语

我们上面的叙述,虽然说仅仅是从某些角度来进行的,难以面面俱到,然而,近代日本的国民使命感,关于它的类型,我们已经作了较多的考察。对于这些类型的使命感,在此重新对之进行评价,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阐明了这三种类型的使命感形成的思考过程的话,我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可以说,上述的三人,无一例外,都把日本的富强看成是自己的夙愿。但是,包含在这一夙愿之中的内容、意义,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相异就表现在,日本应该在一种什么样的立场上使自己变成“强国”,变

成“一流国”，成为“伟大的民族”。这些都是应该通过与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它所面临的现实这两点格斗以后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探讨大隈、内村、北一辉三人以及他们的使命观时，或许可以从内村或北一辉所设想的路线——二者的内容、意义虽然截然不同——中感觉得到一种可怜或是凄惨。这种可怜或凄惨，可能来源于他们在近代日本所处的困境下无论如何都想面对现实寻找这个国家的前进道路这一点上。他们对东、西两方的对立，不把它看成是单纯的表面的文化融合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将这一课题放在作为东方国家日本的生存逻辑与生存伦理这一高度上来思考，然后，在这一基础上试图再将问题升华。这时，他们将东、西对立外在性的存在转化成了内在性的紧张关系。这样，正是由于这种转化，为了实现这一使命，不仅仅要对外作战，而且同时也要对内作战。他们的使命观，没有停留在仅仅提示了外在活动的目标，而是始终强调为实现这一使命的内部的革新与内发性的能量。换句话说，即通过这一使命观的提示，在社会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上，他们试图与近代日本的所谓文明开化过程对立，并推动了这一对立面的发展。

我们最后仍然有一个问题必须附加说明一下，那就是，如果实现这一国民使命必须由内发性的能量来支持的话，那么，这个能量最核心的部分就应该是由国民组成的这个国家的传统，除此以外，恐怕别无他物吧。章炳麟所说的“使帝国主义群盗厚自惭悔”，就是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还有，孙文在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权”，主张“公理”时，可以说，他的心灵深处蕴藏着“天道”，或者是中国传统的“和平主义”。他们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从保护弱小民族的伦理中去寻求中国的天职。

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三民主义》）

孙文的这番话,显示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引导出来的中国式的使命感,体现了权力与道德相均衡的姿态。<sup>[2]</sup>

固然,现实中,使什么样的传统复苏,这与这个民族对现在和未来的态度是相关联的。然而,从中不得不使我们觉察到潜藏在北一辉思想深处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将一个民族的过去仅仅放在“国民自卫的本能性发展”之中来认识的思想,可以说,北一辉路线发生偏斜的主要原因,已经在这里潜伏着了。这样,北一辉的可怜、凄惨——与内村的因敢于将自己与日本的传统切断而引起的可怜、凄惨相反——可以说是他将日本的过去仅仅在这一点上进行理解而引起的。这当然不单是北一辉一个人所碰到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民族的传统和文化以及现今这一民族对自己过去的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问题。在思考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时,那么,作为与一个民族的自立以及生存密切相关的使命感这一课题,在各种各样的时间、场合,都会扑向我们面前,迫使我们作出选择。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到证实民族自信的强大的力量,洋溢着美感。

## 注 释

[1] 这里仅举一例。大正教养主义的代表者阿部次郎,本着海外旅行途中的体验,深思了在东、西方对立中日本应该担负的使命,写下了以下的一段话:“为了肩负这一使命的重担,明治以后的日本,必须作出多深的忏悔和赎罪、清算和整理啊!这一点如果不诚实地、仔细地思考的话,东方的盟主最终将会堕落成一个拜倒在欧美式虚伪下的追随者。对于我们来说,必要的不是志高气扬,而是深沉地默默地劳动。”(《东洋》,载于《秋窗记》。见《阿部次郎全集》第10卷)阿部提出的对策是,“在阶级斗争与民族纷争之外,找到奠定新世界基础的道路”(同上),他的对策,具体说来,意味着文化上的“日本主义宣言”。这里,也可以说从阿部的思想里渗透出了大正民主主义的苦衷。

[2] 这里,一并将甘地的一段话也引用如下:

“我想,印度的使命与其他国家的使命不同,印度才是这个世界名副其实的拥有宗教主权的国家。这个国家所经历自我进步而纯化的过程,在这个世界上无一国能与之匹敌。印度不必要有铁的武器,印度凭借了神这个武器战斗到了今天,现在仍然能够利用这个武器来战斗。其他的国民是暴力的信奉者。……(但是)印度则能凭借灵魂的力量来取得胜利。在灵魂面前,暴力等于无能,这一点,历史为它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实例。

因为印度跪倒在欧洲脚下,所以,无法给予人类任何希望。觉醒以后的自由的印度,才能给苦闷的世界带来和平与善良的祝词。

……必要的话,国家必须有能够为了世界利益而献身的自由。故而,我对国家主义之爱,换言之,我的国家主义思想,就是要使我国自由。这里,能不能对我们的国家主义下这样的一个定义呢,为了人类的生存,民族憎恨等的余地应在世界上消除。”

(《我梦中的印度》,收载于1961年4月《三铃》第二十五号)

## 参考文献

1. 大隈重信著:《经世论》、《经世论续编》,富山房,大正元年版。
2. 《内村鉴三全集》,全20集,昭和八年版;《内村鉴三著作集》,全21卷,岩波书店,昭和三十年版。
3. 《北一辉著作集》第1卷、第2卷,三铃书房,昭和三十四年版。
4. 孙文著,安藤彦太郎译:《三民主义》(上、下)岩波书店,昭和三十二年版。
5. 竹内好著:《中国的民族主义》,收载于《现代思想》讲座Ⅲ,岩波书店,昭和三十二年版。
6. 堀内善卫著:《日本的知识人》,收载于《现代思想》讲座Ⅺ,岩波书店,昭和三十二年版。

## 第二章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大陆问题”的构想及其实态

### 一 问题之所在

近代日本的历史,是对中国认识失败的历史。这一历史现象,可以说,至今尚无根本的变化。

当然,要认识一个国家,并不可能像镜子一样,将这个国家如实地、准确地映照出来。其实,像镜子一样完完全全地将一个国家映照出来这样的事,既不可能,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对一个国家的国民来说,对另一个国家、国民的认识和理解,最终都只能停留在自己所能认识、理解的范围之中。所以,在这里,说它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其实都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即对另一个国家、国民的变革、变化以及这种变革、变化的方向始终抱有兴趣还是对之完全不关心。

虽这么说,但是,在认识、对待中国问题时,我们通过自己的手描绘出来的这一条近代历史的轨迹,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这一历史轨迹中,其问题到底在哪儿呢?抱着这一疑问,我想在这儿,以大正至昭和初年的我国对中国的认识为主,进行若干考察。

明治四十四年(1911),也就是明治天皇去世,时代向大正年间转移



的这一年,中国大陆发生了政权交替,给日本的内政、外交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称为辛亥革命的这场政治变革,推翻了大清帝国,建立了中华民国。几乎与江户时代同时起步,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安定的政权清王朝,在明治维新 30 余年以后,终于打上了生命的终止符。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我国的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对邻国出现的共和体制感到惊恐万分,开始了维持清王朝苟延残喘的活动。同时,以犬养毅、头山满等为首,被称为“浪人团”的民间力量,则高举着支援南方革命派的旗帜。我国的外交政策陷入了极其混乱的“形势追随主义”的泥沼。这些历史都是众所周知的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变更,给我国的外交,不,不仅仅是外交,而且给我国的内政以至于社会、思想的深层,都带来了猛烈的冲击。这样,以辛亥革命为契机,“大陆问题”,对近代日本的命运来说,给予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频频波及我国的内政和外交,“大陆问题”在我国制定今后的前进道路时,开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遣词造句或者语言表现的方法,往往可以给我们准确地提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大陆问题”一词的流行,一般认为是在日俄战争以后开始的。这时候的“大陆”一词,往往与日俄战争中在大陆的原野上浴血奋战的“十万生命”,用作军事费用的“二十亿国帑”等历史重叠在一起。直率地说,至此,中国问题已经再也不是以往那样的“亚洲问题”或者“清国”问题了,而是扩大成了摆在我国面前重于一切的“大陆”问题了。也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对我国而言,已经不是面临近代西方列强侵略的近代亚洲的命运问题,而已经转化成了地理的、物理的大陆问题,即领土问题了。再者,中国问题,随着明治、大正两朝的交替,再也不是—种思想、文明这些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了,而是已经转化成了完全凭借国势,谁强谁弱,谁来统治谁的政治问题了。

内村鉴三(1861—1930)曾经在日清战争之际,将这时的“日、支两国之关系”理解为“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间的关

系,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把这场战争称为“义战”(内村鉴三:《征诸世界历史论日、支关系》,《小愤慨录》(下),1894年版。——《内村鉴三著作集》第二卷,岩波书店1953年版,第34页)。担当战时外交指导的陆奥宗光(1844—1897),也将这场战争理解成“西欧之新文明与东亚之旧文明间之冲突”(陆奥宗光著:《蹇蹇录》,1895年版。——岩波文库1963年版,第45页)。还有,福泽谕吉(1835—1901)的“脱亚论”,冈仓天心(1862—1913)的“亚洲一体”那样的词句,则更是众人皆知的了。对中国,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此时,都还是文明的问题,是与思想意识相关的问题。但是,“大陆问题”一词,当它在人们口中频频出现时,中国,已经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扩张的物理上的、自然上的对象了。德富苏峰(1863—1957)的《大日本膨胀论》(1894),在后藤新平(1857—1929)的《日本膨胀论》(1916)中,已经被发展成为“大凡一切政策,皆须以生物学之原理为基础”的论调。这样一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登台、清王朝的衰退、辛亥革命后的形势混乱这些时代过程中,中国问题,以一种极其隐讳、巧妙的形式,一点一点地从“亚洲问题”向“大陆问题”转化了过去。这一种语言表达的相异本身,其实就暗示了今后的日、中两国的命运。我这样讲,一点都不言过其实。

以这种转化及其意义为基本前提,并在承认这一转化的基础上,应该还有一些不得不讨论的问题。把中国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或者说成是“政治问题”,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本质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如果仔细考虑一下的话,在明治前期,“清国问题”虽然包含着很深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但是,与政治问题仍然有着切不断的牵连。这从中江兆民(1847—1901)的《三醉人经纶问答》(1887)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得出来。中江兆民将三醉装扮成“民主家洋学绅士”、“侵伐家豪杰君”与“南海先生”,这三醉人被看成是兆民的化身,所以,在这三人雄辩之词的背后,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兆民难以言状的苦痛。

另一方面,大正以后,“对支那问题”日益向“大陆渗透问题”转化,虽

然说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权力的优先、膨胀的结果,但是,如果说这里在与中国民族的纷争、冲突中没有什么思想理论基础的话,毕竟是难以想象的事。如果这种思想理论基础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潜藏在这一转化的深层,我们通过对一些事例的研究,应该是可以将之挖掘出来,加以澄清的。那么,中国的问题,为什么在我国会从“亚洲问题”转向了“大陆问题”呢?

我们有幸找到了两个大正初年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论”,一个是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还有一个就是内田良平的《支那观》。通过对这两个“中国论”的分析,这个时代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大陆问题的构想,似乎就能够非常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首先,想以这两个素材为线索,开始我们的讨论。

近代的日中关系,不用说,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句话就可以将之表现出来。在进入这一问题的讨论之前,我想先把能够显示日俄战争以后日中问题的基本构图的一段文字揭示出来。这段文字,直至战败为止,一直是制定各种对华政策的一个强有力的磁场。日俄战争发生的三年以后,明治四十一年(1908)的《对外政策方针》(经过阁僚会议通过)中,早就将这一构图完全地勾画了出来。

清国将来之命运,虽固不可测,然以其与帝国之事业并经济极为密切,故帝国应有于任何场合均对其占有优势地位之觉悟。……是以帝国于今后对清国应持努力融和其感情,使其信赖于我之方针。又,为防其万一之事变,不可怠于不得已对其加以威力之准备。于平日之时,当避免有挑拨其国官民对我产生恶感之举措,专以去名求实之方法,在其国中扶植我势力,以致万一其国有不测之事变,亦均能确保我至优地位。并亦有必要谋求满洲之策,以达使满洲之现状永远持续之目的。而列国对清国之态度,比年大改其趣,专心于怀柔其国官民,故帝国关于与列国共通之事项,应与列国采取同一之步调,以资达成前述帝国之目标。且渐次使列国承认我于满洲

之特殊地位一事，亦应采取手段。（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原书房1966年版，第306页）

在这一段文字中，因日俄战争之胜利而勃然兴起的日本帝国的“国家理性”，一目了然。日本政府为了求得在满洲的“特殊化”地位以及对<sub>中</sub>国保持自己的优越感，责无旁贷地摸索着各种对策。对待中国，在努力“使其信赖于我”的同时，必要的时候，可以加以“威压”。另一方面，与列国步调一致，设法使之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中，日本政府在某些方面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在某些方面，又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专以去名求实之方法”）。但是，这种一发而不可收，以一种本能性的冲击接近中国的日本“国家意志”，在这里，以一种难以名状的色彩浮现了上来。我们在这里引出来的这一当时日本政府的路线、方针，的确成了这以后制定日中关系政策的一个框框。关于这一点，抱有疑问的人似乎一个也没有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里，向人们提供出来的日中关系的活动舞台，对大多数人来说，其认识、活动的范围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同时，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舞台甚至成了禁锢他们的枷锁。从此，在这个舞台上，随着形势的复杂变化，围绕着日中关系，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连续剧。

## 二 国权主义空想家——以内田良平为中心

以黑龙会的主干而闻名的内田良平（1874—1937），大正二年（1913），写下了《支那观》一文。

在这以前，内田曾写过《俄罗斯论》（1901），又为“日韩合邦”四处奔走，为完成“使朝鲜从中国之虐政中解放，使满洲从俄国之垂涎中解脱”的“日本之使命”而竭尽心血。在《支那观》中，内田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治下的政情混沌的中国局势进行了分析、论证，关于今后日本政府应采取何种对华政策一事，向日本政府献上了建言。

这里,内田的主张,可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趁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之机,促使满蒙独立,使之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此后,他的这一构想——其历史性的变化姑且不论——在现实中,由接二连三发生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1912),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1916)以及最后的满洲国的建立等一系列事件而得到了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内田的《支那观》是日本侵略性膨胀主义的最右翼的代表,同时,又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过程中最突出的表现形式。

那么,内田是根据哪些理由提出了这一主张或政策的呢?如果现在马上就给内田下一个“国权主义者内田”这样一个结论的话,那么,接下来也许就没什么话可讲了,但是,这里似乎仍然存在着一个进一步探讨的机会。即,将内田的《支那观》作为中国认识的一种类型,在这个层次上对他进行研究。<sup>[1]</sup>这里,想把内田对中国的认识的主要言论稍作概括,分述如下。

内田称,“原来支那社会大要有三别”,将中国社会的构成分成了以下三类(见内田良平著:《支那观·国难来》,黑龙会,1937年版):一是“读书社会,即政治社会”,一是“农工商社会,即普通社会”,再一就是“游民社会”。“读书社会”是由所谓的“读书人”构成的社会,“唐宋以后,设科举之法以登用官吏,读书人成为社会之上流,于支那,谈议政治得失,皆属此社会”。与之相对,所谓“普通社会”,是指“如农工商,唯逐个人利益。因以为生”的人们,“彼等全然以个人为本位,只要个人之生命财产安全,则如君主一事,拥戴亦可,不拥戴亦可”,至于“其国土归何国所有”这样的问题,与他们无关,没有必要向他们询问。可是,据内田所说,在“支那”,另外还有一种“游民社会”存在着,他们是“秦汉以来,以豪侠自任者”的一伙人,“彼等平生之职业乃打家劫舍,掘墓赌博,在其眼中,既无政府,亦无祖国,既无仁义,亦无道德,其理想之所,唯能自己快活则足矣”。因而,“游民社会”位于“政治社会”与“普通社会”之间,对中国社会的安定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一方面,若“使游民社会甘于政治社会之

驱使,普通社会则无不可忍之虐政”,另一方面,若“使游民社会为工商社会出力,政治社会则无不可行之权力”。在内田看来,“支那之国民性”,是极其恶劣的,这种恶劣的国民性,从“政治社会”到“普通社会”,上下一致,毫无例外。

世界之国民中,其性情之恶劣,如支那之国民者稀也。彼等非以自家为中心以逞其政权欲之凶汉,则为自家私利私福不辞忍受羞耻之险民。彼等无政治之机能,彼等无国民之精神,彼等无敌忮自强之志气。主义、主张、人道、名分,于彼等之间,固无任何之意义。(同上,第20页)

诚然,辛亥革命的动乱,一方面来看,不能不将它看成是“支那国民之觉醒”。但是,在内田的眼中,说到底,“支那乃一畸形之国”,“政治社会与普通社会,全然分离,各自为政,风马牛不相及”。“支那”之国民性既然如此,那么“支那”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前途呢?“若支那之国民望其政治家收拾时局,统一国家,对内整理自国之财政,对外立威信于列国”,这样的事情,若“对之寄予希望,则事理难通”。

回过头来,再看围绕“支那”的国际形势的话,则列强对“支那”之姿势,“悉藉保全之名,实行瓜分之实”,虽“有以租借之名,得割让之实,占领其国土之政治蚕食主义,有以借款修铁路之名,垄断特殊利益之经济蚕食主义”,然均是“乌之雌雄”,其实都是一样的。俄国如此,法国如此,英国、美国、德国皆如此,无一例外者。这样,在内田的心中,日本帝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支政策”,则不言亦可自明。对“支那”,莫如“以不保全之策而使之得以保全”,所以,“一面以高压手段威服彼政治社会,一面于放任主义之下保护彼农工商社会,则驾驭支那,更是易如反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利用“其国民对领土之鲁莽、冒失,掣肘其权力交付,以达割让之实”。如此,满蒙经营这个日本的根本方针,从这儿,几乎作为必然的口号,被引导了出来。

以上,我们概括了内田的《支那观》,只要一读其文,贯彻于其中的彻头彻尾的中国侮蔑观,便昭然若揭了。他的“支那观”,是以“恶劣之国民性”和“畸形国支那”为轴心构成的。而且,在内田的分析中,又将欧美对中国的蚕食这一情形组合了进来,站在这一立场上得出来的主张,不用说,是最露骨的侵略主义路线。

可是,在这儿,似乎有一个不可错看的重要之点,那就是,内田的“支那观”与“对支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最重要的。确实,他的“支那观”,亦即他对中国的认识,是从将中国社会三分成“政治社会”、“普通社会”和“游民社会”开始入手的。而后,认定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就在于“政治社会”与“普通社会”的分离这一点上。假使内田的这一分析正确的话,那么,“以不保全之策而使之得以保全”这一对华政策,说不定就是中国不得不甘受之命运。但是,仔细考虑一下,内田的这种对中国的理解,并不新鲜。中国这种“国家”乃至“政治”与“社会”的分离,是王朝体制下的特点。对于这一特殊现象的认识,在内田以前,即屡屡被指出,因而,内田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是极其传统的。说起来,在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确立以前,这种国家、政治与社会相互分离的体制,反过来可以说是一种最正常的现象。直率地说,内田的“对支政策”绝不是经过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进行了严密的分析以后引导出来的,而是正好相反,是从“蚕食中国”这一国际形势中得来的。“蚕食中国”这一国际形势,从根本上左右了内田的思维过程,而对于中国这个真正的实体,内田在这儿几乎没有去观察,他感知的只是一块抓不着握不住的硬物而已。

内田曾经作为天佑侠的一员,援助了东学党,活跃在日清战争中。又与一进会勾结,在樽井藤吉(1850—1922)的《大东合邦论》的基础上致力于“日韩合邦”。这些行动当否姑且不论,与韩国农民结盟提携,并由此而产生的“大亚洲建设”的理想,这一点是他真正引以为自豪的事。但是,现在,内田眼看列强瓜分中国之剧愈演愈烈,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中,他为日本帝国的大陆侵略而处心积虑。实际上,通观《支那观》,让我们

感到的就是，全篇充满着日本帝国的焦虑，除此以外，别无他物。这种焦虑，反过来通过对恶劣的“支那国民性”的谩骂，对其利己主义的非难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否则的话，如何来理解“彼等无政治之机能，彼等无国民之精神，彼等无敌忮自强之志气”，“非为凶汉，……则为险民也”这种彻底的谩骂的出笼始末呢！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在发现不了中国内部的什么把柄的情况下，为形势所迫，将中国社会本身的变迁肢解的做法。我这么说，绝非言过其实。

当然，内田并不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因而，要求他的分析中有什么严密性与理论性的统一的话，那就太不恰当了。再者，在内田的这种动向的背后，还有一种他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在起着作用。也就是，在辛亥革命中，他曾声援、联系过的革命党，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交涉中，与袁世凯妥协，背叛了革命这一体验。另外一方面，如果站在更高一个层次的立场上来看，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在影响着内田。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日韩合并中节节取胜的日本，在下一个步骤——大陆渗透的形势下，“亚细亚主义”这个口号，对日本也好，对中国也好，到了这个时期，早已经是一堆虚伪的躯壳了。在以这样的形势为基础的前提下，内田将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蚕食瓜分作为一个主要框架，放在自己思考的中心部位，而对中国本身却采用了极为传统的、极为一般的认识，竭力避开面对中国的现实，从中能够得到的结论，除了“支那乃一畸形国也”这个论断以外，其他什么都得不到。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道理了。

诚然，内田是最具战斗力的国粹主义者，亦曾是国家主义者。这个内田，由于没有正视中国这个实体，却敢于将它作为对象来进行考察，这或许是不合道理的。但是，始终高唱着“皇祖皇宗之遗训鸿谟”的内田，将欧美对中国的蚕食这一历史现象安放在自己思考的中心部位，一见似乎是一种矛盾，其实并非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内田是将自己置于近代西欧对亚洲侵略这个一般的形势潮流中，并将这一潮流作为自己的视



点,通过这一视点,再将不断被蚕食的中国放在特殊的形象中加以分析的。或者可以说是将中国视为特殊社会来进行分析的。然而,对中国的这种认识方法,并不只限于内田一个人,毋宁说,在日俄战争以后的几乎所有中国认识中,多多少少都带有这种特征,这是一股时代潮流。其中的意义,我们准备放在后面加以说明。这里,为了使问题更加明确化,我们想再看一下内藤湖南的《支那论》。

### 三 支那学者内藤湖南世界里的“中国”

湖南,内藤虎次郎(1866—1934),是杰出的支那学学者,又是在《万朝报》、《大阪日报》等报社度过了前半生的新闻记者。内藤湖南在辛亥革命的触发下撰写《支那论》一文,是与内田撰写《支那观》几乎同时的大正三年(1914)。

当然,湖南与内田不同,他是有着广博知识的中国史研究者。面对辛亥革命后混沌不清的中国政情,不愧为是一个中国史学者,湖南想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来追究中国的前途。他认为,中国的国情是“依靠绝大之情力而潜移默化之国情,超越人为矫正之效力之国情”,他想在这一国情的基础上来断定“此情力之方向”。他在此文的《序文》中这样说:“此书,完全代替支那人,为支那人而考虑。”这里所含有的那种庇护者、救世主式的意识,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对日中关系所持的一般态度,同时,又证实了湖南作为支那学者的绝大的自信心。(内藤湖南著:《支那论》,文会堂书店版。——后与《新支那论》并成一篇,创元社1938年版)

湖南首先从中国的政治这一点开始发问,中国是要君主制呢,还是要共和制?湖南在这里断言,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共和制,其他无路可走。即使在一段时期内,帝制复活或者复辟活动猖獗,但从历史的发展潮流来看,迎来的只可能是共和制。这宛然是古代、中世、近世这一自古至今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环节,可以推断,共和制的来临,是一种必然的

趋势。根据湖南的研究,秦汉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贵族政治,宋以后,演变成君主独裁政治,这种君主独裁政治,到了清代,其弊害终于达到了最高峰。与君主独裁政治发展并行,人民的力量也逐渐增强,到了最近,已渐渐接近了“一切权力应归人民之高潮”。从而,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贵族政治是早已不可能再复活了。那么,共和政治的出现,则成了不可避免的洪流。接着,湖南又对领土问题、地方制度、财政问题等进行了研究,引证了大量的古今事例,认为,在中国的内治问题上,原来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体制在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松散的地方分权主义,即联邦制度,应该培养传统的地方自治团体,使之发展成为地方自治。可以说,湖南的立论,是在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他向我们展示了与数以百计的所谓“支那通”截然不同的中国认识。

确实,湖南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很透彻的分析研究。例如,他主张,构成中国社会实体的是地方的自治团体——乡党、宗族。这些地方自治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进行救贫赈恤、开办学校、管理卫生,甚至从事地方防卫事业。而且,这些地方事业,虽说经历了辛亥革命,但却无所变化。从而,湖南认为,“收揽”这些地方自治团体的代表——即所谓的“父老”,“不问其法制之美恶,不论其人格之正邪,此乃支那成功之秘诀”。湖南的这一揭示,大概不能说他是错了的吧。因为他引用了顾炎武、黄宗羲、冯桂芬等人的言论,或者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或者从官僚与人民的关系上,为他的这一论说进行了论证。可以说,对中国的实态进行了最切实的研究。

可是,在这里,我们大概应该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湖南对中国的国情越是贴近就越是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倒错。事实上,从近代世界的范畴来考察的话,湖南所描绘出来的中国形象,毋宁说是一个奇怪的形象。例如,刚才提到的那样,“收揽父老”是“成功之秘诀”,但是,湖南又说,“父老者,对外国而言,其独立心,爱国心之类并非特别重要,乡里

之安定，宗族之繁荣，自我之快乐，此等事若能被保证，则无论于何国人之统治下，均能柔顺服从”。“得父老之欢心而成功之君主亦好，大总统亦好，于外敌之前，则敢保证其国运不灭者无一人也”。（同上，创元社版，第9—10页）从而，“此秘诀，对救国家之危亡”，不是起不到任何作用吗？果然如此的话，那么，中国的前途到底在哪里？中国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将来？在近代世界中，中国会沦落到抛弃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希望吗？湖南在这里，又从国防问题上，对此进行了探讨。他说：

于今日，首先不得不接受者，乃远见深识之政治家之卓见，亦即将来廿余年中，支那绝无国防之必要一事也。……支那完全废弃国防，于其被侵略之土地之上，因受各国牵制，故不至有其完全独立之危险，此乃托列国势均力敌之福也。又，即使其有四十师团，五十师团之兵力，然其军人之素质，不言亦为大方所知。日本亦好，俄国亦好，若真下决心欲使之灭亡，则支那绝无防御抵抗之理。其他列国，因有日、俄两国逞其强，当亦无敢有指手划脚者。故而，对外国，支那无维持其兵备之必要。（同上，第161—162页）

当然，湖南并没有像国权主义者内田良平那样，主张因为中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所以可趁势将之瓜分。他站在“为支那而考虑”的立场上，最终提倡的只是在缩减军备、削减军费，以充实国家财政这一点上。在湖南议论中国的笔下，在对待这一最敏感、最热点的政治问题时，并不是根据时势而高谈阔论，而是用一种淡淡的笔致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但是，即使这样，从否定国防、否定独立，凭借列国之势均力敌而生存的中国形象中得出来的中国观，果然就没有一种倒错感的存在吗？或者还是因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个别性这一视点，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他的中国观的全貌呢？

这里所揭示的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认识的特点，随着历史的进展，渐渐地以更加明了的姿态浮现了出来。大正八年（1919），在杂志《太阳》

上,湖南撰文说:“若切言之,支那于何日灭亡一事,早已非问题之所在。今日之支那,实早已灭亡,不过以其残骸而蠢动而已矣。”(《山东问题与排日论之根柢》,《太阳》1919年第7号)终于,到了1924年,湖南撰写了《新支那论》,再一次将他心目中的中国以鲜明的形象描绘了出来。这里,我们在介绍的同时,也将他的问题揭示出来,一并作一些考察。

在湖南看来,在他撰写《新支那论》的时期,“支那之民政,其真正之机能,……依然仰赖于乡团之自治”,这种现象,无丝毫变化。因而,“于今日,支那人真正掀起民众运动,激起国民同仇敌忾一事,从根本而言,无有此可能”。即使有以这种“形式而四处活动者,此均因废物之煽动而兴起之事”<sup>①</sup>。“自清朝末年以来,欲将国家建设成普通国家之支那人之努力,因革命一事,顿时烟消云散,二十年内外之努力,化为泡沫,一切归旧。”(《新支那论》,博文堂1924年版。——前引书,创元社版,第255—256页)“支那”,完全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特殊的国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支那”,“自发性革新之可能性”是否会有呢?还有,“支那之革新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将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随着这样的问题的展开,湖南的《新支那论》的论证开始逐渐走向极端。

湖南说:“如果极其简单地问,要打破支那传统之政治组织,引导新民众之政治,其原动力何在?在于日本国民于支那经济界之活动也。”(同上,第261页)正像五胡十六国时期那样,北方的各民族给予了中国一个极大的刺激,将中国从衰死中救了出来。现在,我国的商人通过经济活动,不断地向中国内地渗透、渗透,这一行动甚至可以说是“支那人,日本人均未觉察之一种使命感”。“若此一运动被阻止,其结果只能是支那民族自找衰死”。因此,“以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对支那之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一类之议论,完全成不了问题。”(同上,第261页)并且,这样的经济渗透——日本国使命的实行——在满洲已经一步一步地被实现,“关

<sup>①</sup> 指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众运动。——译者注

键之事，乃以坚韧不拔之心，将日本向支那内地之渗透与支那国民将获利益一事，强使其内地霸主知悟，除此而外，别无他事可为也。若能成此事，真正之日支亲善始能达成。此等事例，于满洲亦已实现。”（前引书《山东问题与排日论之根柢》）

虽说湖南的《支那论》与内田的《支那观》是通过完全相反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完全相反的程序来认识中国的，但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他们二者其实是在同一层次上来展开日中关系这个课题的。内田是从国粹主义、国权主义的立场出发来鼓吹日本的使命和所谓的“国威发扬”的，根据这一理念，他将中国定性为“畸形国家”并将这个畸形国家的前途完全抹杀。湖南则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出发，在 20 世纪帝国主义世界的形势展开中，逐渐高唱起日本的使命，并寄身于这昂扬的斗志之中。当然，前面也已经提到过，湖南绝不是一位国威发扬主义者，相反，毋宁可以说他是一位几乎连政治价值都没有的“文化主义者”。“人类之创造出来之事业中，政治、军事之类，乃最低级者”，这句话，是湖南的坚定信念。“日本如今于政治军事一面，已达其全盛”，是因为“国民之年龄尚处于幼稚阶段”，日本与欧美诸国，“自认为自己远胜于支那，乃大错之特错也”。（前引书《新支那论》，创元社版，第 309 页）从而，可以听到他下面这样一段话：

纵使支那国家灭亡，窃以为亦无过分悲哀之理由。若于支那民族之大局而观之，所言支那灭亡，绝非侮辱支那之语。若高于民族之大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其于政治经济之领域，国家虽濒于灭亡，然其郁郁乎文化之大功业则足以令人尊敬。与此大功业相比，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无宁其文化恰能大放光辉于世界，支那民族之名誉，定与天地共存，传之无穷。（前引书《山东问题与排日论之根柢》）

可是，湖南的这种言辞，与现实社会来参照对比的话，存在着多么深

刻的倒错,关于这一点,似乎再也没有必要详说了。固然,湖南是一位不从政治,而是从文化,特别是从中国文化中来认识中国的价值和意义的汉学家,但正是这一缘故,湖南一方面想为日本入侵中国正名,另一方面,却又忍受不了世间对中国文化的贬低与鄙视。所以,一边谈论着“支那之亡国”,一边又竭力赞扬中国文化,这一颠倒不堪的意识,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他的《支那论》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陆这一平面上展开的,这一事实是不言自明的。如果再附加一点的话,那就是,湖南《支那论》的思想矛盾,在将中国社会放在这一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中,并且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方法来看待它时,这一思想矛盾的基本性质就已经被确定下来了。

至此,我将内田良平、内藤湖南两人的中国论揭示了出来并加以考察,对两人的中国观的特点多少有了些了解。当然,他们两人认识中国的侧面以及考察中国时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如此,他们两人似乎仍然有着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将中国放在畸形性、特殊性中加以考察的这一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其实,他们所持的这种理论和方法,也绝不是他们两人的专利。在明治维新以后,富国强兵路线基本得以实现的我国,毋宁说这是一种非常一般的见解、非常一般的意识,因为,很明显,中国是近代世界的落伍者、落第生。故而,特别是湖南的《支那论》,他是支那学的一流权威,他所起的作用,大概可以说一方面为这一意识进行争辩,一方面又增强了这一意识。他的见解,被作为有识之士的卓见,屡屡被引用,同时,又以各种形式,例如稻叶君山(1876—1940)的“支那国际管理论”(稻叶君山著:《对支一家言》,日本评论社出版部1921年版)那样,被以更加强硬的姿态扩展了开来。

我在对湖南的《支那论》进行考察的同时,又引用了他的《新支那论》,似乎有点儿过于心急了,现在想再回顾一下《新支那论》出台前后的背景。自辛亥革命至《新支那论》撰写的大正十三年(1924),其间,日中之间,发生了诸多的事件,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

首先,最重要的是,1914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日本占领了青岛。然后,次年1915年,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其次,1918年,寺内内阁决定了援助军阀段祺瑞的“西原借款”。1919年,中国发生了排日的五四运动。在这样的激变期中,中国自身也发生了激荡,共产党的成立(1921),国共合作(1924),还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6),更有日本出兵山东济南事件、炸毁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的皇姑屯事件(1928)等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某种意义上讲,在这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其详细的历史经过先暂时不看的话——只有日本的大陆侵略与中国方面的激烈抵抗而已。深入到中国内部的日本大陆政策,还有抵抗日本势力渗透的中国的姿态,这二者,到底给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外交史的角度来看,众所周知,当时的对外路线大致可分成两大派系,一是以对美国采取协调主义的所谓“币原外交”,一是主张以强硬的武力推进外交的所谓“田中外交”,这二者同时存在。一般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也给日本的外交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帝制俄罗斯的崩溃,作为我国历来的对外路线的支柱“日俄协商”的构想彻底瓦解。另一方面,在原来的国际政治的中轴欧洲以外,新兴的美国作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势力登场,对于这一巨大的存在,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正视这一现实。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混沌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外交政策逐渐发展到必须面临的一个选择,即选择国际协调、经济外交、互不干涉内政的“币原外交”呢,还是选择以武力确保在华权益并计谋以军事力量侵入中国的“田中外交”呢?在此,“币原外交”所展示的更加和平、更加经济合理的方法以及将中国的民族主义抵抗力量渐渐放到自己的视野中来的性质,我想,已经没有必要对之进行重新评述了。我想在此作为问题提出来的,既不是对日本的“对支外交”的评价问题,也不是在制定政策时有多少选择余地的问题,而是在各种时势下,政策的决定者们是怎样尝试着几种不同的方法

的。也就是说，我想探讨的最终仍然是日本人认识中国的方法问题。

湖南曾经针对中国学生的排日爱国运动，作了如此言论：

尤其是排日运动，数年以来持续不断，甚至有称应将之写入教科书者。或有人认为，不良学生团之运动，于都会受到压迫，纷纷以散乱之态扩展至农村，难以捉摸。此等人亦不知支那事情者也。若于都会，得群众之心理，各类有组织之活动始能实行。一旦散入农村，受到胁迫，能承担调达资金之大商人亦无从寻找。学生于地方，欲阻止农民等购买日货之日用品，此事若行，则反遭地方农民之排斥，亦未可知也。（前引书《新支那论》，创元社版，第248页）

湖南的这一揭示，在当时若说他完全错了，恐怕还不能断言。甚至，他所提出来的所谓乡党自治、宗族团体的中国形象，如果讲他完全错了，毕竟也是不可能的。确实，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着这种形式的东西，并且，在湖南的时代，这样的形象依然存在。事实上，辛亥革命以后政情的混乱、军阀的混战、半殖民地的深刻化等一系列的时势，都从侧面给湖南对中国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根据。但是，如果再仔细考虑一下的话，重要的大概不是仅仅指出这种现象而已吧。无论是何种社会，它肯定背负着过去的遗产，并且面对着这笔遗产踌躇不定地寻找着生路。因此，更加本质性的揭示，仍然应该是怎样才能揭示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的方向的问题，即感知这一发展动向的胎动，把握这一发展的方向。这种感知和把握难道是完全不可能的吗？

如果内田、湖南的“支那论”是由于把中国社会放在畸形性、特殊性上进行考察而逐渐丧失了观察这种发展动向的目光，陷入了泥沼的话，那么，相反，从更加普遍、更加开放的范畴来感知、把握中国社会，抱有这种志向，怀有这种目光的人，大概可以发现一些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向吧！也就是说，不是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上，而是从更广泛的，或者是民众，或者是民族、阶级、人类这些范畴中，说不定可以找到它



的发展道路。说到这种志向,使我们想起了与上述中国认识不同的其他一些认识方法。虽然,从近代日中关系的历史上来看,这些中国认识是极其少数的,并且均以孤立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些中国认识,都是以与我国自身的动向——大正时代的思潮、风潮——密切相关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首先应该举出来的大概可数吉野作造为第一人吧。

#### 四 开放性的中国认识——吉野作造

关于吉野作造(1878—1933)的中国观,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野原四郎著:《民主主义者的孙文形象》、《五四运动与日本人》,均收载于《亚洲历史与思想》,弘文堂1966年版;松尾尊兑著:《民主主义者与五四运动》,见《大正民主主义研究》,青木书店1966年版)吉野大学毕业后,正巧在中国居住了三年,有着做过袁世凯儿子家庭教师的特殊经验,此后,他几乎自始至终关心着中国的变动。作为大正年间的所谓“西欧派知识人”,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位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极其稀有的轨迹的思想家。

但是,在这里,我并不想涉及吉野的中国认识观形成、变化的全貌,也不打算详细探讨他的中国认识中的微细的构造,只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这儿将问题集中到以下的三个方面来:即他的中国认识观与其他一些中国认识观的区别在哪里;对其他一些中国认识观中所存在的歪曲,他是怎样来进行突破的;他用以突破这些歪曲的中国认识观的根据是从哪里找来的。也就是说,想在揭示大正民主主义者吉野思想中最优秀部分的基础上,找到更能深入研究的线索。当我们从这一观点来阐述吉野时,尤其是将他与内藤湖南进行比较时,首先不得不出来的就是吉野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虽然有点儿长,但最初仍想将这样一段文章抄录于下。这是大正八年(1919)六月,北京发生五四学生运动后,他在《中央公论》卷头发表的社论,题为《切勿谩骂北京学生团之行动》。

上月四日，以北京大学为首之高等诸学校学生团，因激愤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之失败，历数卖国之罪，焚曹汝霖君之私第，使章宗祥君身负重伤，乃一大珍事也。虽是他处之事，然吾人惟觉遗憾。

但彼等声讨曹章诸君罪名之时，亦唱叫直接收回山东权益，进而排日之声日高，由此之故，以致我国之报纸等颇有谩骂彼等诸君之行动者。不幸吾等不能赞同此说。

吾等虽决不能说彼等之行动为可饶恕之暴举，然吾人于评价彼等之行动时，以下两点乃切不可误。其一，视曹章一派之青年政客为亲日派。其二，视以学生为代表之中华民众之排日运动为针对日本国民之深仇。

曹章诸君诚以亲日派为吾人所知，然彼等之所谓亲日行动，又有何者满足了日本国民真正之要求呢？彼等乃我国官僚军阀乃至财阀之亲友，此无可怀疑。至于中华民众一般之排日之情绪，不过是对官僚军阀乃至财阀所代表之日本之反感。为此，多数之国民是如何因之而困惑者，观吾人多年来对彼等之对支政策每每攻击批难，即可昭然。邻邦之一般民众，恐不知于我国之中尚有“侵略之日本”与“和平之日本”之别，若彼等能知其别，则排日之情绪应会销声匿迹。

故而，欲于支那根绝排日之不祥事，其策不在援助曹章诸君以购民间之不平，而在于我国自身限制军阀财阀之对支政策，使邻邦之友人知我日本国民真正和平之要求也。为之，吾人多年来致力于将敬爱之日本从官僚军阀手中解放出来。北京学生团之运动，于此点，不亦与吾人之志向目标全然一致吗？

愿我等早日成功此解放运动，亦真切祈愿邻邦民众之解放运动早日成功。唯有从官僚军阀手中解放出来之两国，始能于两国间筑起稳固之国民亲善。

从这一段充满紧迫感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首先是吉野在将日本分成“侵略之日本”与“和平之日本”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排日运动进行评价的这一视点。然后，第二点是，将把“敬爱之日本从官僚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与“邻邦民众之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从中寻找到了日中两国之间国民亲善的未来和前途。吉野此畅言，正值他组织“黎明会”（1918年12月），又与浪人会进行决裂（同年11月），即正当所谓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最盛期，在此之际，有此一声惊喝，无不令人感动。在发表了这篇社论后，吉野接着又提倡了“日支学生提携运动”，通过北京大学的李大钊（1888—1927），与中国方面取得了联系。这一运动在“黎明会”与“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共同提携下，以中国的教授、学生团来日本的形式，虽然不十分充分，但也算是部分地实现了。（1920年5月。这一段史实，详细情况请参见前引松尾的论文。）

吉野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在当时是鹤立鸡群的，我这样说，绝对没有夸张。当时，对于五四运动，《大阪每日》的评价是“恰如歇斯底里症发作的女人”（1919年5月10日）。中国的某位哲学研究者，在论及当时的中国劳动运动时，称，“其多为薪金问题，……仅为三、四钱之事而起哄”，“并无多深之根柢”。（小柳司气太著：《支那现代学界一斑》，《散文》第四编第四号，1922年版）与以上这些中国认识相比，吉野对五四运动，对中国的认识就越发显得标新立异，这一点，我们是不难看出的。吉野之所以如此淋漓尽致地道出了自己的中国观，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把中国放在畸形性上来考察，而是从与官僚军阀进行斗争的民众这一方面，即站在普遍性范畴这个立场上来观察、把握这一运动的。与吉野相反，前面提及的《大阪每日》，则完全将中国看成是一个畸形国家，其代表性的言论，可举一例说明，即，“是可多归于支那人勇于追逐私利，猛于党同伐异，眼中无国家盛衰兴亡，诡辩狡策，唯以虚饰达其所欲之国民性之弱点”。

然而，虽这么说，吉野的中国观中，其实也有过极大的摇摆和膨胀。

前面我们说过,他一生之中几乎一贯到底始终对中国问题抱有特殊的关心,可是,他的中国观确实实是沿着某一条线上下微妙地摇摆不定的。吉野从历史学家式的眼光出发,对明治以来中国的革命派与日本人的交流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关心,而且可以说这种关心是一种亲中国式的感情。然而,虽然如此,在充满着对中国亲善感情的基础上,吉野中国观中微妙的摇摆不定的现象仍或隐或现。现在,我们再一次来看吉野的中国观时,最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出其问题所在的恐怕就是他对“对华二十一条”的态度了。五四运动爆发前四年,对于“对华二十一条”,吉野是采取肯定态度的。吉野称日本政府的对“华二十一条”,“若从表现上来看,抑或是对支那主权之侵害。……然若从帝国之立场来看,此乃最起码之要求”。他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他相信,“且从与西洋诸国之关系来看,此亦可称是最好之时机。从将来帝国对支那之控制上而言,亦是极为适宜之处置。”(吉野作造著:《日支交涉论》,警醒社书店1915年版,第255页)在当时,吉野虽然看到了今后“年青支那”的中心势力并不是袁世凯一伙,而是“现今正为祖国之改革而奔走高呼之数百之青年”,即“支那青年党”(吉野作造著:《对支外交根本政策决定时日本政客之昏迷》,《中央公论》1916年3月号)。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政治因“过于看中眼前之事实,而稍有远见之事”则难以捉摸。从而,得出了这样一个言论,“于右,应与青年党之间保持某种交涉,于左,则应与袁世凯共事,此巧妙之措置”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同上)也就是说,他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只有成为独立自主的强大国家以后,真正的日中提携才能得以实现,为使中国实现独立自主,我国必须尽一切可能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援助。但是,另一方面,对列强各自扶植自己势力这一现状,他又不得不承认在必要时应谋求一些应急措施。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附加一句,吉野的这种思想,绝不能把它看作是“现实主义”式的思想。“政治过于看中眼前之事实,而稍有远见之事则难被容忍”。他的这句话,乍听起来,虽然是非常“现实主义”的,然而,与这句话相反,吉野在更多的方面,

针对中国这个国家,针对中国的实体,最真实地、最客观地进行了认识。中国将朝什么方向发展?推动这一发展的力量存在于何处?针对这些问题,吉野的认识仍然是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对四年后爆发的五四运动,吉野就能立刻把握它的本质,向世间的“狂乱之支那应得惩罚”论者作了针锋相对的挑战。(吉野作造著:《狂乱之支那应得惩罚》,《中央公论》1919年7月号)

前面已经提到过,五四时期吉野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纵观其一生,都是非常卓著的一章。在吉野看来,五四运动是“支那国民之自发性运动”,绝非“官界商界有势力者之煽动”,“今日之运动乃真正之国民运动”。而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排斥外国之侵略主义”,“排斥国内之专制官僚主义”。这场国民运动之所以采取抵制日本这一形式,是因为我国乃“侵略主义之冠军”。这样,作为大正民主主义论坛张目人的吉野,随即大踏步地迈上了“日支学生提携运动”的道路。“支那之青年学生”们,“如彼等憎恨自国之官僚军阀一样,亦憎恨我国之官僚军阀”。而这批官僚、军阀,正是这数年以来吉野与之战斗的敌人。“为官僚军阀之错误政策所累,两国之间永不得亲善。由此而生出之各种苦难,实难以忍受。军阀与军阀相互勾结,则一事无成。”因此,根据对这次排日运动省察的结果,体会到了“欲使日支真正亲善,比彻底抛弃军阀更重要者,乃是与真诚之青年,即第二国民之提携”。(吉野作造著:《日支学生提携运动》,《中央公论》1920年6月号)吉野接下来的一句话,可以说,鲜明地、活生生地显示出了他在当时为此跨出第一步时的心情:“从此,国民间之真正亲善将开始;从此,东方和平之花将盛开。勿言以一介学生身份难以成其大事,然无论于何国度,革新事业无一不依无垢之学生而兴起,至少,事业之端绪总是发自学生。”由此,吉野进一步提出希望:“此运动不单为我等少数有志者之事业,实亦为广大之诸君,不,实亦为全国国民之大事。”(吉野作造著:《日支国民亲善确立之曙光》,《解放》1919年8月号)

吉野的这种认识和实践,恐怕得力于他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果

敢的斗争。这一时期，吉野对所谓的“权势派阀”正在进行着最激烈的斗争，立场鲜明地站在反抗权势派阀专制统治的民众一侧。正因为如此，吉野才有可能完全把中国青年学生运动跟自己正从事的斗争放在同一个层次上来理解，将中国的五四运动作为“真正之国民运动”来看待。从而，从这里引导出来的吉野的中国认识观，就不是将中国定性成一个特殊范畴而加以考察的结果，而是与之相反，是在一个开放性的、更加广泛的共同范畴内捕捉到的。这一看法我在前文中曾经指出过。

纵观吉野一生，可以说其最光辉的就是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的认识观，这是我们都承认的。然而，我们现在不得不将问题挖得更深一点来对他进行考察。前面提到过，他曾经肯定了日本政府的“对华二十一条”。改变吉野的这一看法，使吉野与中国的民众运动逐渐接近的动力，不是别的，而正是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中他自己的活动。但是，现在回过头来问，使吉野采取赞同“对华二十一条”的思想基础又是什么呢？还有，他又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框架的禁锢，才站到了认清五四运动的本质，提倡“日支学生提携”的立场上来的呢？我们在设定这样的问题时，实际上已经渐渐接近了一个最本质的课题。

从前面的引文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将“青年支那”的未来与“青年支那党”联系在一起进行展望的同时，另一面又相信“对华二十一条”是“极为适宜之处置”。在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对华二十一条”时，吉野之所以站在赞同的立场上，其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在于“对华二十一条”“从与西洋诸国之关系来看”，是最好的时机，同时，“从将来帝国对支那之控制上而言”，又是最起码的要求这一点上。我们大概可以把他赞成“二十一条”的理由归纳成以下两点，一是“帝国日本之国家利益”，一是“二十世纪世界之国际秩序”。这两点，其实是日俄战争以后至大正初年一般日本人看待对华问题的大前提。对于这一大前提，几乎无人对之抱有任何怀疑，所以，毋宁说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一时代产物包孕在吉野思想的内部，绝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他的语言表现——“若从表面

上来看,抑或是对支那主权之侵害”,但“若从帝国之立场来看”,仍是可以赞同的——是极具有象征性的。

这里,对吉野而言,最本质的问题首先是日本帝国这个国家理念。不用说,投身于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之后,对吉野而言,首先应该有一个突破包含于内心之中的“帝国日本之国家利益”这一理念的过程。军阀、官僚、财阀们的“侵略之日本”与我们的“和平之日本”,完全是两回事。将要从官僚、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我们的日本”,绝不是一个“侵略之日本”,“愿我等早日成功此解放运动,亦真诚祈愿邻邦民众之解放运动早日成功”等一系列的吉野的铮铮之辞,确实有着令人震耳欲聋的回荡。历来的所谓亲善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亲善,唯有从官僚、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两国,始能筑成真正之亲善。从这一断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此时的吉野,已经将所谓的帝国日本国家权益的虚伪性几乎完全地揭露了出来,并把它打得粉碎。或许就是此时此刻的这一突破,吉野才得以开拓了全新的中国认识观,才能从“排日”这一充满危惧的时势中脱身而出,隐约窥见了“日支亲善”的新路途。

还有一个,就是左右过吉野思考的“国际秩序观”这一框架,至今又怎么样了呢? 19世纪以来,欧美列强称霸世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历史事实。因此,所有与世界秩序相关的观念,都是在这一历史事实之上建立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秩序的观念,是由已经完成了近代国家建设的诸国构筑的观念,也是由以这些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社会的观念。即使这一国际秩序的内容,因其无与伦比的势力为之增添了无穷的色彩,但构成近代世界,规定了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仍然是这些列强诸国。这里,日本因为明治维新以后的发展,也在其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在这样的形势下,这种国际秩序的观念——除去极其少数的例外——尤其在日俄战争以后,在日本人的心目之中,是一个非常普遍,又非常黯然的考虑国际问题的大前提。如果从这一视点来看,面对欧美列强势 力不断渗入中国而唯恐落后、焦虑万分的内田固然是这样,将日本的对中国

经济渗透认为是给中国的生存活力带来新刺激的内藤湖南，也是从同样的观念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仅限于这一点上来说，吉野其实也是站在同一观念之上的。与国家秩序的内幕作了坚决斗争的吉野，却没有冲破这一国际秩序观念的束缚。

吉野发表《切勿谩骂北京学生团之行动》的同一期刊的同一号上，同时还刊登了吉野的另外一篇文章——《解决山东问题之世界背景》。在这一论文中，对于触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山东问题，与评价五四运动完全相反，斥责了中国要求“将山东权益从德国手中直接归还中国”的主张，并建言将山东权益一旦归还国际联盟，我国政府再从国联处取得特别管理权利。在吉野眼中，“今日之巴黎会议乃世界改造之空前大会议”，这展示了“世界性新形势之趋向”。可以说，这一时期，他期待着国际秩序能通过“国际联盟”而使之渐次向“道义”、“理义”的轨道上发展。从贯穿于吉野思想的伦理性格来看，他对国际秩序的这种方向转变，是抱着极大的期望的。但是，吉野对所谓的近代文明诸国垄断国际秩序这一本质性的东西，却不抱丝毫疑问。

对于吉野的这种态度，当然可以找到许多理由来替他辩护。我们可以说吉野的民本主义思想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不彻底性，也可以说，吉野虽然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但最终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仍然无缘。实际上，吉野的中国认识，最具有昂扬斗志的其实也就是这几年。以后的吉野的中国认识观可以从他对“万县事件”的评价中看出一点端倪来。大正十五年（1926），吴佩孚麾下的军队在四川万县与英国军队发生冲突，这一事件被称为“万县事件”。对于这一事件，吉野赞同英国的干涉政策，认为英国的干涉政策若能减弱地方军阀的势力的话，那实际上是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利益。（吉野作造著：《最近之英支葛藤》，《中央公论》1926年10月号）然而，对吉野的这些侧面，无论怎样指责他，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事。因为，在二战以前的日本——其实，在二战以后的日本，依然——不管什么样的思想也好，意识也好，从右翼到左翼，在真



正意义上能突破这一近代国际秩序观念束缚的人,事实上一个也没有。这一近代国际秩序的观念,恰像是一张巨大的网,将人们的思想全部束缚在其中。确实,正如章太炎所说的那样,帝国日本不可能革帝国主义自己的命。在这里,我只想附加说明这样一件事,那就是吉野发起“日支学生提携运动”的北京方面的媒介人李大钊,对吉野期待的能实现“道义”的国际世界,却当头棒喝,斥之为“强盗世界”。(李大钊著:《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1919年第22号——《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2页)之后,李大钊在国内与军阀、官僚这些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渐渐地将革命的主力军从学生转向了劳动工人,即走上了与民众相结合的道路。

这里,我想有再一次将这一问题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必要。关于吉野,我们再作这样的说明,当然并不是替他的局限性或时代性作什么辩解,而是与作为本文主题的中国认识所应有方法问题密切相关的。吉野的中国观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其实给大正年间以及昭和初年的好几种中国认识观——尽管其表现方法完全不同——带来了很深的影响。将中国放在畸形性的范畴进行理解,将中国问题的实际内容抛弃,仅将之视作我国的领土问题的中国认识观,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进展,逐渐占有了优势地位。日本的侵略深深地冲击了中国的内部,在中国的内部,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故而,从中展现出来的思想问题,依然是带有深刻的意义的。

一般说来,在日本的近代史中,大正时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好景气,滋润了每一个人,日本也终于成了世界五大列强之一。欧美思想滔滔不绝地流入日本,甚至连街头巷尾都充满着“舶来文化”的韵味。在这种背景下,“支那”的文化,“支那”的变动,在知识界,没有成为真正的研究对象。“支那”的风土、世俗,只不过是引起知识界好奇心的一个话题而已。例如后藤朝太郎、井上红梅等人对“支那”人情风俗的介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趣味心,千方百计想以此

来引起人们的兴趣。这样的现象，不仅仅限于知识界。在政治界，也绝不能说对“亚洲”、“支那”采取特殊观点的立场是大正年间主导外交的主流，反而否定这一观点的立场也时不时地显露出来。比如，大正六年（1917）的阁僚决议中说：

又，世人往往依据日支两国人种上或地理上之关系，有以之为基础，倡说两国相互提携，共其命运者。然于事实之上，支那之盛衰，未尝给帝国勃兴之国势带来任何之消长。人种上或地理上之关系，与帝国之命运并无必然之联系。且以支那之休戚即为帝国之休戚之说，极其危险之推论或由此而起，唯恐内政干涉之端发于此，黄祸恐日之惑生于兹。（《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425页）<sup>[2]</sup>

然而，这种不干涉内政的路线，当然与现实是相反的，这一事实，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更准确地说，日本根本没有把中国看成是“相互共其命运”的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而是赤裸裸地将中国看成了与日本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土问题，从而，采取的是侵略大陆的军事路线。在某种意义上说，与政界的发展变化步调一致，在知识界，以一种更加复杂、更加微妙的形式，一个极其深刻的课题在不断地发芽、生根。例如，从大正教养主义的代表人物阿部次郎（1883—1959）的一段话中，大概可以看出这一复杂情绪。他在外游途中，面对欧洲人对黄色人种的横暴，他仔细地考虑了日本应该担负的使命的同时，说：

为了挑起这一使命的重担，明治以后的日本必须做出多深的忏悔和赎罪、清算和整理啊！这一点如果不诚实地、仔细地思考的话，东方的盟主最终将会堕落成一个拜倒在欧美式虚伪下的追随者。对于我们来说，必要的并不是趾高气扬，而是深沉地默默地劳动。（阿部次郎著：《东洋》，收载于《秋窗记》，岩波书店1937年版。——《阿部次郎全集》，角川书店1960年版第10卷。）

当然，阿部次郎的这段话本身，极其暧昧，含有多种意思，令人难以

确认。而且,从这儿得出来的所谓前进道路,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但是,如果将之与日本、中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联系起来看的话,那就是他不断地在向我国提示一个课题,即,不允许将中国问题转化成“大陆问题”这一路线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课题,作为与日本自身的存在密切相关的本质性的思想课题,一直叉开双脚站在近代日本的发展道路的先头。在这一方面,也就是说在日中两国关系方面,像吉野那样,将中国放在反抗军阀、官僚的学生运动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民主主义潮流”的范畴中来加以认识,绝不是不可能的事。也就是说,像吉野这样的行动,使得将中国放在变革中,或者说放在革命运动中来加以认识变成了可能,很明显这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课题的一个回答。然而,在另一方面,将中国视作帝国主义世界里的被压迫民族,即从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所处的这一地位出发来发问,并对之作出解答,就连吉野,最终都没有能够回答这一问题。这对于帝国主义的日本来说,固然是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并且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虽然如此,对中国受帝国主义压抑这一现实问题,虽然形式很晦涩,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好几种表现形式觉察到一些答案式的东西。不,与其说是一种答案,倒还不如将它看成是一种几乎处于无意识之中的不安或苦闷反而更加妥当。在这里,想通过三个例子来简单地看一下这种表现形式:一是超国家主义者北一辉,一是白桦派,再一个就是社会主义者。

## 五 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洞察——北一辉的眼睛

如前所述,站在把中国作为一个特殊国家、特殊社会而将之抛弃的立场上,想捕捉这个国家的动向,是完全不可能的。日本军国主义因此而盲目地走上了侵略道路,并且越陷越深。为了掌握中国历史的动向,或多或少,对外的、开放式的目光,即,将中国放在普遍的范畴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北一辉(1883—1937)在辛亥革命中的发现以及通过这一

发现而接近中国革命的态度，在方法上虽然与吉野完全不同，但仍然带有同样的性质。面对欧洲势力的侵入，日本凭借着本国的“兴国精神”，保持了独立。北一辉以为中国与日本一样，也有着这种“兴国精神”。因此，他想通过这一点来把握中国的动态。

北一辉在二战以前的右翼团体中是类似教主一样的存在，又是日本的超国家主义的理论指导者。从《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这一独创性思索出发的北一辉，在他一生中几乎用了十年的时间，投入到了中国革命之中。这一期间，他的思想，在大正五年（1916）出版的《支那革命外史》一书中开花结果。我们想以这一书籍为线索，在与前述诸问题相关的基础上，将北一辉的中国认识观作为一个典型树立起来。

首先，北一辉的中国认识观，与众多的右翼思想相比，其本质性的区别在于他与“支那蔑视论”彻底划清了界限，相反，他将辛亥革命视作全新的中国革命的始点，即，将它看作是“兴国之魂显现，潜伏之过程”。他说：

当不肖<sup>①</sup>在此回顾革命运动之轨迹时，首先不能不将与支那轻侮论者相异之着眼点置于前。彼等虽亦将排满革命命名为革命战争，然却嘲骂此革命不过是一起值得一记之无胜败之发火演习，并将此罪归嫁于其民族性。不肖之看法则与之相反，大凡古今之革命运动，实是思想之战争，不在兵火之胜败。（北一辉著：《支那革命外史》1921年版。——《北一辉著作集》，三铃书房1959年版第2卷，第22—23页）

在此以前，我们已经看了国粹主义者内田的《支那观》，我们大概很容易发现，北一辉的这一批判似乎就是直接针对内田的。辛亥革命的结果导致了军阀袁世凯政权的成立，对此，内田确实感到非常失望，所以，将之痛斥成“恶劣之国民性”。但在北一辉看来，内田的谩骂只不过是可

<sup>①</sup> 北一辉的谦称。——译者注

笑的浅陋之见。中国的排满革命事实上关系到四百余州的存亡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权力者之交替，可以说这是一场“因经济、政治之颓废而濒临灭亡之旧国家自身，于黑暗中尝试其复活、飞跃之革命”。（同上，第10页）这一国家意识的觉醒，才是现今中国的动乱的本质。从而，这一革命是亡国阶级与兴国阶级之间的斗争，亡国阶级从根本上被一扫而尽，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建设“近代有组织的、有机的统一国家”作为目标。

在北一辉的这种认识的背后，根据同样面对欧洲势力的渗透而实行了明治维新的日本来类推的色彩非常浓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北一辉将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也只想限于这一点来考虑。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国革命的起因、动力，在于中国国家意识的觉醒。对中国国家意识的觉醒给予极大刺激的，实际上就是日本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而不是别的。如果将吉野与北一辉比较一下的话，吉野是将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的变动放在民主主义运动的潮流中来把握的，与之相对，北一辉则将之放在民族主义的觉醒中来理解。北一辉思想的性质，如果将其中的一些偏执除外，实际上有准确地把握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动态的本质的一面。在北一辉看来，中国爆发的排日运动绝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因国家意识的觉醒而产生出来的爱国心，不管日本的“对支政策”如何。本来就有着亲日和排日的两面性。“对支那革命，日本人应受之光荣，非为目前之物质协助，亦非于妓楼置酒争论功赏之个人交游，实为日本之兴隆与思想等给予其国之国家民族主义精神也。”（同上，第42页）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能明确地表现他的观点的了，他亦由此成了数以百计的大陆浪人<sup>①</sup>中最出类拔萃者。不，还不仅仅是这样，从这一侧面来对中国进行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在吉野作造身上都是很难得看到的。有这样一个传说，吉野读了北一辉的著作以后，感铭万分，一天，特

---

<sup>①</sup> 近代活跃在中国大陆的民间人士，多为国粹主义分子，充当收集情报等秘密活动。——译者注

地拜访了北一辉,与北一辉尽心畅谈,交换了意见。但是,北一辉式的中国认识观与吉野式的中国认识观,最终仍然没有机会能够合流、扬弃,而是各走各的路。这就是二战以前日本的中国认识观的实情。

北一辉从国家民族主义这一观点出发,对中国的动向进行了尖锐的剖析,这一点,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了。那么,他对日中两国的关系,还有,对国际秩序,到底展示了一个什么样的构想呢?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北一辉的面前,耸立着一堵充满着矛盾的高墙,面对这堵高墙,北一辉不得不再作一番挣扎。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北一辉从明治维新中看到了最重要的成功要诀,那就是日本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北一辉从中国革命中发现的也是国家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在这一点上,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二者间是相同的。那么,他的以这一共同点为轴心而展开的日中关系的构想中,对19世纪以来的欧美构筑的国际秩序,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呢?如果用一句结论性的话来说,那就是,对这一国际秩序,只能用国家民族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与之进行正面冲突,否则别无他法。换句话说,就是以国家为后盾,组织对抗这一国际秩序的力量。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北一辉的真正拿下这一课题,真正解决日中关系的设想,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对“革命支那”作了理论性阐明的同时,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也被提了出来,即提倡树立日本的“革命性对外政策”。

北一辉对日中关系的认识是从这儿开始的,即革命中国在“国家意识觉醒”的基础上,断然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在外国谋求本国的利益。中国在这一政策之下,首先发动“俄支战争”是必要的。同时,日本趁“俄支战争”之机,一方面,废弃日英同盟,将英国势力从“南支那”驱逐出去,另一方面,将俄国势力击退,使自己的势力进入满洲。一句话,“支那首先为生存,日本则为使小日本转为大日本”,“俄支战争”是一场非进行不可的战争。这样,以此为基础,“日支同盟”可以实现,在与革命中国的共

同协力之下,实现“亚洲门罗主义”。这就是北一辉提倡的“革命性对外政策”。北一辉的这一主张,对使亚洲殖民地化的欧美式国际秩序,确实是一支直透其心的利箭。与内田、湖南等最终委身于这一国际秩序,对这一世界潮流随波逐流,并为日本的势力渗透而处心积虑的做法相比,与吉野希望通过国联来对这一国际秩序进行“道义”化改造的极其伦理性的期待相比,北一辉的主张则是从一个侧面将这一秩序的虚伪性、伪善性彻底揭穿。俄国在满洲的势力,英国在中国南部的势力,不管以何种逻辑来粉饰,只要站在亚洲的立场上来看,它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其伪善的一面。很明显,北一辉不是站在世界潮流和现存国际秩序一侧,而是站在亚洲这一侧来表明自己的主张的。

但是,虽然如此,在北一辉的主张里,仍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这一点,恐怕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北一辉的最基本的范畴是国家民族主义,而这一国家民族主义存在于国家意识的觉醒之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日支同盟”如何才能得以保证呢?从中引出来的疑问,倒不如说是最终具有相同势力的“日支两国”之间怎样才能避免发生冲突的问题。更何况,正是北一辉的祖国日本,在日俄战争以后,委身于侵略大陆的冲动之中,与日俱增地侵蚀着中国。这一侵略行为,与北一辉的“日支同盟”正相反,除了招致中国的排日运动和“日支”两国的民族冲突以外,绝不会带来其他什么结果。

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北一辉是为了隐瞒这样的事态而单在语言上故意提倡“革命性外交”的。对日本积极推崇欧美式国际秩序,并由此成为“亚洲盟主”的这一做法,北一辉确实是“一贯不惑”地加以抵抗的。但是,北一辉在国家民族主义之中寻求抵抗的根据时,“日支”提携一事,在他的思维逻辑中便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在现实的变化之中,要想解决这一矛盾,北一辉不得不作出更深的认识来。吉野撰写《切勿谩骂北京学生团之行动》的前后,北一辉正在上海。在“席卷支那之排日运动之哄声中,深居简出”的同时,他不得不拼命地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

口。“眼前所见立于排日运动阵头之指挥者、鼓吹者、叱咤者，悉十年来与之共生死，有刎颈之交之同志，面对此大矛盾，如何是好？”“岂非于地上之享生者难遇之矛盾，大矛盾哉！”（北一辉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第三回公刊颁布之际》1926年版。——前引书《著作集》第2卷，第356、358页）面临着这一大矛盾，他写下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变其初衷，投身于日本本国之革命，离开了中国。这些史实，都是众所周知的了。与此同时，他的思想越来越向国家靠拢，倾向于超国家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北一辉是在所谓“于强取他人寸土之同时，……若有必要，应有夺取全地球之远大抱负”（北一辉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19年版。——前引书《著作集》第2卷，第277页）的“革命性大帝国主义”之中，来寻找解决这一矛盾的突破口的。

北一辉在“势力就是正义”的国家主义思想中，恐怕永远也找不到克服这一矛盾的方法。随你怎样将“革命性”这样的美辞冠于头上，也克服不了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际秩序中一员干将的北一辉的祖国日本的矛盾，也同样克服不了苦于“席卷全支那之排日运动之哄声”中的日中两国的矛盾。前面我们考察的其他几种类型的中国认识观中，几乎没有涉及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这一问题，是北一辉将之公正地提了出来，并且，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大胆地向欧美式国际秩序进行挑战，更进一步将这一问题作为思想问题提起世人之注意的。关于这一点，我承认。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他的视点本身所包含着的致命的缺陷，使得他最终不得不走向了理想破灭的道路。对这一点，似乎让人感觉到了一种可怜或凄惨。在北一辉中国认识观的深处，他没有能够彻底把握住中国的民众运动。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根源在哪儿，将这一问题彻底看透的视野，在北一辉的中国认识观中还远远没有形成。大凡若要真正把握20世纪的中国动态，应该是抛开国家这个框架，然后将目光集中到人民大众的运动上去，这大概是最起码的要求吧！



## 六 大正知识分子周围的“中国”

北一辉通过国家民族主义这个媒介来接近中国,在这个基础上,将国家这一观念中所包含的问题追究到了极限。如果我们说北一辉是选择了这条道路的话,那么,与他相反,在观念上超越国家这一概念,并由此对中国产生了某种反作用的,就是白桦派。白桦派并不是什么积极地想提示什么中国认识观的学派,他们的目光,毋宁说主要集中于欧洲,并且,他们都限于纯文学、纯艺术的领域,甚至可以说,与政治问题毫无缘分。而对白桦派产生某种关心的却是中国方面,并且也只限于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是白桦派提示了某种日本的中国认识观或中国印象,倒还不如说是中国人通过白桦派的作品反过来感知到了日本的中国认识观或中国印象。但是,不管怎么说,白桦派的活动,事实上给我们展示了大正年间的中国认识观问题的一个方面。

如果想马上提出一个话题的话,那首先就是与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的戏曲《一个青年的梦》或与“新村”运动相关联的话题。武者小路创作《一个青年的梦》,向世人畅诉人道主义的人类爱时,是大正五年(1916)。然后,鲁迅(1881—1936)将它翻译成中文在《新青年》上发表,是大正九年的事。这部戏曲,武者小路用其特有的笔调,从“战争”=“相互厮杀”这一非常单纯明快的命题出发,提示了人类怎样才能从这一现实中逃脱出来这一现实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在这里对武者小路的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刺激,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在这部戏曲里,对登场人物德太郎(德国)、英太郎(英国)、日太郎(日本)等人的愚蠢进行了讽刺与批判,讴歌了超越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爱怜。后来,武者小路关于这部戏曲,作了如下的述怀:

《一个青年的梦》,对于当时 30 岁左右的我来说,战争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对战争的恐怖深有痛感,所以写下了这样的一部作品。

当时,将战争作为问题来看待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我仍然有创作这部作品的意愿。鲁迅将之译成中文,后来,在上海遇见鲁迅时,我曾对他说:“这部作品,在日本,大家都早已忘记了它的存在,而在中国却至今还被人们传颂。”这已经是19年前(1936年。——著者注)的话了。(《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16卷《后跋》,新潮社1956年版)

不过,最早介绍武者小路这部戏曲的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1885—1967)。他早于鲁迅翻译此剧两年,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中,以《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为题,介绍了这部作品。在这里,周作人将之作为非战文学作品,作了非常高的评价:

日本从来也称好战的国。樱井忠温的《肉弹》,是世界闻名的一部赞美战争的小说。但我们想这也只是以前的暂时的现象,不能当作将来的永远的代表。我们看见日本思想言论界上,人道主义的倾向,日渐加多;觉得是一件最可贺的事。虽然尚是极少的少数,还被那多数国家主义的人所妨碍,未能发展;但是将来大有希望。武者小路君是这派中的一个健者,《一个青年的梦》,便是新日本的非战论的代表。

鲁迅读了这篇介绍文章后,马上设法弄到了这部剧本,读后感慨万千。

周作人对武者小路的介绍,不仅仅是《一个青年的梦》,武者小路一创办“新村”,周作人马上就在《新青年》上为之作了介绍。大正八年(1919),周作人直接访问了位于日向的“新村总部”,在那儿与村民们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李大钊对武者小路的这一尝试也作了极高的评价。周作人回国后,在北京创立了“新村北京支部”,致力于热心的宣传。武者小路的作品与“新村”运动,当然,接受的人各有各的想法,但不管怎么说,给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鲁迅对《一个青年的梦》,在哪些方面感慨最深呢?他在《译者

序》中,这样写道:

我……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坚固,声音也很真。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鲁迅著:《〈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新青年》1920年第七卷第二号,群益书社[上海])

在这里,鲁迅的思想与武者小路的主张产生了共鸣,因此翻译了他的作品,但其中又含有一种踌躇与拘束。不用说,这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鲁迅着手翻译这部作品是大正八年(1919),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这一年。三个月前,学生们举行了排日运动,在两国相互憎恨的时期里,鲁迅即使翻译了这部作品,恐怕读者也不会有多少。鲁迅曾被这一烦恼所困扰过,也感到羞耻过,他为此写道:

但我虑到几位读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该熟读此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合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译成中文的意义。(同上)

这一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鲁迅的思想和感情的波动,现在读来,仍历历在目。这些先姑且不说,《一个青年的梦》在中国被接受,这一过程的背后,仍然有一个受容方法的问题。就拿鲁迅与周作人来说,周作人的受容方法与鲁迅就很不相同。对周作人来说,武者小路的这一作品,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代表了“非战论”。武者小路自己曾说过,在日本,这部作品问世以后不久立刻就被人们忘却了。在我国,这一作品果然就是被作为“非战论”的代表作而被接受的吗?其实,倒还不如说是被作为

托尔斯泰主义来加以评价的。<sup>①</sup>

但是,仔细考虑一下的话,武者小路自己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对国家的问题,对侵略与被侵略这一些问题,真正地认真思考过吗?对于这一点,回答是否定的。这儿,我们不是专门讨论武者小路思想的,但有一点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得出来,武者小路这方面的弱点,不待到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早在这部作品的创作前后,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sup>[3]</sup>

武者小路对自己的作品被译成中文非常高兴,给周作人写了《与支那未知的友人》的信。信中,他除了真心诚意地表示对译本的满意以外,还写道:

我老实地说:我想现今世界上最难解的国,要算是支那了。别的独立国都觉醒了,正在做“人类的”事业;国民性的谜,也有一部分解决了。但是支那的这个谜,还一点没有解决。日本也还没有完全觉醒,比支那却已几分觉醒过来了;谜也将要解决了。

在国土广大这一点上,俄国也不下于支那;可是俄国已经多少觉醒了,……但支那是同日本一样,还在自此以后;或比日本更在自此以后。……我想青年的人所最应该喜欢的时候,正是现在的时候。诸君的责任愈重,也便愈值得做事,这正是现在了。(武者小路实笃著:《与支那未知的友人》,《新青年》1920年第七卷第三号)

然后,他又举了后鸟先飞的例子,称道,支那觉醒时分,将会是最先进的国家。最后,他又附加了一句:“但我绝对的希望这往前的方法,要用那人类见了说好的方法才是。”(同上)

我对武者小路在这个意见里表现出来的认真与善意,没有丝毫怀

① 托尔斯泰, Lev Nikolaevich Tolstoj, 1828—1910, 俄国贵族、作家、思想家。极力抵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引起的农村荒废与贫穷化,是守旧农民阶级思想的代表者,是所谓托尔斯泰主义的倡导者与实践者。——译者注

疑。从他以《老实人》登场以来的历程,更从他在“新村”运动中的活动来看,这是非常清楚、毋庸置疑的。所以,鲁迅才会对之下了“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的评价。但即使这样,日本“比支那却已几分觉醒过来了”这样的说法,又有多少是可确信的呢?还有,前进的方法首先得“要用那人类见了说好的方法”这样的说法,是当时的侵略国家日本对被侵略国家中国那么容易就说得出来的话吗?陈独秀(1879—1942)在《新青年》同卷同号上撰文,感谢武者小路的来信时,对日本“比支那却已几分觉醒过来了”这一说法,在基本承认的前提下,写下了下面这一段激愤的文章:

但是中国人除了少数的欧美日本留学生在那里做“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梦,最大多数的老百姓,自来没有中这种毒。……日本底军阀、外交官,他们本来应该糊涂,不算稀奇,但是一般的日本人大半迷信“国家主义”,好像是一种宗教,就是近年来热心“社会运动”、“劳动运动”的学者,也有许多还是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像武者先生和山川均氏夫妇那样见解彻底的人,恐怕仍然很少,这是我们很忧虑的事。(《陈独秀附记》,《新青年》1920年第七卷第三号)

如果仔细考虑一下的话,鲁迅也好,李大钊也好,周作人也好,还有陈独秀,他们对日本的印象,都是将它浓缩到一点上来看的,并且以此描出了一幅鲜明的日本像。不用说,这一印象就是“好战国”、“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其实,这并不单单是一个印象,至少在中国方面看来,这是根据事实画出来的日本的肖像。在这幅肖像前面,武者小路又能做些什么呢?

武者小路所提示的“人类”、“人类爱”这些观念,确实是一种最普遍的理念。所以,他的作品才能在国家间的政治争斗中,漂洋过海,被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所容纳,他的心被感动了。武者小路因其作品在中国被接受而喜悦,“无论何处国家与国家的感情虽不好,人与人的同类间的感情是可以好的”。在高呼着这些感动的语言的同时,他在观念上克服

了因国家这一概念而带来的苦恼，心情激愤，振臂高呼。与武者小路的这种心情相比，中国方面又怎么样呢？在中国，决定接受武者小路作品这一做法本身，就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意念，即，他们在承认“人类”、“人类爱”这一普遍理念的正确性，与之产生共鸣的同时，又将这一理念作为一个尺度来衡量日本这个国家，从而，与这一普遍理念相对照，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日本肖像就越来越鲜明地浮现了上来。

武者小路做错了什么吗？他的思想，放在近代日本这一历史中来考察时，比如说与德富苏峰、后藤新平提倡的“膨胀论”——虽然他们的方向不同——相比，其结果，从根本上来说或许是一样的。但是，事情的实质可能并不这样简单，而应该以更复杂的形式出现，而且，与大正思想这一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对这一问题，我想从另外一个侧面来揭示。为此，想先看芥川龙之介（1892—1927）的《支那游记》（芥川龙之介著：《支那游记》，改造社1925年版。——《芥川龙之介全集》第6卷，筑摩书房1958、1965年版）的一小节。

芥川龙之介在大正十年（1921）作为《大阪每日》的海外视察员，去中国旅游。关于这一时期的芥川，江口涣（1887— ）后来这样写道，芥川在湖南省长沙市的女子学校参观时，被中国的排日抵抗精神所倾倒。

女学生们在教室也好，在家庭也好，绝对不使用日货。钢笔、墨水、笔记簿均不使用。……忍受着各种不便，将抵抗坚持到最后。……当芥川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一坚强的决心与斗志时，深受感动，差一点儿都要流出眼泪来了。后来他对我说：“中国这个民族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现在我看到了。现在，你要记住，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国家的。”（江口涣著：《我的文学半生记》，青木文库1968年版，第219页）

芥川的《支那游记》本身，却是以更复杂的面貌展开的。他在《支那纪行》中，追求文人的诗情，对名胜古迹的俗恶，是皱起双眉来看的。此

中,关于排日运动,亦有如下的记述:

去看了天平山白云寺,在倚山亭壁上,乱涂有许多排日词句。有“诸君,尔在快活之时,万万不可忘了三七二十一条”之类。……尚有更猛烈者,“莽荡河山起暮愁,何来不共戴天仇;恨无十万横磨剑,杀尽倭奴方罢休。”……据闻,用于唆使抵制日货之费用,或在三十万元内外,如果有此效力,则对驱逐日本商品而言,毋宁说是极便宜的广告费。(芥川龙之介著:《支那纪行》,收载于前引书《支那游记》)

对长沙的女子学校,又有这样的记述:

参观长沙天心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并附属高等小学校。一位古今稀见的哭丧脸模样的年青教师为我做向导。女学生皆为排日而不用铅笔等,桌上置笔砚,却上着几何、代数课。再想一见其宿舍,与翻译之少年交涉,那教师愈显哭丧之脸,称:“这万万不可,因先有兵卒五六人闯入此处宿舍,惹起强奸之事故。”(芥川龙之介著:《杂信一束》,同上)

从芥川龙之介的《支那游记》中,立刻去寻求他的“支那观”,这似乎过于性急了一点儿,这样做或许会犯错误,因为,这毕竟是这位大正文学家的文学作品而已,其中,有他的“艺术”与韬晦。但是,即使是这样,在对照着江口涣的记述,再来读《支那游记》时,情不自禁地体会到了芥川龙之介的那种因对中国这个国家所面临的现实欲解不能而抑郁不安的心情。比如:

一 欧罗巴的汉口 这水中倒映着,  
英吉利国旗的鲜艳。  
——啊,好险!  
差点儿撞上了车。

## 二 支那的汉口

彩票,麻将的道具之间,  
火红的夕阳,  
照射在砂砾的道上。  
独步其处,  
盔形帽下,  
感觉到了汉口的夏日。  
——一小竹篮的巴旦杏,  
告诉了我季节!

(同上)

又比如:

## 十九 奉天

正是日暮时分,停车场里,  
看见四五十日本人阔步走  
来时。差一点儿就产生了  
赞成黄祸论的想法。

(同上)

侵入中国的欧洲和对此默默忍受的中国,然后是在大陆横行霸道的日本人,这一幅幅画面,都给了芥川一种异样的冲击。这种“模糊不清的不安”之中,不正是深深地印刻在大正时期日本思想界的无论如何也难以排除的苦恼吗?这一思想上的苦恼也深深地潜藏在武者小路的心底,因而,他高呼与中国人携手的令人感动的言辞之中,不禁使人感觉到一种徒劳。《支那游记》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心理,不得不说它在某一点上反映出了这一时代的中国认识观中的深深的裂痕。

## 七 社会主义者与中国革命运动

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混战,以俄国革命、五四运动为重要契机,愈演愈烈。至今为止除了在军事上投机而没有发现其他路途的孙文



(1866—1925),由于五四运动和苏维埃俄国的成立,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大正十三年(1924),改组了国民党,以后又实现了国共合作。孙文死后,国民党继承其遗嘱,开始了北伐战争(1926—1927)。这意味着,辛亥革命后,经历了十余年,重新改组后的国民党逐渐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中国大陆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当然,这一变动,给日本的“对支政策”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因素,同时,对日本人的中国认识观也提出了新视野的要求。这一时期,探索认识中国新方法的任务,主要就落在了社会主义者的肩上。这里,被寻求到的新观点,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阶级”观了。

日本左翼的中国认识观,若要对之进行全面的把握,在这里毕竟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些特点,经前人的研究已经被揭示出来了。日本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起,民族主义的观念就非常淡薄。例如,幸德秋水(1871—1911),他声援朝鲜的民族独立斗争,却是在“否定国家理念”的理论中找到了斗争的方向的。另外,针对亚洲的革命,他曾经这样说:

彼等(指菲律宾、安南、朝鲜等革命家。——著者注)之运动,限于一国之独立,一民族之团结时,其势力虽甚不足言,然若使之结为东方诸民族革命党,彼此间无国家之别,无人种之别,迅速汇合于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之旗帜下,以至形成联合,则二十世纪之东方,实是革命之天地也。(石母田正著:《幸德秋水与中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9卷《亚洲主义》,筑摩书房1963年版,第386—387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面包含着很浓厚的抽去了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色彩。这里,若将之作为一种缺陷提出来,对历史来说,应该说是过于苛刻的评价了吧。在近代的日本社会里,天皇制一手遮天地独占了日本的民族主义,因此,各种类型的反体制思想以及反体制运动,就必然地带有国际主义的色彩,并且,或多或少,都不得不在国际主义的理念中寻找自己的据点。所以,可以说,近代日本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反过来却是

思索怎样才能将自己的思想或运动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苦恼的历史。我想讨论的，是大正时期左翼的中国认识观。在这一时期左翼的中国认识观中，仍然没有能够避免日本社会主义出现当初就不得不背负的宿命论式的弱点。这些问题，随着政治形势的日益紧迫，至昭和初年，终于不可收拾，呈现了破败的局势。在这里，我想随便列举一些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者的中国认识观，以证明前面提到的这一倾向，并提出若干看法。

挺过了大逆事件以后的冷酷的时代，堺利彦(1870—1933)终于又“举起一面小小的旗”，继续标榜社会主义。在大正四年(1915)的《新社会》第三号上，撰写了《支那革命之性质》，发了以下之论：

窃以为，支那从今以后，尚需经过数次小革命、小骚乱，始能进入资本主义制度的近代国家。其后，始能兴起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劳动运动。

次年，在第八号上，针对“支那革命之将来”，又作了如下之论述：

支那之形势极其混沌。袁世凯恐难免没落，其后，革命党之理想果能被实现与否，尚未可知。……革命成功之当初，其理想之一部分或暂时能实现，……但形势必然会逆转，反动必然会发生，然后，今日尚未在意识之中的经济这一必然现象会产生。这不外于确立近代产业制度，换言之，即支那国的资本化。……近代意义上真正之革命，当在这以后。

然后，又说：

所谓革命党，能将革命之理想实现到何等程度呢？今后仍会经过几度反复又反复，最后以不彻底之妥协而告终。孙逸仙(孙文。——著者注)君之将来或如日本之板垣伯，张继君之将来或如日本之中江兆民，亦未可知。我暗暗为之担心。支那真正之革命，当是这以后的事。

堺利彦的主张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他虽然没有明言,但事实上仍是将辛亥革命与明治维新进行了对比。在这一点之上,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历史推断成是一个近代国家形成,或者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曲折多端的进程。然后,真正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进程完成以后才能到来。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杉荣(1885—1923),对中国的“抵制外国商品”运动,作了如是说:“只要是本国资本家生产的产品,即使品质低劣,也强使民众购买,这种想法完全出于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不理解。”并且笑着说:“他们的觉悟尚未达到这一高度,不管怎么说,自愧不如嘛。”(前引石母田正文第393页)大杉荣说这番话时的态度姑且不论,在思想上仍然与堺利彦是在同一层次上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注意到,在堺利彦的中国认识观中,似乎充满着一种非凡的自信,“形势必然会逆转,反动必然会发生”,这一言辞,能够充分表现出这种非凡的自信。在堺利彦看来,中国的变动,将被“经济的必然现象”所左右,从而,把握住了这一视角,对中国的将来进行预测才会有可能。这种充满自信的预言,内藤湖南不用说,就是连吉野作造,最终也没有能讲出口来。如果说社会主义思想给日本的中国认识论添加了一种类型的话,那就是堺利彦从这一视角中产生的中国认识了。

堺利彦的这种中国认识方法,到了他的弟子山川均(1880—1958)的时候,通过“阶级”这个更加明确的普遍性范畴,将之升华。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时代,山川撰写了《民主主义之烦恼》(1919),从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上对吉野作造作了尖锐的批评。后来,大正十一年(1922),以《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变》一文(《前卫》7—8月合刊号),给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吉野曾经预想过的“年青支那”的勃兴,通过国民党的改组、北伐战争等形式崭露头角,为此,不管日本帝国主义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对此作出相应的回答,采取相应的方针、政策。随着这种形式的发展,山川对“对支问题”的关心度也逐渐升温,与此问题相关的发言也多了起来。对中国问题几乎没有什么论说的山川,突然之间开始评

论起“支那问题”来，是昭和二年（1927）的事。这一时期，中国的政局风云变幻，国民革命军怒涛般地席卷了华南平原，向长江流域挺进，在长江流域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对峙，引发了“南京事件”。与此同时，在北伐运动的内部，早就存在着的国共两党的分裂倾向更加表面化，最终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另一方面，我国的对抗北伐运动的田中内阁，策动了第一次山东出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致日本死命的大陆问题，作为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开始一步一步地登台亮相。

在这样的形势下，山川首先看到，中国的激烈变动，是“代表反动旧势力的军阀与代表支那革命民众运动的南方革命军两大势力的最后的正面武装斗争”。（山川均著：《支那问题之展开》，《山川均全集》，劲草书房1966年版，第7卷，第376页）但是，山川并不把这一运动视为单纯的“民众觉醒”的运动，而把它看成是“支那民族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向先进资本主义诸国的资产阶级争取对等立场的运动”。（山川均著：《支那问题之国际影响》，《全集》第7卷第3页）是否可以这样说，堺利彦曾经预言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现在正在山川的眼前慢慢地展开。然而，另一方面，堺利彦“暗暗为之担心”的孙逸仙是否会沦为日本的板垣伯的预言则归于破产，因为，奠定了这一国民革命基础的，不是别人，正是孙文本人。为此，孙文自身的转变——改组国民党，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山川对这一系列的形势变化，也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支那的革命运动，在过去，与资产阶级国民主义运动有着共同的性质，然而，其作用则不同。）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榨取国压迫国与被榨取国被压迫国之间出现明显的分裂对峙之今日，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民族解放运动，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制崩溃的一大力量。特别是支那，由于国内资本与民族资产阶级之力量非常薄弱，因此，对支那国民的革命运动而言，就更多了一层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山川均著：《支那问题之展开》，同上，第375页）

山川或许正是以“阶级”这一范畴为武器，才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这一时期，日本国内也以“南京事件”为契机，劳农、日劳、社民三党展开了“对支非干涉运动”。再者，共产国际成立以后，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给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从中国共产党势力的迅速发展，国民革命军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较量，“四一二政变”后的国共分裂这一系列事件来看，被压迫民族的阶级斗争的蓬勃发展，戏剧性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样的形势下，从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山川看到了民族解放运动和随之而起的无产阶级力量的抬头的趋势。因此，限于这一点来看，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已经突破了大正初期的那种非常图式化的中国认识观，显示出了更加深刻、更加锐利的认识观，这样说，我想绝不言过其实。山川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通过运用社会主义理论，说得更准确一点，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得出来的，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杰出的认识。

然而，在这里，我仍然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来，这个问题，是与日本社会主义的性质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得更广一点，是跟日本与中国、日本与国际社会这两大关系密切相关的问题。当我们读了山川的与中国问题有关的论说以后，似乎会有这样的感觉：他的立论，可以说几乎都是经由了“国际资本主义”后才树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在山川看来，中国问题，首先是中国与笼罩着现代世界的资本主义秩序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承认这一关系的基础上，将中国革命作为这一秩序崩溃的一个征兆来加以理解的。例如，他说：

今日，英支关系的紧张，影响着支那问题的解决。其实，真正紧张的，并非英国与支那之间的关系，而是盘踞于支那之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关系。（山川均著：《英帝国主义与支那国民运动》，同上，第343页）

据山川均所说,“被压迫民族的觉醒,特别是支那的民众运动与工农俄国的存在,是正在威胁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力量,是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分解的两个催化剂。”(山川均著:《英国关系的紧张》,同上,第377页)然后还有,“支那国民运动”,只要始终坚持着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势力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性质,就能发挥“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最大势力”的作用。(山川均著:《支那问题之国际影响》,同上,第377页)山川的这种认识当然是不错的,而且,也正像前面评价过的那样,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正因为他抓到了本质性的东西,因而显出了他的卓见远识,并且,作为时政评论家的他,以其超人的时势洞察能力,时时刻刻对日本的“对支政策”进行批评,展示了他的辉煌。但是,尽管如此,如果站在近代日中关系这一历史舞台上来看的话,山川的中国认识中,仍然有着一种欠缺。这种欠缺,说到底,不是别的,就是对中国缺乏一种加害者的意识。

前面曾经说过,内田良平在列强蚕食中国这一历史现状之下,对列强的行为作了全面的肯定,促使了日本的大陆侵略合理化。对内田来说,这种瓜分竞争,才是20世纪世界国际秩序形成的必要过程。与内田的主张相比,山川是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关系”中发现了国际社会的本质,然后在被压迫民族的国民运动中,找到了未来这个世界崩溃的道路。从这里,山川在被日本帝国主义压制的日本社会主义者与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民族之间,也就是说,在同是被压迫者这一点上,开辟了国际联合这条道路。关于内田与山川的国际社会观,如果用最不客气的话来说,二者虽然矢量上完全朝着相反的方向,但是,在其构造上,潜藏着某种类似点。内田是面对这一世界秩序,从加害者的立场上来积极参与的;山川则是从被害者的立场上来预测这一秩序的崩溃的。但是,对中国,山川恐怕并没有站在加害者的立场上,就是连这种加害者的意识都是没有的。在这里,有一个无论如何也难以突破的障碍,那就是笼罩在近代日本头上的那张不可抗拒的近代世界历史逻辑的巨网。

关于山川个人,仍然存在许多必须详细探讨的重要问题,其中牵涉当时的言论统制、思想状况,还有工农派马克思主义等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山川的中国认识观中所包含的这种特质,我依然认为这不仅仅限于山川的认识观中。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左翼运动受到了天皇制的大镇压,但其中相当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小团体,却在某种程序之上继续活跃着。比如,在《思想》杂志的“支那特辑号”(1929年7月)中,就是以被推测为共产党系统的藤枝丈夫(1903—)为首的一批人为之奋笔挥毫的。在这里,根据阶级的理论来进行分析、批判的倾向,越来越鲜明地浮现了上来。虽然如此,在他们的分析、批判中,是怎样来描述这个国家的苦闷和变动的,仍然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藤枝在《支那最近之思想运动》的论说中,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分成“支配阶级(豪绅、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上述三种思想中,特别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国民党左翼”的改良主义思想作了彻底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又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了它的本质呢?毋宁说在这种批判中忽隐忽现的只是对经由共产国际而贩来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图式的承袭,或者过于简单地运用阶级联合这一理论,将日中关系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亦即日本的中国认识观中必须解决的本质性课题渐渐抹杀了。

## 八 尾声

以上,可以说从右到左,对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中国认识观进行了考察。在近代日中关系的历史舞台上,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是丰富多彩的,各自上演了一出自己的悲喜剧。通过这一考察,我们对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认识观的基本骨骼多少有了一点了解了吧。这里,我还想在上述的基础上,再一次提出一些问题来加以考察,或者说,针对上述的各种中国认识观,以独白的形式,叙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如果用结论式或断定式的话来说,以上的这些中国认识的历史,都

是失败的历史。这些中国认识观,其实都没有准确地把握住 20 世纪初至 20 年代中国社会内部变革的真正动力。这一特点,在前文中已经反复强调过多次了。

但是,反过来说,要想彻底理解、把握中国这个实体,形成自己的理论,毫无疑问,没有敏锐的洞察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里,我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后代人就可以对前代的历史人物说三道四的打算。对于历史人物来说,他们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当时的中国,确实是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混沌之中激烈地变动着,事实上,面对着这一激变,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是很难一下子将之看透的。这样,我国的中国认识观,一味地跟着中国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中国的变动而自身不断地分裂、解体。如果想避免这种解体,那就只有对中国社会的变化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否则就别无他途可寻。这种对中国社会的变化视而不见的态度,不用说,正是我国昭和年间所走的道路。德富苏峰曾经在大正初年,虽一边倡导帝国主义逻辑伦理,但还依然主张“我日本帝国不使他人加不义于我之同时,亦期望不加不义于他人”。(德富苏峰著:《时务一家言》,民友社 1913 年版,第 250 页)但这句话终于被发展成为“替天行道,代伐不义”(《军歌》的一节)的口号。日中战争爆发后,近卫内阁发布的所谓“不与国民政府(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是最能够说明这种形势变化的了。

那么,这个时代,中国激荡的历史潮流又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现代最需要的是什么?中国的前途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当时,连中国人自己恐怕都不是很清晰明了的。有国民党与军阀之间的斗争,又有国共两党之间的对立,还有,即使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毛泽东(1893—1976)的井冈山斗争,在不断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着独自的战斗,这些形势状况都是非常明白不过的了。在这里,我们先不谈 30 年代与世界历史相关的极其复杂的理论课题,只想涉及一些最单纯明快的问题。这从国民党右派的空想家戴天仇(传贤)



(1890—1949)著《日本论》的一些言辞中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他对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说:“分析中国形势,不言革命对反革命,而言南方与北方,此种方法乃是他们(田中义一所代表的日本统治层)的一贯伎俩。”“(对他们而言),不能忘却的要点有一个,若革命运动成功,中国因此而统一,则绝对对于日本不利。”(戴天仇著:《日本论》,上海民智书局编辑部译 1928 年版,《中国》1968 年 12 月号第 80、85 页。后有市川宏译《日本论》刊行,社会思想社 1972 年版)当时的中国存在着的对立,不是南北对立,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其趋势不是分裂,而是对统一的希求;需要的不是制度或机构,而是运动本身。对日本来说,为了明白这一简单明了的道理,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态度呢?

还有第二,现在似乎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出来。前面我在考察多种中国认识观时,批判了将中国放在畸形性中加以理解的中国观,对能够或多或少地运用更加具有普遍性的范畴来认识中国的有效性,也作了一些论证。然而,作为一般的民众,他们难道也能在上述的几种方法论的指导下来认识中国吗?能运用更具普遍性的范畴,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理智的认识观,仍然只局限于知识阶层。同时代的日本的一般民众,又是怎样来看待中国的呢?

吉野作造对五四排日运动时期甚嚣尘上的“支那应惩论”,孤军奋战,作了如此之批评:“(这种议论之所以出现)是多数国民之头脑中潜藏着‘若不加十分之威压,则恐其久而成习’之想法,我们首先不得不从此谬想中觉醒过来。”(吉野作造著:《狂乱之支那应惩论》,《中央公论》1919 年 7 月号)另外,与之相反,哲学家和辻哲郎(1889—1960),在昭和初期论及“支那人之特性”时说:“日本人如果失去团结,从个人立场上与支那人对立,则日本人毕竟不是支那人之敌手。因此而使支那人取胜,则对人性而言,是一大退步。”(和辻哲郎著:《支那人之特性》,《理想》1929 年 7 月)

现在,我并没有要说明日本民众的中国观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准备,报纸上的论调或记事,其实也显示不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意识。这种民

众的中国意识,只能通过当时被展开的中国认识的议论反映出一点儿来。从当时诸多的中国认识以及作为历史的日中关系的现实来看,日本民众的中国意识,只能将之放在“替天行道,代伐不义”或放在“支那应惩论”之中来加以考察。断然决定第一次山东出兵的田中内阁,在此以后,召开了有名的“东方会议”,会议中宣布了“对支强硬外交”政策(1927年6—7月)。然后,鼓吹日本统治满洲,称霸大陆的所谓“田中奏折”出笼了。其真伪的程度是另一回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却几乎是完全依照这一“预言书”而向前进展的。日本的民众,作为“国民”,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吉野也好,武者小路也好,或者山川也好,他们各自描绘着自己的行动轨迹,一古脑儿地与昭和这一时代潮流合流了。他们的认识观中,或多或少,对未来的日中关系所持有的希望,几乎没有对日本的民众产生任何的影响。他们的中国认识观的破裂,与其说仅仅是认识方法上的破裂,倒还不如说是这些围绕在中国认识观周围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潜藏着的真正意义上的破裂。

从这些相关联的事情上来看,集日中关系的悲剧于一身的,不得不说是那些“革命”家们。北一辉就因他自己的特有的行动而品尝了这一悲剧的苦果。再例如,佐佐木到一(1886—1955),也是在同一层次上品尝了“被撕裂”般苦恼的一位。佐佐木作为陆军军人,是当时被称为第一的中国通。驻留在广东的时候,与国民党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很早就预测过“第四次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此后,在南京参加了蒋介石的北伐。田中内阁第二次出兵山东,挑起济南事件时,作为风云人物,差点儿被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杀死。当然,作为帝国军人的佐佐木,日本的国家利益、满蒙特权的维持是绝对的。他对这些问题,既没有主张采取绥靖政策,甚至连对中国的主张表示能够理解的态度都没有。但他却作为一个实践者,对中国的动向作了确切的观察。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旧军阀已经不再是国民革命的敌人了。不久将占领上海、南京……的我国,成了国民党新政权的目标,围绕着满洲问题,在政策上必然

会出现冲突,从而,尽早制定相应政策”是绝对必要的。(佐佐木到一著:《一个军人的自传》,普通社1963年版,第134页)这是大正十五年(1926)佐佐木下的断言。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佐佐木又被嘲笑为“中了国民党的毒”。另一方面,佐佐木为了突破我国历来“对支政策”的惰性,自己也流露出了“让奉天王国为国民革命的怒涛所吞灭”的自暴自弃的心情。佐佐木的这种思想表达,当然最终都是在军事背景这一高度中展开的。可是,佐佐木在当时确实是把中国的动向当做革命来看的,而且是最具动态地来把握的。这样的视野,在近代日本社会里,恐怕只有“革命家”才能获得。

最后,再想附加说明一个问题来结束这一话题。

众所周知,“脱亚入欧”,在近代日本,至少是一个基本论题。“我乃于心中谢绝亚细亚之恶友者也”,福泽谕吉的《脱亚论》(1885)中的这句名言,在以后的几乎半个世纪里,至少是规定了近代日本路线方针的最基本的命题之一。这句话,在二战后的日本,或者是以一种感叹之念,或者是以一种苦涩的回味,时时地使我们回忆起来。“脱亚入欧”的命题,对于明治以后的我国来说,确实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远射程的妥当命题。如果将这一命题作为一个基准来考虑的话——当然,仍然呈现着微妙的交错——前面我们所谈及的诸种中国认识观,都是非常巧妙地与这一命题的消长交织在一起的。

我们再一次回到福泽的话题上来。我们可以重新阅读福泽的《脱亚论》,来观察一下他提起这一命题的初衷。已经有研究指出,福泽的“脱亚论”,作为文明论、政治论、外交论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对“自身所处之亚细亚(=儒教主义)”的斗争宣言。这可能是对明治十四年、十五年(1881—1882)以后日本国内的复古倾向而发的,是与这股复古势力进行斗争的自我宣言。(请参见桥川文三著:《福泽谕吉》,《中国》1968年1—4月号。后收载于《黄祸物语》,筑摩书房1972年版)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乃于心中谢绝亚细亚之恶友者也”这句话,才能超越了单纯的外交政

策论的范围,作为一种无限的精神影响波及整个社会。也正是这个缘故,福泽在儒教主义中找出了“必须谢绝之恶友”,揭露出了与官僚阶级结合的支那儒教主义的缺陷,并由此而展开了他的理解中的中国文明论。仔细考虑一下的话,日本虽然与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亲近感,但是,即使是在明治时代,人们对中国的无知,也是令人吃惊的。当时对中国的认识几乎全部限于知识分子之中,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是通过经院式的研究而得来的。福泽也不例外,他是通过对“儒教主义”以及他想象中的儒教主义的载体“官僚阶级”的认识,来展开他的中国文明论与中国社会论的。这些姑且不论,如果福泽的“脱亚论”及其与“自身所处之亚细亚”进行斗争这个意义的话,那么,问题就绝不应该只停留在“东方之恶友”=“支那”这一点上。对日本来说,中国是什么?这个问题,说到底,应该是与英国是什么,德国是什么,法国是什么,然后,世界是什么这些问题完全一样的。在福泽看来,必须与之战斗的是“自身所处之亚细亚”,限于这一点上,他确实敏锐地看破了中国社会中的某一个特质。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个对“自身所处之(某某)”充满战斗力的人,他也应该发现中国社会中的其他的一些特质吧。不,其实这绝不只限于中国一个国家。

说起来,认识中国,其实就是认识日本自己。这一认识过程,也是通过他者来自我认识的过程。二战结束后经历了20年的现在,在真正的意义上,可以说已经到了日本的问题与世界的本质问题已趋于一致的时代了。今天,我们探讨大正以来至昭和初期日本的中国认识观的不幸历史,从中是否能够给我们提示一些走向未来的教训呢!

## 注 释

[1] 关于内田其人的思想特质及其演变过程,这里不作特别叙述。请参见《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9卷《亚细亚主义》编者竹内好的《解说》,筑摩书房1963年版。

[2] 但是,关于这一部分,本野一郎外交大臣在栏外注曰:“关于本文之趣旨,由本大臣之说明而无异议,然有招致误解之嫌,听取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引者注)之意见,将之消除。”

[3] 他对“满洲事变”、“日支事变”等一系列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与先前也没有什么变化。他认为是蒋介石不理解日本人的一片善意才导致了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为此,他写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又嘲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为世界三大混蛋。(参考久野収、鹤见俊辅著:《日本的观念论——白桦派》,收载于《现代日本的思想》,岩波书店 1956 年版)

## 第二部



# 第一章 走向亚洲的航踪——宫崎滔天的思想和行动

## 一 问题的所在——滔天的悔恨

将全部精力倾注到清国革命,尤其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中去的宫崎滔天,进入了大正时代以后,回顾他以往的活动,时时被深深的悔恨之念所袭击。宫崎的悔恨,可以说是双重的。

(1) 自己为什么作为日本人而没有作为中国人参加这场革命呢? (其中使我最难以忍受的悔恨,是在他[宫崎弥藏]死后,自己改变了道路,没有作为支那人来从事支那革命,而是作为日本人来参与支那革命一事。《亡友录 岛津弥藏君》,见《宫崎滔天全集》,1971—1976年,平凡社版第2卷,第516页。以下所引,均出自《全集》)

(2) 在将全身心奉献给“支那革命”以前,为什么没有致力于“日本的改善”呢? (《来自炬燵<sup>①</sup>之中》第3卷,第247页。)

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在辛亥革命后的混沌的形势中,虽然民族的苦恼越来越深,但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为契机,解放运动的新

---

<sup>①</sup> “炬燵”,即架上盖着棉被用于取暖的熏炉、被炉。——译者注



动态,已经可以时不时地感知到了。另外,我国随着“对华二十一条”,寺田内阁的援助段祺瑞等政策,对中国露骨的侵略,越来越明显了。

滔天投身中国革命的方法,在其献身精神与无私尽力这一点上,是非常出类拔萃的。他的这些特点,屡屡为人们所提及。在近代日本的历史中,宫崎滔天也是“大陆浪人”的一员,但他与国权派、“支那占领主义者”相比,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存在。从这一点上来看滔天的话,他在辛亥革命以后大正时代的日中两国的现状中,不知道承受了多少难以忍受的苦恼。

综观历史,滔天的苦恼可以说是非常正当的苦恼。在历史经过了一个循环的今天,他当时不得不忍耐的苦恼,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解脱,这可能是谁都一眼就看得清的事。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遗嘱的孙文死后,他的遗志被毛泽东和共产党所继承,从这场革命运动中,新中国诞生了。另外一方面,大正时代滔天非难的并与之进行不息战斗的日本“军国主义”,在日中战争中,顿时烟消云散,败死在大陆的山野之中。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滔天的苦恼是最终得到了善报的苦恼。而他的悔恨,或许可以将它看成是在混沌不清的革命途中偶尔发出的一丝叹息吧。

然而,作为革命的实践家进行活动的滔天,在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的悔恨,纯粹是由于历史的物理的原因,他不可能站到半世纪以后的历史现实上来观察历史。因此,在他自己的心里,这一悔恨之念,又解脱了多少呢?

身处中国革命之中,“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二者之间的问题,还有,“改造日本”与中国革命之间的问题,这包含在滔天悔恨中的两大问题,可以说受到了明治以来至大正年间的政治形势的很深的影 响。对于全力倾注于中国革命的滔天来说,因两国之间的关系而给他带来的“被撕裂”般的悲剧心理,正是他产生这种悔恨的最基本的要因。这既是滔天的光荣,也是滔天的悲剧。但同时,在滔天的献身与悔恨中,大凡近代日本与中国、近代亚洲与欧洲,然后还有近代亚洲的革命,这些最原则

性的问题，难道不都潜伏在其中吗？

这些问题，固然都是应该通过弄清滔天的思想和行动的轨迹以后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滔天为什么要参与中国革命呢？还有，在这一革命运动中，他所看到的，使他明白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我想先回到滔天这个人物原初的情况上来，从这里开始，来接近他的思想和行动。

## 二、宫崎家的人——混沌的能量

滔天，宫崎寅藏，明治四年（1871）出生在熊本县玉名郡荒尾村（现荒尾市），其父亲宫崎正贤（长兵卫）是本地的豪士。滔天在兄弟中排行十一，在众多的兄弟中，三个兄长和一个姐姐早逝，诸兄弟中，既已成人的兄长真乡（八郎）、民藏、弥藏，他们各自都给了滔天强烈的影响。

只要看一下滔天的家族，大家肯定会对“宫崎家的人”所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以及多彩的志向所倾倒。他的家族，可以说是德川幕府末期至明治时期推动日本社会变革前进诸志士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滔天的父亲长兵卫，在幕府末期曾两次作为武者在全国修行，是一个非常善于剑道的人，他的行动中，明显地打上了当时所谓“处士横议”、“脱藩浪人”的时代烙印。使长兵卫形成如此道德规范的，不用说，那就是武士精神。在那个激荡的时代里，长兵卫教给自己孩子们的东西是自由地树立自己的志向，踏上社会，并且，对他们充满了期望。他虽然自己有了 11 个孩子，但仍然收了养子（高木元卫门），并让他继承家业，与亲生儿子一样接受了同样的教育。这位养子也终于离开藩国，游历了诸国<sup>①</sup>，后来到了长州，在蛤御门之战中战死。长兄真乡，通称宫崎八郎，长兵卫也是让他“接受家政大权，继承家产，执著于一家之经营，欲使其精神伟岸”。（筑

<sup>①</sup> 指日本国内的旧藩国。——译者注

地宜雄著：《宫崎滔天》，手稿本）这位被誉为乡党之英雄的长兄八郎，对少年滔天的人格形成，给予了无可比拟的影响——这在《三十三年之梦》中，滔天自己作了详细的叙述。

八郎，明治初年去东京游学，明治七年，参加了所谓的“台湾征讨战”，在故乡熊本县，又是民权党的中心人物。明治十年，西南战争爆发，八郎马上组织了熊本协同队，与西乡党<sup>①</sup>结成同盟，最后战死，年仅27岁。“像兄长那样好好干”，“亲戚朋友以及村中老者”们的这种“煽动”，大概也使滔天坚定了“大将豪杰，贼军谋反，均不能离开自由民权”（《三十三年之梦》第1卷，第26—29页）的决心。从这些经历中也可以觉察得到，在八郎的身上，毫无疑问，明治初年最进步的要素与支撑着他的豪杰的要素，二者交杂混合在一起，而且，这种最进步的要素，在不同的形势下，会突然之间转化成完全相反的东西，这种危险性，也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亦即，自由民权与征韩论，或者反政府运动与台湾征讨战。不，如果我们要讨论这样的问题的话，当然那就不得不讨论西南战争，就不得不讨论西乡隆盛。八郎确实是一位自由民权之徒，对明治初年的藩阀政府<sup>②</sup>，抱着旺盛的在野精神，进行了对抗。但是，在潮涌般扑来的开国进取精神的感召下而产生的向亚洲发展，唤起日本的生机这一志向，在他身上，又表现得十分激进。例如，在征讨台湾的问题上，八郎在写给父亲的信上，这样说：

日本尚少悬军事，故人人陷于因袭，以致纲纪不振。此节出兵事成，乃尤可贺事也。去年琉球王子亦来朝皇国，彼为日本藩属已定，琉球王受日本藩王之礼，参列华族。台湾人杀害琉球人，乃与杀日本人无异，我国责其罪，乃万国公法也。（荒木精之著：《宫崎八郎》，《祖国》1954年5月号，第182页）

① 以西乡隆盛为首的不平士族反对明治维新政府的反叛组织。——译者注

② 指明治维新后至大正六年左右政党内阁出现之间的藩阀独占要职的时期。——译者注

还有，如以后滔天介绍的那样，八郎给当时身在清国的曾根俊虎写了信，信中，展开了自己的梦想：

先前所报一群马贼蜂起之事，尔后状况如何，请望一报，此处可依事斟酌，放弃万事，直奔大陆。至于岛国之事，无甚可言者。可告者，唯乐在整装，欲早日呼吸大陆之空气也。（第1卷，第109页）

这儿可以看到的，不就是“陷于因袭，纲纪不振”的日本的改革，以“万国公法”为盾向周围地域扩张，以及梦想中的苍茫无垠的大陆吗？但是，另外一方面，八郎作为西乡党参加西南战争的同时，又抱着极其明确的民权党的意识和目的。在他起草的纲领中所写下的那样，“断然覆灭暴虐政府，于内确立千载不拔之国本，于外恢复万国对峙之权利，欲与全国人民共保真正之幸福”是他的志向。（宫崎滔天编：《熊本协同队》第4卷，第114页）实际上，他组织的协同队，通过队员投票的方法，选他做了干部（中队长、小队长）。从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采用了非常先进的组织方法。（同上，第4卷，第124页）转战的途中，在山鹿，“基于久来主张之自由民权之趣旨，召集人民，说明自治政体之要旨，使其以普通选举法选出人民总代表”（同上，第4卷第116页），显示了他实现民政的努力。说他是暂时的也好，说他带有自上而下的先觉者的启蒙色彩也好，不管怎么说，他在这里展露出来的意识，是不能无视的。“应该知道，彼等已忠于主义”，这种对协同队的表述，在这一意义上讲，绝不能说过于夸张。那么，具有这种思想意识的八郎，他与西乡党结合，最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在时代的激变期里，奔流在八郎体内的能量是什么，要找出它来是很困难的。这里，我只想引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八郎的话题。在西南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一天，中江兆民寻访了八郎。在这里，两人交换了意见。

当时，宫崎的友人中江笃介，自东京驰来，面对宫崎曰：西乡隆盛非自由民权主义者，这般事，恐不过是无名之英雄耳，君请三思。

宫崎曰：使西乡取天下然后复叛之，不亦快事乎。但此事败局已定，君请速回东京。强使中江离去。他当时已视萨人<sup>①</sup>之骚动为无知不可教，心中窃为与之共事而后悔。（同上，第4卷，第119页）

滔天所生活的时代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形势，其中潜藏着的各种各样的志向性。如果是上述那样的话，那么，在那种形势下，滔天自身朝着什么方向，为自己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呢？

### 三 滔天的出发——前进与诀别

进苏峰的大江义塾，然后进京，然后归依基督教，渐渐对这个世界萌生怀疑，然后恋爱、结婚，初期滔天的思想、人生经历，通过滔天自己的笔，生动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他的经历，至少可以说是生长在明治初年的青年们精神、人格形成的一个典型。作为这个时代的青年宫崎滔天，他的思想、行动与时代趋势进行交锋的焦点，仍然在“支那”革命这一“生涯之大方针”的决定上。他在经历了多彩的人生以后，在他与二兄弥藏的议论中可以得知，最后，在“支那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决定，是在八郎死后剩下的三兄弟民藏、弥藏和寅藏之间思想上、方法上的诀别。如果稍为夸张地说，这里所上演的是一场围绕着“民权”、“革命”、“亚细亚”的轮廓非常清楚的精神剧，这不仅对滔天来说是如此，而且对明治前期的日本来说也是如此。我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绝非过言。综观这一幕精神剧的脚本，对于揭开吸引滔天作出这一决定的广阔的磁场，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弥藏和寅藏的立论基础首先在于他们认为“进而弘人道于宇内，或退而拥护人权，其最切要者，乃暴力基础，此且急售”。“社会改造论与土地处分法”，“于议论中皆已陈腐”，“其要在于实地决行”，然后，“决行之

<sup>①</sup> 即萨摩藩国人，西乡隆盛原为萨摩藩士，故言。——译者注

道路”，“唯赖于暴力之权，仅此一途也”。并且，放眼现今世界，“俄国肆其野蛮之暴力以蹂躏人道，掠去民权之日”，也并不太远，令人忧虑的形势迫在眉睫。这样，他们的目光，具体地说，是集中到了“支那”这块土地上。在他们看来，邻邦“支那”，“现朝执政柄三百年，以愚民为治世之要义”，因此，“人疲国危，终将有自受弊害之祸而难支”的局面。然而，“支那”国民绝不是不求进步的国民，倒不如说他们“以三代之治为政治理想”，并且，三代之治，“实为政治之极则”，这一点，却与“吾等之思想极近”。他们这样的认识，基础在于“所以慕古者”，亦“将欲大进也”这一点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现在这个时点，不正是“革命立极之好机”吗？“伏惟普天恢复人权，于宇宙建立新纪元之方策”，除此以外，则“不可求”。“愿共赌此一生，进入支那内地，使思想展翅百世纪，心为支那心，收揽英雄，以定继天立脚之基。”（《三十三年之梦》第1卷，第54—55页）这就是他们的经纶，他们的大方针。

在这样的壮大的经纶之梦中，明治青年特有的烙印，非常生动地展示了出来，这其实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在这里，青年的生涯大方针，即刻就与国家、天下的命运结合起来了。在这一抱负中，至少有两点我们想注意一下。即，第一，他们的经纶，仍然以“人道”、“人权”、“民权”为中心在回转着。他们对“人道”、“民权”的理解，从“三代之治乃政治之极则”这句话中，似乎能清楚地看得出来。他们或许是在重温儒学教养之中寻找到依据，是在“圣贤之道”与“自由民权相通”（《支那革命物语》第1卷，第296页）这一思考上形成观念的。然而，至少可以说，“弘人道于宇内”，“四海皆兄弟”，“万邦为同胞”，他们的这些理念，已经克服了国家间的障碍，超越了国家间的鸿沟。正因为如此，他们“吾等移住此国，为其国民”（同上，第1卷，第296页）的想法，是很容易渗透到他们的心中的。正因为如此，才能够站到了“吾以此为是，决意躬自进入支那，遍地物色英雄，并为之游说，若得其人，则执犬马之劳以助之，若不得，则欲立而自任”（《三十三年之梦》第1卷，第42页）

这样极其开阔的立场上来。很明显,他是为了要与“支那占领主义”严格地划清界限。第二,在他们的立论基础中,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摆在他们的面前。专制国家俄国的南下,被直接理解成“人道之蹂躏”、“民权之掠夺”。不,不仅仅是俄国,“以近世自由民权之先觉者而自任之欧美各国,……反而蹂躏他国人之自由民权”(《支那革命物语》第1卷,第295页),笼罩在现在东方之上的现状,正是一个“弱肉强食之修罗场<sup>①</sup>”。正像以后滔天在《明治国姓爷》中,通过登场人物讲出来的那样,将“东方全体之命运与正义人道之消长”(第3卷,第141页),视为不可分的一个整体。“若使支那复兴,以义而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振,菲律宾埃及可救也。”(《三十三年之梦》第1卷,第54—55页)在这里,他将“支那”革命与亚洲的解放放在一起考虑的同时,还包含着将“支那”革命直接与“正义人道”等同起来的思想。这一系列的构想中,或多或少,将之看成亡兄八郎身上萌发的诸要素在此发芽、生长,绝不会有太大的错误。

但是,弥藏和寅藏,将这一大方针与民藏商量时,民藏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民藏反对的理由,总结起来讲有两点。

第一,以主义而立之吾等,伪称支那人,无此道理。

第二,吾等之主义,于日本尚且难以贯彻,以此游说支那人,是劳而无功之业。(《支那革命物语》第1卷,第297页)

不错,正像民藏所说的那样,在日本都难以贯彻的主义,想在大陆施行,这过于无谋了。如果说是梦的话,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壮大的梦。但是,与兄长民藏的议论,并不是这种单纯的常识性的现实论,这里所含有的是更加紧张的理念上的格斗,或者是包孕着紧张感的思想和路线的选择。这一内情,在《支那革命物语》中虽然有简洁的叙述,但在《三十三年之梦》中,记录得更加详细。据《三十三年之梦》,民藏

<sup>①</sup> 战场。——译者注

对滔天说：

若此业为可能之事，作辮发，着胡服，且伪隐姓氏生国，游说于道途，以此为达成正义之目的而暂用之权术，是吾断不采用之处也。苟欲使正义公道弘扬于天下，则其方法手段亦不可不光明正大也。

对民藏此说，滔天回答说：

志向在公不在私，成则天下万世可救，误则自进就死。他人或视之为权术，于我则无所病。

但民藏又接着说：

主张，非一代之可行也，若能公然号呼于天下，则百世之下尚有继承其志而奋起者。吾宁安于是而已。（第1卷，第55页）

关于这场议论，滔天后来这样写道，与兄长民藏之间，“虽于大体之精神固无异存，然于其方法手段，意则不同”。我却不认为这种差异仅仅是方法问题。当然这里所存在的，首先是手段和目的的问题。民藏所说的那样，“作辮发，着胡服，且伪隐姓氏生国，游说于道途”，为了正义的目的，是过于“权道”了。然而，仔细考虑一下的话，在这一做法的背后，甚至连弥藏、滔天想完全彻底地变为“支那人”的意识是否都已经潜伏在这里了呢？还有，在民藏看来，一个主张，即使一代人不能完全实现的话，只要这个主张是正义公道的，那么，“百世之下”，尚有“继承其志而奋起者”，在民藏看来，人毋宁说应安于这一趋势，这才是真正想将正义公道弘扬天下的人应有的态度。广义上，在人权的确立，四海同胞主义这一点上，民藏与弥藏、滔天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但是，在将这一主义发扬光大、弘布天下这一点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隔阂。虽这么说，这里成为问题的，是仍然单纯地通过游说来弘扬人权公道呢，还是容忍某种程度的暴力呢？这个问题是与实现这个主义的方法以及为实现这个主义应从什么地方开始这一问题相关的。兄长民藏主张的方法，大概可以说



是自己在日本这块土地上“公然号呼”这一主义吧。如果通观滔天的一生，民藏的批评，其实包含着对滔天的根本性的批评。民藏的批评中指出来的，正是在什么“地方”、进行什么样的革命，这种大凡是革命家都不得不经常考虑的基本问题。

我刚才称滔天这一路线的选择是一幕精神剧，但若从他们的富有戏剧性的生涯来看，倒不如将它看成是一幕精神与行为的剧目或许更为妥当。在这里，兄长民藏讲的并不是单纯的漂亮话，众所周知，民藏后来也终于以令人吃惊的彻底性，向前大踏步迈进。在兄弟间的这场议论后六年（明治三十年），单身踏上了世界周游之途。在从事劳动的同时，在伦敦还拜访了社会民主党的海德曼（H. M. Hyndman），在巴黎拜访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等人。回国后，设立了土地复权同志会（明治三十五年）。民藏的路途，在某种意义上讲，与滔天所走过的路途相比，甚至更具有彻底性。以后，民藏的生涯，全部奉献给了这一运动。固然，这里不是专门讨论民藏的地方，但还有一点不得不指明一下，即，在民藏的身上，仍然栖息着令人吃惊的理想主义思想和原则主义思想，并且，从中还流露出了这一理想主义和原则主义指导下的行动轨迹。（《浪人生活 宫崎巡耕一相良迫川》，参见第2卷）这恐怕可以说，在八郎身上潜伏着的混沌的思想，在充满着紧张感的岁月里，分解成了两极：一极是朝着大陆=“支那革命”，画下了一个巨大的弧；一极是朝向了日本农民土地享有恢复的革命，“土地均享，人类之大权”。（民藏的著作）民藏在巴黎万国博览会的德兰士瓦<sup>①</sup>馆里，看到了布尔战争的英雄科尔格尔（S. J. P. Kruger）的像时，据说在签名簿上署下了“日本国农民代表团宫崎民藏”的名。（第2卷，第429页）不管怎么说，这二者，都各自画下了自己鲜明的行动轨迹。如果稍稍把话讲得早一点的话，滔天所处的位置，恰在这二者的紧张关系之中，并受着这种紧张关系的制约。

---

<sup>①</sup> 南非。——译者注

在“支那革命”中，具体说来，就是到了孙文出现的时候，孙文与民藏，这两个原点，构成了滔天的坐标轴。“支那革命家”孙文的名字，最初刻印到滔天头脑中去的，其实也是这位兄长民藏。

当时，予长兄在美国。因彼知予与二兄（弥藏）有志于支那革命，故将孙君之真影与赏赞其主张人物之横字报纸寄来，附记曰：“支那虽曰国衰，犹有如此人物，足强人意。吾思汝等游支那之日不远，到则必物色其党与其人物，与之缔交。彼等非单于支那不啻为最进步之党与，恐于亚细亚，亦是最进步之党与也。”（《孙逸仙》第1卷，第491页）

后来，孙文曾赞赏道：“不懈于革命者，宫崎兄弟也。”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意义，对于将滔天这个人放在何种历史位置上来说，是一个不得不时刻进行原理性思考的课题。

当我们考察他们这一出精神与行为的剧目时，可能还有一个不得不附加一笔的问题，这就是，驱使他们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然，他们每个人都是典型的主义者、原理者。使得他们发现了问题的所在，采取了行动的驱动力，到底在哪里呢？从滔天写下的大量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写文章的人，如果是一位小说家，也必定是非常优秀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如果把他所写的东西全部视为事实的话，那还是稍加注意为好。但仅就我们现在要谈的问题来说，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的地主生活和他们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考察，我想是不会错的。根据《三十三年之梦》这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著作，还是在他对基督教的福音充满憧憬的时候，乡村笼罩在一片农业失收的恐慌之中。为了地租的事，佃农们涌向宫崎大宅，他们的母亲，与佃农们“谆谆商讨处理办法”，民藏则更是在佃农们面前，承认了地主制度的不合理性。民藏说：

今实欲分配土地与汝等，然仍须暂请小忍，贡租于吾等，待一学

问成,因而出世,则必尽力打破此不合理者,广为佃农恢复权利。今尚为准备之时期,准备不成则战争亦无法兴起。(第1卷,第44页)

民藏的这番话,面前的佃农们是怎样听的可暂且不管。仔细对照民藏的一生,可以说民藏在这以后的生涯中是非常忠实自己的这一诺言,为实现这一诺言作了努力的。被这一通话深深打动了的滔天,听了农民的心里话,知道了贫穷百姓的悲惨生活,品尝了“一夜难眠”的滋味。(第1卷,第44页)“贫穷”这一事实,以地主-佃农这一最活生生的姿态,驱动着他们。他们自身也为了这一主义与革命,将家产三等分并将之用尽。滔天也不得不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挣扎。对滔天贫穷的程度,后来樋子夫人曾这样回忆过,监视“支那革命家”滔天的高级刑事警察对滔天的赤贫也目不忍睹,“提来了茶叶作为礼物”。(宫崎龙介著:《父亲滔天的事》,收载于宫崎龙介、卫藤沈吉校注:《三十三年之梦》,平凡社、东洋文库版,第295—296页)从这儿可以看出,对于受压迫的农民,或是从广义上来说,对于受压迫的民众的认识,一直潜伏在他们的心底,并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行动。如果稍微图式化一点来说,民藏、弥藏以及寅藏,各自画着自己的弧线从事着革命,然后融入了孙文的中国革命。在这一构图的底部,被压迫的民众以及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当然,他们的行动,取得了什么成果,自己的目标是否达到,这些问题则应该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还有,那些贫农们对民藏、滔天是怎么看的,这也应该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似乎可以从与这些诸要素相关的事实中,看出他们行动的全过程来。

关于滔天对生涯大方针的决定,我或许过于原理性地看待了。众所周知,滔天首先是“侠”客式的人物。正像他在赞扬孙文时所说的那样,与靠食秩禄的武士相比,自己更喜欢民间的救危扶贫的侠客,在“发于激情之所”发现“义”字。(《侠客、江户人与浪花节》第4卷,第191页)因此,当他“决定大方针”时,漂浮着的气氛是“吾等之事原来只是一种赌博”。事实上,他的行动方式也是一种典型的所谓浪人式的行动。只要

有滔天在,他的周围马上就变成了梁山泊,变成了高论天下大事、置酒放歌、醉倒不醒的世界。心情郁闷之时,倾听一曲浪花节<sup>①</sup>,将之作为“生命之洗涤”(《支那革命物语》第1卷,第324页)。为了自己的志向,可以为一封电报而东奔西走。他的这种行动方式,现在已经不用我再多说了,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已写得一清二楚。作为凡人的滔天,如果不考虑他的这一侧面的话,那么,得出来的滔天将会与其实体相差很远。在考察他沉浸于“支那革命”这一事实时,不考虑到他这一方面的素质,得出来的结论肯定是不正确的。然而,虽然如此,使滔天与时代进行激烈的交锋,并且,使他与数以百计的大陆浪人分道扬镳的行动之中,是豪杰般的行动的底层,存在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或者是说,首先对自己的主义与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冷静而客观的认识。他在“浪人生活”中,借用末永浪啸之说,在“拓先”,即“开拓先头”事业之中,找到了“浪人之本意”(第2卷,第398页)。这里分出的浪人的五种类型(道理型浪人、侠义型浪人、国家型浪人、才能型浪人、学理型浪人),虽多少有着一点儿玩文弄墨的意思,但严格地将之类型化,可以说其中有着一种苦痛。从这一观点上来看,他的著述中的很大一部分,可以说是通过对破天荒式的浪人生活的描写来倾吐知我者之悲哀的。无论怎么说,这一人生大方针的决定,正是“支那革命主义者”宫崎滔天的诞生。

#### 四 世界革命与社会革命

滔天,当他一开始自己的活动时,就将自己视为“世界革命者”,并且又是“社会革命者”。在论及滔天的行动轨迹时,他自己给自己下的这一定义,一定会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想稍微详细一点来谈一下这一问题。他说:

<sup>①</sup> 一种三弦伴奏的民间说唱歌曲,类似于中国的弹词。——译者注

余信人类同胞之义，故忌弱肉强食之现状。余奉世界一家之说，故憎现今国家之竞争。所忌不可不除，所憎不可不破。……故余遂至以世界革命者自任。

然后，又说：

余虽素不承认所谓人力之范围，然人生之要务在于自我之觉醒。……余以为，能至兹者，唯在学习一途也。夫坚信学习为唯一之途者，故思教育之普及，然社会乃极不平等也。……而教育亦不可不待时间与金钱，欲谋教育之普及，则不可不一变多数佃民之状态。于是余又以社会革命者自任。（《三十三年之梦》自序，第1卷，第12页）

根据这一见解，滔天给自己下的定义是极其单纯明快的，或许还可以说是太单纯、太明快了，真是滔天式的明快。滔天既然已经为自己下了这个定义，那么，他想从什么地方开始来实行这一世界革命、社会革命呢？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支那”了。

所谓暴力之权术，若不能实际施行之，亦仅是一种梦想而已。故余欲选择支那，以作此暴力之根据地。

这里，滔天叙述他之所以选择中国的理由，也是极其简洁的，即，“以为彼处人多地广，亦甚有为革命所迫之机”。在这一理由的背后，滔天选择了这条道路，是有着历史的原由的。这一历史的原由以及它所含有的意义，在前面我们已经作了叙述。这里，他使用了极具象征意义的“根据地”一词，非常值得我们注目。滔天是信奉“人类同胞”、“世界一家”之说的，因此才立志从事“世界革命”。因为这个原因，为“世界革命”而建立“根据地”这一想法，可以说是滔天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思想。确实，若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有“为革命所迫之机”的中国，起码在滔天的心目中，才是最合适的根据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像一些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是不是应该这样来评价滔天，即，滔天似乎还不是为了中国革命的“支那革命主义

者”，毋宁说他是“为了世界革命的支那根据地主义者”。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单纯地把滔天的话拼凑起来从中理出一条什么思路来，也不是想在滔天的“世界一家”这一乌托邦式的梦想与他现实中的革命活动之间架起一座什么桥梁来，而是想发现潜伏在他的思想与行动中的一种志向。如果用结论式的语言简单地来说，他的这种志向明显地起了作用，并且在与中国革命派的接触联系之中，他的志向，得到了尽可能的发挥。革命者因为处在超越国境的革命联系之中，才会呈现出自我革命的姿态，我想这样说并不过分。

那么，在滔天的眼中，世界革命应该如何来展开呢？当然，滔天的活动，在第一意义上说，是“支那革命”，他全部的活动，都是围绕着“支那革命”进行的。在他的活动中，最终将“支那革命”作为基础，更进一步向“世界革命”展望这一意识的形成，具体地说，可能是1905年前后数年间的。众所周知，这一年，以孙文为中心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三年以前（1902），发表了《三十三年之梦》后，在桃中轩云右卫门的指导下沉浸在浪花节世界里的滔天，这时候，在新宿番众街构筑了新居，再次开始了同“支那革命派”的同志们的频繁往来。同盟会的成立，是“支那”革命活动的一个划时期的转变。滔天与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相呼应，与日本同志一起创办了《革命评论》。正值这一时期，笼罩日本社会的日俄战争，给我国带来了惊人的紧张感。另外一方面，从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内村鉴三等）等的非战论的出现也可以看得出来，这场战争的结果，虽然不是非常明显，但是，日本社会中某种潜在的裂变开始显露了出来。然后，又有俄国的“俄国革命党首领”尼古拉·拉塞尔（Nikolai Russell）、革命家哥尔雪尼（Grigorii Andreerich Gershuni）来日本之事。（关于拉塞尔，参考和田春树著：《尼古拉·拉塞尔》（上、下），中央公论社1973年版。特别是第七章第十三节《俄国革命党首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在日俄战争这一国家间武力冲突之中，最能让人感觉得到革命的波浪由远东地区向世界扩展的

时期。

在这一时代的旋涡之中,比如说,在《革命评论》上发表的滔天的《支那革命与列强》一文中,对“列强将会干涉支那革命”这一不安进行了批驳,将之看成是杞人忧天。他这样主张:

假使让杞忧家一步,欧美诸国果有干涉支那革命之意乎?革命军已陷十二省,不固守之,弱势之干涉军苦于是。于优势之干涉军,则不战而退往内地,取旷日弥久之策以待敌。欧美之天地,是时正勃发社会革命之乱,国家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世界主义之决战,自是将起。是,余辈坚信之。……如斯观之,不得不说,支那实持有左右世界命运之力量。即,若革命成就,则能号令宇内,弘道万邦;若列国干涉,则惹起世界革命之动乱。呜呼!支那国之前途多望哉,生于支那国者幸福哉,余辈实欣慕不已。(第2卷,第608页)

刚才提到过,《革命评论》的一个目的,是从侧面来援助同盟会以及《民报》,它的基调是介绍“支那”的革命运动,为“支那”革命的现实性、可能性立证。但是,上述滔天的主张中的最后目标,其“为了世界革命的支那根据地主义”的志向,仍然清清楚楚地展现了出来。这里,放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展望图,即,设定在“支那”内地建立根据地,采取“旷日弥久之策”,并且等待欧美内部爆发社会革命之乱,还有“若列国干涉,则惹起世界革命之动乱”的设想。滔天的展望虽然线条还很粗,但是,如果稍稍用夸张一点的话来说,在他的展望里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与俄国革命之际期待欧洲革命的列宁、托洛茨基处在同一个层次上的。我想我这样说,是绝不过分的。时代,确实能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不,倒还不如说,在一种体制的动摇瓦解之中,它能够在一瞬间启发我们看到未来世界的方向性,这样说,或许更妥帖一点儿。滔天的这一设想,难道不正是明治末期渐渐萌芽的“亚细亚革命”——“亚细亚主义”这种“世界革命”意识的闪现吗?

滔天之所以能展示这种志向，当然，与对欧美国家的“社会革命之乱”有一定的估计是不可分的，而给予他这种知识与认识的，不是别的，正是“支那革命派”，正是孙文，或者也可以说是由此而推广开去的世界革命家们。随着滔天与同盟会的同志们的密切接触，这一方面的交流当然也就不断地加深了。他的这种交流的痕迹，在主办《革命评论》时期是非常显著的。这一时期，孙文正倡导“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主张在政治革命的同时必须实行社会革命，这是广为人知的。在《〈革命评论〉发刊词》（第2卷，第595—596页）中，这种视点也好，用语也好，都留下了明显的印痕。还有，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对帝国主义的论述，其态度，其论战的姿态，在《民报》的各篇论文中，是不难发现的。从中可以感觉到的一点是，滔天这种思想的形成，来自《民报》的刺激非常大。但是，比通过对形势的观察分析来了解滔天更能表示其志向原形的，大概是他自己创作的故事小说《明治国姓爷》了。《明治国姓爷》，或多或少，能够将它安置在明治二十年以后的“政治小说”的谱系之中。在这一部波澜壮阔的小说中，对滔天接近“支那革命”并通过对欧洲动乱的估计冲向世界革命这一过程，非常具有象征性。

明治三十六年，《明治国姓爷》在《二六新闻》上以一百二十回的大长篇（未完）发表。主人公堺铁男，被评价成有“滔天自身与内田良平之混合之感”（东洋文库：《三十三年之梦》，卫藤沈吉解说，第319页）。这位主人公渡海来到大陆后，因遇到了“支那革命家”（孙霞亭）而目光大开。又在俄国、欧洲的虚无主义派的影响下，逐渐踏上了新的道路。在这部小说中，欧洲虚无主义者对欧洲社会的批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例如，滔天首先安排了让“支那革命党”来说出了欧洲对亚洲的侵略这一事实。

然密猎船等事，今若更言，则显迂腐。欧罗巴鬼子，其一国之方针，皆立于小偷主义之上，白昼公然以国家名义偷窃他国领土。今此浦盐斯德等地，以前是我国之领土，终为俄国以奸诈手段所夺。



我国虽无尊严可言，然趁强骄恣之欧罗巴诸国，其做法实卑鄙至极。  
(第3卷，第113—114页)

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从事“支那革命派”活动的主人公堺铁男，在失败以后，躲在外国船上，逃亡到了欧洲。在他的面前，出现了抱着同样问题的欧洲虚无主义者。其中的一位虚无主义者说：

卿是东方人，或闻东方人其衰弱诚可悲，然衰弱者非仅是东方耳。卿所见强而富者唯外面少数人之事，其多数人皆如卿昨夜于简易饭铺所目击之人物也。此亦非限于俄国，彼法兰西、德意志、英吉利皆如此。一将成功万骨枯，国家以富强而夸耀，其实百万生灵尽奴隶也。所云人道，实皆空名，现时正是不平等之极。所云文明，实皆欺人之虚言，今世正是兄弟相食之修罗场也。(第3卷，第217页)

这一虚无主义派别，当然，比较起来看，是属于社会主义谱系中的。这个小说故事，从时间上来说，成于同盟会成立以前，正属滔天失意之时。但是，这里所反映出来的视点——将“弱肉强食之修罗场”，不仅仅看成欧洲对亚洲的侵略这一“正义人道之蹂躏”，而将欧洲内部也视为“不平等之极”——不是别人，而正是“支那革命家”和世界革命家告诉他的。通过以上这两段文字，以戏剧台词的形式表现了出来。通过这些故事，滔天自己的“为了世界革命之支那根据地主义”的构想才在某种程度上鲜明地描绘了出来。不久以后，《民报》上展开的“欧洲社会问题”、“社会革命问题”这些共同的视点，不正是代替滔天将这一主张宣传了出去吗？

## 五 对近代文明的控诉

在这里，关于滔天，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说明。他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对“文明”这个东西产生了疑问，亦即对“虽云文明，实皆欺人之虚言”这一文明的虚伪性产生了深深的疑问。

滔天对这一文明的虚伪性的认识也是从他信奉“世界一家”、“万人

同胞”这一点出发的。从这一点来说,走向这种理想本身,在滔天看来,才是文明的进步。可以说,这种进步,就寄托在“自由”、“平等”、“民权”这三者在现实中的普及。对文明进步的这一种判断,在现实中肯定是非常微妙的。可以这样说,第一,这种呼声是以欧洲对亚洲的侵略为契机迸发出来的呼声,存在着历史性。第二,19世纪后半期,位于东亚的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存在。国权论-民权论这种众所周知的复杂的谱系,作为日本独立的命题,这是一个谁都不得不担负的课题。还有在现实中,“文明之利器”=生活之进步这一社会潮流,也正是以一个实际存在的事实在人们周围展开着。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文明”形式,滔天的态度,在他对“玄洋社”-“天佑侠”的批判中,极具象征性地反映了出来。大崎正吉、内田良平、武田范之等的“天佑侠”,主张专制、固陋的李氏朝鲜必须击破,因此欲与蜂起的农民运动“东学党”携手,潜入了“东学党”的根据地。为了取得“东学党”的信赖,考虑了目前“东学党”最需要的物资。在他们看来,“东学党”目前最急需的只是“文明之利器之爆裂弹”。据说“天佑侠”将之付诸实施,送给东学党首领全捧准爆裂弹,换来了信任,鼓舞了士气。(《亡友录 武田范之君》,第2卷,第587—588页)他们现实中的行动本身姑且不论,他们的思想中,暗示了当时“文明”这一概念在日本以及在亚洲是一种多么微妙的存在。

我们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同样是站在亚细亚主义立场上的滔天,在他的前进过程中,获得了与他们完全不同的视点。他的态度,是对“今世之文明”展开了根本性的批判,这一批判,与他的“支那革命-世界革命”这一步伐是平行的。例如,滔天认为:

人或曰,现今之社会乃文明之社会。比之古代,予亦承认今之文明。各种学艺之进步,诸种器械之发明,电铁广被利用,世界呈比邻之观,伟岸则伟岸矣。而此等学艺进步,机械发明之同时,兵器之新造,战舰之改筑,兵备日益扩张,战斗愈极惨绝,壮观则壮观矣。然以此伟岸壮观,径言其为真文明可乎。以予观之,今之文明乃野蛮性文明也。

与文明力相伴,野蛮力亦得进步。非止如此,世界依文明力而缩小,野蛮依文明力而扩大。……若此间有可称文明者,即以精巧之机械取代不精巧之机械耳。……日本乃新进之国也,过去 30 余年间之发达,实可称世界无比,其尤见于警察兵马之术,然其可谓是野蛮性文明之进步也。(《孙逸仙》,第 1 卷,第 474—475 页)

滔天,是一个容忍“暴力之权力”的人,甚至可以说这一点恰是他的出发点之一。在这里,将日本这个“新进之国”断罪成“野蛮性文明之进步”的国家,故而从心理上,更加朝着“支那问题”=“支那革命”的方向发展。“驱除鞑虏,创设民国,弘扬合众之制,平分地权,以四万万之众,共同开拓新天地,退而挽回东方之衰运,置于泰山之安稳,进而揭起人道之旗帜,保证万国之和平。”(《孙逸仙》,第 1 卷,第 477 页)这段话,是滔天心目中的孙文,同时又是他寄托在孙文身上的梦。在这里,他写下的“今之文明乃野蛮性文明”这一断论,可以说是投身于“支那革命”的滔天从他的理想中引导出来的对文明的最尖锐的批判。这不单纯是从东方对西方这一图式中得出来的批判,而是站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被压迫民族、被压抑民众的立场上发出来的批判。

清末的民族革命家章太炎曾经写过《俱分进化论》,提出了进化与退化二者并行发展的观点。在章太炎看来,欧洲的文明进化,同时包含着人类退化的因素在内,欧洲的社会进化(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亚洲来说,正是社会的退化。这一见解,正是被压迫的亚洲一方最尖锐的批判。滔天对文明的断论,与章太炎的控诉,几乎是在同一高度上的。这样说,绝不言过其实。仔细考虑一下的话,在当时日本的如潮涌般的脱亚入欧、文明开化的潮流中,能作出这样的批判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追随于所谓的进步图式,那么,欧洲的文明本身就是价值,就是善。在这种情况下,将问题看成是欧洲与亚洲的对立,从中寻找出对抗的焦点,这种做法说到底还是比较容易的。多数的“亚细亚主义者”,直至后来,都还是立足于这一点上。如果看一下明治时代的话,对欧洲文明作

了根本性批判的,大概也只有内村鉴三那样的充满强烈个性的基督教徒了。例如,众所周知,在日清战争之际,内村将这场战争视为“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间的战争,主张这场战争是“义战”。后来,他终于对我国在日清战争后的朝鲜经营以及英国的布尔战争(对南非的侵略战争)绝望,将近代欧洲文明作为一种对真正基督教的背叛,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将基督教从欧洲文明中剥离出来,站在他所追求的立场上,对欧美文明的彻底批判。当然,滔天对近代欧洲文明的批判并不是这种彻底的原则性的批判,但是,比较起来说,这里所能看到的滔天的批判和控诉,是站在亚细亚主义立场上的最大限度的批判和控诉了。这一控诉,正是这一时期的滔天在与中国的革命运动以及亚洲的联合中获得的最奋进的视角中得来的。

## 六 滔天的“欣慕”与“悔恨”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在滔天的“支那革命主义”中,还包含着他的“支那革命-世界革命”这一展望。接着,我们又引用了滔天的一段话:“呜呼!支那国之前途多望哉,生于支那国者幸福哉,余辈实欣慕不已。”在论述滔天迈向辛亥革命的历程时,想将这一段话中所含有的几个问题在这儿说一下。

滔天的“支那根据地主义”,在与革命派的国际联合中,关于世界革命,有了某种程度的展望。如果说滔天的这一展望已经具备了什么具体内容的话,那么,他的这种欣慕之念,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是当然的事了。但是,尽管如此,投身于“支那革命”的革命家滔天的思考,与同时存在于他的意识中的时隐时现的阴影,却非常明显。

回顾历史,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认为生在“支那”是一种幸福,从心里“欣慕”邻邦的“支那国人”,这样的日本人到底有几个呢?那时,我国正以一个新兴独立国家在东亚地区登场,击败清国,击败俄国,正是国威大

振的时期。若要问以归属何国为荣耀的话,至少在亚洲,那日本几乎是唯一的国家。恐怕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会因自己是“帝国臣民”而感到幸福,绝对不会去“欣慕”邻邦的“支那国民”。滔天对“支那国民”的“欣慕”之念,首先还是因为他以“世界革命者”自居,是站在一个“革命家”的立场上发出来的。在这里,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几乎每一个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革命家均具有的思考方法。不错,在20世纪初期的东亚,明治政府统治下的日本,一向是进步的象征,相反,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是固陋旧弊的代表。然而,如果从世界革命的观点来看的话,情况可能马上就变了。假如使“支那”有“革命立极”的机会,那么,正是这种固陋旧弊,“支那”才有“建立宇宙新纪元”的根据地的可能性。在滔天眼里,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机会正在一天一天地成熟起来。滔天对这一根据地的前途寄托了极大的希望,并且因此而对之“欣慕”。“欣慕”的原因,可以说首先是从这儿来的。

然而,还有第二个原因。我们从滔天的论说的最后一节中,是否还能同时感知到一点滔天自身的某种悟道来呢?从这儿渗透出来的,是他对现在“生于支那者”,即对出生在中国的人的一种“欣慕”之念,而对自己是日本人这一点,似乎多少带有一点可惜和遗憾。回过头去看,滔天的出发点,不正是“作辮发,着胡服”,移住“支那”国,“为其国民”吗?事实上,与他志同道合的二兄弥藏,为了这一革命的准备,与骨肉、亲旧断绝音信,一个人跑到横滨,做了“横滨支那商馆之掌柜”(《三十三年之梦》,第1卷,第18页),采取了彻底的行动。滔天自己身处中国革命之洪流,在与三合会、哥老会的交往中,也频频自称“我已忘却自己是日本人”。(《支那革命物语》,第1卷,第411页)从滔天自己多次的述怀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欣慕“支那人”,想成为“支那人”,对他来说,似乎是夙愿。但是,最终,滔天都没有“移住其国”,也没有能够“为其国民”。从事革命活动以后倏忽十余年,这个时候他发出来的“欣慕”之念,肯定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来自于现实的苦涩的回忆。当然,这里的问题绝不是滔天没有

能够“作辮发，着胡服”，没有能够变成“支那人”这一类的问题，就是连在“支那革命派”的活动中因为自己是日本人而被另眼相看这一类的问题都不是，倒不如说相反，滔天与革命派之间几乎自始至终都是同心同德地活动着的。总理孙文对滔天是非常信赖的，将同盟会在日本的活动全权交给了他。（《孙文给滔天之委任状》，第1卷封口照片）从这几点来看，滔天在与革命派的共同意识、共同行动中，起到了最重要而且最应有的作用。这样说，我想绝非言过其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使滔天最后发出“欣慕”之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不错，滔天从庇护亡命客孙文开始，到调拨武器弹药，到同志间的联络，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也正是这个缘故，从黄兴开始，数量众多的“支那革命青年”，才能依靠滔天，出入于滔天的居宅。但是，仔细考虑一下的话，滔天所能起到的作用，仍然是作为一个日本革命家所起的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滔天的工作是尽一切可能在日本为他们提供活动的场所，这是一个非日本人则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也是“支那革命家”们期待着作为日本人的滔天来完成任务。

滔天能够顺利地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从历史来看，仍然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简单地说，大致至日俄战争为止，“支那革命派”的革命目的，与日本的国家目的，不管怎么说，多少还有着一些共同的基础。虽然也有着许多迫害与困难，存在着复杂的政治困惑，但滔天在活动中，依然取得了犬养毅、头山满这些在日本相当有势力的政治家或政治势力的援助。滔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尽到了一个日本革命家应尽的使命。但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滔天，作为一个日本的革命家，他完成被期待的使命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他离成为“支那”国民，成为“支那革命派”这一目标越来越远的过程。当然，如果滔天仅仅是一个夸耀自己对“支那革命”的协助，并且满足于这种协助的人的话，那么，以后他就可能不会产生这种“欣慕”之情了。再有，若是中国革命能在与日本的“改造”相互提携的基础上进行的话，那么，这种“欣慕”之理念，必然也就会烟消

云散。滔天在这个时期,对将来日中关系的绝望性的破裂,似乎已经敏锐地觉察出来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是一时看错了日本帝国的真相了呢,还是被明治日本的国家外貌弄糊涂了呢,或者还是作为“世界革命家”的滔天的理想,终于没有使他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日本的“支那革命家”这一现状呢?

身处中国革命之中,“是日本人”、“是中国人”,这一问题以及潜藏着的民族、革命诸问题——其中,滔天流露出来的“欣慕”与“悔恨”之念亦包含在其中,关于这些课题,对我来说,要容易地找出其答案来是很难的。还有,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民藏对弥藏、滔天的批判,从结果来看,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呢?关于这一点,令人十分满意的答案也还没有能够找到。但是,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说不定从辛亥革命以后滔天的各种行动中,或者从其他不同的视角中,能够找到一些。这里,我想把目光转到滔天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及大正年间的活动轨迹上来,重新对一些问题加以考察。

## 七 从辛亥革命到大正时代

1911年10月,随着武昌新军的一声炮响,清王朝终于走上了最终的瓦解之路。“支那革命家”滔天盼望已久的机会也终于来到了。

辛亥革命时期,滔天的行动是广为人知的。(第2卷,参见近藤秀树著:《解说》)稍迟于大举渡过东海开赴大陆的日本浪人团,滔天也来到了动乱中的大陆。在香港,迎来了从美国经由英国回国的总理孙文,与孙文一起到了上海。与之同时,又为补给武器、资材、资金不足的革命党而奔走不停。当然,这些补给、援助的来源、路途,均在日本。

众所周知,这场革命,虽然迫使清王朝退了位,建立了东亚最初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但是,根据所谓的“南北交涉”,革命的果实为军阀袁世凯夺去,这一现实,与滔天梦想中的“弘公道于宇内”的理想相差得太

远太远了。对于袁世凯的独裁，作为一个当然的历史进程，革命党掀起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但是，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袁世凯面前，又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曾一时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被迫再度亡命，出现在日本的土地上。在这一系列瞬息万变的形势中，对孙文也好，对黄兴也好，对滔天也好，肯定更深刻地体会到了通过武力打倒旧政府、夺取政权这一目标，是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体、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密不可分的这一事实。

当然，滔天与革命党的联系，对革命的援助，即使在这一沉浮不定的时期内，也丝毫没有改变。他对中国的亡命之客“支那革命青年”，始终不变地为他们在日本的活动提供据点。不仅如此，例如，在孙文看到革命中组织纪律涣散，准备结成中华革命党（1914年6月），自任党首，组成独裁性机构时，为了避免其他同志的反对，争取团结，滔天也是焦虑万分，用尽了心血。这一时期，或许是滔天在与“支那革命派”的交往中最谨慎的时期。

但是，通观滔天的一生，他的行动的最高峰，也就是在辛亥革命的前夜，这一点，恐怕是难以否定的。不错，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数年间，滔天仍然匆匆忙忙地在活动着。例如：大正二年（1913）初，孙文来日，与当时的首相桂太郎进行了重要的会谈；同年七月，二次革命爆发；次年，刚才提到的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然后，大正五年，滔天到了上海，在上海，多年来的同志黄兴突然死去，滔天受到了沉痛的打击。但是，这数年也是深深地制约了滔天的活动的数年，也是更大的时代巨变的数年，这也是我们不能不考察的数年。

大正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正四年，日本政府将所谓的“对华二十一条”强加给了中国。大正六年，俄国的“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时代变动，也是一个磁场的变化。从滔天自己的变化来说，大正五年，遭受了与自己气质最为相近的黄兴的猝死这一打击后，很快开始失去了与“支那革命派”共同活动的焦点。次年，



为了参加黄兴的葬礼，滔天奔赴湖南，虽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但是，不可否定，在这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曾经是黄兴的盟友这一形象已经褪色了。

这一时期，从现在所存的东西来看，除了少数的几篇以外，滔天几乎没有执笔作文。（《轻便乞丐》，《日本及日本人》，1914年，收载于第2卷；《湖南行》，《东洋日出新闻》，1917年，收载于第1卷）大正四年，为了参加第十二次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回到了家乡熊本县，做了候选人，但最终还是落选了。当然，滔天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目的，是在“大亚细亚主义”的基础上，“确立根本性的对支政策”（《候补人宣言》，第2卷封口照片）。也许这一时期，围绕着自己活动的前进道路，各种各样的想法乃至焦虑之念，仍在他的内心奔流不息。但是，到了三年后的大正七年，滔天已经几乎变成了一个书斋人，晚年滔天的写作活动也从此开始了。

从这时期开始到他死去的五年间，滔天留下了非常详细的日记体的著作。（《寄自东京》，收载于第2卷；《来自炬燵之中》，《荒唐日记》，收载于第3卷）这是已经离开一线的革命家对时代发出的评论，或者说是对形势的观察纪实。这些文章全部发表在《上海日日新闻》上，或许正是因为在这—毫无拘束的报刊上发表，滔天才得以畅所欲言。他的笔锋，时时直插政治时事，时时又论及身边的杂事。但这些绝不是单纯的怀念录，也不是所谓的追想记，而是不断地提示问题、解决问题的著作。他的日记，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大正时代政治、思想实情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接下来，我们将要与在辛亥革命中达到高峰的滔天的政治思想相关联，对他的行动轨迹进行再次的追踪。

## 八 愤怒与警告

对辛亥革命以后的滔天，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的话，那就是对社会的愤怒与绝望。

滔天愿将一生奉献的“支那”革命，一下子就夭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是一位“支那国民”的话，那他还或许有百折不挠进行努力的余地。但是，滔天是日本人。这里，阻止这一革命的前进，阻止民国成立的，第一就是日本政府。在辛亥革命当时，因为形势还是混沌不清，因此，还存在着各种的可能性与方向性，支持、援助“南方革命派”的势力，虽然各自有着自己的想法、目的，但还是不少。然而，仅仅过了四年，“对华二十一条”出现时，事态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日本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什么日本人对支那人采取这样的态度？”滔天满腔的愤怒，全部倾泻到他的笔端，这似乎已经是无须赘言的趋势了。虽然有点儿长，但是，我还是想引用几段，来体验一下滔天的愤怒。

中华民国之确立？阻挡其确立之徒即是日本。虽不能视为全部之日本人，至少日本当局，无论其为何政府，均以阻挡为己任，无一为民国之成立添一箕土者。

若夫寺内内阁之对支政策，则愚蠢矣。于援助政策之下，贷其款项，贷其武器，使支那南北之纷争永久持续，以是激成排日之感情，此一言即可概括之。若问第一次革命时如何，一千五百万之借款契约既已达成，而日本中途违约，其结果，使南京政府终止北伐，陷入妥协之破局。愈是妥协，革命党岂不愈是软弱，失却自尊心后则有怨骂之声。除少数同情者以外，于心中洒一掬同情之泪者尚无一人。如斯高唱日支亲善，反复千遍万遍，又有何功。余于此，断断乎明言，其罪当全归日本及日本人也。（《来自炬燵之中》，第3卷，第244—245页）

滔天的愤怒难道就仅仅针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吗？不，毋宁说，滔天的愤怒在更深的意义上是针对明治以后的日本这个民族的。

留学生来到日本，第一吸彼等血者即住所之房东，以彼等未习语言习惯为奇货贪取暴利，此乃通例也。……次即车夫，彼等对支

那人之态度实污秽之极，毫无羞耻地发挥其暴利主义。如斯，保护彼等，同情彼等者，无一人也。……非仅于内地<sup>①</sup>如此，于彼国亦傲慢不逊也。对彼车夫苦力则无须言，于商业买卖之中，恃财力藐视彼等以贪我利者，岂止于〇〇、△△洋行哉。此等实仅是代表耳。（《寄自东京》，第2卷，第60页）

总而言之，我国人对支那人，过于倨傲也。以“腔阔罗”<sup>②</sup>呼之，以“腔阔罗”待之，故引起彼等之反感。（《寄自东京》，第2卷，第8页）

彼等通常以毛唐<sup>③</sup>呼白人，称支那人为“腔阔罗”，其面对白人，则鞠躬如也，唯恐失其欢心；其对支那人，恰如对待奴婢一般，开口便是“腔阔罗”。此乃通例也。总之，对弱者则逞强，对强者则示弱。……每思此事，则痛叹不堪忍也！（《寄自东京》，第2卷，第41页）

然后，又进一步批判道：

试想，世界虽曰广大，然于思想感情及至行动之中，能与日本人类比之差别感，尚有何处哉？（《寄自东京》，第2卷，第123页）

回顾我们民族，傲慢已极，自是井底之蛙，却对东方无理至极。若因果报应乃天地自然之公理，则我国必有亡国之运，国民必尝其悲惨。是天之应惩也，是慈悲之铁拳也。（《寄自东京》，第2卷，第120页）

一等国民哟，大和民族哟，君子国民哟，东洋日出处之国民哟，于今若不反省，则近有噬脐之悔。物先腐者虫生之，有尸之处鸢集之。外难决不足恐，可恐者唯在国民性之堕落与无能而自负。（《寄自东京》，第2卷，第330页）

以上，我引用得或许太多了。从滔天走过的道路来看，他对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发出如此的愤慨，可以说是极其自然的。对于滔天的愤怒

① 指日本国内。——译者注

② 汉语“中国人”Chung kuo jen的转讹，对中国人的蔑称。——译者注

③ 即多毛的外国人、洋人，对外国人的蔑称。——译者注

以及包含在他的愤怒之中的近代日本人——恐怕至今都无太大改变——的问题,我只想通过滔天的呼声将之揭示出来。

但是,仔细考虑一下的话,辛亥革命以后,加负在滔天身上的课题,大概不仅仅是发泄愤怒吧。对“革命家”滔天来说,这里首先有一个今后日本前进道路的改弦更张的课题,然后还有对日本现状发出什么样的警告的课题。对于这两个问题,滔天作出了怎样的回答呢?

刚才也稍稍提到了一点,滔天现实活动的道路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因此,展开具体活动的机会最终也没有能够创造出来,这一事实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黄兴之死,也许让滔天感觉到了时代的推移。孙文在这数年之中,也是处于暗中摸索的时期。另外一方面,在国内,他最期待、曾经又得到过帮助的犬养毅,作为国民党的党首,在寺内内阁以后,进入了“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这毋宁说是在政府决定外交政策的会议上占了一席。这些与他的初衷相违背的事,在不断地出现着,发展着。一时间立志于参政的滔天,竞选失败,从政之途断绝,没有能够容易地找到政治活动的具体线索。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滔天对现实的分析中,发现他始终保持着自己一贯的敏锐的目光。

例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俄国革命,然后到凡尔赛媾和,在国际政治的大波浪中,对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的政治、外交基本路线的转换,滔天抱着急切的希望。他说:

我等从不认为历来之对支政策及台湾、朝鲜政策乃人道者王道者,而是军国主义、侵略主义乃至利己主义之发露。但于过去,所以能多少姑息,乃觉其有对抗俄国军国主义之必要也。今俄国军国主义与其帝政已共崩溃,新生之俄国则绝对否定侵略主义,国际联盟又禁止单独军事行动。若是我国一变军国主义外交,实以今日为最好机会。现内阁果有其觉悟与勇断乎。(《寄自东京》,第2卷,第169—170页)

已经数次提及过，滔天是站在亚细亚的立场上，将“正义人道与东方之命运”作为一体来对待的。日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是对蹂躏“正义”的沙皇俄国的战斗。不，先不说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姑息”，在我国，将日俄战争视作民族存亡之大事者，不仅仅是滔天。但是，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一下子变得“倨傲”，毫无顾忌地踏上了“斩取强盗主义”（《寄自东京》，第2卷，第323页）的道路。这条道路，与“人道”、“王道”相差得太远太远了。在滔天眼里，帝政俄国的崩溃，正是日本转换前进道路的好机会，正是一变军国主义外交路线的好机会。确实，这一时期，帝政俄国的瓦解，新兴国家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登场，亚洲各民族抵抗运动的出现等一系列的形势变化，使得原来以日俄协商为轴心的日本外交政策完全解体，跌入了最混迷的状态里。不管是否愿意，这都是一个不得不改变路线、方针、政策的转换期。那么，这一转换，在滔天看来，应该首先从什么地方着手呢？这里，滔天的外交政策转换的要求，首先从台湾、朝鲜的问题开始提起，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其次，在凡尔赛媾和中，日本代表团因美国的排斥日本移民法案为契机提出了“人种法案”，滔天与这一点相关，作了如下之说：

如人种案，作为问题乃是一个好问题。唯我国所言之人种案，甚不彻底，以此为憾也。若于我，则以解放朝鲜、解放台湾之决意而绝叫，而提案，而游说。若作此努力，则定能为彼等人道主义之榜样，得到多少反响。其意义尚不止于此，于前则可节制俄、德、奥、匈之过激军，于内则可育成几多受此思想感染熏陶之劳动者。尔后，此举对拥有郁郁不平之殖民地之诸国，毋庸置疑，则是一种伟大之权威。（《寄自东京》，第2卷，第119—120页）

在黄兴的三周年忌时，为了怀念战友，在汉城，他写下了这样一段：

黄君克强之逝，既已三年矣。我今日于日本之新领土，新亡国之朝鲜首都，迎来此三周年忌，感慨无量。（《黄兴先生三周年之回

忆》，第1卷，第518页）

在滔天的言辞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他视野中的据点，正是在滔天式的亚细亚主义之中奠定了基础的。割取台湾与合并朝鲜，这对滔天来说是无法忍耐的，可以说是心中的一根刺。不，毋宁说是近代日本前进道路上的根本性错误的起点。从而，也必须是日本的对外路线改弦更张的唯一的出发点。如果我国使朝鲜得以解放，对“对支政策”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互相缔结平等关系……这个如果，肯定是滔天在这个时代的激变期里，再三在心中描绘出来的蓝图。滔天对盲目地在军国主义路线上疾步的日本外交路线提出的这一全面转换的要求，正是在这一立场观点上得出来的。对于这一点，无论如何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然而，即使是滔天自己，也可能想到这种转换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错，滔天的转换要求，产生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具有一定现实可能性的构想，但是，这个可能性的程度，太低太低了。现实中，几乎是鲁莽冒失的、缺乏反省的外交路线在拖拖拉拉地延续着、发展着。滔天对日本政府的军阀外交的痛骂，压抑不住地迸发了出来。

由来源于军人头脑之单纯也。……日清、日俄之役后，骄慢无度，敢自进助长所谓军阀外交之弊，则近买邻邦之怨恨，远招欧美之疑惑，是使我国现今陷于孤立之境之所以也。……要之，军阀外交乃低脑外交也、盲目外交也。托人类于此一国之外交，天下岂不有如此之危机耶。（《寄自东京》，第2卷，第225—226页）

然而，据滔天所言，当时能够牵制、制约军阀的政党，也太无力了。其与军阀并列，可称其为“党阀”，与军部一样，不过是只顾自己党利党略的私人集团而已。滔天的这一断言，其正确性，我们应该可以从以后的历史中容易地得到验证。大正八年，滔天对日本的前进道路，最终作了如下的预言：

或最终都强行贯彻国家主义，跌倒后再自己觉悟。抑或与列国

保持协调，或立于更高处，如博士黎西亚特君所言，以彻底之人道主义为基础，作亚细亚联盟之主唱者，解放朝鲜，解放台湾，更一变对支那之外交，举亲善之实，援助尔余之诸小国，于平等组织之下组成联邦，以此对抗白人。抑或与过激派提携，以当欧美之国家主义。我国家民族可取之道，恐不出此三者之外也。（《寄自东京》，第2卷，第128页）

滔天的这种预测，是以哪一种形式实现了呢？还有，这一预测本身，有着滔天多深的亚细亚主义的投影呢？这些问题的答案，这里先暂时保留一下。不管怎么说，在时代的进展之中，滔天几乎是用绝望的眼光来看时事的推移的。

## 九 “支那革命”与日本的改造

综观滔天的历程，辛亥革命以后的滔天，自己背负着的思想课题难道就是这样的批判、警告和预言吗？这里是否还留下了什么更重要的课题呢？有，这一课题就是他的“支那革命”与日本的关系。

滔天，在明治时代，自己将“支那”确定为革命的根据地，在“支那”的革命中，他付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在他的思考中，唯有“支那”的革命，才是推动日本改造的据点。但是，绝不能说他就因此放弃了日本这个课题，毋宁说，他是将日本的课题放在建立“支那”这个根据地的运动中来实践的。对滔天来说，日本的变容，也许远远地超过了他原来的预想。同样是投入了“支那革命”的北一辉，面对“十数年间加速度般腐败堕落之本国”的容貌，留下了著名的“从日本人精神的最根本处彻底改变其面貌，进行日本自身的革命”一言。（《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告第三回公刊颁布之际》，《北一辉著作集》，三铃书房版，第2卷，第356页）对滔天也好，对北一辉也好，明治时期的日本，大概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的预想，瞬间向帝国日本这个巨大的集权主义国家变貌。为什么没有先进行日本

的革命呢？为什么没有想到要在日本进行革命呢？这个问题，也许才是辛亥革命以后的滔天不得不重新自问的课题。滔天晚年写下了下面这样的这一段文字，如果将它看成是面对这一问题而怀抱的悔恨与作出的自省的话，我想绝非言过其实。在这一段问答体裁的文字里，批判滔天的 A 这样说：

毫不客气地说，君等费于支那革命之努力与诚意，何故不以此尽力于日本之改善。……第一岂不错在君之出发点上？（《来自炬燵之中》，第 3 卷，第 246 页）

何故未先行日本之改善而后支那之革命。此乃日本人……行动之正当顺序，若能按其顺序而行，则煞费苦心经营至今之支那革命不至为日本所阻碍。憎恨日本乃无道理，若憎恨日本，则应先憎恨自己之不明。（同上，第 247—248 页）

滔天写这一组问答时，虽用了许多开玩笑式的笔法，但他自己比谁都清楚，这只是掩饰自己苦衷的一种韬晦。这可能是最尖锐、最基本的论点。滔天针对批判者 A 的问题，作了回答：

若冷静思考，将自己生国置诸不理，埋头于他国之革命事业，若问其谜何在，此实是一种异想天开之行动，常识派者绝不参与之行动也。尤其，其结局并非于革命取得一定成功以后因是外国人而不使参与枢机不使当其理想之要冲之故，而是弹指引退，若思及此境遇，则被责为好奇过度或愚蠢至极，亦无所可辩也。按 A 君之顺序论，为我之生国作相当之努力而终其一生，于我岂不是最睿智之行动？

滔天接着又说：

然日本如何伟大，亦终无推动世界之力量，而若使支那转而为理想国家之实可成，则其力量足以号令宇内，道化万邦。在此判断之下，委吾一生，寻踪于自己夸大妄想之路径，其结果，即今日我之



境遇也。(同上,第248页)

因吾之最初出发点乃世界人类主义,又因是以支那为根据地之暴力主义,故而仍有拘泥于此而轻视部分问题之病。(同上,第253页)

滔天在这里的议论,几乎等于全面降服,看上去非常软弱,这恐怕是难以否定的。对于“顺序是否颠倒”的指责,滔天承认了“轻视部分问题”的错误,有将自己“夸大妄想之途径”的原因,归咎于“日本终无推动世界之力量”,故只能将之寄托于“支那”。这里所反映出来的真实问题,倒不如说是脱离日本,进入“支那”这一“脱日入华”的思想的构造问题。滔天的这一番话,在多大程度上与他的真实想法接近,这一点,我不能马上就能断定。滔天首先是一个善于“实践”的人,长于“实行”的人,体系性的思想,强固的理论,并非是他的擅长,也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在他与A进行了这一番议论之后,通过“然真理乃世界之共通者,A君之无大小广狭之议论,对我确是一服清凉剂”(《来自炬燵之中》,第3卷,第253页),这一言,淡然地接受了A君的批判。然后,对中国,也承认了其前途中极大之光明,“今后之支那,已早不必要吾等无力之声援,……吾等于支那已早是无用之长物”(同上,第249页),飘荡着一种淡然的冷静的意念。在滔天的这种述怀之中,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他的自省与悔恨。

滔天寄托于“支那革命”中的理想,很明显是“夸大妄想”,他不应该做别的,应该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将全身精力倾注到日本的“改造”上,除此以外,“正当之顺序”是不可能有的。但是,用此来要求滔天,当然是不可能的。并且,只对滔天一个人发出这样的要求,则完全是一种无视现实的做法。问题存在于明治、大正时期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存在于日本当时的形势之中。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不得不问下去,当时,在日本,根据这种“正当之顺序”而展开的路线是否能够找得到呢?而在现实中实行这一路线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

## 十 日本的改造与民藏的轨迹——日中两国的关系性构造

在这之前,谈及滔天的出发点时,曾经提到了民藏与弥藏、滔天的争论,滔天的位置,因他与民藏的紧张关系而被规定了下来。后来又具体谈到了形成滔天坐标轴的两个原点不外乎于“支那革命”=孙文,以及民藏。

根据“正当之顺序”来制定革命路线的可能性,在当时的日本国中,只能到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去寻找。但是,这一课题与本稿的意图相差得太远了。不仅如此,而且将这个课题追究得过深的话,肯定会脱离现在我们探讨的课题范围。根据上面所述,民藏,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滔天的化身,夸张一点说,这种化身是一种意识的分工。两个人,几乎是抱着同样的意识,在同样的形势中出发的。我在这以前是尽可能将滔天这个人的思想与行动放在滔天的思想内部来进行探讨的,这里,我还想将滔天与民藏进行比较,将问题再稍许展开一点。

从美国寄来照片、资料,把“支那革命家”孙文介绍给滔天的民藏,回国后,发起了“土地复权同志会”(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的努力是专心致志的。“土地复权同志会”初期的同志,除民藏外还有59人。次年的明治三十六年,决定了大举访问名士的方策。明治三十九年至四十年,民藏与同志相良寅雄(=迫川)等人一起,赴甲州、信州、越后、中国、九州、纪和、大阪、奈良的农村进行游说。其目的,不用说,是为了宣传“土地均享”是“人类之大权”这一可以说是从天赋人权思想中找来的“土地复权”主张。在这里,民藏对土地国有政策采取了断然的反对态度。国有,其结局实质上只能是“官有”,因此民藏考虑到,一旦土地国有化,他理想中的“土地平等享有权利”其实就不能得到保障。为此,民藏的“土地复权”的意愿是通过有偿的方法,进行土地的再分配。为了将土地复权作为国家立法,民藏等展开了运动,向国会提出

了立法的请愿书,在这里,我不想涉及对民藏发起这场运动的是非以及妥当性的评价问题。对这场运动背后所蕴涵着的思想以及所背负着的历史局限性,我想暂时也不加考察。虽然民藏充满了热情以及令人吃惊的单纯,但是,“土地复权”运动,并没有顺利地进行下去。然而,民藏完全没有因此而挫折,排斥了集会宣传的形式,最终都是采取个别访问的形式,进行说服、劝导,通过这一独特的方法来招募同志,扩大力量。为了募集资金,举办摄影社,在东京附近巡回服务。将“土地复权”一事,看成是从根本上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道路,在日本这块土地上,“公然号呼天下”,这就是民藏的形象。他的路线,就是将自己所生活着的这个国家为根据地,紧紧地抓住“人道正义”这个课题,面对日本社会的路线。这样说,我想并不过分。

然而,这里不是专门讨论民藏的场所,在这里,与本稿的主题相关,我想谈下述的两个问题。

确实,民藏的运动,迟迟没有进展。运动开始后,经历了数年,组织的覆盖率,在全国府县数中,好不容易才达到了三分之一,并且,连运动的理念、进行的方式这两点,都没有顺利地得到赞同。但是,这场运动又没有单纯地自我消亡,而是在以大逆事件(明治四十三年)为契机的情况下,才终于走向了消亡之路。从上述民藏的思想与行动中大概也可以觉察到一点,他的思想与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在性质上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而可以说正是这一差异,才是决定民藏的思想特征以及运动特征的基本性格。但是,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将民藏的这种运动,会自然而然地安排到与社会主义一派极其相近的位置上去。因为民藏与牵涉到大逆事件中的松尾卯一太有亲密的私交关系,因而,民藏的别墅遭到了警察的彻底搜查。民藏当时正在汉城,因此才幸运地逃脱了枷锁。但这一事件,等于是将“土地复权同志会”在精神上、肉体上全部绞杀了。正是以这一事件为起因,民藏愿将一生奉献的这场运动,作为运动,被迫走上了消亡的道路。绞杀了民藏的“土地复权”运动的罪

魁祸首，不正是使滔天绝望万分的帝国日本吗？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曾经与滔天在思想上充满紧张关系的兄长民藏，他的国内改革的道路，结果不也是被封锁起来、宣告此路不通了吗？

民藏的路线，与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派路线是明显不同的，即使与欧美的社会主义派路线相比，也是不同的。一方面，他亲身感受到了日本农民的贫穷，对人类的这一应有的大权利被剥夺一事，以满腔的愤怒进行了控诉。另一方面，他又坚持他自己的土地权利的解决方法，坚决反对土地国有=官有的道路，而认为授自于天的土地，如果人们不能平等享有，则所谓人权确保的理想绝不可能实现。民藏从这儿得到的理想蓝图是，现实中人人都平等享有土地，这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他的这一观点，或许受到了土地单税论（亨利·乔治）、土地国有论这些议论的启发，但最重要的还是映入他眼帘的日本的现实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使他的思想性质具有了鲜明的独创性。人们也将民藏与滔天一样，放在当时东亚的形势中加以考察，认为他具有“亚细亚性”。这种说法，我想大错是没有的。民藏的“土地复权”思想，或许在孙文初期的“三民主义”中的“平均地权”的构想中得到了继承，关于这一点，已经被多次指出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多少具有相同性质的兄弟两人的道路，即将基础定在“亚细亚主义”之上的滔天的以“支那”为根据地实现世界变革的道路也好，希求“土地复权”的民藏的国内变革的道路也好，将之封闭，将之绞杀的，不正是“亚细亚”国家、自己的祖国日本吗？如果明治日本的富国强兵路线，其结局是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的话，“亚细亚主义”或“亚细亚性”的东西被抹杀似乎是当然的趋势，因为在这里，亚细亚是完全被否定的。如果从一开始，滔天就服从民藏的意见，同民藏一起踏上同样的道路，那么，他仍然摆脱不了苦难的历程，在大逆事件中，说不定会被刺断咽喉。那这样讲起来，在日本，“亚细亚主义”这条道路，反而成了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了吗？

在这里，顺着这个不言自明的趋势，我觉得还有一个必须交代的问题，

这就是民藏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踪迹。民藏在“土地复权同志会”的活动自由被剥夺后,却在中国出现了。为了“在孙文招集之国民会议上使之提出土地均享法案”,民藏自己试着将自己的法案汉译、印刷了。(上村希美雄著:《宫崎民藏的思想与生涯》,《熊本年鉴》第24卷,第124页,熊本年鉴社昭和四十六年版)民藏在辛亥革命以后,频频在中国露面,他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日支间的往来中度过的。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首先当然与滔天有关。辛亥革命以后的民藏,毋宁说是与滔天形成相补关系在进行活动的。虽然这么说,他自己的“土地复权”的志向,并没有就此放弃,这也是非常明显的事。民藏在这一时期的行动踪迹,有很多方面还不是很清楚。就我们所知而言,民藏的最终目标仍是实现自己的“土地复权”的志向。正是为了这一志向的实现,他的目光转到了筹集活动资金方面,在大陆试着开办实业。也就是说,这以后的“土地复权”运动的轨迹就与为了获得资金而在中国开办实业结合在一起了。在民藏的行动轨迹中,与滔天的关系不用说,也与其他的一些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例如,民藏的内兄立花小一郎,作为朝鲜宪兵司令官(陆军少校),在一段时期内,也为民藏在朝鲜的铁矿开发事业出了力。(后藤是山著:《先觉宫崎民藏》,《祖国》,昭和二十九年五月号,第165页)

为日本农民的土地复权运动倾注了一生的民藏,在明治日本,实现理想的场所被夺走以后,终于不得不投身于中国,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支那大陆”,对当时凡是抱有志向的人来说,都有一种难以抵抗的吸引力,这一强大的磁场又是什么呢?民藏在明治四十三年,同样是为了资金不足而烦恼不安时,不远万里渡过了太平洋,从美国富豪卡尼基那儿弄到了46140美元的捐款。这笔捐款是民藏在竭力宣扬了自己的理念之后,作为将“土地复权”运动在全国弘扬的资金而得到的。此时,民藏的眼光,是朝着大海的东边(美国)的。当然,他的这种志向与行动,在此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而其最终结果,民藏不再朝着东边,而是朝着西边,即被中国吸引了过去。虽然无数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包括前述的与立花小一

郎的关系在内,民藏在朝鲜、中国的事业,目的虽是为了获得运动资金,但现实中却渐渐地转变成一个权益性的东西。(前引后藤是山著的《先觉宫崎民藏》第166页中,有这样的记述,民藏“在四川内地勘探并发现了矿脉的露头,那时,如果有五万元,甚至连包括钻探资料在内的设计都可以做出来,但是,因为资金调拨没有令人满意,所以没有能够着手此事,白浪费了时日。到了大正时期,又将这一设计带到了币原[喜重郎]那儿,与币原作促膝交谈。将目光盯着缅甸的翡翠矿,为获得开发权而东奔西走,也是在这一时期”。)

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性质、特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一性质、特征,在战前,除了规定了日中两国的历史性关系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什么了吗?(关于民藏,参见丝屋寿雄的解题《宫崎民藏 土地均享,人类之大权》[实业之日本社昭和二十三年版]以及前引上村论文,《祖国》宫崎兄弟特辑号[昭和二十九年五月号])

## 十一 情念的亢进——亚细亚主义与翻译社会主义

我在上节中谈民藏似乎谈得太多了,最后,不得不再回到滔天这儿来。

大致在大正五、六年(1916—1917)以后,晚年的滔天,如果用一句话简单地总结的话,大概可以这样说,在外界闭塞的环境中,从出发的那天就内含在滔天体内的各种要素,因为找不到出口而在他体内浑浑然,朝着各种各样的方向亢进。一方面,滔天给日本的军国主义断罪,对日本的前进道路时时发出警告,并且对自己的生涯进行回顾,作出了某种自省。另一方面,同时又站在东方的立场上,对欧美的国家主义,迸发出了愤怒之火。不,其实他的亢进程度还远远不止于此。当他听到英国苦于爱尔兰问题,又苦于印度独立运动时,他大叫快哉,“英国之末日来了,破灭之时代来了”(《荒唐日记》,第3卷,第382页)。还有,英国国内的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时,他又写下了“白人文明之总清算时日来了,因果

报应之理又轮回来了”(同上,第421页)。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他对“彼等于人道之名义下胁迫我等东方又几何,待我等如禽兽又几何”(同上,319页)这一19世纪以来的“白人之祸”的愤怒的迸发。对于日本,滔天将它断定成一个“难容理想之国”(同上,304页),并表示了他“如日本般令人厌恶之国家没有,实是令人身颤般厌恶”(同上,243页)的厌恶感。这里,似乎让我们看了他因为找不到出口而显露出来的自暴自弃的想法。但是,几乎与此同时,他又写下了“以天皇万岁为第一”,“是我国国体冠绝世界万国之所以”(同上,346页)的文章,时不时又泄漏出对“东宫御洋行之仪”表示“更增一层敬意”(《寄自东京》,第2卷,第304页)的想法。滔天作为一个明治时代的人,他也终于没有能够逃脱天皇制国家这一咒语的束缚。虽然如此,滔天身处在这个天皇制国家中,但他的目光基本上还是朝着生活在这个天皇制国家中的民众的。滔天的这种心情,在他偶尔于火车站看到一队出征兵士时写下的一段述怀中最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于出征兵士挥舞旭日之旗大声呼叫之中,拥挤在停车场内之旅客,佯装不知,竟无一人应者。余因彼等之迟钝而心焦,故高举双手大呼万岁,和之者仅四五人。(《寄自东京》,第2卷,第23页)

在从明治向大正时代推移的形势变化中,滔天能够重新寄托自己希望的,当然,可以说是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实际上,在“支那革命”的挫折之后,滔天对作为打倒军阀,改造仅谋党利党略的政党的重要力量之一的普选运动、米骚动、罢工、佃农抗争等,寄予了极大的关心。如果不促成这种社会改造运动的话,那么,日本就要灭亡,滔天所抱着的危机感强烈到几乎接近于异常。对政治家的普选运动最终都没有超越党阀的行动范围这一点,滔天也是失望至极,显示了与青年学生的“民主运动”的同感。如果回到本稿一开始的《宫崎家的人》所阐述的观点上来看,滔天的长子龙介,作为“新人会”的成员开始活跃这一点,可以说是在新的形势下非常成功地继承了父亲的志向。如果从吉野作造在大正民主主义理念下,提出打倒“军

阔之日本”，联合“和平之日本”与“和平之支那”的口号，发起“日支学生提携运动”来看，这样的设想肯定是在更加深一层的关联中找到了根据的。

我觉得，滔天虽然对大正民主主义寄予了关心，并对逐渐开始兴起的工人运动开始注目，但是，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到最后，几乎没有能够容纳。他之所以没有与运动直接发生关系，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已经从第一线上退下来了的缘故吧。大正九年五月，在日本最初的五一劳动节之际，写下了这样的一段：“余亦想出席此有名誉之会合，且慢。君子不近危也。……二十年来登录于警视厅阎魔账上之黑明星，尚未完全消踪灭影，又复引来警探跟踪之事，并非适意之幸福也，急思而返。……令人作牡丹饼，祝贺此日。”（《荒唐日记》，第3卷，第362页）这里，滔天对运动的心情，微妙地表示了出来。

滔天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最终都没有相容。这恐怕绝不是仅仅因为这种形势的缘故，而是因为日本社会主义者是他所说的“翻译社会主义”这一缘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俄国革命以后列宁的共产制的强烈不满。从滔天的记述来看，对布尔什维克所实行的“强制”，毫不隐讳地说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据说当时他劝民藏去俄国。民藏对滔天的这一建议，以眼前“从事日支之商事且担负最重要之责任”为理由拒绝了。但民藏拒绝滔天的真正理由恐怕不在这儿。民藏关心的俄国革命，并不是列宁，而是“社会革命党”，因为列宁派“无将来之理”，而认为社会革命党有着未来的希望。（《答寅藏劝俄国行》——此信承麦田静雄氏好意得阅）

从滔天对列宁的土地政策的见解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民藏对滔天的影响。至少，布尔什维主义，在滔天眼里，是违反人性自然的东西。固然，滔天对俄国的实情并没有展开体系性的批判，只是作了一些片段性的记述而已。另一方面，滔天也没有可能得到俄国共产主义的准确情报，因此也就不可能对之有准确的理解。但至少对站在亚细亚主义立场上的滔天来说，他自己的理念与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最起码与日



本的“翻译社会主义”在性质上是相异的。滔天感到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活动的肤浅,所以最终都没有能够对之完全信任。似乎也可以这样说,是滔天觉得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与行动在日本缺乏乡土性,所以,最终没有能够完全相信。与之相反,滔天更加关心的是农村的佃农抗争以及佃农的实际生活状况。

在这里,我还不能完全地把握其内在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极其本质的问题。对滔天来说也好,另一方面,对堺利彦、大杉荣来说也好,最终使他们脱离了自己的路线,造成了偏斜的原因,毋宁说,是形成了他们的基础的“日本帝国”。但是,使滔天对社会主义有难以接受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那就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本身对民族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其思想与行动缺乏土著性,无论是对农民阶级还是对不断出现的工人阶级,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都没有真正的认识。对从亚细亚主义出发的滔天来说,在这一点上,几乎是直感式地感觉到了一些不协调。此外,对滔天来说,新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其说是因为这一理论的内容,倒还不如说是因为构成这一理论的框架、基础缺乏土著性这一原因,使得他终于没有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理论。那么,填补这一空白的理论应该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亚洲的“革新”问题上,难道不是最应该深究的问题吗?

## 十二 滔天的回归

退出一线的滔天,一步一步地回到日本的问题上来了。他归依了堀才吉主宰的神秘宗教大宇宙教。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大正十年),他完成了最后一次“支那旅行”——广东行,受到了正在广东建立军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的以孙文为首的胡汉民、张继、汪兆铭、何天炯、马君武、廖仲恺等昔日同志的热烈欢迎。滔天对他们正在从事的活动,从心里觉得高兴,但是,却又拼命地向他们灌输大宇宙教的心灵现象。到这里,我们似乎感觉到了某种难以言明的可怜与凄惨。((《广东行》,第1卷)这里所存在着的距离,不是已

经退出第一线者与现在仍然活跃在第一线者之间的距离，这仍然是深深地横在近代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距离。

然而，滔天并没有回归到天皇制国家的日本，而是真正回归到了自己的故乡荒尾，也可以说是回归到了日本的自然之中。从这里，滔天第一次渡海去了中国，面对着眼前壮观的风景，在船头“顾望低徊”，终于泪落满襟。（《三十三年之梦》，第1卷，第58页）在《狂人谭》中，描绘了书中人物村雨铁之丞面对“错觉河为海”的大陆风貌而欢呼雀跃的心情，正是他踏上大陆时那一瞬间的写照。（第3卷，第35页）但是，晚年在京都盆景般的自然风景中，他感受到了一种美，在美中感受到了一种安逸。回到乡里荒尾，在那里做做乡长什么的，这些话，在辛亥革命以后是能够频频从滔天口中听到的，这也许是他流露出来的老后的梦吧。去大陆，去实现世界革命的理想之子，到了晚年，终于回到了乡里荒尾。或许在滔天的思想中，反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热爱乡里，也就是热爱日本，而且又是与热爱世界是相通的。

晚年，在外奋斗了一生的滔天与兄长民藏一起，重归故里。已经是老农的小学时代的旧友，一边呷着酒，一边对兄弟俩说：

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也说给我们听听哟。你们想的事情太大了，太太们为了你们坐立不安，村里的人等不及，都一个个死了。……你们能为我们百姓做些什么呢？我们百姓辛苦一辈子，连个饱饭都吃不上，这是为了什么？

滔天听了这一番话，写道：

教我兄弟无颜色。（《荒唐日记》，第3卷，第453页）

滔天、民藏，均是志士，杀身成仁的志士。

滔天寻求到的“亚细亚”，或许就在这位农民身上。深入到他们中间去，然后掘起他们的力量之时，或许才是亚洲展现其面貌的那一天。

## 第二章 尾崎秀实与中国

### 一 序言

从左翼的立场上来把握支那，完全使我迷醉了。对于我，并非因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激发了对支那问题的关心，而是相反，是支那问题的现实，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心。我即处于这种关系之上。（《尾崎秀实著作集》，劲草书房版，第4卷，第296页。以下引用《著作集》者，仅标明其卷数）

尾崎在最初的《呈报书》中，写下了上面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是尾崎真实的内心表白。1928秋天，作为《朝日新闻》的职员赴任于上海支局以来，至1932年2月回到大阪本社，在整整三年多的时间内，尾崎以上海这个国际都市为据点，亲身感受到了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当时，国民革命，即所谓的“北伐”（1926年7月）的波澜，虽然因蒋介石挑起的“四一二”（1927）而呈现退潮的趋势，但是，以江西、湖南为中心，革命的新运动已经开始。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揭开序幕，正是尾崎去上海赴任的前一年。在尾崎滞留上海期间，耸动世界耳目的红军占领长沙事件发生（1930年7

月),遵照“李立三路线”(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而发动的这一起占领长沙事件,虽然仅三天就告结束,但这一事件确实让人感觉到了在中国的大地上正在酝酿着一场地壳变动般的风暴。尾崎就是在“毛泽东路线”形成期的那数年间,在中国现场,全身吸取了这一时代的风潮。另外,在同时存在着革命与反革命的上海,他加深了与史沫特莱<sup>①</sup>、左尔格<sup>②</sup>等左翼阵营的交往。与他们的交往,作为其结果,十年后,发生了“左尔格事件”<sup>③</sup>,与之相关的一些历史过程,在这里似乎已经没有再加说明的必要了。

众所周知,尾崎回国后,作为中国问题的专家,非常风光地登场了。“卢沟桥事变”的前夜,以及日中展开全面战争以后,尾崎在日本社会里所占有的地位,首先就是目光敏锐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站在这一位置或地位之上,以《朝日新闻》社为后台活跃着,参加了“昭和研究会”,成了“近卫内阁特别顾问”。作为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尾崎,他当时的一些论述,确实有使人大开眼界的地方。在“西安事变”的第一报传到日本的那一天写下来的评论,其准确的预言,使得他自己的名字从此深深地印刻到了人们的头脑中。他的论文、解说,在国际政局十分微妙并且极度紧张的这数年间,一直为外交舆论投下了重要的一石。有心的人,会被他的提问所唤起。他对时势的洞察分析能力,也将他自己推到了政策制定的中枢机构。如果从这一观点来看,尾崎的中国问题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他工作的核心,而且形成了他的人格。这样说,我想并不过言。这里,通过对尾崎的研究方法、视角,与中国现实的交锋等等的探讨,尾崎其人以及通过尾崎这个人所映照出来日中关系的现实的一个侧面都能够清清楚楚地反映出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考察这一问题,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阐明尾崎其人以及他

① Agnes Smedley, 1890—1950, 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 长期滞留于中国, 从事革命报道。——译者注

② Richard Sorge, 1895—1944, 德国人。——译者注

③ 指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以将日本政府的机密、日本国内的形势及驻日德国大使馆的秘密泄漏给苏联之疑, 1941年10月, 与之牵连的德国人左尔格、尾崎秀实等人被捕处刑的事件。——译者注

的历史意义。

尾崎的中国研究以及通过研究得出来的预测、建言,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与性质呢?我想以这一问题为线索,对尾崎的思想与行动,还有他的历史地位加以若干考察。

## 二 中国研究的方法论

尾崎首先指出了当时的中国研究中“缺乏科学的方法论”。在这样的研究状态下,尾崎自己具体地从“国际关系”以及“民族运动”这两个视角来观察、分析中国,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中国分析。这些事实,已经多次指出过了。尾崎的中国分析,至今,我们再次阅读时,都会被他的透彻所倾倒。尾崎的文章非常明快,就是在这些明快的语句之中,蕴涵着极强的说服力和尖锐的洞察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原来的中国研究中所存在着的缺陷,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判。在他的批判背后,确实对自己在中国的亲身体会——“从左翼的立场上来把握支那问题”,“支那问题的现实展开”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方法的有效性充满着信心。

例如,尾崎说:

在日本,并不是不存在着支那研究,倒不如说反而应该为所谓的支那通过多而担忧。……这些支那观,总体来说,应该说都是“东洋”史的史观。……今天,在支那研究中,成为一大问题的,那就是科学方法的缺少,亦即支那论中方法论的欠缺。(《处于暴风雨之中的支那》自序,第1卷,第3页)

不用说,要从根本上理解日支之间的相互关系,其重点不得不在对经济、社会诸问题的阐明上。……我想,我们要究明日支关系,应该排除观念性的方法,遵从与经济、社会相关的具体方法。(同上,第1卷,第62页)

这里,被称为“科学”的方法,无须多言,就是从“左翼立场”来认识的所

谓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尾崎的这种“与经济、社会相关的具体”分析的基础，在他的《现代支那论》（收载于第2卷）中，从对支那社会的两大特性，即，“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的分析中，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尾崎对这两个基本“特性”的分析，不是从别的方面，而是从“国际关系”以及“民族运动”这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从“支那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中，导出了“支那与列强资本”的问题，从“半封建性”中，导出了决定“现代支那动向”的“民族运动”的问题。这二者密切相关，形成了“相辅相成关系”。只要对尾崎的论文、解说多少有点了解的人，都会感觉到，“国际关系”与“民族运动”这两个视点，其实即使在非常短小的不起眼的时评中，也是极其醒目的。如果把话讲绝一点，这两个分析问题的视角，其实贯穿于他与在中国研究相关的全部著作之中。

但是，仔细考虑一下，“现代支那”的“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这两个特性本身，在当时的“左翼阵营”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定义。大凡以“对支那社会进行科学性解剖”来标榜的论著中，都泛滥着这一类用词。还有，像“国际政局”、“民族运动”这样的遣词，其本身都未免过于通俗，在那个时代甚至已经可以将之视为陈词滥调了。但是，尾崎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这两个基本定义、基本视角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运用自如地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活分析”。换句话说，以上的这些用语，恰如是他自己创造并将之定型的那样，从而，也使他的分析方法充满了独特性。这样，尾崎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过程、分析结果，即使部分地与他人相同，但这并不是他单纯地引用“共产国际理论”或机械地运用阶级分析的结果。因此，他的分析过程与结果，与其他的左翼阵营相比，具有不同的性质。

这里，在尾崎的中国分析中，对其令人吃惊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研究，我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性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对自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底是一种什么理论，我觉得，尾崎的现实主义精神都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以上这两个层次，形成了他自己的思考方法。

例如,在日中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南京政府面临着撤往重庆的局面,尾崎针对这一局势,这样写道:

使政府从上海南京一线往内地撤退一事,对蒋政权而言,实际上并非容易之事。……撤往内地的同时,蒋政权变质——落入共产党的影响之下——是可以预想得到的。与蒋政权保持着绝大利益关系的列强以及作为蒋政权支柱的支那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浙江财阀,他们对这一关系是不可能没有想到的。因此,他们将会拼命地与蒋政权加固关系。这一通常的预测未必没有道理。但是,现实中,在我们所能看到之处,这种努力,不管是哪一方,几乎都未有任何表示。

这是为什么呢?尾崎分析道:

浙江财阀的消极态度,首先与上海承受了极大的经济打击是分不开的。

这一打击,其性质,可以说是几乎夺去了浙江财阀的发言权。

站在列强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对日本的反感情绪高涨,停止调停之事确实存在。……然而,列强内部尚未取得共同步调,恐亦是理由之一。

列国从其利害关系来看,当然应该防止战争之扩大,然而却无所举动,或无法有所举动。其最大理由当归于支那民族运动的方向之决定,伴随着这一巨大的压力,已经开始有所动静。

然后,他的结论是:

此加速了支那近代历史赋予的民族解放的要求,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作为国民政府的指导和国民政府的势力所难以控制的力量开始发展起来了。(《蒋政权的衰退与新政权的前途》,1939年2月版第2卷,第323页)

尾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虽然仍有一些让我们感觉到其意识不明确

的地方,但是,就我个人所知,他的这种分析,在当时的各种论说中,仍然是出类拔萃的。在这里,决定战局、政局的基本要素被极其简洁、准确而且毫无遗漏地揭示了出来。在尾崎看来,蒋介石政权的重庆撤退一事,非常明显,会带来政权变化的可能,蒋介石政权本身当然也不希望有这样的事发生。尽管如此,蒋介石政权还是果断地采取了撤退这一路线,而且,与之有着密切利害关系的列强,几乎没有挽留之意,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在这里登场的是复杂的国际政局的变化以及另一个最大的因素,即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力量。尾崎在这儿叙述的观点,绝不是需要什么特殊的情报才能得出来的观点,而只是从万人瞩目、不言自明的“蒋政权内地撤退”这一现实中得出来的。这一分析,我们几乎可以将之视为他的历史认识、现状分析的方法论的典型。

不仅仅如此,他的认识方法,时不时地能让我们觉得是“政治现实主义”的模特儿。例如,《现代支那论》中,有这样一段:

只是含糊不清地认为英国在支那所占之势力非常之强,所以对英国必须如此这般的议论、主张,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应更具体地、彻底地察知英国对支那的历史性地位、其现有势力、与支那交往的方法,或者其势力浸透的特殊性,并且将之与世界形势变化相结合,推测其政策在今后会向什么什么方向转移,从而,我们也不得不在什么什么方面通过什么什么方法来进行对应,只有这样,或许才能树立妥当的政策。如单单停留在对英国势力之强大进行实证的阶段上,那么,甚至会因此得出必须打倒英国势力和必须与英国协调这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来。(《现代支那论》,《支那社会的两大特性》,第2卷,第201页)

事实上,贯穿于尾崎《现代支那论》中的,不是单纯的阶级分析、历史发展规律这一些方法论,确实能让我们感觉到“活”分析的样子。他对历来的“支那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称之为“缺乏科学方法”,同时,他更强调的首



先是所谓的动态分析。他说：

科学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实验不能停留在显微镜上，也绝不能是尸体解剖。对活体的解剖，比什么都必要。即使在一向长期处于假死状态的支那，事实上还保存着活力，而且，新的运动规律对之起着作用。（同上，自序，第2卷，第195页）

使尾崎充分发挥这一分析方法的，大概可以说是针对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问题的分析。尾崎对中国的民族运动的重要性，反复加以强调，同时，他对那种机械的、片面的分析，自始至终地加以了恰如其分的批评。

现在，看到这一民族战线的团结意外地巩固，有些人就说，支那民族运动完全消除了各阶层的利害，我觉得这是与事实相反的机械性看法。（同上，《民族运动的特质》，第2卷，第271页）

于支那内部，统一战线不是均质的东西，而是极其不均衡的结合，毋宁可以将它看作是包含着各种矛盾，这是极其不均衡的各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努力寻求平衡，努力希望结合的一种形态。（同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第2卷，第281页）

如果仅从尾崎的语言上来说的话，排除机械的分析论，追求全面的、整体的把握，这些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贯主张。如果再跳跃到另一个侧面来看，当时，再三强调这些方法论的重要性的，可以说不是别人，正是担负着统一战线一端的毛泽东。（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希望，那就是想确认一下当时尾崎对共产国际、中共关系的文书以及毛泽东的论文收集、阅读的情况。高田尔郎氏曾经说过，1941年，作为“日森情报”的一环，他将译成日文的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亲手交给了尾崎。——《尾崎秀实与日森虎雄》，《现代史资料(2)左尔格事件(二)》附录《现代史资料月报》，三铃书房版。）

当然，不用说，知道这一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与应用这一分析方法，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新闻记者，尾崎的“直觉”是很有名的，并且据说他自己

也对自己的这一“直觉”充满自信。或许可以这样说,这种分析方法,与他天生的素质相结合,更加得到了洗礼,在激烈的政局舞台上,充分地将自己的才能发挥了出来。

在这里,我们要探讨尾崎的中国研究乃至中国认识的特质,最有效的方法似乎只能从他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科学方法”,即超人一等的现实主义手法中来寻求。但是,当我尽可能将尾崎数量众多的论说放在当时的形势下加以通读时,觉得要将尾崎的所有的特质全部放在这种“方法”中来寻求其独特性的话,仍然是不可能的事。直率地说,至少对于我,是被某种难以名状的为难和奇妙所纠缠着的。就像最终与左尔格事件相牵连的那样,在尾崎的内心,基本上还隐藏着另外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如果极其简单地说,尾崎反复指出的“支那民族运动”,为什么他就能将之紧紧抓在手上进行明彻的分析,而别人则完全视而不见或只是触其皮毛呢?或者即使已经看到了“支那民族运动”的发展,而却又为什么只是用公式化的、教条主义的眼光来观察呢?尾崎的中国认识,不正是他理性与感性这两方面的结合吗?尾崎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的起点、终点,以及他的分析之所以与其他几乎所有的中国分析都存在着质的区别,其原因就在于一个亲自触摸了中国民族运动的人的触感上。这种触感或许可以用“黑压压地出现在眼前的民族运动”这一存在来表现。尾崎自己将之表现为“支那的正体”(《现代支那论》自序),而且也完全抓住了这一运动的本质。当然,这一切,都是通过他自己的感性而获得的。

当我们设定了这样的问题来考察尾崎时,其决定性的体验,当然是三年多的上海生活。尾崎的这一段经历,是无人不知的事。在此期间,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到“支那民族运动”中去了。尾崎为林守仁——山上正义翻译的《国际无产阶级丛书 阿 Q 正传》(四六书院 1931 年版)所写的序文《说中国左翼战线之现状》(第 3 卷,第 269—273 页)之中,正如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迸发出了自己的感情。若从人生的经验、人生的前进道路这一点上来看,为之作序这一体验,对尾崎来说,成了一个重要的命运

之举。跟几乎所有的人一样,人生中的偶然与必然微妙地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尾崎在上海所获得的感性认识,不仅仅是贯穿其个人一生的事,而且还成了他分析、预测中国的动向以及决定日本的前进路线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他在上海的体验当然是他固有的东西,而调动自己的理性与感性,在上海获得的中国认识,则更属于他固有的财产了。正是通过这种认识,他才确实实地窥见了“现代支那的正体”,说得更广一点,窥见了20世纪亚洲的秘密。

直率地说,我在读尾崎的文章时的一个难以抑制的感觉是,他想将他自己体验到的正体和秘密向世人传播,但在当时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形势下,却又不能畅快地完全将之传播,在这种急不暇待的心情下,显得有点焦躁不安。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各种场合,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他的“支那民族运动”,以此来唤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只要是运动,那么,它的实际形态就只能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尾崎立于“民族运动”这一原理性说明与运动的令人吃惊的多样性以及瞬息即变的运动实态的夹缝之间,在自己都尚未能够充分确定的正体面前,不断地苦闷着,彷徨着。

这里,如果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可能包含着两个本质性的问题。一个是,尾崎通过自己对中国的认识,被“民族运动”,特别是“运动”这一存在形态深深地吸引住,并将之吸收为自己自身的思想。若从他大量的与中国相关的评论来看,他的主张,如果大胆地说,那就是“别看政权,请看运动吧”,或者也可以说是“别看制度,请看运动吧”。在不断地评论南京政府、蒋介石政权的过程中,他的这种视点,跃动在每一个角落。在不断地指出这个政权所拥有的某种强固性与脆弱性时,最后所展示出来的形象,仍然是席卷中国的“运动”——“民族运动”。下面我们将要看的一段话,或许是反映他的这一观点的最生动的一段。“卢沟桥事变”半年前的1937年2月,尾崎在论及“支那与苏联”的文章中说:

国民政府立于高涨的民族运动之浪尖,想一举完成国内统一事业,对外也有着巨大势力的后盾,得以主张获取某种地位。但是,问题

是国民政府自己不具备领导或控制这一昂扬的民族运动潮流的力量，仅此一点，若有一步走错，则大有从浪尖波头被摔落下来的可能性。（《处于暴风雨之中的支那》，第1卷，第47—48页）

这一潮流，代表着“不断发展的支那民众的动向”，更加具体一点来说，这一革命的主力军是以“一向盲目连方向都不知道但却以惊人之顽强在这块土地上营营而生的支那民众的形象”（同上，自序，第1卷第4页）表现出来的。以“游击队不用说，一切的政治势力与采取不协同态度的只知面对土地的农夫以及街头衣衫褴褛的少年”（《东亚协同体的理念与其形成的客观基础》，第2卷，第312页）的形象表现出来。

另一个问题则是，据尾崎的看法，这一民族运动的本质，首先具有“自己解放”的性格。自己解放自己，才是这一运动的实质。严密地说，这一句话，在尾崎的著作中，仅仅偶尔一见，因为仅仅偶尔一见，所以在著作的整体中不易被觉察。但是，毋庸置疑，这一定义，才是尾崎把握民族运动，更广泛一点来说，是尾崎思想整体中的一个关键。“卢沟桥事变”一发生，尾崎就写道：

我觉得支那的“赤化”已是难以改变之趋势。……这是与支那民族运动中命中注定的自己解放这一事实以及今后来自外部的日益增大这一事实相关联的。

支那的“赤化”，是由支那特殊的复杂性及特殊的内容决定的，我想不一定就非要将它考虑成是与苏联同类型的东西。也不能说今后再次惹起国共两党分裂的可能性就没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赤化”倾向仍是在所难免。（《从国际关系看支那》，第1卷，第197页）

然后，正是在这种规律性之中，虽然话讲得比较委婉，尾崎仍然给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下了结论：

现在，不难想象共产国际与支那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然而，支那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热情，并不单是根据这些指令关系而形成

的。经历了1925至1927年的联合，他们之间似乎有着更加本来的、独立的东西。从中国共产党、军队现在的指导部的人物来看，毛泽东、朱德、林彪、聂荣臻、周恩来、贺龙、刘伯坚等将领，无一人访问过莫斯科，全是从斗争中走过来的人。这些人中间，自己的妻子、眷属曾被国民党杀死的人亦为数不少，然而，他们仍然尽力地与国民党提携着。（《现代支那批判》，第2卷，第117页）

在尾崎这样的笔致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细腻的观察方法，即，对“自己解放”自己为目标的中国民族运动——担负着主要的一端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理解、把握，不是从所谓的“规律”、纲领，而是从人性以及其行动上寻求事物的本质的。

以上，我对尾崎的中国研究的独特性，以及其研究乃至认识中的本质的方面进行了阐述。我觉得，在他的分析方法中，与现实主义精神同时，还根据事实本身，将“支那民族运动”的基轴视为“自己解放”，在真正的意义上作了尽可能完整的发现和认识。如果将这一点视作尾崎的现代中国研究的精髓的话，绝非过言。

这里，还有一个不得不加以说明的倾向，这就是，对中国的民族运动，在近代日本，尤其是在明治末期大正以后的我国，是人们最终都没有能够完全把握的问题，到了昭和初年，甚至可以说发展到了日本人几乎不可能理解的地步。对明治宪法体制——天皇制国家确立以后的帝国臣民来说，这种意义上的“民族运动”，是绝对难以理解的。这种不理解由来自于从富国强兵走向对外侵略的近代日本内在的最根本性的深层。这期间的详细情况，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回到尾崎个人身上来说，正是从这儿，开始了他悲剧性的、绝望的努力。这以后，在日中全面战争的过程中，尾崎的生活、斗争，与参加权力的中枢机构，参与“东亚协同比论”，最后与左尔格事件发生牵连这一系列的问题迅速地牵扯到一起去了。

### 三 日中全面战争的爆发——亚细亚与日本的构想

在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后一年多的 1938 年 11 月公开出版的《现代支那批判》的自序中，尾崎写道：

至战争爆发之前，笔者的态度是一心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向国人警告日本所面临的重大事态。然而，在事变朝着大规模发展以后，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当然必须是更积极。在最近的论文中，虽然尚未达到充分的积极与具体，但是，读者肯定能看得到，我们正在不断地从所谓客观主义中摆脱。（第 2 卷，第 1 页）

被收入《现代支那批判》一书中的，大致是 1937、1938 这两年间撰写的时局评论。在战局、时局的急剧发展中写下来的这些论文，正像尾崎自己所说的那样，确实带有比现状分析更强烈的“从所谓客观主义中摆脱”的调子，更加准确地说，是飘荡着一种浓厚的被逼得无可奈何、万不得已的感情或情绪。《现代支那批判》，正像书名所显示的那样，由《支那政治批判》、《日支时局批判》、《支那经济批判》三章组成。其中，《日支时局批判》，以从“卢沟桥事变”至“汉口攻击战”为止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发展着的战局为背景，因此，充满着明显的迫切感。

然而，尾崎的这一论集中，他想批判什么呢？或者，在“日支时局”的发展中，他尝试了什么样的批判了呢？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要批判“现代支那”，是要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来批判“支那”的“政治”、“经济”。但是，这本书中，却隐藏着极其曲折的意图。

尾崎在“‘局部性解决’、‘不扩大方针’都完全不被理会”，“国民的大多数只知道向敌人突进，少数的软弱者对事态的趋势毫无主张，只是呆然怅惘的形势下”（同上，第 2 卷，第 66 页），对事件的深刻化作了准确的预测。

因为战争，支那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整体变弱，全

国性抵抗能力也不断减弱,这是事实,但放远眼光历史性地看,民族的凝聚力能实现飞跃性的前进。(同上,第2卷,第99页)

然后,又说:

不管怎么说,现在支那发生的最大变异,不在南京政府将要濒临崩溃这一事实,而在于支那的民族运动的内容在迅速地左翼化这个事实。(同上,第2卷,第79页)

在论及中国的将来、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时,尾崎卓越超群的认识恐怕已经超出了共产国际的认识,这样说绝非过言。

如今,(国共两党的)问题,已经不是同一阵营内部两个对立集团的问题了,不过是结成一个集团的民族统一体中两个指导部的问题而已。……现今一般的看法是,支那战争败北,其结果,国共两党之间产生分裂,进而支那完全丧失抵抗力,以致趋于崩溃。或者与之正相反,强调支那民族统一战线的顽强性,国共两党之间,时至今日已经不会再生分裂。笔者的见解与上述两者均不同。……我认为,分裂的危险性确实存在,并且,越往今后,这种危险性毋宁说就越有增大的倾向。然而,我又看到,即使看到这两者的分裂,向来支持这两大政党而走到一起来的民众,其内部的统一性,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崩溃的。从而,只有保护民众统一愿望的政党才能保持其势力,而存在着破坏统一愿望倾向的政党,将在全局的变化中失去意义。(《国共两党合作的将来》,1937年11月版第2卷,第92—93页)

像许多研究中经常指出的那样,本世纪30年代所具有的意义,至今都是极其复杂的。这一复杂性,对现代历史,依然会带来微妙而且深刻的影响。仅从中国方面来看,这一时代的各种各样的路线、方向,一直给解放以后的历史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20年代后半期至日中全面战争,国民党的动向、共产国际、王明路线、还有

毛泽东路线等等,知道这一复杂关系的人,可以感觉得到尾崎这一段稍稍带有鸟瞰性的文章中令人钦佩的感触。这里可以说,尾崎通过亲身体验而获得的中国民众的动向,耸立在他的这一预言的背后。

但是,对于尾崎来说,对中国的情况越是准确地把握,就越是觉得问题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未免太过于悲剧化了。以民族运动这个核心描绘出来的中国像,在自己的心目中越是鲜明就越是觉得与自己的祖国日本所描绘出来的中国像完全颠倒。尾崎的《日支时局批判》,不正是在这种倒错、破裂之中,将赌注下在历史的逆转之中而发出来的悲痛呼唤吗?

正像尾崎在《自序》中写下的那样,“战争爆发之前是对国人警告”,然后,“事变发展以后是积极的提醒”,如仅从字面上来看,绝不是什么虚伪。但是,其内容,仍然有着曲折的双重意义。

接着,我想首先将最能够直接看透战争之际尾崎的心情的一段文字揭示如下,在《长期抗战的去向》中,他这样写道:

日支事变开始以来已经过了八个月了。战争依然在持续着,现在,战争何时能结束,谁也预测不到。

自己的村庄里,竖起了几根墓标,几位年青的友人们去了大陆,再也没有归来。回头想一想,不知何时,自己的日常起居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现代支那批判》,第2卷,第94页)

放眼战争的彼方,以曾以豪华的建筑而夸耀于世界的首都南京城为首,如蜂巢般地被穿透,在江南平原上默默展开。于我等这样数次游赏其地,为其和平的风光所陶醉者,怎能不生感叹。(《现代支那批判》,《败北支那的前进道路》,第2卷,第80页)

对有着深厚的中国体验的尾崎来说,在这里,他自身痛切的个人感怀,抑制不住地流露了出来。尽管如此,他对战争本身的认识,似乎保持了断然的态度。他击退了“这个事件如果那时那样那样的话不就可以不发生嘛”这种议论,而“不想将这种那种偶发的事情作为问题”,但又好



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条道路必定是日本七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毫无办法的归结。（《现代支那批判》，《长期抗战的去向》，第2卷，第95页）

这句话的意思，在这里已经不必要详说了，这是明治以后日本资本主义所展开的“大陆政策”的自然而然的归结。“不出所料，作为日本，这是必然要走的道路。”正是从这一认识中，尾崎欲转而委身于历史的必然之中，“退却也好，转换方向也好，都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在事变的初期，都预料到了这一事件的重大性。为了两国，心中希望能够找到和平手段迅速解决。以后，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全面展开。时至今日，半途而废的解决方法已经绝对不允许，唯一的道路就是战胜支那，否则别无他路可寻。不再挥舞假面，集中精力与支那斗争，除此之外，绝无生路。（《现代支那批判》，《长期战争下的诸问题》，第2卷，第105页）

当然，我没有理由仅凭文字就此接受尾崎的这一主张，也不想单纯地将之视作某种转换。与直至左尔格事件的全部过程结合起来看，对于尾崎个人，还有尾崎对形势的预测，问题远远比这复杂得多，微妙得多。但日中战争的全面展开这一现实，对尾崎的思想与行动给予了强烈的冲击，这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确实，尾崎心里很明白，“退却也好，转换方向也好，都是不可能的事”，在现实形势下，也看穿了在“不再挥舞假面，……斗争”以外别无出路。但是，尾崎的这种认识，在他心目中，绝不仅仅意味着与对手“支那”之间的军事斗争，毋宁说更多的意味着与自我自身的斗争，还有在日本国内的斗争。这一认识直接与日本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造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些问题的关系，尾崎在多处作了暗示。“为配合眼前的形势，必须有应急对策，此应急之策就是改造日本社会的组织。”（《长期战争下的诸问题》，第2卷，第104页）“今日，在日本举国

与支那扭打在一起的形势下,这早已不是单单实现大陆政策的问题了,而早已成了日本本身的问题。”(《长期抗战的去向》,第2卷,第95页)

然后,尾崎说:

日本国民、日本社会,从深深的底层开始被动摇。……政治指导部不得不看准这一方向,谋求对应的政策。然而这二者中间,存在着数重官僚、资本家的既成机构,这些既成机构,形成了最高政治指导部与民众之间的绝缘体——至少是不良导体。(《汉口攻略以后的形势》,第2卷,第128页)

民众或是已经开始懂得了自己面对着的困难是非同寻常的。……我们确信,大众已经从深层之处举着自己的解决方策登场了。正是这种期待,对内也好,对外也好,真正的勇气才一定能够发挥出来。(《汉口攻略战的意义》,第2卷,第123页)

刚才我写到“事变开始后”的尾崎,他的“从所谓客观主义中摆脱”,“积极的态度”带有曲折的双重意义。尾崎,一方面委身于“日本七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毫无办法的归结”、“必然要走的道路”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委身于“理性的狡智”之中,几乎表现出了随波逐流的态度,认为只有“不再挥舞假面,集中精力与支那斗争”,才是日本的一条出路。但同时另一方面,他又将这一事变后的斗争视作根本的斗争,确信日本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大众已经从深层之处举着自己的解决方策登场了”。可以说,尾崎从这以后的公开社会活动,几乎是沿着这两个方向进行的。他在1938年7月,作为近卫内阁的特别顾问,在国内政治上,参与了制定所谓“近卫新体制”的策划,在对外政策上,也厕身于与“支那事变处理”相关政策的立案以及“东亚协同体论”的尘嚣之中。就促使外交舆论骚动一时的“东亚协同体论”而言,尾崎对这一协同体论,多次反复地声称“东亚协同体论”与其他的理论不同,这是从“支那事变的具体进展”中产生的,正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又与“亚洲

门罗主义”、“东亚经纶论”等不同，“东亚协同体论”的意义在于“意识到支那民族问题的意义，反过来能够真正地促使我们考虑本国的重新组织”。（《东亚协同体的理念与其成立的客观基础》，第2卷，第318页）这个时期，对尾崎的一生来说，是最风光的时期。他可以自由出入于首相官邸，接近内阁的最中枢人物，煞费苦心地鼓吹自己的构想。在这一段时期内，通过书记长官风见章，作为近卫内阁的智囊，他有着他人无法比拟的观察决定政策的过程以及权力变动的极好机会，从而也有了根据自己的思维方法，为事态多少有点改善而不惜倾注精力的可能。对“东亚协同体论”以及围绕“东亚协同体论”的争议的那种陷入太深、欲罢不能的感觉，也可以将它考虑成是这一延续的必然结果。

但是，尽管如此，他的构想，随着现实的推移，在自己的胸怀中不得不将之熄灭。对于近卫内阁的“东亚新秩序建设”声明（=“东亚协同体论”）中将中国视作“中国吞并的别名”这种做法，写下了“根据具体实践，新秩序论者对之不得不回答”（《现代支那论》，第2卷，第286页）的尾崎，认清了“与民族问题相比，‘东亚协同体论’是多么的凄惨与渺小啊”，“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东亚协同体论的理念与其成立的客观基础》，第2卷，第314页）他的这种思想，在1939年1月辞去了近卫内阁的特别顾问以后，变得更加切实了。

“东亚新秩序论”=“东亚协同体论”，随着近卫内阁转换成平沼内阁，急剧地失去了它政治上的地位以及政策上的支持，尤其是国民再组织问题，随着东亚协同体论本身的发展，也使它经受了一次挫折，陷入了可悲的境地。（《东亚新秩序论的现在与将来》，第2卷，第359页）

若要说尾崎对近卫或者“东亚新秩序建设”声明是否抱有何种幻想什么的，毕竟是难以想象的。对尾崎来说，“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凄惨”与“渺小”，应该从当初一开始，心中就是非常明白的。但是，作为现实政

治中的一个人,要说他采取了完全撇开的态度,这也是难以断言的。从他当时写下来的东西中表达出来的,可以说是被夹在仅能容身的日中关系之间不得不发出来的悲鸣,从中甚至都似乎可以看到他因挣扎而扭动着的身躯。从引用的文章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尾崎的心目中,“东亚协同体论”与“国民再组织问题”,几乎是一个内容的两个方面,也许这正是尾崎接近近卫内阁的基本想法。但是,他怀着深深的热情写下的“日本社会组织的改造”,“从深层之处站起来的大众”这些构想,在现实中即刻土崩瓦解了。这些构想,说不定是日中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他脑中一瞬即逝的梦想。经过了这样一种“可悲的境地”,“一次挫折”以后,他面对将来,又写下了如下一段暗示性的文章:

如反复所述的那样,必须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现实基础,这才是各种(问题)的根本。(同上,第2卷,第359页)

形成所有问题的根本的“现实基础”,当然也意味着中国的“地壳变动”——抗日民族运动的发展,尤其是抗战主体的质变,以及对采取了新形态的中国的展望。他在好几个具体问题上,对中国的“新型的民主主义形态”(《汪兆铭问题的新发展》,第2卷,第372页),“支那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发展”(《现代支那批判》,第2卷,第174页)的可能性,作了毫无保留的阐述。

以后,尾崎在左尔格事件的《第九回讯问调查书》中,大声说道,“我所说的‘东亚新秩序社会’……是在日本国内的革命势力非常弱小的现实”中,“日本如要实现这一转换,苏联、摆脱资本主义机构的日本以及完全掌握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支那,此三者必须紧密地提携援助。使此三者的紧密结合成为核心,首先将目标定在东亚诸民族的民族共同体的确立上”(《现代史资料(2)左尔格事件(二)》,三铃书房版,第128—129页)。尾崎向左尔格谈及日本社会革命的现实预测——日本因疲敝而爆发革命的可能性时,已经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夜,亦即在他自己被

逮捕的数月之前。从《东亚新秩序建设》声明的发表(1938年11月)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1年12月),时代像激流一样发展着,尾崎也就在这一激流中恶战苦斗着。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两三年中,在日中两国关系的夹缝中挣扎扭动着的尾崎,与日夜都梦想着历史逆转的尾崎之间,很明显地存在着一条鸿沟。通观尾崎的一生,这期间他所描述的思想活动轨迹,真可以说是一条过于孤独、孤军奋战的道路。这里,超越日本,然后再超越中国,实现世界革命的梦想,只是以一个倒错的形象打上了一个句号而已。

“我本来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上申书》,《狱中书简》)这句话,在对尾崎的评价中,围绕着尾崎的历史地位,屡屡被引用。

在这里,我并不想过深地涉及这一问题,因为关于这句话,与变节、假装变节等问题牵扯在一起,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非常严密的思想性问题,而且有时候甚至是需要通过心理分析才能发现答案的问题。然而,因为这里的主题是“尾崎秀实与中国”,所以,对他在这里所揭示的问题性质,似乎仍然有必要作出一个解答来。这或许是一个在近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之中重新评定尾崎的历史地位的课题。

#### 四 日中关系的夹缝之间——日本、中国、世界

尾崎在《狱中书简》中,谈到了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他这样写道:

读了《三十三年之梦》,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滔天初次溯扬子江而上进入上海时,感动万分而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的场面,我深有同感。我最初来到上海时的感动,是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事之一。(《感情如星星般降落》,第4卷,第174页)

还有,在1943年8月31日的信中,要求家里人送来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第4卷,第92页)

在其他的书简中,还可以发现他要求送来历史、哲学、传记、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的书籍的事,并写下了许多读后感。这些与“现代支那”相关的研究书籍,或者像《黄河之水》(鸟山喜一)、《长安之春》(石田干之助)等等,虽是先人的著作,但都激起了他的许多回忆。

回顾历史,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无数编织日中关系史的人们,从右翼到左翼,从军人、革命家、政客、浪人、商人到娼妇、流氓,几乎所有种类的人都被包含在其中。然而,如仅限于在历史舞台的正面登场的人来说,其历史归结姑且不问,但若要将这些人分门别类的话,那么,这儿或许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界限,那就是是否自始至终都将中国革命与日本的变革以及世界革命,即中国、日本、世界这三者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从其主张来看,尾崎确实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位国际主义者。“社会主义不是在一个国家就能以完整的形式确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等待世界革命才能实现的制度。”(《检事讯问记录》,《现代史资料(2) 左尔格事件(二)》,三铃书房版,第285页)“不用说,我意图中所谓的‘东亚新秩序社会’……应使之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环。”(《司法警官讯问记录》,同上,第129页)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尾崎才置日本革命于心中,参与了中国革命,并对苏联采取了协力的态度。这又是尾崎其人其思想其行动被定性为共产主义的原因。尾崎带着某种感怀重温宫崎滔天、北一辉时,或许已经超越了自己个人的主义、主张,可以肯定地说,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似的磁场。

这里,有一个动不动就被遗漏的问题,例如,宫崎滔天,他绝不是单纯地为了“支那革命”的“支那革命主义者”,也不是通过与孙文的结交纯粹无瑕地为中国革命而献身的热情汉,他首先应该是一位“为了世界革命的支那根据地主义者”。第二部第一章里已经提到过,在《三十三年之梦》中,滔天淋漓尽致地说道:“余信人类同胞之义,故忌弱肉强食之现状。余奉世界一家之说,故憎现今国家之竞争。所忌不可不除,所憎不可不破。……故余遂至以世界革命者自任。”这绝不是单单停在口头上

的东西。在追踪滔天的思想与行动轨迹时，我们也已经提到过，他的这种构想呈现出最紧张的姿态可能是在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这一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尼古拉·拉塞尔、格尔雪尼等俄国革命家来访日本，然后又有因日俄战争而引起的日本社会的裂变，更有因日俄武力冲突而引起的国家间的决裂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的时期。滔天在这一时期展示的蓝图是，在“支那内地”建立“根据地”，采取“旷日持久之策”，等待欧美内部的“社会革命之乱”的爆发，如果“列国来干涉，则惹起世界革命之动乱”。在滔天看来，这也是“国家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世界主义决战”的时期。（《支那革命与列国》，《宫崎滔天全集》平凡社版，第2卷，第608页）这原是滔天描绘的一场梦，并且还是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滔天寄托在“支那革命”中的一场梦。但是，综观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不用怀疑，这是在体制的动摇之中，根据逐渐萌芽于明治末期的“亚细亚革命”——“亚细亚主义”的思想而闪出的世界革命的光芒。

北一辉，在这个时期内，全身心投入了“支那革命”=辛亥革命，后来又终于转回到了面向日本的改革，转向了超国家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他在《支那革命外史》中，提倡日本的“革命性对外政策”，发动“俄支战争”——“对俄一战”，将中国进行“武断地大统一”，然后废弃“日英同盟”，将英国从“南支那”驱逐出去。这种构想最终转向了超国家主义。在有名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出现了“于强取他人寸土之同时，……若有必要，应有夺取全世界之远大抱负”这种令人吃惊的飞跃。

当然，我在这儿将尾崎的《狱中书简》中偶尔出现的两个人的事情提出来，并不是想将他们作为论据，以此为参照物将尾崎也适当地安排到这一谱系的某一个位置上去。也不是想设定尾崎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国际主义者这两个问题而从中来二者择一。不管从时代上来说也好，从形势的变化发展上来说也好，他们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应该将之视作必须仔细研究的新课题。尽管如此，单从与中国的关系这

一点来看,对于近代日中两国关系的错综复杂,我不禁产生了诸多的感慨。

被所谓的“中国问题”所触发,并将“中国问题”放在与日本问题有本质性关联的角度上加以摸索的人们,如果将他们行动中的各种差异都舍去,就会发现,随着明治、大正、昭和这一时代的推移,他们的活动范围在逐渐地缩小,而其活动的领域却不断地往权力构造的高处升。例如,滔天的行动,可以说是民间志士的活动。他周围的人或者与他相关的人,是所谓的“浪人”或者是在野的政治家们。北一辉作为民间右翼团体的台柱和重要人物,隐然拥有着某种势力,为了“国家改造”,逐渐地向权力中枢靠拢,想以此来撼动权力中枢的这棵大树。然后就是尾崎,尾崎作为内阁的智囊,事实上已经站到了权力中枢机构的周围,凭着这样的地位,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自己的“东亚新秩序社会”——“世界革命的一环”这一构想中去。但是,不用说,尾崎抱着自己的这一构想进行活动时,他也就成了一个最孤独的革命者或最单独的革命者。在孤独的环境中,他越过了海洋,将自己孤独的影子与德国通信员、纳粹党党员左尔格联结了起来。不,倒不如说是不得不与左尔格联结在一起。日本的近代国家体制是如何急速地对国内进行压制、迫害,同时对国外进行侵略的,尾崎的事例就是一个缩影。如果从这一观点来看,尾崎的活动,不正是在这种压制、迫害的过程中依然拼命努力的几乎是戏剧性的轨迹吗?

回顾这段历史,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感想,即在近代日本,大凡对体制持有批判态度,并且在相对开放的意识中思考问题的人,几乎都在中国寻求自己发展的舞台,想通过中国的革命,来展望日本的变革,展望世界革命。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有中国革命才是通向世界革命的道路。可以说,这才是良性的“亚细亚主义”的基础,才是近代日中关系应有的构造。在近代史上,中国对我国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之一,难道不应该从这儿来寻求吗?



“八一五”<sup>①</sup>以来已经 30 多年过去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很快地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这种关系的构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这一构成的变化之中，中国的意义是什么，日本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今天，重新回顾尾崎的生涯和思想时，从中反弹回来的课题，我觉得似乎应该在这些问题之中吧。

---

<sup>①</sup> 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日。——译者注

### 第三章 橘朴——亚细亚主义的彷徨

#### 一 序言

橘朴(1881—1945),从明治末年,经大正到昭和,几乎在大陆度过了自己大半的生涯,作为在野的新闻记者,作为一个中国问题研究者、思想家而著名。

他因就职于《辽东新报》,第一次渡海来到大连,是明治三十九年(1906)的事。尔后,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留下了无数的足迹,最后客死于混乱不堪的“奉天”,是日本战败那一年(1945)的10月。因此,橘朴的一生中,几乎将近半个世纪是在激变期的中国度过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橘朴是“日本帝国”在大陆兴亡盛衰史的同时代人,或者说,自明治初期至“八一五”,以日中关系为舞台而活跃的众多的群像中,橘朴是名副其实的最后到达终点的一位选手。橘朴留下的思想与行动的轨迹,在织成近代日本的日中关系史的无数根彩线中,或许是色彩非常独特的一根。

迄今为止的研究,大致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了橘朴:

第一,将橘朴作为中国思想、中国社会的研究者加以研究。橘朴在

这一领域的主要著作有《支那思想研究》(日本评论社昭和十一年版)、《支那社会研究》(日本评论社昭和十一年版)、《中国革命史论》(日本评论社昭和二十五年版)。橘朴在这些著作中的分析,一直到今天都还值得我们探讨。

第二,是围绕着“满洲事变”(1931)以后,橘朴自觉地进行了“方向转变”等问题的研究。橘朴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宣告跟“自由主义与资本家民主主义诀别”,选择了“新勤劳者民主主义”,特别是“为了满洲建国的农民民主主义”的道路。这是昭和思想史上的一个“转向”问题。

第三,是对他在日中战争时期因参加“翼赞运动”而被视作“国家主义者”乃至“超国家主义者”的研究。以《国体论序说》(《中央公论》,昭和十六年七月版)为代表的《职域奉公论》(日本评论社昭和十七年版)是其思想的结晶。

以上这几个侧面的研究,可以说都抓住了橘朴思想中的重要部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能够从这么多的侧面来进行探讨的本身,又说明了橘朴这个人物的多面性与多样性。

但是,能将橘朴的这几个侧面贯穿起来的又是什么呢?其实,这并不难发现,从他的经历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能将这几个侧面贯穿起来的就是中国,或者可以说是橘朴心目中中国这个国家所具有的意义,或者还可以从更基本的方面来说,那就是近代日本史上日中关系的构造。正是这一原因,才使橘朴有时候成为一个最现实的观察者,有时候又使他成为一个热情奔放的活动者。然而,另一方面,日中关系这个磁场,又恰如万有引力般地掐住了他的脖子往上揪。当然,对近代日本而言,中国问题几乎是一个命运问题,普遍笼罩在所有日本人的头顶上,从中产生出了“脱亚入欧”论,从中也孕育出了“亚细亚主义”。中国问题,是近代日本的现实与理想、利害与观念阴阳交错、内部失和、互相争执的舞台,同时又是将这种瓜葛关系即刻反馈回日本国内的一个基地。从政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可以说,近代日本不管在哪一个领域都

没有能够避免来自这一基地的冲击。

橘朴,尤其是在昭和年间,是最自觉地将来自中国的冲击进行吸收、升华的人。不,或许可以说,从日俄战争后的第二年开始一直到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为止,在他的思想与行动的变迁中,几乎浓缩了明治、大正、昭和各个时期的中国问题的原貌。如果从这个视点来看,对橘朴所描绘出来的轨迹,说不定有对之进行更高评价的可能性。

在这里,我并没有将橘朴的生涯进行传记性叙述的意图,也没有打算将他曲折的思想尽可能地进行梳理综合找出什么精髓来,倒不如说,主要的意图在于阐明通过橘朴独特的个性反映出来的中国问题的实质,从而对近代日中关系的构造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考察。这种历史的探讨,或许能给再探讨中国或亚洲对日本到底具有什么意义这一课题提供一点线索。现在想从鸟瞰橘朴的生涯开始,逐渐接近这一中心课题。

\* 关于橘朴,有山本秀夫的《橘朴》(中央公论社 1977 年版),首次非常详细地叙述了橘朴的一生。与橘朴相关的史料,如《支那研究资料》、《月刊支那研究》、《满洲评论》(均由龙溪书舍出版)等已复印出版,基本史料正在陆续刊行。就橘朴的个人资料而言,山本秀夫氏的力作中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应该成为橘朴研究的出发点,本论在写作过程中,关于橘朴的传记部分,也多得益于此著作。

\* 关于地名,为使当时的历史状况乃至历史感能更鲜明地反映出来,全部使用当时的称呼。还有,在引用原文时,为了方便起见,在许多场合使用了简体字,这里事先申明。

## 二 问题的所在——橘朴与中国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橘朴一生的活动轨迹,大致可以分成三个侧面,与这三个侧面大体相对应,他一生的活动,也能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期,是从他渡海来中国到“满洲事变”发生之前的这一段时期。

橘朴到中国后不久,就遭遇了辛亥革命,此后,他专心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之中,提出了许多自己独特的中国认识论。以后,又接连不断地体验了从“五四运动”直至“北伐”=“国民革命”的一场又一场的激浪。

第二期,以“满洲事变”为契机,实行了自我的“方向转变”以来,至“满洲国”成立这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作为“满洲国”协和会理论领袖之一,积极从事活动,同时也形成了所谓的“满洲评论”派。

第三期,从日中全面开战至日本败战、身故这一段时期。这期间,往来于日本与中国之间,谋求日本国内的改造以及日中战争的解决方案,在评论、活动两方面,展开了他最后的活动。

橘朴的这三个时期的界限是非常明显的,并且具有相当的自觉意识。后来,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些转变,也有明确的说明:

(一) 渡华以来,“我相信在支那研究中……最有兴趣的题目是其政治现象”,对中国的政治,利用新闻记者的特有的方法聚精会神地进行了研究。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死后,橘朴对自己的这种看法开始产生了某种怀疑,感觉到有必要采取更加深入的研究方法。他说:

支那的传统政治是在支那特有的社会组织上进行的,而在如此之社会组织之中又必然会有如此之政治体制。……从而,为了重建……支那的政治,必须改造其社会组织,除此别无他途。只有从根柢将此“政治”彻底摧毁,才是改变支那的根本要件。

作为记者,能够触摸到支那这个伟大的生物体,实际上是有了这种认识以后的事。(《月刊支那研究》第1卷第1号,《时评数则》第161、158页,龙溪书舍版)

橘朴的这种“理智的兴趣”,在此后,“几乎完全从政治现象中脱离,一味地向社会现象倾斜过去”。(同上)

这里,他的中国研究的轨迹可以说是极其明显的。以《支那研究资料》(1917—1918,全十册)、《月刊支那研究》(1924—1925,通卷十号)为

代表,开始沉浸在最基础的中国社会、中国思想的研究里,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国认识观。同时,在他心目中浮现出了中国社会组织改造的这一巨大的历史性课题,这一课题,在他的研究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

(二)十几年以后,当他进入了第二个活动期之际,写下了有名的《满洲事变与我的方向转换》一文,他说:

满洲事变,给我的方向转变带来了机会。

我是个自由主义者,同时,我又被否定自由主义的母胎资本主义这个志向强烈地支配着。

东拓楼上的感慨(指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的会谈),实际上给了我一个对自己如此脆弱的立场作出反省的机会。……虽然与现在将校团(指策划、实行满洲事变的板垣、石原等关东军将校)的指导方针在基调上不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可靠的同行者,对这一新势力有着颇高的期望。(《满洲评论》第7卷第6号,昭和九年[1934]八月。《橘朴著作集》,劲草书房版第2卷,第17—19页)

对于这一段话的意思,想附加说明的东西几乎没有。“诸多的友人,将此……解释为右倾”,但是,“又没有任何的反对理由,我自己将这一方向转变解释成自己思想上的一大进步,同时,也将它看成是对我的社会观给予的一种安稳感”。这些言辞,都是橘朴斩钉截铁地说出来的。橘朴自觉地改变自己的前进路线这一点,昭然若揭。

(三)但是,标榜“建设王道乐土”的“满洲国”的成立,最终不过是日本侵略中国本土的一个跳板而已。1937年,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线,日中战争全面爆发时,橘朴迎来了第三次转机。当时,他对田中武夫这样说:

我简直是呆了,我一直惦念着日中两个民族间正常关系的模式,并对其理论与方法不断地进行考察,但是,目光只注视在作为客

体的中国方面,努力地科学地把握其诸条件,而对至关重要的主体的诸条件却考虑得太浅了。这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设定这一关系吗?我不得不重新出发。(田中武夫著:《朴庵先生与〈满洲评论〉的历史》,《楠》(“橘朴研究会”机关杂志)1977年1月第9号,第45—46页。——严格地说,这只是田中的谈话,而不是橘朴本人的原话。但田中是橘朴刊行《满洲评论》时的门生,故而比较真实,故加以引用。)

1939年(昭和十四年),橘朴留下这样的话以后,回到了日本,从此以后大约四年的时间内,他活动的场所转移到了国内。或者参加“昭和研究会”,或者在“东亚联盟”上进行演讲,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对支政策”的建言献策上。再次返回中国,已经是1943年的事了。

如果从辛亥革命、“对华二十一条”要求(1915)、“张作霖爆炸事件”(1928)、“满洲事变”、“日支事变”等接二连三的大事件的历史潮流中来看,橘朴的行动轨迹,就在这滚滚的波涛之中。在这波涛之中,他自己为自己的活动作了划时代的决断。不,毋宁说他的活动是非常准确地适应了时代的转换,是配合着这一个个时代的转换来改变自己的路线的。他的方向转换越是有意识,越是自觉,这三个转换的区分就越是鲜明地呈现了出来。

“往往被误解为支那学者,我只是始终一贯地将支那社会作为对象的评论家”,后来,橘朴自己给自己下了这样的定义。并且,“评论的动机不在于感兴趣或求知欲,而主要在于政治目的,即探索日支两民族正常关系的理论及方法。”但是,“满洲事变后……特别是支那事变<sup>①</sup>后”,作为评论家的橘朴,“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抛弃以前的那种旁观者的立场”(《职域奉公论》自序,第2页)。事实上,橘朴真的是从一位怀抱着政治目的的“评论家”,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弧,向活动家滑

---

<sup>①</sup> 即卢沟桥事变。——译者注

了过去。以“满洲事变”、“支那事变”为鲜明的界限，度过了他一生中的三个时期。

虽然，橘朴在现实活动中自己两次有意识地改变了自己的前进道路，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转移到历史的更深处看问题的话，我觉得他的生涯，若以中国巨大的政治、社会运动为分水岭，那实际上只能分成两个时期。这里所说的巨大的政治、社会运动，就是20年代后半期震撼中国、震撼世界的“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1926—1927）。如果放到橘朴的身上而言，就是他对这一蓬勃发展的“国民革命”的认识、把握的方法问题。可以说，就是这场运动，在真正的意义上决定了橘朴的行动。固然，橘朴的方向转换，其有意识的选择，是难以改变的事实，对此产生疑问的余地是没有的。但是，橘朴对北伐——国民革命这一巨大的政治、社会运动的观点，才是对他以后的生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

这里，现实中每天都发生的“中国问题”，以无可比拟的分量横在面前，这一现实与怀抱政治目的的“评论家”橘朴之间，迸发出了激烈的火花。

从这一视点来看橘朴时，对于橘朴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似乎只有通过以这一最重要的时期为中心，将问题集中于此，从而找出课题这一方法，才能将之阐明。可以说，在大约20年间，以这一场国民运动为界限，存在着以形成他独特的中国认识观为中心的前史时期与经历了“中国问题”的异常曲折而向“日本问题”转化的后史时期。

历史原本就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个人的历史也是这样。个人的历史就是某一个人对不断发生的种种问题所采取的对应过程，也只有掌握这一对应过程，才能决定这个人的轨迹。在这个意义上，分水岭也只有以更广阔的视野为前提的基础上才能找到。以下，我想以“中国问题”的基本观点为轴心，尽可能地忠实于橘朴极具个性的足迹，随着时代的演变来探讨一些问题。



### 三 走向中国研究——来自民众世界的观点

橘朴的前半生,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记者、评论家而度过的。从《辽东新报》,到《日华公论》,到《京津日日新闻》,到《济南日报》,他来到大陆以后,辗转于大连、北京、济南等地,专心致志地与报纸、杂志打交道,送走了大约 20 年的岁月(1905—1925)。橘朴成为满铁本社调查课的特约顾问,是 1925 年 10 月(大正十四年)的事。在这之前的记者时代,他还两次发行了自己参与创刊的学术杂志,即《支那研究资料》(1917—1918 年,全十册)以及《月刊支那研究》(1924—1925 年,通卷十号)。从在外地发行面向日本人的报纸、杂志这一点来看,虽说是一名新闻记者,但那种带着几名工作人员,整天过着牧歌式的生活,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初在《辽东新报》、《日华公论》的时期(大体相当于辛亥革命以前)写的文章,一篇都没有留下来,其内容当然也无从知晓。但是,从他的经历来看,至少他愿做一名将一生奉献给“支那问题”的新闻记者这一点,在当时的文章里肯定是有所表现的。

橘朴非常有意识地、自觉地构筑自己的前进道路是在袁世凯死后的大约 1916 年(民国五年),但他的这种立场像决了堤的洪水似的奔流横溢,则始于 1924 年(大正十三年)《月刊支那研究》的创刊。在这里,评论家的橘朴的中国研究显示出了一种什么样的特质呢?

\* 严格地说,橘朴的记者生活是从 1905 年札幌的《北海时报》开始的。次年,橘朴去了中国,其实,橘朴去中国的动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有,在他的前半生中,1918 年 9 月,作为随军记者,橘朴随日本兵来到西伯利亚,从赤塔回归的途中,在达乌利亚因脑溢血倒下,一时被死亡所笼罩,以后,身上多少留下了一点后遗症。考察这些事迹,不用说,是寻觅其思想的形成和行动的足迹时极为重要的课题。为了不脱离本稿的中心主题,事情经过的叙述就限于此,不想再过多地深入。参见山

本秀夫著：《橘朴》、中西胜彦著：《橘朴的思想形成——从渡航的动机来看》（大阪市立大学《法学杂志》第22卷第1号）。

《月刊支那研究》第一卷第一号的卷头首篇，当然是橘朴亲自撰写的所谓创刊宣言，这一论说题名为《认识支那的道路》。

在发刊词中，橘朴首先严厉地批判了历来的所谓“支那通”。这些“支那通”们的研究，其实只是将片断的知识拼凑在一起而已，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便到处散播各种各样的预言。针对这种现状，橘朴提倡要用“全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这个“全新的方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科学方法”，即，“依据人种学、心理学这些方法来研究支那人”，还有就是“遵循各种社会科学所指示的方法来研究支那社会”。可以说，在这篇发刊词上，橘朴展示了他与以往的那种只顾搜集情报的“消息通”诀别，开始搜集、取舍与各种社会现象相关的材料，带着明显的利用新方法的意思，用社会科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展开对中国的研究的决心。

橘朴研究的具体内容准备在下文慢慢叙述，这里还想提出一个问题来，这就是橘朴在发刊词中提出来的东西，不只是停留在新方法的提倡上。换言之，他在这里提倡新方法的动机，并不是单纯地来自欲将中国研究更加科学化这一点上。在某种意义上，其动机应该在于引导作为日本人怎样才能找到真正“认识支那的道路”这一点上。他说：“日本不仅在自然地理的位置关系上……与支那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在日本的领土以及租界地内，拥抱着支那民族的一大社会”，因此，“无论是对公还是对私，谅解支那人，是我们理所应当肩负的责任”。从这一观点来看，“日本人一般对支那的知识是贫乏的”。其实，不仅仅是知识贫乏的问题，在橘朴看来，在日本人对支那的认识中，“更恶劣的是，其内容从基本上就几乎完全是错误的”。对于这种现象，他这样主张：

他们缺乏常识的最明显的实例，此处可举三条来看。

一、日本人一般在支那人面前，自吹自己是先进者，丝毫无反省

之意。

二、日本人以为支那是儒教国家，并钻进这一观点的死胡同里，不能自拔。

三、与上述的错误认识一看相互矛盾，日本人心目中的支那人是一个几乎没有道德情操的民族。

从以上这些斩钉截铁般的言辞中，我们似乎马上就能感觉到橘朴自己非凡的自信以及他将要在日本与中国之间构筑的立场。

前面已经提到过，对中国，他从“理智的兴趣”，“一味地向社会现象倾斜过去”的民国五年（1916）起，到《月刊支那研究》创刊为止，大体经过了七八年。在发刊词中的那些鲜明的言辞背后，充满着这七八年间他对中国社会研究的深厚的积累。我们想稍微触及一下他这一时期的中国研究，来试着探讨一些其中所包含着的问题。

民国五年秋，橘朴立志要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以后，首先专心的是“调查行政、特别是税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同时又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月刊支那研究》第1卷第1号，《时评数则》第161页）。关于前者，次年的四月（1917年、大正六年），他主笔的《支那研究资料》就创刊了。至于后者，他以晚清的政治小说《官场现形记》为中心，对中国的官僚社会、村落以及家族组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成了《月刊支那研究》各期的重要篇目。

橘朴最初创刊的杂志《支那研究资料》（主编是田原天南），事实上这一杂志名称几乎是名不副实的。它的内容仅仅限于“支那的制度事物”、“从政治法制到理财产业”，重在用实证性的方法究明其实态。即，“一、网罗精选与支那相关的准确知识，将之译成日文，集成每月约300页的小册子，希望它成为认认真真的支那研究者书架上所不可缺的资料。”“二、体裁不拘泥杂志的形式……只要是法令公文乃至报告论文日记等，他日必将成为研究资料者，确实、无遗漏地加以收录。”“三、取材以支那官署调查编制的各项文书为主，此对日本人而言是最难获得且最难解释

者。另外，亦以其他列国官私的报告以及敝处人员之研究补其缺。”（《支那研究资料编辑主旨》第1卷第1号）在这一宗旨下，占了这部杂志主要篇幅的是《民国行政纪要》，即民国政府从民国五年年底以后开始在政府公报中连载的《民国行政统计汇报》的翻译和注解。

根据山本秀夫的考证，《民国行政纪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作为“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报告、由织田万完成的《清国行政法》在民国时代的继续。（山本秀夫著：《橘朴》，第36—39页。从而，与《清国行政法》的情况相同，同后藤新平的关系可以推测得出来。）实际上，《支那研究资料》的内容，涉及民国以来财政、交通、司法、教育、农商的各个方面，介绍其沿革与现状，极其详细。与政府公布的各种法令、公文的翻译相结合，《支那研究资料》确实是一部在掌握了准确知识基础上对民国的制度与实态进行追究的一部研究资料，也可以说，这是一部通过庞大的资料介绍来透视当时中国国家机构的研究著作。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橘朴的研究，其最根本的动机，不在阐明现实的中国政治制度本身这一点上，而是要将“支那的传统政治”，即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从根柢上将此政治彻底摧毁”，因为这“才是改造支那的根本要件”。民国的统治机构，在橘朴看来，是“改造支那”的根本对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橘朴在默默地从事翻译《民国行政统计汇报》这一看上去枯燥无味的工作时，对这一统治机构是从哪一点上来进行透视的呢？还有，正好在这个时期，他流露出了“触摸到了支那这个伟大的生物体”的感觉时，感受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的秘密了呢？

1913年（大正二年），橘朴从大连移居到了刚诞生不久的中华民国的首都北京时，最初引起他极大的兴趣的实际上是民间道教这一题目。这一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与中野江汉一起，给民间信仰的道教定名为“通俗道教”。对这一“通俗道教”，橘朴呈现了异常的兴趣。橘朴的道教研究，不是对道教进行哲学式的研究，也不是对道士们的礼仪、秘密仪

式的研究,而是名副其实的对民间流行的道教信仰以及民间的道教式的行为、思想的实态的研究。可以说,他对于道教的教义,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是对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深刻地影响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这一民众信仰本身的性质与实态抱有极大的关心。(这一研究,后来以橘朴著、中野江汉编《道教与神话传说——中国的民间信仰》的形式出版了。改造社昭和二十三年版。)另外,在橘朴写作活动高峰的20年代前半期,先于《月刊支那研究》的创刊撰写的有《支那民族的政治思想》、《支那民族的宗教思想》和《支那民族的道德思想》三篇。(《满蒙》第五年第42、43、44册,大正十三年1、2、3月。后收载于《支那思想研究》。)这可以说是关于中国民众的思考方法的一个基本考察。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容易地看出,从这里展开来的世界,很明显,是橘朴的中国“民众世界”,或者是一心追究现实中支配着民众生活的思想、意识、行动的橘朴的身影。而为他的《统计汇报》、《法令》的解读润色的不正是来自这一“民众世界”的视线吗?还有,橘朴对军阀政治统治下的中国统治机构的透视,不是从别的方面,而正是从“民众世界”这一立场出发的。“日本人以为支那是儒教国家,并钻进这一观点的死胡同里,不能自拔”,“日本人心目中的支那人是一个几乎没有道德情操的民族”,橘朴的断言,大概可以属于来自这个“世界”的控诉。一旦深入到了中国的“民众世界”以后,在这里,这个民族的“政治思想”、“宗教思想”、“道德思想”世界便以其固有的性格展开了,构成这一社会的村落、家族组织这一些细胞也就从传统政治的内侧形象鲜明地呈现了出来。

橘朴对通俗道教的研究,还有对中国的古典——《中庸》、《墨子》的考察,对官僚社会的分析,包含着极具特色的内容。尤其是在作为民间信仰的道教这个领域,橘朴、中野的研究,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但是,橘朴的独特的观点,似乎又不是那种对研究对象作出独创性解释的问题。他的“支那研究”,从整体上讲,并不具备那种严密的考证和致密的理论,毋宁说,他的独特见解只来自他自己的眼睛。我在这里,面对橘朴

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想马上就对其作结论性的总结,而是想从他研究的独特性出发,来阐发一些意见。

橘朴“支那思想”研究的最初的成果,首先是对儒教与道教的对比研究。按橘朴的说法,将“支那”视为“儒教国家,并钻进这一观点的死胡同里,不能自拔”,是因为“日本人没有常识”。

日本人轻率地过高评价儒教,甚至还有人梦想凭一卷《论语》即可融和日支民族的思想,如此愚蠢的见识,真是天下无双。(《支那民族的政治思想》,收载于《支那思想研究》,日本评论社昭和十一年版,第3页)

老一辈的日本汉学者们,肤浅地观察支那历史,主张儒教的繁荣是与支那民族性相契合的。但繁荣于支那社会的绝不是儒教,而是道教。(同上,第12页)

一言以蔽之,儒教是立足于统治者的利益之上组成的教义,而道教则与之相反,代表了被统治者的思想与感情。从而,若要说两大教义中何者更多地反映了支那民众整体的思想、感情,无须赘言,那就是道教。(同上,第3页)

这里,我们马上就可以觉察得到的是,橘朴的立论基础,不是“汉学者”们的所谓“支那民族性”,而是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种一般原理、普遍原理为基轴的。道教“代表了被统治者的思想、感情”。所以,更多地代表“支那民族整体的思想、感情”的,不是别的,正是道教。原本,中国存在着儒教与道教这两大思潮,其中,儒教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一般民众之间,则受道教的影响更深,在一定程度上,这属于常识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橘朴的揭示并不是什么新奇的见解。但是,橘朴的特色却在于首先从被统治者、弱者的眼中来看待事物这一世界观上。例如,他在政治面上,从所谓的“天命说”中来探求儒教的教义,并将之作为汉代以后中央集权的绝对专制政治的理论根据。在这一前提下,对与

儒家彻底对立的老子，橘朴又是怎样看待的呢？橘朴说：

老子对神，即上天或上帝的存在是断然否定的。

如不首先打破天命说，那么，要把被统治阶级从统治阶级的无慈悲的牢笼中解救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天命说的最大根据是一神论的信仰，所以如果不击破有神论，则无法置天命说于死地，老子大概是这样考虑的吧。……老子对政治组织及统治阶级的罪恶的尖锐批判，其感情自然地影响了他的哲学思索，他的理智与感情两相配合，终于结成了无神论的新思想。这一点，只要是读过一遍《老子》的人，都是容易首肯的。

然后，橘朴又说：

对于与政治有关的两教的争执，不用说，我们是站在老子一边的。（同上，第4—6页）

橘朴对中国古典的研究方法，从一切的经学束缚中摆脱了出来，是非常理性的。他的考察，趋向于对“支那民族的政治、道德、宗教、思想”的全面把握。对莱格、查伊尔斯等欧洲人的有关研究也自在自如地吸收了进来，将自己从“民众世界”中得来的极具个性的目光投射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上去。橘朴在将孔子以后的儒家定义成已经转化为“拥护绝对专制主义的道具”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道：民众“无意识地诅咒政治，在实际生活中离为政者越来越远的同时，在其精神生活上，则求救于道教”（同上，第12页）。在橘朴看来，老子其人的思想是无神论，但老子否定神的动机在于“对统治阶级独占神的反感以及不满于神只是一个恐怖的对象”，因此，老子“高唱无神论，想依此来解放民众，使之摆脱这一痛苦的宗教——政治束缚”（同上，第23页）。但是，对于民众来说，老子主张的“虚无”这一形而上学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是极其难以把握的，因此，在民间，人们就用玉皇大帝来取代了上帝的至高宝座，同时又将其他的各种神仙作为玉皇大帝的化身来加以崇拜了。

橘朴的这种理解是否得当,这里不将它作为问题来讨论。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橘朴继续从事有关道教的研究,留下了更加致密的道教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离开橘朴个人的研究史,这里更重要的是他的思维方法,即,关于道教的教义也好,关于道教的存在形态也好,首先从民众的生活这一点上来提起问题的这种认识论。作为救苦救难的民众宗教的道教,当然,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繁多的神仙,简单地说,这是幼稚,这是迷信,在这种信仰中反而增加了民众的不幸,这种事情并不少见。但是,橘朴却说:

我们不能说,凡是迷信都来源于无意义或无理由。(同上,第 27 页)

然后,又说:

今天的统治阶级只要没被击破,那么,政治与民众生活之间的鸿沟就不会消失。只要这条鸿沟没有消失,非政治的道教思想就绝不会在民间衰退。(同上,第 14 页)

他的目光,很明显是从道教教义贯穿到了民间生活,然后更进一步贯穿到了政治。作为民间信仰的通俗道教,几乎与世界各地的民间信仰一样,产生于政治与民众之间,带有一种救世观念,这可能是谁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想得到的事。但是,在橘朴的场合下,却是将民众的生活形态与社会的存在形态以及宗教与政治间的错综关系,用更深一层的目光来加以捕捉。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橘朴以下的一些观点。

在橘朴的观点中,不错,老子否定了以天命观为基础的儒教绝对专制主义,他的理想,众所周知,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社会。但是,这就能说明老子与儒家对立从而就否定了一切的政治了吗?

很多人将老子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只要读一下《老子》本身,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的。

将无政府主义浅薄地从形式上解释成所谓的否认政治乃至政



府的人暂且不说,即使是否定一切“人对人的支配”的人,也很明显进入不了老子理想的小社会中去。还不单是这样,如果承认了老子的小社会中当时已经出现了父权制的大家族这一现象的话,那么,老子就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模范的专制主义者了。(同上,第9—10页)

橘朴把小社会内部的统治势力或统治制度看作是大家族主义。所谓大家族主义,那必定是由家长支配的长老政治。他对小社会内部的政治,其实也是以敏锐的目光来观察的。如果从这一点来透视的话,尽管儒道二教之间有对立,有抗争,但老子也不愧为是一位专制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橘朴没有任何的成见,而是用极其真实的目光来认识、分析中国社会以及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芸芸众生的。这样,从这儿开始,课题就不单是这个民族的宗教思想、政治思想这个层次上的问题了,而产生这一政治或信仰的更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实体,即中国的社会组织、村落构造、家族宗族形态这一课题作为一个重要的关键问题便逐渐地呈现了出来。占了《月刊支那研究》重要部分的他的诸多的论说,首先就是以“支那的社会组织”、“政治构造”为焦点展开的。

我们在探讨了橘朴在“民众世界”中显露出的真实的目的的基础上,接着再来极其简单地看一下他的社会分析。

橘朴在探求“保证”中国社会“安宁”的要因时,找到了以下的四种力量,即,“其第一是帮会,第二是家族制度,第三是面子意识,第四就是道教的劝善惩恶的教理”《通俗道教的经典》(上),太上感应篇解说,《月刊支那研究》第1卷第5号,第103页。后收载于《支那思想研究》第52页)。后两者,是决定了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人们的生存方式以及相互联合的精神、道德要因。与后两者相比,前两者则是产生这种意识或反过来支撑这种意识的社会构成的基层组织。在橘朴看来,作为存在于中国这个整体社会中的部分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就是家族及宗教结社,还有就是帮会。一方面,家族因血缘而结成,继而发展成宗族,一个或几个

宗族结合起来,屡屡形成村落自治体。另外一方面,在这个社会中,还有一个强固的纽带存在着,这种是被称为会馆、公所、商会的这些由同乡或同行业组成的团体——即最广泛意义上的帮会。这前后两者,才是形成当时中国社会实际内容的真正的基层组织。

众所周知,作为巨大的专制国家的中国历代王朝,以文武官僚群来统治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官僚组织的神经末梢,到了知县衙门便停了,……再往下伸张已经不可能”。这里,“潜藏着官僚政治与民众生活相隔离的支那特有的政治现象的契机”,在这样的政治势态中,地方的治安就委任给了村落自治团体。一方面,民众在以家族、宗族为支柱的村落自治体的管理下实行自治,另一方面,又通过自治体,对来自官僚的压迫,团结自卫,进行斗争。会馆、公所、商会等同乡或同行业的团体,只能将其看成是这种自治组织向城市的延伸。简言之,形成中国社会实体的就是这两类组织以及耸立在这两类组织之上的朝廷和官僚阶级,后者对前者进行政治、社会压迫,进行经济性榨取。以《官场现形记》为素材,对作为榨取者的官僚阶级,他的分析是极其透彻的。据橘朴所说,中世、近世以来的这种政治、社会组织,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也丝毫没有改变。若要说什么变化,那不过是在皇帝下台以后,以往一直主要由文官来担负的官僚政治,今天变成了由更加露骨的武人——军阀来担当而已。在这种形势下,橘朴的头脑中浮现出了这样一幅构图,这个构图的场面就是作为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家族、宗族——村落自治体以及帮会与位于他们上层的官僚政治之间的权力争夺剧。但是,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只有打破这种“支那的传统政治”,才是“支那改造的根本要件”,如果这一方向不错的话,那么,这条道路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考察了橘朴对传统社会从意识、实体两方面进行把握的方向以及归结,这里,不得不把目光转移到橘朴对中国现状的分析——这是“评论家”橘朴的本领——上来。

然而,在这之前,也是为了以后的行文,我们似乎有对橘朴具有个性

的“目光”稍稍加以探讨的必要,也就是说,是什么,促使橘朴形成了这样的“目光”呢?在前面,我屡屡提到了橘朴“来自民众世界的目光”,而且,还论及了他在儒、道二教的斗争中“当然站在老子的一边”的立场。支撑着他的这一观点、这一立场的支柱,到底是什么呢?

就像在某种程度上预想的那样,橘朴具有强烈的个性。(他在中学时代,屡屡掀起豪杰式的骚动,受到退学、开除的处分。在熊本的第五高中中也只呆了一年便从那儿飞了出来。这也对他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家庭,离开了乡里,后来前往大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参见山本秀夫的《橘朴》)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不,倒不如说,他对个性自由发展这个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是极其有意识地进行着的,并将之作为自己思想的一个基轴而确立了起来。橘朴这种思维方法,在针对广泛的社会问题的漫笔中也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例如,在《京津日日新闻》时期,橘朴经常将女性问题作为话题进行评论,在这里,他呼吁日本的女性应该与家族主义进行斗争,“今日女子教育的方针以及制度”,是出于对“阻止她们思想的自然发展而制定的”,对之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接着又主张,“如果有独立的人格,则不会被他人随便支使”,“树立个人主义的辛苦确实是不容易忍受的,但从中又伴有一种爽快味”。这里,他承认了这种生存方式的基本价值观。(《写给年轻的女性》,1923年。《楠》1978年7月第12号)并且,他的这一主张,一转又发展成了民国以后中国女权运动与日本女性问题的比较,他向日本女性高呼:“你们这些现代女性,为什么不采取堂堂的态度,面向男人,主张你们应该享受的正当的社会以及个人权力呢?支那或被说成后进国,或被说成半开明国,由此而被你们轻视,你们这样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你们就拿不出与她们相当的态度来呢?”(《支那女性的气质》,1923年。《楠》1978年10月第13号)这种态度正是来自于他的“个人主义”思想,这一点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再有,他的思想,与中国1911年以后的新思潮、新运动产生的共鸣以及他与在专制权力的压抑下的

“民众世界”所产生同感，都是不难看到的。

如果用一种很有感染力的形象说法，橘朴似乎是以这种自我的“个人主义”为媒介，一步一步地进入中国的“民众世界”，然后从“民众世界”这个立场上来透视这个国家的政治构造和社会构造的。橘朴以前，在中国问题的认识、处理上，留下了重要足迹的好几位日本人，他们或是通过援助“支那革命”，或是在“救助支那民众”这种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大义名分”之下，投入了自我的活动。橘朴与他们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究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橘朴的“个人主义”思想。由于他的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他可以摆脱当时强烈影响着近代日本的所谓国家或民族的使命感，更加自由地考虑问题，对“自诩为先进国家的日本”，能够用更加自由的目光来进行批评。橘朴正是有意识地确立作为自己生存方式的“个人主义”，并在广义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中寻求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价值，寻找社会的进步的。

尽管如此，似乎仍然有必要同时注意橘朴这种思想的时代性，或者说时代给他的思想烙上的印痕这一微妙的问题。也就是这一时期，关于所谓的“王道”，橘朴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文章《日本的王道思想——三浦梅园的政治及经济学说》（《满蒙》，1925年5、6、7、9月。后收载于《支那思想史研究》）这是他围绕着“王道”这一主题发表的最初的论文。对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王道”，以及由来自于这一“王道”的江户时代中期儒家梅园的“王道思想”进行了论述。在这篇文章中，他到底想要主张些什么呢？橘朴通过对中国的“王道”理想的考察，从中找到了道德主义、地方分权主义、善政主义这三个要素。这是在古代中国的封建制度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政治理想。站在现代的立场上来看，当然也还包含着许多历史性制约与缺陷。“把人——民众——当作道具一样来对待，拒绝承认其人格，对王道思想而言，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时代，都是根本性的缺陷。”（《支那思想研究》第497页）还有，“按自然的样子对之进行放任，王道思想的道德使命就会变得反复无常，这是伴随着王道论的

一个根本缺陷。”(同上,第 513 页)但是,例如说对于地方分权主义,橘朴又似乎认定了它有一种超时代的价值。他说:

如果说王道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通过地方分权的行政组织来直接为民众图谋福利的话,那么,凭着所谓联省自治或者孙文考虑的县自治的实现,原理上王道精神就能复活。(同上,第 486 页)

不仅仅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央集权制盛行”,“列宁主义也主张中央集权”(同上,第 515 页),橘朴认为,时代的趋势是中央集权在“走下坡路”,“(在物质利益万能这一点上),对王道来说不啻为一大障碍的资本主义,亦将渡过其全盛期”。他说:“像一部分学者推定的那样,将来社会主义世界将代替资本主义,如果这一推断能够实现,则封建社会以来已经绝迹的政治上的道德主义将必定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复活过来。”因此,橘朴主张,“如从这一见地来看,不应将王道思想看作是仅存在于支那的古代,而应将它看作是——即使其内容上应作诸多修正——永久地指导地球上人类社会的原理。”(同上,第 519 页)对“王道思想”这个东西,橘朴也坦率地承认它只不过是两千年以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政治理想,“善政主义”,只不过是无视民众人格的“善意的专制主义”,缺乏法制主义的“道德主义”,也只不过是执政者的幌子。但是尽管如此,他为什么还是对王道主义这一“根本性的原理”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呢?在这里,或许就不得不寻找时代投在橘朴身上的影子了。在橘朴看来,给全世界带来沉重打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惨痛的经验,不得不使西洋人自身反省其“潜藏于文明深处的缺陷”。这种反省,导出了“文明……不仅仅只限于西方文明,……其他种类的文明与西方文明具有不同的价值”这一文明观。“此数十年来,举国倾倒于西方文明,忘却了东方固有文明”的我国也好,中国也好,印度也好,在这一点上,正在不断地被这一转机所迫近。(同上,第 473 页)这些可以说是支撑橘朴思想认识的磁场的微妙的变化。

文化的发达以及普及,就是鼓吹使每个人个性发达,同时追求自由。王道的善政主义,很明显,在文明世界里,是与上述的追求相违背的东西。(同上,第516页)

但是,东方固有的价值,在时代的趋势中再一次重展其翅时,“王道思想”也通过改观重新获得了光彩。在这里,橘朴没有放弃其“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式的思考方法,而是仍然在“个性的发达”、“追求自由”中,寻找其基本价值。就他个人而言,可以说,他的这种性格趋向,纵观其一生,丝毫都没有改变。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么,这里我们所能看到的仍然是一种磁场上的微妙变化。如果再附加上近代日本所走过的道路这一背景,那么,这就是与“大正民主主义”的那种华丽多彩的思潮以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战争休止期间”这一世界历史舞台剧情变化的一种背离。即使在橘朴本身,其所谓的东方固有的价值,也是以极具两面性的形式存在着的。

在这里,我们应该留意这样一个现象,这就是,橘朴对这些问题,只是从“王道理想”,即政治这一高度的价值面来接近它,这在他的“个人主义”与东方政治理想这一政治课题之间,似乎就难免出现某种背离。在时局的变化中,造成了“评论家”橘朴体内的政治膨胀化。

对于以上的课题,我们似乎过于深入了,为了展开下面的问题讨论,这里不得不先刹一下车,回到原来的主题上去,继续探讨主要问题。

#### 四 从“中国社会论”到“中国革命论”

从1916年以后到20年代初,正当橘朴将全部精力倾注于中国社会的“活体解剖”时,中国这个国家必须迎来的政治大变动的预兆开始呈现了出来。作为所谓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前史,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24年孙文进行了“国民党改组”。然后,不久,中国便迎来了北伐——国民革命这一巨大的浪潮。这

等于使橘朴不断进行分析的以几千年历史为背景的静态社会，一转其势，瞬间显示了它的动态。

构成中国革命的诸因素，到了这个时期，到底呈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对于这种变化，橘朴又是怎样来认识、理解的呢？

橘朴几乎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这一历程的时代同行者，作为同行者，他稳健地跟着这一时代的步伐向前迈进。他的前进，几乎与前述的所谓经院式研究是并行的。我们先简略地考察一下他这一时期的足迹。

将橘朴放在历史中来看，他对中国的认识、把握，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这意味着他摆脱了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蔑视认识观，也摆脱了当时以欧美为主体的国际舆论的偏见，得到了自由的思考。他从以学生、青年知识层为中心的“自我觉醒”来寻找“新文化运动”的动因，又将激发“五四运动”的动力归结为“爱国心”和“民族意识的弘扬”。

这些论点，到了今天都已经属于常识了，但从当时各种各样的论调来看，在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上，仍不失为出类拔萃的见解。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之际，仅仅因为他们提出了“排日”的口号，日本社会的舆论就为此而大动肝火。对于以杂志《新青年》为始点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从历史意义这一角度来加以认识、分析的人，也是极其有限的。对于以“民主”、“科学”而标榜的“支那新人新思潮”，能够充分预测到其历史进程的，到底又有几个人呢？其中，橘朴，虽尚有一些保留，但他却对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现实的变动以及这一变动中所包孕着的历史大趋势进行了很有见地的预测。橘朴之所以能站到这一视角上来，仍然得归功于他自己的中国研究的出发点以及他独特的方法。这里想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为了批判内藤湖南的《新支那论》而写的《支那会怎样》一文中，他将自己的立场告诉了世人。（《支那会怎样——读内藤虎次郎氏的〈新支那论〉》，《月刊支那研究》1925年2月第1卷第3号。后收载于《支那思想

研究》)在这篇论说中,对中国史研究大家内藤湖南的分析,在好些方面表示了赞同之意,也确认了他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内藤湖南一致的地方。但是,橘朴对湖南的《新支那论》过于强调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的独特的性格这一观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湖南关于政治与民众之间巨大的鸿沟这一问题,即,“政客阶级这一特殊阶级产生并垄断政治,其他的人对此则不感兴趣这一支那特有的现象”,认为这是因为“毕竟,此民族之政治年龄已经过于衰老”。对于湖南的这一认识,橘朴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认为这是“过于年轻”的原因。

不能说支那产生的政治现象就是支那特有的东西。至少至18世纪中叶,欧洲所施行的政治,就其本质而言,与支那是完全一样的。西方的民主主义也是进化的产物,支那的政治也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凝固而停滞不前。我们的想法与内藤氏正好相反,支那的政治与欧洲相比,其进化的程度迟了一个世纪或一个半世纪,换言之,支那的政治不是过老,毋宁说是过于年轻。(《支那思想研究》,第358页)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橘朴的认识方法具有极其理性的一面。在以趣味为本位的“支那事情”介绍或“支那通”盛行的时期,他对中国社会的实情采取了尽可能用总结性、规律性的方法来认识的态度。同时,他对中国社会独特的性格,绝不将它局限在特殊性中,而是将之放到更广阔的世界中进行比较,竭力将中国社会置于普遍性中去。因此,不是将中国社会放在“凝固”、“停滞”中看,而是看到了它的“历史进化”。

在《新支那论》中,湖南从前面提到过的认识中,得出了以下这样的不同的结论,即,“其结局,支那若不惧政客吹毛求疵之议论,共同管理也好,其他任何的统治方法也好,只要其乡团自治不破,支那整体之安全则无可破之理”。提倡对中国实行国际性共同管理,是这一时期欧美的新闻界屡屡登场的论调之一,这一论断的前提就是中国人“自治能力阙如与道德沦丧”这一偏见。不用说,这一主张的背后充斥着的毋宁说是先



进列强们对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贪欲——政治性压抑、经济性榨取的期待。然而，在橘朴看来，中国混乱的政治，虽一向呈现了令人绝望的样子，但是，今天，这个国家却正处于从清末以来累积数十年的巨大社会变革——“历史进化”之中。“道德沦丧”，单是指原来的统治阶级所显示出来的末世现象之一，而“支那民族”，毋宁说在其本来的社会组织中，反而具有优秀的自治能力。从而，在橘朴看来，这一变革过程，正意味着迄今为止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阶级”与他自己定义的“中产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橘朴说：

（内藤氏主张的）政客与乡团自治组织的对抗，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阶级与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的中产阶级之间所进行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阶级斗争。

而且，

这一阶级斗争成了我的整个支那观的骨骼。（同上，第388页）

橘朴在“文学运动”向“五四运动”的发展中，几乎是准确地把握住了“自我觉醒”、“民族意识的弘扬”这一浪潮。虽这么说，但从整个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这一时期的浪潮也还只不过是这个国家政治、社会变革的序幕而已。以学生、青年知识层的斗争为契机的这场运动，给他的分析对象——中国社会的基本构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不，更加深刻一点应该这样问，是这一基本构造的哪些部分，因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才使这个国家的社会变革实现的呢？然后还有，作为他的“整个支那观的骨骼”的“阶级斗争”，具体地说，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展望的呢？这一课题的探讨，也意味着对橘朴对中国社会的静态分析是怎样随着中国的变革一举转变为动态分析的这一转折点的探索。在这里，我们要的不再是橘朴描绘的传统中国社会的示意图，而是有必要站到橘朴描绘的中国革命的示意图前面来了。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谈到过橘朴的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社会的基

层组织,也就是构成这个社会的真实的结合体是村落自治体以及最广义上的帮会。这种村落自治体以及广义上的帮会,是在中国历代王朝统治下的残暴的政治形态下,尤其是在宋代以后的官僚政治中,形成的强固的民众自卫组织。另外一方面,垄断了政治的官僚阶级,为了保持自己既得的特权、地位,也通过与家族宗族的联合,形成了应该被称为乡绅阶级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里,存在着独占权力、专事经济榨取的官僚阶级和与之对立的几乎与政治完全隔离、在村落或帮会的组织中营生的民众这两大集团。这里,橘朴从官僚阶级中,找出了作为社会实体的所谓“乡绅阶级”。另一方面,将与之对抗的广泛的民众(农民、商人及其他)定名为“中产阶级”。从清末至民国的长期的社会动乱,在橘朴看来,这是一个在旧中国慢慢解体和列强诸国的侵略下,社会构造的变革变得不可避免时的中国官僚阶级与中产阶级为生存而展开的阶级斗争的过程。

在橘朴的这种分析中,好像很容易就能发现一个问题,对历史的宏观把握这一点姑且不论,其阶级分析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含糊之处,这似乎是不可否认的。尤其是“中产阶级”这一范畴,将之视为与官僚——乡绅阶级相对抗的被统治阶级这一点,有着非常欠缺的一面。在这以后,到了20年代中期,橘朴又非常快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在激烈的形势变化的触发下,向更加详细的分析,即向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详细的分析跨出了一步。但是,橘朴这一时期对现实的展望,其最显著的特色,可以说是想把自己创立的中国社会认识的构图以极其激进的形式加以贯彻。即在这个构图的前提下,20世纪中国的未来,首先就是中产阶级的自治组织——村落共同体以及公所、会馆、商会等帮会组织通过自己的手来施行政治。换句话说,就是政治上被压抑的中产阶级,为了自卫,打倒腐败、混乱至极的官僚阶级,代之而起,创造新型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在中国固有的或者说乡土的自治组织的延续上,找到了克服中国政治与民众分离这一积弊,从而通过民众自

己的手来施行政治的近代国家的形成道路。这是从他的“整个支那观的骨骼”中产生出来的展望,同时也是他的中国认识的最忠实的应用。事实上,20年代的中国也正像橘朴所期待的那样,社会的基层组织正在由静态向动态开始为自己的生存而独自地行动了起来。

橘朴的展望,也与这种动向相呼应,被不断地增强,不断地发展。现简略引用一段原文来看一下。

重要的是,这数年来,虽然还只是萌芽,但中产阶级中间对民族政治的兴趣以惊人之势抬起头来了。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不将民族政治从官僚手中夺过来由自己掌管,那么,他们的安宁与幸福则绝对得不到保障。……对他们的实际生活而言,迄今为止,所必要的组织只不过是帮会或小规模联合体,阶级意识觉醒以后的他们,毕竟是不会满足的。这里,他们从不同职业间的联合走向不同产业间的联合,从地方性的联合走向全国性的联合,而且今后定会从商工业小资产阶级的联合走向包括农业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产者所有阶级的联合。(《不同阶级的支那人气质考察附:〈官僚政治与中产阶级政治〉》,《月刊支那研究》1925年6月第2卷第1号。后收载于《支那思想研究》,第280—281页)

成为[民族国家]建设事业基础的是支那民族的单位社会,家族、村落自治体及商工业帮会。……广东省的保卫团联合,是属于帮会的商团和村落自治体组织,即所谓乡团联合而成的。之所以能形成遍及全省的庞大的联合体,主要是依靠了商工业帮会的母团体商会的力量。我非常重视广东省这一例,因为这是他日支那民族自己建设民族国家过程的雏形。(同上,第285页)

20年代的中国,终于逐渐地从地下开始了震动。就像橘朴所举的例子那样,福建、广东、厦门、上海等地,各个阶层的具有不同方向性的行动都相应开始了。既有以大都市商会为中心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动,

也有农村农民自卫团的行动。尤其是广东,由于孙文在那里建立了广州政府这一特殊的政治状况,新兴的政治天地被打开了。不仅仅是这样,就像橘朴自己根据具体事件得出来的结论那样,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这种帮会、乡团以外,一步一步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带着组织的特征,作为与原来性格相异的社会存在,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出现了。在这里,我们对当时复杂至极的政治状况以及包孕于其中的政治力学本身,似乎已经没有详细叙述的必要了。这里,重要的是,橘朴从家族、村落自治体以及商工业帮会中来寻求中国的国家建设事业的基础单位,想从这些单位社会的联合中看到国家建设过程中的“雏形”这一对中国社会的把握和认识。当然,这一把握未必就是经过整理而得出来的,另外,在方法上、理论上可能还留下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但是,尽管如此,这里,橘朴的中国认识的特色仍然难以否定地表现了出来。

第一,他彻底贯彻了自己的“整个支那观的骨骼”。在分析了旧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并且与内藤湖南的“只要其乡团自治不破”,则以“共同管理”为首的“其他任何统治方法”都难以确保“支那之安全”这一说法相反,橘朴在“中产阶级”起来打倒“官僚——乡绅阶级”这一点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这确实可以说是橘朴的看法,这一看法是从“民众世界”的目光中得出来的。还有,橘朴要求各国在与中国的接触过程中,不管从什么意义上来看,所谓的“政客”阶级乃至军阀势力都是不可依靠的力量。“军阀统一支那是绝对不可能之事”,“外国绝不应该援助某一军阀”(《月刊支那研究》第1卷第1号,《时评数则》,第167页),在这些评论的背后,有着他坚定的信念。如果附加说明日本政府的政策的话,辛亥革命以后,例如,“寺内借款”等做法,实际上是想通过利用向军阀贷款来介入中国的政治。橘朴的这些评论,也可以说是对日本政府援助军阀政策的猛烈批判。

第二,橘朴对中国未来的展望,始终从这个国家内发的动力中来追求。家族、村落自治体以及商工业帮会的力量,即使其复杂多样,并且一

向光怪陆离,然而,无论怎么说,它们都是来自于这个社会内部,来自于民众自卫的能量,其中孕育着形成新组织的内发性变动。反过来可以这样说,橘朴对中国社会的这种认识越是深刻,就越是拒绝接受那些单纯来自历史的类推、习惯性的解释或者既成的理论。再稍稍改变一下视角来看,也可以将之视为橘朴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向孙文或孙文主义靠近。我们在考察橘朴对中国未来的展望时,很容易想起孙文三民主义中有名的“从宗族到国族”的主张,孙文希望在中国社会“宗族”结合的强固基础上,将“宗族”发展成为“国族”的团结,通过这种团结来打开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道路。橘朴从“庞杂但需要高度技术的拼木工艺中”寻找着孙文主义——即使尚缺乏相当的理论性统一——的“自由主义的优点”(《支那妇女的环境及问题》,1929年。《支那社会研究》,第586页),即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动中来展望中国的未来。其实,这也是橘朴一贯的态度。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中国各地各阶层的活动,在20年代前半期,仍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并且不断呈现出令人生畏的态势。对橘朴也好,对孙文也好,对所有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人们来说,想明确地把握住这一股蠢蠢欲动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股力量一发而不可收地迸发出来,戏剧性地改变了革命构图的就是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的北伐过程。可以说,橘朴对于眼前所展开来的这一过程,肯定每时每刻都在屏住呼吸凝视着。非常明确,这是验证橘朴对中国未来的构图的一个现场,也是橘朴必须作出某种归结的历史现象。

橘朴的一个重要转机来临了。

## 五 对“国民革命”动态的分析——其高涨与结论

1926年7月,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始,势如破竹地向北进发。随着北伐军的北上,华南各地的农民运动也风起云涌。北伐军在同年年底,即抵达了长江沿岸。1927年3月,上海实行了总罢

工,赶走了军阀,以工人阶级为中心成立了政权。但是,众所周知,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共政变”,北伐的方向急变。7月,国共分裂,武汉的国民党容共左派政权崩溃。简要地说,这一年,是这个国家以明确的姿态登场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在极其复杂的势力配置下,以国共两党为基轴展开生死斗争的一年。

橘朴注视着这一激烈变动的过程,时时刻刻地在分析着这场革命,在这一旋涡中,蒋介石政权确立了。在这一历史状况下,橘朴对眼前所发生的这场斗争进行了总括性的研究。收录在《中国革命史论》中的诸论文,真实地记录了他在这一时期对问题探求的实况,篇数多达20余篇。特别是对上海总罢工、湖南农民运动、“四一二政变”等1927年上半年发生的事件,橘朴宛如一位随军记者,进行了跟踪报道。《国民党与武汉工人》(《满铁调查报告》,1926年12月),《上海总罢工及其意义》(《满铁调查报告》,1927年2、3、4月),《上海总工会与蒋介石》(《满铁调查报告》,1927年5月),《武汉政府治下的农民运动》(《满铁调查报告》,1927年6月),《上海无产阶级的争夺战》(《满铁调查报告》,1927年10月),等等。橘朴作为一个观察者,将全部热情都倾注到了追究中国社会的前途这一课题上。

那么,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国民革命”运动,围绕着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的指导等问题极度错综复杂,成了非常微妙的政治课题。我们在这里想不直接接触这一课题本身,只想根据橘朴个人的观察来探讨他对这场暴风骤雨般的运动的认识与把握。

政治过程中有着众多的曲折,对这一个个曲折的过程的观察,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橘朴也不例外。对橘朴这一时期的态度,如果要下决心作一个总结评价的话,那么,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这一“革命”之际,橘朴大致上与武汉的容共国民党左派政权产生了最深的同感。在北伐军怒涛般的进攻中,他深深地体会到了农民运动这一巨大的力量,同时,又看出了农民层的阶级分化——自耕农与佃农,或者说

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与农村无产阶级之间的巨大差异。橘朴对农村各阶级分析的深化,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还有,他通过对上海总罢工的观察,对城市工人阶级的实力和形态,在经验上也有了重要的积蓄。在《上海总罢工及其意义》一文中,对“内外之人”仅是表示惊讶而“不知其内容及目的,也不想知其内容及目的”的冷漠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支那社会研究》,第317页),自己在尽可能收集得到的情报的基础上,对其实态进行了极其详细的分析。

简言之,橘朴没有将“北伐军的胜利”单纯地视作“军事上的成功”,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中显示出了“民众的力量”。(《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军阀势力》,《满蒙》,1927年10月。《中国革命史论》,第146页)这场革命,不是别的,正是橘朴多年来关于中国前途摸索的一个现实化过程。

回顾橘朴,他看问题的一切的出发点以及他知识性追索的关键问题,可以说在下面的一句话中表现了出来。“支那的民众与国家,比这二者的结合更困难的问题果真还有吗?”(《支那人的利己心与国家观念》,《支那研究论丛》,1927年4月。《支那思想研究》,第297页)将这一课题置于眼前,他想从民众自卫组织的积极发展——“武装自卫”中来找出解决这一难题的方策。(《支那会怎么样》,《支那思想研究》,第382页)很明显,这就是意味着要给予这些组织“武力与政治理想”。(《支那的舆论》,《支那思想研究》,第422页)毋庸置疑,橘朴在这种变动的顶点上,发现了20年代的孙文及孙文主义。

自1924年至1926年,广东省内建立了充满生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权,省内的军阀如霜见朝日一样,在这一新政权面前消失了。这个时代,消灭军阀的力量,第一是遵循孙文的意识,在加伦将军的援助下由蒋介石氏编制的新军队,第二是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及农民大众。工人及农民的贡献,比其对革命政府的军事行动给予的有力支援更重要的,毋宁说是给了在都市以及农村有着根深蒂固的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组织,即士绅及地主的传统势力——此为

军阀社会的基础构造——以沉重的打击。（《中国军阀战争的展望》，1929年12月。《满蒙》第10卷第12号。《中国革命史论》，第398—399页）

北伐以这两种力量为基础展开，橘朴也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对整个运动过程进行了展望。

但是，还不到一年半，北伐的性质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该担负打碎军阀社会基础构造的工农大众的组织被破坏，与资产阶级结合的蒋介石政权的盟主地位确立。那么，这一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又在哪儿呢？橘朴对此作了综合性阐述：

1926年7月，蒋氏率领国民革命军踏上北伐的道路以后，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势不两立的左右二翼分裂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权的不幸不仅限于此，而且还呈现了左翼的武汉政府自身依存于湖南军阀的武力这一奇观。当然，左翼国民党及其同盟者共产党的干部，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矛盾，他们以为通过努力能排除军队中的军阀性，但是，这一预想完全被背叛了。1927年夏天至秋天，武汉政府与湖南军阀一起没落了。左翼国民党的这一失败，说明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势力，尚未成熟到足以战胜军阀、士绅及地主这些前资本主义的专制主义势力的程度。

从1924年至1927年存续的小资产阶级政权，在实行他们终结军阀战争这一最大使命时，前半期成功了，后半期失败了。前半期的成功，归功于两点，第一，军阀的规模尚小且处于分裂状态；第二，得力于被组织起来的农民及工人与精锐的革命军之间毫无隔阂的合作。后半期的失败，也有两大原因，第一，国民党的指导者们在革命的过程中，过于相信军事行动的效果，没有对工农运动倾注充分的努力；第二，不仅是他们的基本部队即蒋介石麾下的北伐军因右倾最终变为资本家的武力，就是对其新编入的部队即唐生智的湖南



军,武汉政府虽拼命地作了努力,但最终也没有能够涤除其军阀性。  
(《中国军阀战争的展望》,《中国革命史论》,第399—400页)

大概可以说,橘朴对晚年的孙文及孙文主义的推行,是抱着极大的亲近感的。从改组国民党前后开始,孙文全力倾注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化,这为橘朴的“打倒官僚——乡绅阶级”这一社会变革,在现实中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中产阶级”这一模糊不清的范畴,在现实的动态中,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权”这一形式,在政治上重新被认识。另外,橘朴所说的“村落自治体”中的“自卫组织”,在向地主阶级的“民团”与以贫农为主的“农民协会”分裂的过程中,他正确地认识到了后者的力量。也许在橘朴的眼里,正是在这样的路线中,中国才能找到未来,孙文主义的正确贯彻,才是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国走向统一的道路。因此,在革命的具体过程还在进行之中,橘朴想将革命的凝聚点集中到武汉的左派国民党政权上,这绝不能说他是错的。

但结果是“前资本主义的专制主义势力”仍然非常强大,还有,无产阶级的登场,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产生了斗争,蒋介石北伐军迅速右倾化,转变成资本家的武装,原因就在这里。这也是孙文主义路线戏剧般的挫折。

橘朴面对“国民大革命”中激烈的政治力学的变动,在得到了许多深刻教训的同时,对目前展开来的现实形势,提出了他独自的意见,其实这也是给他今后的前进道路带来了深刻影响的重要原因。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投映在他身上的这一深深的阴影。

第一,在中国的变革中,橘朴进一步认识到了武装暴力的正确意义。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橘朴看来,民众的“武装自卫”,是在军阀政治的高压下为对抗军阀势力而产生的最具内发性的行动。橘朴的眼睛,甚至连最底层的一贯极其迷信的农民团体的活动都没有放过。

河南的红枪会,因盖着迷信的面纱,外观上看上去是奇怪的团

体,然其实质却是由各农村为防御军队及土匪的掠夺、舍命集合起来的善良农民的严肃团体,亦即自然发生的农民运动。(橘朴引用罗绮园的观点。《支那的舆论》,《支那思想研究》,第417页)

对除了物理性的暴力以外,任何正统性的统治中都不应该有军阀政治,对之斗争,将之打倒,所能依靠的只能是民众的武力。反过来说,能给这样的民众“武力与政治理想”的政权,在推进中国社会变革这个意义上讲,均是值得肯定的。对与共产党合作而展开的北伐,橘朴绝不加以单纯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只要这一合作是站在打破军阀政治、打倒乡绅阶级这一大的立场上,毋宁说,橘朴是积极地大加肯定的。这样,北伐运动,在民众与武力的结合中,或者是说在“民众的军队”(孙文)打倒军阀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民众若要砸碎封建的桎梏,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这是从橘朴的“整个支那观的骨骼”中得出来的结论。同时又更加确认了他的“整个支那观”。

第二,在这条道路展开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的势力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这一社会变革主要得由他们来承担这一点,橘朴却没有加以预想。换句话说,关于共产党的理论和行动橘朴仍然采取批判性的态度。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中国如何被应用,这一点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身必须在以后长期的革命过程中解决的课题。在这里,将中国革命理解成一种什么性质的运动,其主要的担负者到底是什么阶级,以这个大问题为首,还有许多理论上、实践上的大问题都一个个横在前进的路口上。不,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指导也好,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也好,因伴随着运动的幼年时代而呈现的未成熟性依然很强,可以说反而显露出了许多混乱。但是,与这些理论上的高度相异,橘朴作为中国问题研究者,就共产党领导下的运动的实态,似乎在某一点上抱有重要的偏见。这是与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更具体地说,就是与“贫民层”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形象相关的问题。他对构成无产阶级的中国贫民,最终都没有对其将来寄予希望。

无产者中占最大多数的是贫民,最有势力的是匪徒。贫农中无任何组织,而匪徒中则有会党这样的大组织。但这种反社会性的势力,无法担当国家改造、解放的事业,这是无须多言的。(《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新天地》,1926年8、9月。《中国革命史论》,第59页)

中国社会中现实存在的无产者,只有“以匪徒为首的贫民与农村”。(同上,第64页)不错,北伐运动一方面使得农民运动的巨大能量爆发了出来,但是,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在橘朴看来,同时也是“以匪徒为首”的中国农村构造的显露的过程。“武汉政权势力圈中的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们,似乎将必须努力把无赖汉从这场运动中排斥出去这样的事全都忘了。”(《国民党的再分裂》,《满蒙》,1927年9月。《中国革命史论》,第139页)“对于支那社会运动中无赖汉的危险性”,必须有“深刻的审察”(同上,第140页)。在橘朴看来,构成北伐运动一翼的共产党,正站在这一势力之上开展着运动,“以农村无赖汉为主力的暴动,即共产党的所谓农民运动的行为,真是荒谬绝伦的胡作非为”(《北伐军内部的军阀势力》,《满蒙》,1927年10月。《中国革命史论》,第159页),并且将之视作武汉政权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然后,橘朴又说,“公平地来看支那的社会组织,狭义上都是贫民,……使他们参加革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只会成为实现革命的阻力。”(《南支暴动的理论及实际》,《满蒙》,1928年2月,《中国革命史论》,第248页)在橘朴的眼中,对中国革命的实态越是了解,这种问题就越容易理解。这里所含有的问题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讲,或许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课题。如何看待贫民,还有游民、无赖汉这些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众所周知,这是中国毛泽东路线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我们通过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看到另外一种看待贫民的态度,即贫民甚至流氓无产者,能够使它们转变成革命的主力军。但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在这个问题上,对橘朴进行这样

那样的指责,反而不适当。在毛泽东看来,贫农成为主力军的趋势也只是处在一个萌芽阶段而已。我们不妨可以说,橘朴对匪徒带有的危险性的大声警告,对共产党的农民式的暴动主义采取批评态度,限于当时的状况,在理论上、实践上,毋宁说是一个适当的结论。

他对“八一南昌起义”后共产党的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我相信,对于南岭山脉东部的彭湃氏、西部的毛泽东以及朱德氏指挥的农民暴动,共产国际的干部至少在理论上应对之加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退却》,《满蒙》,1928年9、11、12月。《中国革命史论》,第309页)

今天,共产党系统的暴动已经没有指望,换言之,已经成了无意义的反乱。然……暴动继续在举行,为此而牺牲的农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农村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他们依然……毫不在乎地决意让值得怜惜的支那农民继续举行这种无益而遗憾的游戏。(同上,第310页)

在上述对中国的展望中,橘朴选择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左翼国民党。这是对在北伐过程中共产党的运动——他们的方向性与努力作了一定的评价之后作出的选择。

然而,在这里,我们绝不能漏过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大地涌起的各种运动,给橘朴的认识带来了微妙的阴影或分裂。这一分裂,可以说是理论与心情的分裂。不错,在橘朴看来,中国的前途,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是找不到的,而应该到孙文主义的正统继承者左翼国民党那儿去找。但是,武汉政府倒台以后,在他眼里,左翼国民党的失败,对他的期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背叛。橘朴对现实中的行动不断地进行观察后,说:

尤其使我觉得不可思议并且感到失望的是,左派的指导者们,即使在给了他们活动的自由的年代里,也还是专心于政治及理论的

斗争，……而对他们的理论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工农及小市民却全然不理。我这样评价，绝非过言。（《左翼国民党的政治立场》，《满蒙》，1929年8月。《中国革命史论》，第326页）

又说：

扫除农村中的乡绅势力及其基础，这不单单是共产主义者的工作，只要是有志于支那之改造者，必然得摒弃此障碍物。关于这一点，孙文思想的正统继承者左翼国民党的理论家们，有着不小的错误。……以革命为己任的他们，高喊“打倒劣绅”这种不彻底的口号，这应该觉得惭愧。社会阶级为何物，若多少对这一问题有所了解，那么，应该会懂得，乡绅是革命途中的障碍物这不在于他们个性之“劣”。乡绅全体作为旧的统治阶级，是支那改造进程中最顽固的阻碍者，这一点，没有理由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退却》，《满蒙》，1928年9、10、11月。《中国革命史论》，第299—300页。——但是，关于“劣绅”这一词语的解释，从当时的用法来看，橘朴有着若干的误解。）

从理论上讲也好，从运动的实践上讲也好，左翼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堕落成都市知识分子政党，全然不理睬中国的工农大众和小市民。橘朴进一步说：

与顶着巨大压力仍在冒死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的态度相比，左翼国民党的态度似乎总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绝不是左翼国民党的荣誉，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事。（《左翼国民党的政治立场》，《满蒙》，1929年8月。《中国革命史论》，第326页）

橘朴一方面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左翼国民党身上，一方面又对其现状感到十分不满。确实，共产党的行动，在一个时期内被橘朴非难成“无意义的叛乱”，被橘朴认为是“让值得怜惜的支那农民”继续从事的“无益的游戏”。但是，当橘朴看到共产党仍在继续冒死对凡是中国的变革者

都“必然得摒弃之障碍物”的“乡绅阶级”展开斗争时，橘朴反过来深深地被感动了。“民众世界”摆脱压抑、求得解放，尤其是围绕着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这一现实问题，橘朴的理论与心情，流露出了一种矛盾，即一方面在理论的妥当性上对左翼国民党抱着信念，另一方面，对共产党在现实运动中的斗争精神又有着微妙的共鸣。这正是国民大革命向橘朴提示的新的课题，同时又是国民大革命给他带来的困窘。

第三，“北伐”本身，经过了1927年、1928年，在橘朴看来，事实上使中国出现了更加残酷的现实。这一残酷的现实可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支那改造势力”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各自发展的道路被切断了。蒋介石政权在“四一二政变”以后，与资产阶级携手并继续发展到了向乡绅阶级妥协，彻底地右倾化了。一个新军阀——“蒋介石军阀”诞生了。橘朴在这一方面的分析具有敏锐的目光。但是，橘朴的目光越是敏锐，抑郁的心情就越是不断地向他袭来。他把蒋介石政权定义为“拿破仑式的军阀”，同时又将之定义成“袁世凯式的军阀”。他之所以对蒋介石政权下了如此的定义，是因为蒋介石以浙江财阀的援助为后台，就像被仇视为“宁波拿破仑”那样，建立起了军事独裁政权，同时，他的统治权力又完全立足于原来的政治，立足于原来的社会构造之上的缘故。

事实上，他是军阀首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同时，至少从去年8月（1928年8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著者注）以后，又成了地主阶级利益的拥护者。换言之，他是拿破仑式的军阀的同时，又是袁世凯式的军阀。（《支那军阀战争的展望》，《满蒙》，1929年12月。《中国革命史论》，第382页）

从1927年至1929年，国民党一步步退却，“这一退却不单单是量的变化，实际上已引起了质的变化。”（《资产阶级霸权下的国民党》，《满蒙》，1929年9月。《中国革命史论》，第361页）国民党已“完全丧失其革命性”（同上，第354页），“革命家孙文死后才三年，他所爱的弟子们就被

解释成了专制主义者。”(同上,354页)简要地说,就是橘朴祈求的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在国民大革命中虽然放出了几缕光芒,但当蒋介石再次移足于地主阶级的立场之上,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中国社会的变革运动即告彻底失败。诚然,蒋介石政权在以资产阶级为后台这一点上,与原有的军阀大不相同,但是,蒋介石政权同时又立足于地主阶级的立场之上,因此这一政权可谓是“资本家与地主(乡绅)的结合体”。在这里,存在着这一构造中特有的矛盾。在生产尚未发达的“支那社会”的“幼稚而微弱的劳资阶级”的条件下,橘朴绝没有放弃对“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小资产阶级在获得适当组织时”迸发出来的巨大力量的期望。(同上,第370页)但是,20年代初席卷中国的变革风潮,还是暂时地远去了。橘朴说:

根据我的评分标准,自由民主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作为支那改造的基本力量,均已落第,唯一剩下的就是国民党了。但事实上,今天的国民党已经支离破碎,从而,也不能称作“唯一”的了。其大体上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是左翼,第二是右翼,第三是……“国民党军阀”。(《国民党军阀的解剖》,《新天地》,1928年5月。《中国革命史论》,第182页)

自称是国民党的新式“军阀”登场以后,对于中国的未来,橘朴又是怎样来展望的呢?在自由民主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支那改造的基本力量”均已落第,孙中山主义遭到惨痛挫折以后,这个国家的前途,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面貌呢?

仔细考虑一下的话,橘朴对中国的参与无论有多深,他自己毕竟只是一个中国变革的观察者。即使他以几乎陷入中国大地的形式,立志于中国研究,通过自己的肌肤来感受中国的民众世界,但是,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仍然还是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无数民众。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被观察的对象变了,但是,他民国初年就形成了的认识中国的世界观却始

终没有变。与蒋介石政权的确立几乎同时，“满洲事变”终于来临了。橘朴向“亚细亚主义”的曲折转变也开始了。

## 六 “国民革命”的冲击

橘朴成为满铁总社调查科的特别顾问，是在1925年10月。其中，事情的经过以及个人的原委，不是非常清楚。这时的橘朴已经是名望颇高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和新闻记者了。从这一身份地位来看，通过特别顾问这一非常自由的形式与“满铁”结合在一起，或许是极其自然的事实。橘朴得到了这个合适的地位身份，以“满铁”发行的各种杂志为舞台，更是奋笔不息了。其实，上述的许多关于“国民革命”的论述，都是一篇接着一篇地在《满铁调查时报》等新闻媒介上发表的。回顾这一段时期的历史，橘朴取得了这个身份地位一事，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成了他将视点的重心移向“满铁”、“满洲”或者是日中两国的“满洲问题”的契机。当然，我们并不想单纯地从这个原委中来探讨橘朴今后的活动。从历史上来看，尤其是“对华二十一条”以后，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渗透不断膨胀的过程中，只要是作为在中国的日本人社会的一员，仅此一点，就意味着应该担负起日本社会的共同命运。稍微夸张一点地说，就意味着必须承担殖民主义者的罪责。以后我们会提到，对这些问题，橘朴绝不是避而远之，而是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整个生涯的使命。在广义上，他成了“满铁”的一员，与往日作为“支那问题”的一般“评论家”相比，日中两国间的关系这一课题便更加切实地摆在他的面前。我们从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时，就可以发现，“国民革命”对日本“满洲问题”的前沿阵地的“满铁”，也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冲击。

北伐的不断发展，激起了以“满铁”为中心的“满洲”日本人社会的深刻反响。简单地说，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民革命”的波涛席卷全中国，中国统一的民族主义浪潮一举涌向“满洲”的话，“满铁”以及“在满日



本人社会”怎么办的问题。毫无疑问,对“满铁”以及“在满日本人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威胁着自己生存基础的最深刻的问题。关于这段历史,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根据这些研究,从1925年、1926年到1931年“满洲事变”前夜的各种事件、各种动向,成为我国在异常焦躁的情况下打出“满洲问题”这面旗帜的主要原因。1925年的“郭松龄事件”——奉天军阀的一个首领的反叛,充分地告诉了我国,一直对之支持而又不得不对其依赖的张作霖政权绝不是万全的。另外,北伐过程中,武汉政府用最彻底的方式收回了九江的英租界,至此,事态的本质已经再清楚不过了。简单地说,无论在意识上还是在现实中,20年代后期的中国,就像是一块巨大的铁块,砸向了“在满日本人社会”,我国暴露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全面冲击之下。

\* 关于这一时期“满铁”内部的动向以及与橘朴相关的一些问题,已有较详细的研究。中西胜彦著:《从橘朴的“方向转变”来看中国国民革命时期在满日本人的意识》,《法学杂志》1978年12月第25卷2号。其他还有:《亚洲经济资料月报》中国杂志解题临时增刊号,亚洲经济研究所,1972年,平野健一郎著:《新天地》解题;松泽哲成著:《满洲事变与“民族协和”运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1970年第43号;等等。

对橘朴来说,这一“冲击”是双重的。或者说,这个“冲击”带着两重性直向橘朴扑来。如前所述,橘朴在中国“国家意识觉醒”,在民众自身通过自己的双手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浪潮中找到了中国的未来,这一过程,在橘朴看来是“历史进化”的必经之路。从这一点上来看,无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统一运动以何种方式展开,都应该是橘朴历史预测的一个实现过程。如果将这一运动看成是一个冲击的话,那么,还应该给它附加上另外一层意义,那就是,作为东方世界中的中国的觉醒,给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带来的冲击。“国民革命”的历史意义是谁都难以

抹杀的。在这里,我想已经不需详说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暴风骤雨,首先使日本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使我国在“满洲”的“特殊权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直率地说,这是20年代的中国围绕着这一“特殊权益”的处置问题向我国发来的询问信号,也是这以后中国整体振奋着向我国逼来的冲击。

这种带有双重性的冲击或者说是理论与感情上的分裂,在本质上可以说是袭向明治末期以来真挚地与中国问题打交道的几乎所有人的残酷的命运。例如,参加辛亥革命的北一辉,在自己曾经推进的中国“民族自卫本能的发挥”与日本的“国家主义”相冲突的时候,终于不得不正视这一难以解决的“大矛盾”。还有,将中国的未来寄希望于“年青支那”——“青年支那党”,祈求“和平之日本”与“和平之支那”携手共进的吉野作造,在“军国日本”面前,他的呼声被踩得粉碎。今天,这一残酷的命运,又袭向了橘朴。对于一直将“国民革命”置于眼前的橘朴来说,这一冲击具有更重的迫切感。而对这一分裂、矛盾,橘朴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克服的方法,即日本仅保持在“满洲”的纯经济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经济开发来摸索日中“共存共荣”的道路。在这种形势下,“满铁”也在寻找着自己存续的基础,探求“满铁的特殊使命”,发表了《职员宣言》(1926)等等,出现了一种新动向。以这一新动向为契机,橘朴自己也提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他说:

如果略述一下我的对支政策,特别是关于满洲问题的看法的话,第一就是日本对满洲的政策应该转换到纯经济的立场上来。即不仅仅是彻底抛弃政治、军事野心,而且将满洲作为人口政策的对象这一想法亦必须彻底摒弃。……第二,对在满蒙的既得权益中与前项对照不必要的部分进行整理。大正四年日支协约的修正不必说,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权益中需要废弃者或修正者也为数不少。……第三,在局部地区撤回领事裁判权。……据我所见,这一新政策,可作为支那民族充满底力之新兴国家的国家思想之鉴,此

不单是日本，所有列强，无论其愿意与否，早晚都得追随之趋势。（《支那批判之新基调》，满铁《读书会杂志》，大正十五年十一月。前引书《楠》1976年10月第8号，第31—32页）

面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击，在当时不仅仅要死保日本的既得利益，并且动不动就要求“态度突变”的野心膨胀的国权论风潮中，橘朴的主张，可以说是将日本的要求削减到了最低限度，同时又为追求与中国的协调而作了最大的努力。橘朴清楚地看到了那帮固执于日本特殊权益的人们的浅薄与盲目，他说道：

我一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满洲问题，从支那人的立场上来看不用说，作为日本人，在考虑满洲问题时，似乎没有将之作为支那问题的一部分来加以考虑。……简要地说，日本人，特别是在满日本人，有对满洲的普遍性闭目不见而只高唱其特殊性之癖。我想，这一帮人首先有从这一偏见中脱身的必要。（《在满日本人的支那及满洲论策批判》，《满蒙》，1927年6月。《楠》1997年7月第10号，第29—30页）

还有，对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人对“满洲”的特殊情结，橘朴也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也有所谓抛下数万头颅，用尽数亿库财才得到的特殊地位这种议论，但这是一种愚知，于局外者则不通用。”（同上，第40页）但是，对橘朴来说，比对日本人所表示出来的这种不理解和偏见更担心的是日本国的命运问题。关于日本的命运，橘朴似乎早就有了一种暗淡的预感了。他说：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战时也好，和平期也好，我都绝对反对将满洲变成军事利用的对象。并不是支那人会愤怒，是因为日本从此有陷入苦境难以自拔的恐惧。……我……虽也希望确保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但从中产生出来的国防意识，就这一点，我希望能断然摒弃。（同上，第36页）

橘朴的基本立场,可以说就是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击面前,将作为中国问题的一部分的“满洲问题”,从纯经济的立场上进行再构成,防止朝军事、政治问题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的橘朴,在自己的祖国发现窘迫的征候之中,最终都没有陷入那种民族意识的高涨情绪中去。还有,面对这种形势下的日中两国关系,他的那种一贯的理智分析与理论构造也没有因此而丧失。对“满洲问题”,提出了上述的一些方策的同时,橘朴对这一时期(1928、1929—1931)北伐受挫,蒋介石政权渐渐确立的过程,也一如既往,冷静地进行了分析。然而,作为中国问题的“评论家”,在认识论上虽然有着这样的连贯性,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以“国民革命”——由其过程而带来的一系列的冲击——为契机,在橘朴身上,“中国问题”开始逐渐向“日中问题”转化。这个意义是极其复杂的。这不单纯是从日本的立场上并将之视为日本自身的问题来加以考虑的问题,毋宁说这个意义在于将他祈求的“中国问题之解决”放在日中关系之中加以考虑这一点上。“中国问题”向“日本问题”转化了,这样说或许更妥当。

“九一八事变”,出其不意地向橘朴扑来,这些问题便一举表面化了。下节,我们来考察他的“方向转换”问题。

## 七 “方向转换”——向亚细亚主义的转折

从“九一八”(“柳条沟事件”)到次年“满洲国”成立,这一段历史,经众多的研究已经非常清楚了。从日本近代史,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里的世界史的动向来看,“满洲事件”像是一根导火线,近代日本政治、经济的各类矛盾的火药库,经“历史”这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引爆,一下子猛烈地爆炸了起来。橘朴固然也是这个时代命运的同龄人之一。

橘朴后半生的主要工作是主编《满洲评论》。《满洲评论》发刊后仅一个月,橘朴就迎来了“九一八事变”。“柳条沟事件”以后,橘朴的态度、

判断、决意,像在本篇的一开始就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以极其明确的形式表现了出来。1931年10月,他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进行了重要的会谈,以这一会谈为机缘,橘朴将自己的梦想全部都寄托到了“王道国家·满洲”的建设之上。

在这里,我没有对这一过程,即这一时期他的个人历史作细微追究的意图。这里的焦点只有一个,就是促使他作出这一判断和决意的原因是什么?他对“满洲国”的未来进行展望的思想基础是什么?虽然很难探明橘朴当时真正的心情,但是,对日本和中国这一错综关系中产生出来的这一政治构想,将之作为一个思想课题来加以探讨也还是可能的。

将橘朴的“方向转换”放在时代的潮流中来进行考察时,我觉得似乎有一个关键词自然而然地浮现了上来。这不是别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从他的整个中国观中抽出来的“武力与政治理想”。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在“官僚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给予作为被统治者的“中产阶级”以“武力与政治理想”,在橘朴看来,才是中国变革的道路,中国再生的道路。中国,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经过了70年,已经到了“军阀时代”的最终期,正如唐末五代的历史那样,经过了70年的军阀乱世,现在,“支那民族……正处于近世国家降生的阵痛之中”。(《在满日本人的支那及满洲论策批判》,《橘》第10号,第34页)但是,给“中产阶级”带来了“武力与政治理想”的国民党的“北伐”,虽然当初使各路军阀“霜见朝日般”地破灭了,然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间激烈的政治势力的消长,瞬息万变。在这种形势下,对中国的前途,橘朴到底是怎样来预测的呢?

在这里,对于橘朴的“武力与政治理想”这一基本范畴,往往很容易就将之想象成“关东军”的“力”和“王道政治”的“理想”,但这样似乎过于草率了。问题是,在其思想构图中远比这一想象曲折得多。在这一曲折过程中,“国民革命”仍然投下了深深的影子。接下来,我们先将论点简述如下。

经历了“国民革命”的挫折，但袭向橘朴的却是他自己感情上的挫折。橘朴感情受挫的原因，与其说来自孙文主义的失败，即孙文主义的正统后继者左翼国民党的堕落，倒不如说来自“支那社会构造”的再度变动，即蒋介石军阀的登场。“拿破仑式的军阀加袁世凯式的军阀”——蒋介石军阀的出现。“近世国家”诞生的起点——“官僚阶级与中产阶级”的斗争，虽然仍在慌慌张张地进行着，但其结局，却是向右、向右，将中国的前进道路引向了右倾。对这个社会难以拔除的旧体制，几乎完全没有能够加以否定。“九一八”以后大致四个月的1932年1月，橘朴说：

确实，支那民族的凝聚力很强。但这是根源于民族意识，与所谓国家意识这一观念全无任何关系。（《回顾与展望》，《满洲评论》第2卷第1号，第6页）

橘朴的这一段话，当然与“柳条沟事件”以后他自己的态度转变不无关系。与曾经关于“历史的进化”的论述以及关于“支那民族充满底力之新兴国家的国家思想”的论述相比，其中总好像存在着一些不一致性。这里所提示出来的思索，毋宁说是橘朴对“国家意识的觉醒”、“近世国家的创立”这些期待的失望，从而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形式表示出来的态势。

“满洲事变”后，橘朴根据自己对形势的认识，阐述了今后的一些打算，这些想法在前面引用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从此以后，他的路线，虽然也困政治形势的几多变化而有过曲折，但至少在他自己的理论和心情上，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保持了其一贯性。为了更具体地弄清这一转换的形式，这里，想把其基本内容罗列如下。橘朴说：

（9月18日）爆炸的结果，位于东北政治机构最上层的张家势力化为乌有。失去雁首的军阀机构纷纷崩溃，乡绅及地主压迫下的农村社会事隔多时从政治经济势力的重压下解放了出来，给予了他们

通过自己的判断,根据自己的利益而重新创造政治机构的机会。……面临这一革命机会,东北民众迅速选中的政治题目有以下数种:(一)永久防止军阀统治的机会再现;(二)与支那本部循环性动乱绝缘;(三)为此,必须堵塞国民党势力的侵入;(四)也必须堵塞正从支那中部不断北上的红色农民军运动的侵入;(五)为使此诸多的目的完全达到,应实行绝对的保境安民,换言之,以原东北四省为版图的新型独立国家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同上,第6页)

这篇文章中,很明显有着一种倒错。这里提出来的诸项目,与其说是“东北民众”所选中的,倒还不如说是橘朴自己理想中的东西。潜藏在这种倒错背后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还要加以讨论,仅从上面一段文字的表面,橘朴的认识及他的选择已经昭然若揭了。

第一,“九一八”的“爆炸”,无论是谁干的,其结果,橘朴多年来认定的“支那改造”的最大阻碍者“军阀势力”被彻底铲除了,这样,创立新型中国的基础出现了。

第二,“支那本部循环性动乱”,亦即依然具有再生产“军阀势力”能力的中国社会的社会磁场,对“东北四省”存在着潜在的威胁。所以,为了切断这一祸根,不得不排斥作为新军阀的国民党势力以及指导“红色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势力”。

这样一来,实行绝对的“保境安民”,建设新的独立国家的必要性就自然地提了出来。

这里,来自于20年代中国的强烈刺激,橘朴是以一种破碎的形式接受下来的。“国民革命”的发展,展现了中国统一的民族意识的急剧成长。曾经“对以满洲为舞台的日、俄两国随心所欲的开战,……一向不以为惊,钝感至极”的“支那本部人民”,“今日大连郊外……日本企业家虐待支那工人”一事,竟能激起“广东的劳动工会的猛烈抗议”,显示出了他们的“敏感”。(《支那批判的新基调》,《橘》第8号,第31页)这正是中国的变革给“在满日本人”带来的强烈冲击,对橘朴来说,又是一个本质性

的冲击。故而，现在橘朴将之列入“支那本部循环性动乱”之中，企图在其中建立起绝缘体。曾经要求将日本的“特殊权益”收缩到经济利益这一点上，强调与中国协调的橘朴，至此，发展到了要求通过政治介入，打开建立新的独立国家的道路。以“九一八”为契机，橘朴的这一扭曲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然而，橘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他的这一扭曲，绝不是单纯地赞同“九一八”，拥护日本的“特殊权益”，从而进一步主张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橘朴正是在转向广义上的“亚细亚主义”曲折的过程中来寻求中国将来的前进道路，寻找日本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民族主义面前无法逃避的“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的。一方面，在诸多的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他自己的中国观的一个反映。另一方面，这又意味着在“中国问题”急速地向“日本问题”转化的过程中，橘朴赌上自己的思想生命而实现的飞跃。

橘朴的“满洲国”的建设构想的背后，有过去 20 年中对中国的观察、分析作为后盾。关于他信念中蕴涵着的纯粹性以及难以名状的自我矛盾，我们想将他的构想以最纯然的形式提示于下。

1932 年初，他迎来了“多事多端的昭和七年”，同时，对自己的建国构想也作了如下的描述：

- 一、为彻底实行保境安民，建设新的独立国家是绝对必要的。
- 二、这个国家应是由公民组织的民族联合国家。
- 三、分权性自治国家。
- 四、以完全保障国民的生活为原则。
- 五、设立国民自治指导部为临时性权力机关，使与各级政府对立，使其指导并运用各种各级的自治组织。
- 六、七、八(略)(《回顾与展望》《满洲评论》第 2 卷第 1 号，第 7 页)



对照现实的社会、政治诸条件，他的建国构想的骨架，虽仍然留下不少粗糙的痕迹，但已经将他的想法充分地表达出来了。众所周知，“民族联合国”、“国民自治指导部”这些构想，是以“五族协和”或“协和党——协和会”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具体的建国过程中成了最大的争论焦点。这些课题，也给“满洲建国”的幕后历史增添了许多光彩。对照前述的观点，可以看出，橘朴的建国构想中的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分权性自治国家”的建设。这样的构想，对橘朴来说，是以一种极其自然的形式流露出来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大概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吧。在这一构想中，“保障国民的自治”，首先能从“各民族社会的传统性自治国家（家族、部落、帮会、农会、各种互助团体等）”中求得（《满洲新国家建国大纲私案》，《满洲评论》第2卷第1号，第29号），只有在这种传统性自治之上，中国社会才能保有其基础，这种传统性自治是各种制度、机构得以建立的基层社会形态。然后，在这个国家中，“村镇、县、省、国家等的新自治（包括作物保险、迁移介绍、职业介绍等社会政策）”以及“各种协同组织”等“国民的自治”才能得到更加稳固的保障。

但是，接下来，在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0年代前半期橘朴在“王道思想”的名义下大力阐述“地方分权主义”的情景。这个“地方分权主义”思想是面对资本主义或者列宁主义的中央集权主义，在新时代中赋予了新意义的东西。这种“地方分权主义”，虽产生在中国古代这个历史条件下，但在接受了这一历史事实的同时，橘朴又将它定义成“东方”固有的价值，成了一种政治形式。“分权性自治”，是以中国的历史与社会为基础，以最为内发性的形式，在未来必须展开的全新的政治形态。或许可以这么说吧，橘朴经受了“国民革命的挫折”，以“满洲事变”为契机，经过了许多复杂的曲折，正以“分权性自治国家·满洲国”的建立，以“东方”固有的价值，即以“亚细亚主义”的原理为基轴，再度趋向成熟。

这里，称其为“亚细亚主义”，当然是非常暧昧的说法。这里所称的“亚细亚主义”，是指与所有的近代西方所提示的诸原理相对，在某种意

义上想找出东方(亚洲)社会存在形态中固有的价值的一种思维方法。事实上,在这个时候,“王道政治”或“分权性自治国家”成立的理论根据,连橘朴自己似乎都没有充分地具体地阐明。倒不如说,从这以后他的思想活动反过来为现实所迫,在现实中拼命地摸索着这一理论根据。后来,对西方社会,他提出了“利益社会型的西方社会”的论题,与之相对,东方则是“基础社会型的东方社会”——“东方共同社会论”,这些论题的提出,当然都是他摸索“王道政治”或“分权性自治国家”理论根据的产物。

但是,这里有一点是非常明白的,即橘朴过激地贯彻自己的中国社会论,想在这一思路展开“王道国家论”的构想。但这绝不是为了“满洲建国”而作的观念上的粉饰。至少在橘朴自己的头脑中,他是想打开因“国民革命”而被锁闭了的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再次以与东方社会相称的形式创造出独自的政治形态,以实现东方固有的价值。不用说,这种东方固有的价值,是面向未来的一个先决条件。只要还是一个先决条件,那它就是一个架在虚空中的桥梁。同时,在这个先决条件下,所有的东方国家——包括必须建立的“满洲国”在内,更包括中国和日本,今后的形态秩序,都是应该由这一东方固有价值来决定的。无论怎么说,橘朴是想在一定程度上踩在“亚细亚”=“东方”这个杠杆的支点上往前飞跃,从中国与日本这二者的夹缝中脱身而出的。这才是橘朴“方向转变”所具有的一个本质意义。

然而,尽管橘朴找到了“东方价值”后产生了飞跃,但他的建国构想本身所掩盖不住的现实性矛盾却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一问题,我们也还是不得不提出来的。橘朴之所以把“满洲国”构想成必须是“分权性自治国家”,理由除了来自“传统的自治诸团体”内发性的发展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满洲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这一特性。在《满洲新国家建国大纲私案》中,他说:

构成满洲社会的主要成分的汉、满、蒙、鲜诸民族,大多以农业

为生,所以,在这之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毋庸置疑,是一个农业国家。理论上,农业国家有发展成工业国家,即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倾向。为避免资本主义的弊害,阻止前述的自然倾向,永久或半永久地使其作为农业国家存续下去,此事绝不是不可能。鉴于对其多数国民的福祉以及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满洲有永久性作为农业国家的命运。于是,对农业社会而言,其合理性统治机构必须是分权性自治国家,这一点似已无须多言。(同上,第28页)

“永久性农业国家·满洲”这一定义中,确实融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弊害的批判性理念,但是,从现实的日中关系来看,毫无疑问,在这一定义的背后,“工业国家日本·农业国家中国”这一前提性的构图是俨然存在的,或者说,是将与“工业国家日本”以“特殊关系”而结合起来的“农业国家中国”这一构图作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国家日本”,对必须建国的“满洲国”,不以“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势态为所欲为,这一保证,又在哪里呢?作为今人,以今天的观点看来,橘朴的构想与骇人听闻的现实之间的差距,一目了然。很容易预想得到,在橘朴的面前,有着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将这一构想中“分权性自治国家(=永久性农业国家)·满洲国”的建设这一理念,在现实中使之成为完全虚假的东西,事实上使“满洲国”转化成帝国主义日本的资源基地;另一条路便是,为了使“分权性自治国家·满洲国”确立,作为“工业国家”的日本,凭着自己的力量,使“满洲国”能够获得稳固的地位,并给予这个新兴国家一个合适的政治形态。二者只能择一。在“方向转变”以后的橘朴面前,出现了这样可怕的裂变。

最后,我们不得不涉及的问题是,到底通过谁,通过什么政治主体的力量来实现这一建国构想的问题。在橘朴看来,可以依靠的力量首先就是关东军,是发起“本次行动”的“关东军中坚将校”=“将校团”(《我的方向转换》,《满洲评论》第7卷第6号。《著作集》第2卷,第18—19页),是“革新=法西斯势力”的军部。橘朴在“九一八事变”后执笔的第一篇文

章是以《满洲事变与法西斯主义》为题的，这一做法本身就表明了他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前面提到的《我的方向转换》这一名篇，是事变三年后才写的，当然是一个经过整理加工了的东西。但是，他通过与“板垣、石原的会见”而得到的认识以及对他们的期待，在这篇名文中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即，一个“如此蕞尔之小集团”，之所以“得以发挥如斯之威力”，是因为有“本国同志将校之大集团为其背景”，“更因在其背后有全国农民大众的热烈支持”。

作为亚洲解放的基础，本次行动的直接目标，是以东北四省为版图建设一个独立国家，日本不仅要与之建立绝对的信赖关系，返还一切既得利益，还要进一步给予最大限度的援助。

然后，

与之同时，间接抱有的意图是期待祖国的改造，使勤劳大众从资本主义政党的独裁及榨取下解放出来。如此，才能真正地获得亚洲解放的原动力，诱发建设理想国家的力量。（同上，第18页）

回顾近代日本历史，面对日中关系的构造给我国带来的本质性思想课题，肯定会使我们产生一些新的感慨。橘朴的语言中所表现出来的力学原理，与例如参与“辛亥革命”到面对“排日爱国”的“五四运动”，最后走向“二二六事件”的北一辉的情况，在构造上或许是同样的。我国对中国的侵略这一事实，只要作为一个亚洲国家这一立场不变，那么它就是深深扎入近代日本人意识中的一根刺。对邻国中国的变革、进步的期待，在这个事实面前，以“亚洲的解放”这个理念为媒介，最终仍是走向了“日本的改造”。在战前的日本，站在“亚细亚主义”的立场上，多少与中国的变革有些关系的群像中，能够成功地从这个圈圈中脱身而出的人——像尾崎秀实那样，朝着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夹缝冒死尝试跳跃的例子除外——几乎看不到。侵略中国这个事实，是规定了近代日中关

系的一个强大的磁场,也是一个命运的紧箍咒。

橘朴与北一辉,在各自的思想构造上以及历史的地位上自然大有所不同。例如,在橘朴身上,整体上说,更多地将“中国问题”导向“日本问题”,另一方面,关于近代日本的构造的分析,尤其是与权力相关的问题,北一辉的把握远较橘朴锐利。但是,他们二者之间又有着相似之处,比如说,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与《国家改造法案》所占有的位置,与橘朴《中国革命史论》中所收的诸论稿,还有,“国体论序说”——《职域奉公论》,不是几乎平行的吗?

无论怎么说,橘朴的建国构想,是在“分权性自治国家”的理念下,以“革新派法西斯势力”关东军的力量为支点出发的。这是他在“国民革命”受挫,意识到“自由民主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作为支那改造的基本势力均已失败”,迎来了紧迫的30年代的时候,勉勉强强打开的政治突破口。橘朴“国民革命的挫折”,现在以“东方政治理想”与“革新派法西斯势力”关东军的“武力”这种奇怪的形式,呈现出了倒错的影像。这是橘朴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机,一个决定性的转换,是他的研究对象——“中国问题”反过来以一种恐惧的姿势向他重压过来时作出的选择。当然,这一转机,把橘朴的思想和生涯引向了难以名状的矛盾之中了。

一旦踏上了这条道路,橘朴的思想行动也就朝向了作为“分权性自治国家”的理论基础的“王道论”。(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有:《作为王道实践的自治》,《满洲评论》1931年12月第1卷第15号;《王道史概说》,同上,1935年10—12月第9卷第15—23号;等等)不,毋宁说,这条道路既然是他选择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意识形态上的激烈昂进,终于把他导向了所谓的“东方共同体论”的构筑上。“评论家·橘朴”一变而成了“空想家·橘朴”。尽管橘朴作了这样的努力,但是,在帝国主义日本的国家意志的面前,橘朴的命运变得宛如风中的树叶一样,任风吹得颠来倒去。他的这一命运,我们是不难想象的。

众所周知,“王道国家·满洲国”的建国之梦极其短命。被橘朴赞誉

成是“彻头彻尾革命性”的“自治指导部”在事变后不久的1931年11月开始,仅四个月后的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3月1日)后半个月——就消失了踪迹。代替“自治指导部”而组建的“协和会”(1932年7月),从组建一开始,围绕其性质,内部就抗争不断。其实“协和会”从一开始就是官方设置的组织,两年后经过了改组(1934年10月),完全转化成了政府的宣传机关。橘朴祈求自治的嫩芽,没有允许它成长,即刻被碾碎了。作为“创业”的良机,他常常回顾起来的“本庄时代”<sup>①</sup>,仅仅一年,就烟消云散了。日本资本主义、本国的官僚势力,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把橘朴的“分权性自治国家·满洲”的建国之梦粉碎了。

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叙述“满洲国”的历史了。简单地说,从“满洲事变”爆发的1931年起,到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再到1945年,这一段历史,如果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对抗这一侵略的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个视角来看,是沿着一条直线走过来的。这一期间,橘朴的行动,简单地说,就是为了在自己的“满洲建国”的理想与现实事态的发展之间产生的令人恐惧的裂痕上架起一座桥梁而作的拼死的努力。

他在建国的两年后就叹息道,“前年夏天以来,与满洲国有关的各类……现象,连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都没有接到。”(《从自治走向王道》,《满洲评论》第6卷第12号。《著作集》第2卷,第124页)“从客观上来说,吾人的展望变得更加忧郁。”(《乡村里的日本官吏》,《满洲评论》第6卷第10号。《著作集》第2卷,第338页)并流露出了强烈的不安,“变得太厉害了”,“今后会怎样变呢?”(《国家的成长过程与建国理想》,《满洲评论》第8卷第1号。《著作集》第2卷,第354页)从以上的这些叹息与不安中,橘朴内心的痛苦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满洲国”事实上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实质上的殖民地,日本资本主义以压倒的优势侵入了这个国家,这种现象越是朝着严重的方向发展,橘朴对能

<sup>①</sup> 本庄,指本庄繁,曾任张作霖军事顾问,策划“九一八事变”,日本投降后自杀。——译者注

起到堤坝作用的“革新派法西斯势力”关东军的期待就越是迫切。“满洲事变本身，是勤劳者意识形态战胜资本家意识形态的结果。”（《走向低调的建国工作》，《满洲评论》第7卷第11号。《著作集》第2卷，第353页）“因为关东军建立的坚固传统，在满洲，法西斯势力是占绝对优势的。”（《日满结合的政治过程》，《满洲评论》第5卷第23号。《著作集》第2卷，第134页）在决意“果敢”地迈向“非资本主义”的法西斯道路时（《著作集》，第2卷，第133页），前途上应该会有一缕希望。他屡屡对“满洲国建设计划”进行纠正，并将对计划的矫正寄希望于“现在即能信赖之势力”的“关东军司令部”。（《经济建设的补正》，《满洲评论》第4卷第12号。《著作集》第2卷，第230页）一方面，这是橘朴对“满洲建国”后的现实所作的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不管这其中存在着多大的倒错。事实上除此以外他也找不到能信赖的力量，对“非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势力”关东军的期待，也是一种走投无路、无可奈何的选择。如果把话讲得早一点儿的话，从这一点到祈求改造日本本身，这之间，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在回顾《满洲评论》的创办十周年时，橘朴写道：

如果日本的体制能发生显著变化，其变化的结果能促使对满洲国采取与现今不同性质的民族政策的话，我等十年前期待的民族协和关系才能实现。

接着又说：

不管愿意与否，迫使日本社会产生一场不可避免的飞跃的时机已经来临。……这场飞跃是以天皇为中轴的国家改造的重大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以后，日本国民才能把握新鲜且有效的政治，进而对于堆积于满洲的诸多问题，才能渐渐得到解决的正确方法。（《回顾与展望》，《满洲评论》第21卷第13号。《著作集》第2卷，第378—379页）

至此，我们紧扣主题，对橘朴后半生所走过的路，想作一个小结。从

前面的论述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满洲事变”以后，后期的橘朴俨然以一个超国家主义者的面貌出现了。30年代，法西斯主义以“革新”之名登场，对这一势力配置，橘朴就此首肯并寄予希望。最后，橘朴又想将国家改造的一切希望全部寄托于“天皇”，此篇一开头就涉及的《国体论序说》、《职域奉公论》，即是其代表作。将“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日本”改建成基于“职业性民主政治”之上的“职业性自治国家”，是他在《国体论序说》和《职域奉公论》中描绘出来的简要构图。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期间，橘朴对于“满洲国”的建设，为了实现以“农民民主主义”为基调的“农业性自治国家”，抵制种种障碍、重压，用尽了全部的精力，这一点也是应该指出来的。橘朴最喜爱的弟子佐藤大四郎，认为这一构想必须实现，1937年，在绥化县以惊人的努力掀起了“合作社运动”。但最终在“合作社事件”这一罪名下，有关者全部被检举揭发，佐藤本人也落得毙命狱中的结果。这也已是广为人知的事了。（田中武夫著：《橘朴与佐藤大四郎——合作社事件佐藤大四郎的生涯》，龙溪书舍1975年版。其他可参考者尚有数种。）

橘朴，当然是这个“合作社运动”的理论指导者了。这是由“满洲国”这个特殊的政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在社会的最基层对“农民民主主义”建设的一次尝试。这场运动，对橘朴也好，对佐藤也好，不用说，是他们将自己的理念寄托于“满洲国”建国的重要证明。以“满洲”为舞台，又将射程延伸到了日本的橘朴的后期行动中，其一贯性与伴之而来的苦斗，为之增添了几多风采，这样说我想绝非过言。

关于橘朴的轨迹，在种种的思想背景下，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虽然很多，但是，这里我还是想只就一个紧要的问题进行探讨。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橘朴的“中国社会论”的行踪问题，还有就是在以惊人的速度急剧发展的日中战争中，他的“亚细亚主义”的行踪问题。在日中全面对抗的残酷的形势下，橘朴的中国论，到底呈现了什么样的面貌呢？还



有,战争中决定了橘朴中国认识的基本特征的又是什么呢?在本篇的最后,我想把视点移到这些问题上来,对橘朴后半生的思想轨迹作一个总结。

## 八 “日中战争”——光与影

“九一八”以后,尽管橘朴作了种种的努力与期待,然而,“时局的进展”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想,急速地向前推移着。“满洲建国”告一段落,作为一个国家,应有的局面还尚未具备时,日本便迫不及待地越过长城线,开始了对华北的进攻。“柳条沟事件”后仅六年,卢沟桥的枪声,成了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信号。“王道乐土,五族共和”的“满洲国”建设,只不过是全面侵略中国的一个前奏,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帝国主义日本完全蹂躏了橘朴的构想,使橘朴的理想破灭,并开始对橘朴说三道四,使之不知所措。

日中战争爆发以后,橘朴,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行动人”。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几乎八年间,他频繁地视察华北、华中,在满洲各地旅行,并且又回日本长期逗留,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进行了活动。当然,橘朴最重要的活动仍然是文笔活动,并没有放弃他作为一个“评论家”的作用与立场。这里,称他为“行动人”,这意味着他的一切实践活动都集中在怎样才能使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尤其是大陆政策走到自己所期待的轨道上来这一目标上。橘朴的活动目的早已经与他作为“支那研究者”的时代不同了,而且也与构想以关东军的武力为支柱,建立特殊地带——“理想国家·满洲”的时代不同。现在橘朴所面临着的,是日本与中国两国,在中国本土相互为赌生存而全面激战的年代。中国具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不用说,与日本本国应采取的方针政策以及前进道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橘朴而言,各种言论活动直接与行动挂钩的时代到来了。通观橘朴的整个生涯,或许可以发现,他虽一时积极协助“满洲建

国”，走了一段迂回的道路，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全身心地面向汉民族，面向中国的整体社会，似乎又回到了当初的出发点上。

日中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橘朴虽然已经是花甲之年，又频频地出入医院，但是，他拖着病躯，以惊人的毅力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参与“昭和研究会”，在日本论坛的登场，“东洋共同社会论”的倡导，还有，面对变幻无常的战局，提示具体的对华政策方案，等等。这些活动，非常适宜地装饰了他最后的生涯。但是，现在我们想问的是，通过日中战争，最终橘朴抓住的东西是什么呢？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那就是，在日中战争中，橘朴看到了什么呢？

橘朴在“新京”迎来了“卢沟桥事变”，第二年的1月，新年一早，他起身去了北京，在视察了华北一带的政治形势后，他起草了《北支那视察报告》，提交给了满铁。这是“七七”以后仅半年就提出来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虽写在战争刚爆发不久的时候，但是，橘朴通过自己独特的观察，将自己的日中战争观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人们。在当时数量众多的论述、报告中，关于战争的本质以及趋势，橘朴的《报告书》是洞察最敏锐的一流文章，并且，战争时期，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以这篇《报告书》为基础而展开的。可以说，橘朴的日中战争观，在这篇《报告书》中，以最集中、最全面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我想通过这篇《报告书》中的生动内容，来回答我们上面提出来的问题。

\* 这篇《报告书》以《长期抗战与对策》为题，发表在《满洲评论》1938年2月6日、3月5日第14卷第8、9号上，后收载于《著作集》第2卷。这是一篇因考虑到公开发表而经过删节的东西。最近，经有关人士的努力，发现了《报告书》的原文，山本秀夫氏为之作了解题，刊登在《楠》第3号上。

一读这篇并不算长的报告书，即刻就能感觉得到的基本点是，橘朴将这场战争的本质首先从“游击战”中找了出来。橘朴说：“速战速决的

正规战,以南京的陷落而告结束。支那事变……转向了长期抗战的阶段。”“国民党政府,……在国内,将军事行动的基础从都市移到了农村,在国际上,想进一步加深与英、苏等的依存关系。”(《楠》第3号,第46页)以农村为基础的游击战,迄今为止,主要是共产党采用的基本战略,只要国民政府准备“长期抗日”,那么,就不得不依靠游击战这一战术。橘朴的这一观察,显示了无与伦比的敏锐感。

橘朴以下的几个预测,在准确度上,恐怕任何人都难以与之比拟。虽然原文较长,但仍想不厌其烦地引录于下。

一、在以前的正规战中,虽然并不一定总是日本方面发起攻势且以胜利而告终,但游击战中,主要是支那方面采取攻势,日本方面或临时政府则日夜为其所扰。

二、原则上讲,游击战通常与正规战呼应从而取得效果,但今天已不单是这样,而是深入到了日本占领地区内部。从支那正规军方面独立出来的游击战,占领临时政府统治下的城市、农村,在那里,有着充分组织抗日政权的可能性。

三、如今,在京汉以及津浦铁路沿线,铁道两侧以外广大的地方,均被土匪团,要不就是职业化了的半土匪性质的武装自卫团所控制。在这种形势下,这些武装团体很容易追随驻屯于占领地带外围的支那正规军以及以之为根据的政治工作队,从今天的混战状态中脱出,有着在一定的方针下被整编的可能性。在这之上,民族意识这一精神纽带以外,应当还多少有物质方面援助的必要。

四、第三项显示了在支那存在着能够组织游击战的特殊的丰富的社会基础,但却缺乏着朝单纯的游击战或永久性游击战发展的可能性。一定会如前所述的那样,伴随着简明而贴切的经济政策,综合二者,组织起各级政权。

五、如此的组织,将会沿着战线,特别是战线背后的占领地域内簇生,若用极端的话来说,好不容易冒着巨大的牺牲通过正规战获

得的地方，会非常容易地通过游击战被夺回，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这一类的事情，即使在满洲，吾人都曾经在过去的东边道，现在的三江省、牡丹江省经历过。（同上，第55—56页）

从这篇《报告书》中还可以得知，橘朴当时已经看过了彭德怀关于游击战的论文。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橘朴，或许还有收集到其他一些特殊资料的机会。从《报告书》中可以容易地看得出来，他的北伐以来关于中国政治动态的全部经验与蓄积以及“满洲建国”过程中的一切体验，全都浓缩、升华到了这一日中战争观上来了。他追溯到了由宋庆龄主持的《对日作战宣言及其基本纲领》（1934），又引用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对中国将展开的游击战的本质全面地作了阐明。

橘朴在视察过程中所看到的，在如此这般把握战局的“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也好，在其政治经济机构“特务部”也好，都是“除了悲观什么都没有”的绝望形势。“我是深怀杞忧之心观察现场的，但现场的形势比我预想的更坏。”（同上，第47页）“面对横于二者间（指日中两方各自的对应。——著者注）如此之大的隔阂，我们只有呆然自失，别无他言。”（同上，第59页）虽还处于战争的初期，对日中间几乎令人绝望的隔阂，以及对从中而得出的结论，橘朴已经抱有了无法形容的阴暗的预感了。如果显示形势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其原因以及制订出来的方策又到哪里去寻求呢？

依我之私见，军事当局对支那事变的对象，恐怕是无意识中将之作为同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来看待了。一个世纪半以前使拿破仑一世烦恼至极的西班牙、俄国的分权性封建社会，在今日的支那以更加严重的形态存在着，这一特异的情况，似乎忘记了。第二，处于这种形势下的游击战的价值，如前所述，虽近十年来在支那本部以及满洲屡屡被证明，然而不幸的是被资本家意识形态熏染了的幕僚们，对这些先例的评价似乎颇不充分。……第三，即使已经认识到

了游击战的重要性,但作为对策的政治、经济工作,即对抗前面曾列举的敌方的诸条件,如人民自治,……土地政策……等,树立能够克服敌方的政策,是现在的北支那方面军作战幕僚、特务部幕僚之能力所不能及的。

橘朴指出的这些原因,千真万确,几乎都是意识性的问题,从客观来看也好,从主体上来看也好,我国要想明确地认识到这些原因,并树立起相应的对策,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最后橘朴说:

第四,对付游击战的有效策略,……从资本家地主的意识形态中来寻找是非常不自然的,这必定要等到重农思想的参加才能趋于完成,在这一点上,我想重农派与资本家的重新妥协是必要的。(同上,第59页)

作为结束日中战争的基本战略,橘朴将所有的期待都集中于他所说的“重农派”思想上,即深刻认识农业国家中国的特质,不是为了资本,而是掌握立志于中国农村的安定势力的领导权。要想打开现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局面,在橘朴看来,除了这条路以外别无他途。通观战争的全过程,他反复主张的政策,就是将一切对华政策的基础置于农村的安定之上,然后,使这一对华政策成为左右日本所有的内外政策的轴心。从这一点上来看,甚至连1941年的日美开战这样的大事,都似乎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沉重的冲击。在他看来,这场战争的本质,无论在什么样的形势下,都是亚洲内部的两个国家——日本与中国的战争,与别国无关。

然而,能使橘朴的这种认识成为可能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阅读橘朴的论述——猛一听或许觉得奇妙——使我感到,“卢沟桥事变”以后,橘朴对抗战中的中国的实态的审察,开始闪现出了更加真实而锐利的目光。这是一旦深入中国社会的深层,再次从中探出头来以后才能获得的认识,这种感觉宛如将自己放在与日本不断战争的立场上才能获得的真实感。在这篇《报告书》中,关于二者应该可以采取的方策、

手段、可能性等等,他的考察,可以说具有令人吃惊的冷静。在此,由北伐的挫折,蒋介石政权的诞生,日本的直接侵略这一些过去十年的经验酿成的思维,再度紧紧地抓住了中国社会,对之作真实的观察。他触及的中国社会,即与日本展开殊死斗争的中国,绝不是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分权性封建社会”,同时,在面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抵抗斗争中,这个国家正在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难产之苦。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将他几乎用尽一生追求的“中国观”展开到了最大的限度。这一点,我们大家大概是不会有什么怀疑的。

在《报告书》中,橘朴说:

在支那,原来一直施行的是地主富农寡头政治的部落自治,这是一种由共同社会自然发生的统治形态。其次,……现在,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被组织起来的……资本家、地主的自治,相当广泛地施行着。最后,还有共产党组织的以工农为本位的苏维埃式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游击战中政治工作的中心课题。

国共两党在这一方面花了大量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顺应进行游击战争,提高农民的生产力这一些紧急需要,有必要在其中组织以地方知识分子为中心的、高效率的行政组织。这样,这种新组织将成为给陈旧不振的自治性共同社会带来新生命的机缘。(同上,第52—53页)

当日本进攻中国本土时,这个国家以与自己的社会形态相称的形式全力展开了民族抵抗运动。根据决定游击战趋向的地主自治的特点,可以将中国分成三个地区,这就是,实行地主富农寡头政治的传统部落自治地区、资本家地主的自治地区以及以工农为本位的苏维埃式地方自治地区。这是摘掉了近代国家意识的遮眼罩,用针对这个社会实体的现实眼光看到的一幅鲜明的政治地图。橘朴正是用这一眼光来凝视抗战中国的态势的。

这一时期橘朴对中国的认识,已经离开了国家,离开了“满洲建国”这些权力问题,宛然是趴在地面上,紧贴着中国社会,似乎贴得越紧就越跃动生辉。他眺望到的这幅地图,既是以地域自治这种民众政治实体为基础构筑的地图,也是在考察了什么样的政治势力对其民众展开什么样的政策的基础上描绘出来的彩色示意图。当然这绝不是单纯的军事地图。不,连政治势力的布局图都谈不上。这首先应该是一幅用粗线条将民众生活的形态与政治势力联系起来的社会势力布局图。

然而,手上拿着这样一幅社会势力布局图,橘朴主张的基本方针又是什么呢?

我们怀着感慨沿着橘朴的足迹走了过来,对从今以后的橘朴,我们也还是不得不以一种感慨来进行叙述。这种感慨也就是他再次目不斜视地朝着他自己曾经构想的“分权性自治国家”或者“共同体国家”的建设奔去。在战争这个激烈的局势中,橘朴更加直接地将这一构想转化成了日本的大陆政策乃至这场战争的目的。“从这一立场来看,对付游击战的政策,与吾人大陆政策的根本课题,即解放东方诸民族(其实质是农牧大众)的问题一下子连接了起来。”“(以中、贫农为中心的华北农村的安定与发展),就是在农民民主主义之上建设健全的共同体国家。”“(这是)原则上必须在日本的大陆政策,即将东方诸民族从西方霸权中解放出来,更加现实地说就是支那国家改造的基本条件内加以解决的问题,不允许机会主义地将之变革或从上述原则中逃脱之事发生。”然后,“我主张,(这一)政策的执行者,主观也好,客观也好,才是支那民族的解放者、理想国家的建设者,以西方文明的双生儿帝国主义及共产主义势力为背景的东方主义运动的敌对者国共两党的谬误才能完全排除。如此,吾人……才能看到对抗一切西方主义势力的东方民族解放战线永久的必胜的未来。”(同上,第60—63页)

即使不看他战争当初费尽心机的献策,单看这里存在着的“东方民族解放”的理念与日本对中国侵略这一现实的背离,就已是惨不忍睹的

了。他的“支那国家改造”、“农民民主主义”的“中国社会论”，与我国对中国侵略的现实中“东方民族解放”的口号所指示的方向，在矢量上是完全相反、浮游在虚空之中的。向“亚细亚主义”靠拢的橘朴的思想轨迹中，要求日本成为“支那民族的解放者”、“理想国家的建设者”，然后想在战争中寻找摆脱“西方霸权”的东方民族解放战线，这些矛盾，已经昭然若揭，对之再作深究，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这个矛盾，是与覆盖着整个日本的本质的思想课题相关的问题。对这场战争，无论从什么善意的立场上来确定它的意义，最终都将被摆在眼前的事实所背弃，只能落得自欺欺人的结局。

直率地说，对中国的认识越深，我们就越不能赞同橘朴对战争的现实所提示的矛盾不带有一种自觉性，毋宁说，正是因为这种自觉性，才更迫切地驱使着他的行动，面对现实，吐出了一些看似不像从正面直接挑战一般的话。与这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同，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下，橘朴流露出了个人的感怀。1939年，他这样告诉他的友人：

已经超越了满洲的领域波及北支。想用拼死的游说作一些阻止，但此是言论所难及者。连支那是何等国度尚且不知，即展开行动，真是可怕。（山本秀夫著：《橘朴》第296页）

后来，在《职域奉公论》开头的《序说》中，橘朴写道：

（1939年1月）北支那视察的结果，使我神魂为之震撼的疑问，是难以解开的。……原来，我于日俄战争一结束就来到了大陆，几乎没有回国，我没有意识到，日本民族的道德水准，其间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30年来温暖着我的心灵的日本民族的指导者形象，难道就此永远地消亡了吗？

1942年，日中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日本于大陆无法打出任何明确的政策，随波逐流的现实之中，橘朴自己作了“战术性方向转换”的宣言，提倡“新乡土主义”。与“重庆政权受到买办资本的热心支持，延安政



权受到小农民的热情支持”相比，“唯独南京政权（指汪兆铭傀儡政权。——著者注）难有稳固可靠的社会地盘”。（《合作社论》，《著作集》第3卷，第316页）在对这种形势的认识下，从曾经主张的以中、贫农为中心的合作社运动中大大地后退了一步，想朝着“曾国藩那样的地主性乡土社会建设”的方向转换。“由于长期战争而造成的日、满、华的疲惫”，为了与“对抗国共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技术要求”相对应，“在保守的曾国藩主义之上，加上能动的大地主兼产业资本家，以此作为推动力，将单纯的乡土主义成分导向东方民族主义的发展”，这就是这一方向转换的要点。（《提倡依靠乡土资本的多角农企业》，《满洲评论》第23卷第17号。《著作集》第3卷，第242页）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新乡土主义”确实是一种战术上的后退，它是与“重庆”、“延安”相比，唯有“南京政权”任何的社会基础——正确地说应该是民族基础——都没有的现实中，被迫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从橘朴自身的整个中国观来说，已经毫无疑问，这是理论性的破产。打倒地主、豪绅，人民自治这一过去的构图，已经远远地退避到了背后，取而代之的却是在日本占领区——“沦陷区”提倡的“曾国藩主义”。实现“数亿东方分散农民的解放”、“农民民主主义”的道路，屈服在日中战争的现实面前，今天，只有“地主富农寡头政治”这一传统的部落自治原封不动地成了日本可以依赖的基础、支柱。

但是，到了这个时期，不愧为是橘朴，在他的内心，似乎已经非常明确地预感到了战争的最终结局。1942年，在日中间匆匆忙忙数次来回，到了1943年8月，橘朴最终离开日本，到战败，一直到他死去。这三年中的行动已经被研究得很详细了（参见山本秀夫著《橘朴》），这一期间他的一些阐述也片段地传了下来。1942年秋，橘朴这样说：

日本军迄今为止，在中国肆无忌惮，算是完全失败了。今后留下来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以日本的技术来进行新乡村建设。（引自山本秀夫著：《橘朴》，第360页）

后来,1944年底,在徐州病倒,一时陷入病危状态。稍微恢复一点后,并非玩笑地说:“我死后怎么办呢?”“如果我死了,尸骸可不是回日本,而是想顺路去一下延安。”(同上,第365页)

终于,历史给了日中战争一个最终的结局,橘朴在奉天迎来了日本的战败。面对预测时局,寻求今后的道路而聚集到一起来的人们,针对中共军队今后的方向,他作了如下的推测:

中共军队必定会从热河、辽西、山东方面进入满洲。然后以满洲为基础,计谋充实军事力量,最终南下,向关内出击,制压中国全土。(同上,第374页)

橘朴客死在奉天这块土地上,是“八一五”后仅仅两个月的10月25日的事。

## 九 亚细亚主义的彷徨与寿终——代结尾

我们追踪橘朴的生涯,直到他寿终的这一天,在我们脑海中,留下来的最深的印象,或许就是他思想与心情,还有行动中的数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事实上,在眺望橘朴的行动轨迹时,谁都会意识到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形势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以及对现状的敏锐认识与由此而打出来的方策之间的异常偏离这一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超越历史时代的批判、裁断,当然是不妥当的。因为历史的发展,对于个人而言,其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难以逆转的形势纠缠中,其结果,只能朝着现实性转化。

然而,即使这样,橘朴的思想,在其构造自身,仍然包含着几重相对立的矛盾。例如,在他的思想构造中,尽管重音与语调不同,情况盘根错节,但确实确实东方的东西与西方的东西共存着,农业世界与工业世界共存着,更有个人主义与超国家主义共存着。从另一个高度来说,日本与中国共存着。

橘朴虽然主张发扬东方的固有价值,但也绝没有将出自于西方的诸

原理统统排斥在外,毋宁说,“西方、东方,均属于人类,其创造出来的文化是人类共同之宝物。”(《独裁政党论》(上),《著作集》第2卷,第605页)但同时,“万物的原理绝不只有一个,东方的事情,若仅用西方的原理,亦有无法处理的时候。”(《孙文纲领的东方性格》,《著作集》第3卷,第144页)他的东西方价值论,可由以上的一些言论得到证明。还有,橘朴是重农主义者,但又并非农本主义者。对东方世界中工业的意义,即对“日本、印度以及中国的工业地带”所起的作用有了正确的认识,并且加以强调。(《泛亚细亚运动的新理论》(二),《满洲评论》第5卷第3号。《著作集》第2卷,第589页)

虽然倡说着依靠“天皇”一个人的改革,但最终仍与埋没个人的共同主义无缘。毋宁说,自觉性、个人的重要意义,“共同体自我意识”的主张,即使在他展开他的基础社会型“东方共同体论”时,都没有放手。(《汉民族的性格及其文化》,《满洲评论》第19卷第21、22号。《著作集》第3卷,第107—113页)橘朴在日本与中国的夹缝中所品尝到的难以名状的苦恼,当然已经没有必要再多言了。

但是在橘朴的内心,这些各种各样的矛盾的种子又是谁播下的呢?或者说,橘朴内心的种种矛盾,其起因是什么呢?一个思想家,将什么样的思想变为自己的思想,并将之表现出来,这当然是属于思想家个人的问题。但这一点又恰是这个思想家的个性和特质的展示。然而,关于橘朴,对于这样的设问,从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这一点来试着接近他,来考察他的思想,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我在本篇的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在近代日本,活跃在日中关系这一舞台上的数量众多的群像中,橘朴可以说是最后一位选手。这只是根据橘朴正好在日本战败这一年客死于大陆,即处于剧终这一客观事实而言的。但是,针对这一客观事实,现在我似乎又有了一个想法,如果我们想进一步根据事实内容来看清日中关系的形态的话,从我下的定义中,或许能得到一点线索。橘朴是什么意义上的最终选手呢?这是

与确定橘朴的历史地位相关的问题,同时又是与他所抱有的各种矛盾的性质的考察相关的问题。

回头看,从明治初年至“八一五”战争结束为止,不知有多少人,以中国这个巨大的对象为基轴,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同时,又围绕着与近代日本自身的命运相关的种种课题,不断地探索至今。这里所说的以中国为基轴的思想形成,并非一定就只局限于那些被视为“中国派”的人,凡是面对近代欧洲的侵略,对共有着近代亚洲历史的日中两国的生存方式展开深思的人们,广义上说,其实都包含在其中。从这一观点来看,例如福泽谕吉,也是其中的一人,毋宁说,福泽谕吉这个人,或许才能称得上是近代日本最基本的中国认识观形成过程中的第一位选手。

也没有重新详述的必要,简单地,福泽提示的“脱亚入欧”论,以及“吾乃于心中谢绝亚细亚恶友者”这样的鲜明的态度,是广泛地规定了近代日本前进道路的一个命题,同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这都是一个明显的文明史式的预言。福泽的这个命题,是他在准确地把握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基础上得出来的明快的立论,其超群的广泛性与影响,几乎已无须多言。

然而,在这里,称福泽是先头选手,称橘朴是最后选手,肯定是过于唐突的。我也没有单纯地用线把他们二者连接起来的意图,毋宁说这正像历史相互反弹,相互吸引那样,是由无数根丝线织成的巨流。限于中国观乃至中国社会论这一点来看,我觉得,橘朴的中国观、中国社会论就属于这一股巨流。与橘朴相比较,福泽则处在这股巨流的对立面的位置上。福泽在支配着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儒教的精神构造中,明快地揭示出了这个国家文明世界中的特质,对包含在这一文明特质中的本质性的“旧套”、“固陋”的精神,发表了诀别的宣言。这是明治初年的事。几乎半个世纪以后,橘朴却从道教的世界里发现了这个国家的民族思想,期待着通过这个国家的民众世界、民众自治给中国社会进步带来真正的活力。从儒教到道教,从官僚到民众,这个看法可以说是一个一百八十

度的大转弯,这是不言自明的。橘朴从民众世界的角度构筑了中国社会的形象,从中发现了中国,并想从中寻觅中国真正的生命源泉。可以说,这是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通过了明治、大正、昭和的历史的蓄积,由橘朴得出的决定性的成果和目标。

当然,我并不是想讲福泽的中国论是表面的、肤浅的,而橘朴的中国论则是更加遵从实体的具有现实性的东西,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二者在对中国的认识上,确实都是真实的,或许说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目光敏锐地抓住了中国世界的真相。明治初年,福泽对作为文明世界之一的“中国世界”,从文明论的角度对这个国家作了总体的把握和批判,并且加以拒绝时,可以说是站在他以前的我国的中国认识之上,对中国世界的特质以最敏锐的眼光将它剖析出来。但是,近代这个充满生机的时代,把两国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个侧面错综复杂地联到了一起。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文明世界的中国面貌,而且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民众世界也徐徐地展示了他们的姿势。与“脱亚入欧”这一近代日本的前进步伐以及从中产生出来的总体拒绝“中国世界”的现实相对抗,在明治以后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橘朴从民众世界中构筑的中国社会论,在辈出的种种中国论中,从对这个国家的真相追究的深度来讲,是应该值得高度评价的。

当橘朴构筑他自己的这种中国认识观时,绝没有片面地排斥福泽的立场观点,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通过民众的力量,从根本上变革福泽所批判的儒教型官僚世界,从中寻找近代中国的生存方法,这正是橘朴中国认识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从这个理性的认识方法来看,或者对对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觉醒的正确评价来看,在某种意义上,毋宁说橘朴是福泽的弟子。也就是说,广义上,橘朴的中国认识,从福泽式的认识中萌芽,然后深深地扎入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从而构筑了更加丰富的、多层次的中国社会论。他理解了“脱亚入欧”这一先决条件。但另外一方面,在他的中国体验与中国认识的基础上,他没有无视东方分散农民怎样才

能从近代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个课题。他将向“商工业国家”的蜕变视为历史进化的一个刻度并对之作了一个正当合理的评价。然而，在中国的现实面前，拥有数亿农民的这个农业国家，到底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完成这一进化过程呢？这个难题，是扎根于他内心深处的一根难以拔掉的刺。这或许可以说是笼罩在近代日本跟随着时代的步伐，更加深刻、更加真挚地向中国贴近的所有的人头上的共同课题。极力正视现实构造中产生出来的这一课题，这难道不正是造成橘朴思想中带有多种复杂矛盾的历史原因吗？

在这些矛盾的重压下，橘朴想通过设定亚细亚主义原理的方法来摆脱这些矛盾给他造成的苦恼。不，毋宁说早在受到“九一八”的冲击以前，他就准备奋起一跃，来解决这一矛盾了。

从现在的观点上来看，他的奋起一跃，是选错了历史道路，最后不得不以惨败而告终。这一事实是不言自明的。他的这一跃，终于把他导向了缺乏支柱、缺乏现实基础的亚细亚主义原理，成了一座想架在日中这一虚空之间的桥梁。不错，一方面，橘朴的思想主张不单纯是高唱“东方精神”或“日本精神”的亚细亚主义，我们能承认这一点，至少他的亚细亚主义是刻进了东方农民的脸庞，轮廓清晰，具备了具体内容的亚细亚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最后我们又不得不加上一句话，那就是，在完全缺乏现实基础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亚细亚主义又是彷徨的亚细亚主义，或者说是亚细亚主义的彷徨。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从其真实内容而言，最优秀的东西，在橘朴的亚细亚主义中落了根，但在当时，他的亚细亚主义最终都没有能够找到立足点，没有能够找到支柱，就此凄惨地在中国大陆的上空彷徨徘徊着。同时，这又意味着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的历史性的寿终。明治中叶以来，宛如楔子一般钉入大陆的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中，以中国为基轴不断产生出来的亚细亚主义，到了橘朴，作出了思想性的终结。几乎与之同时，随着日本的败北，近代日中关系的构造也彻底崩溃了。如果再附加一句的话，正是这样的事态，为战后日本

的“作为方法的亚细亚”<sup>①</sup>(竹内好之语)这一假说的提示作了准备。“最终选手”橘朴的历史地位,或许就应该从这些问题的关联之中去找吧!

再次回顾历史,近代日中关系,与其错综复杂的构造相应,其多样的局面产生了种种的思想。橘朴的思想,很明显立于其中的一端。但是,历史是包含了断绝与连续的契机的异样的潮流,又是一种经营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已经成为过去的近代(战前)的日中关系,依然在某些侧面从其深处影响着、制约着现代日中关系。对于近代、现代亚洲的命运,我们难道不应该回到它的出发点,从新的视角对之进行探讨吗?

---

<sup>①</sup> 竹内好提出来的命题,这句话在日本思想史上具有深重的意义。大意是说,在考虑问题时,不以西方为标准,而将在与欧洲的对抗中产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行动作为方法,来探讨亚洲固有的问题。——译者注

## 后记

今天，从多年来发表的与近代日中关系史有关的论文中，选出了数篇，大致按执笔的早晚顺序，将之编成了一册，这就是呈献于读者们面前的这部《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其中最早的一篇写于1961年，距今已有20年了。从时代的变动来看，以现在这种形式公开发表，心里固然有着一种不安。然而，考虑到因为它是一部关于近代日中关系这一“历史”的论文集，又因为无论在什么时代，历史总是照耀在我们脚下的一束光芒，我的研究或许能给战后或者现在的我国认识中国提供一些借鉴，所以，不揣浅陋，产生了将之集成一册再次公开发表的想法。

当初，我选择了中国近代、现代政治思想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么多年来，虽然拙而不慧，但也专心地在这一领域中笔耕至今。

从这一点上来看，这里所收集的论文，与其说是我多年研究的一环，倒还不如说是与我平时的研究主题有着一定的差距。围绕着近代日中关系的思想史以及近代日本思想史的一部分，时不时地作一些考察，这部论文集就是这种断断续续的考察的一个产物，这也是各篇在写作时间



上相差得这么远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虽这么说,这些论文,对我来说,却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副业”,我觉得具有更大的意义。

其实,当初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这一研究刚起步时,我的计划是对清末到20世纪中叶这一段时期的思想主流——即使只有一个粗框架——首先建立起自己的体系来,然后再尽可能对近代的日中关系史进行考察。当时只是一种茫然的想法。

对于我的这一想法,提出“倒是有二者同时学习的必要”这样的建议的,是竹内好氏,那次的谈话似乎是漫不经心的,但却给我指了一条明确的道路。其实当时听了这番话以后也没有把它当回事,但是,从那以后,不管怎么说,还是有意识地时时着手于这一对象的研究。

收进这部集子中的论文,几乎都是配合出版社的各种出版计划单篇写成的,因此,在内容上就免不了有些重复,这一点,不得不请求读者的宽恕。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从明治年间,经大正到昭和,关于近代的我国对中国的认识过程,通过对以上这些对象的研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现在再回头来看,岁月的流逝,还是给各篇论文洒下了不少时代的影子。虽然自己对问题的认识方法并没有改变,但不可否认,在作品的背后,尤其是关于这一时期的日中关系或是所谓的“中国问题”,仍然留下了一点尾巴。对于一篇篇的论文,这里再对它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说明,那肯定已是没有必要的了。在这里,我只想把若干论点和感想综合起来,稍作解说。

完全依个人的实感来说,这20年间,可大致分成两大时期,即以1972年的日中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为界的前后两个时期。当然,这并不直接对论文的内容产生什么影响。但是虽这么说,在国交正常化以前,从各种意义上讲,作为这一课题的一端的中国——至少对于我——绝不是一个轮廓分明的客观对象。战后的善后处理还没有完全了结这一事

实,本身就发散着一种异常的抑郁感。还有,日中两国之间严峻的政治隔阂还存在着,日常的交流被完全拒绝这一状态,不仅是现代中国的实态,就是连中国这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点都是难以捉摸,难以把握的。

在这一时期里写下的主要是第一部中的论文。这些论文,以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这一历史事实为大前提,大致是以总括性的方法,对近代历史上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实态进行了探讨,并且特别是在与历史事实的关联之中,对所谓的日本的中国认识论中存在的欠缺作了揭示。

与第一部相比,第二部中,以活跃在日中关系舞台上的个人为对象,对他们进行了探讨。在第二部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与其说是近代日中两国关系的实态,倒还不如说是这些活跃在日中关系舞台上的群像如何在相互流动的日中关系中,打开充满危机的局面,构筑自己独自的中国认识观的。当然,这里所选择的对象,都是从明治到“八一五”战败期间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所谓“近代日本”这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然而,在这一研究角度的改变的背后,也许受到了时代划分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对中国认识论欲行修正的潜在意识的影响。

回想研究之初,给我带来强烈影响之一的是日本的中国研究,尤其是对近代、现代中国的研究,从其深处流露出来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黏黏糊糊的体质。与之相比,例如美国的中国研究,是在一定的理论乃至历史范畴中,非常干净利落地展开讨论的。与美国的中国研究相比,日本的黏糊状态便一目了然了。有时候,甚至让我觉得忍受不了。这种心情,我也想在此附加一笔。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感到,恰是这种气氛,才是日本的近代、现代中国研究的一个特质,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是一种宿命。不用说,正是这种特质,才是近代日本的侵略历史以及战后冷战构造的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框框和束缚。

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单纯地对这些对象,比如说用共产党的框框或其他特定的政治学、社会学的框框来进行裁断的意思。我只是想对过去的中国研究,或者再广一点说就是对过去的中国认识的足迹,利用自己的观点,对之多少作一些整理、分析而已。

在这里,如果允许我畅说自己的感想的话,70年代初期,给迄今为止的日中关系的历史打上了终止符时,或许这种表现会给读者造成很唐突的印象,有一种感慨重重地撞击了我,那就是“亚细亚主义”——其表现形式虽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影响、左右了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终于死了。

这也许是不负责任的话,也应该说只是一个念头,其意义、内容,就是连自己其实也不十分明白。即使到了今天,也绝不能说已经明确。但是,在第二部中,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对广泛的被称为“亚细亚主义”的这一存在,重新进行历史性证实的心情驱使着我。并且这种心情,至少对于我来说,是摸索70年代以后日中关系应有的态势的一个潜在性的前提。另外一方面,在对近代、现代中国研究这一领域,我觉得也具有重新检验自己史观的意义。

固然,“亚细亚主义”这个词的实际内容惊人的复杂、多样。我的研究,并不是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整体研究,如果我的分析被认为只是一个缺乏全面性的片段研究的话,就是由以上的原因所导致的。作为作者的责任,在这里不得不一并乞求读者的谅解。

接下来,将这些论文的发表情况摘记如下:

(一)《近代日本的国民使命观,其诸类型及特质》,是作为《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第八卷《世界中的日本》(筑摩书房1961年版)中的一章而写的。这一卷的编者是竹内好和唐木顺三。《国民使命观》这一标题是作为这一卷的主要论题被设定的。我是将这一主题浓缩到对中国或者亚洲这一点上来展开论述的。

(二)《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是桥川文三、松本三之介主编的《近代

日本政治思想史Ⅱ》(有斐阁 1970 年版)中的一章。原题是《大陆问题的构想及其实态》。作为一个系列性的作品,尽可能考虑到了历史性的、广泛的涉及。

(三)《走向亚洲的航踪——宫崎滔天的思想和行动》,这一篇是作为《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平凡社 1972 年版)的解说而写的。通过《全集》,我得以了解了滔天的全貌。同时,宫崎民藏也激起了我的兴趣。作为解说,这篇文章前所未有地庞大,但我的意图是想把迄今为止仅仅从《三十三年之梦》中得知的滔天,通过对他整个生涯的行动轨迹的探讨,展示他的全貌。

(四)《尾崎秀实与中国》是作为《尾崎秀实著作集》第二卷(劲草书房 1977 年版)的解说而写的。尾崎,包括其各种政治活动在内,尚有许多问题没有阐明,在本篇中,专门选择了来自中国的冲击这一点,尝试了对他的研究。

(五)《橘朴——亚细亚主义的彷徨》。橘朴是我多年想从事研究的对象,山本秀夫氏的劳作《橘朴》(中央公论社版)公开发表以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以此为机会,站在自己的观点上重新对橘朴进行了考察。这篇论文发表在《立教法学》第 19 号上(1981),几乎同时又被收入这本集子中。通过对橘朴的研究——当然只是某一个侧面——我觉得对橘朴战前、战时的活动分期已基本上完成了。

今天,重新阅读这些论文,尚未成熟的观点,或者过于肯定的部分依然不少。本书虽说是专门对近代日中间的群像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但我期望自己的研究也能给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增添一些枝叶。这次,除了修订明显的印刷错误外,几乎都保持了发表当初的原貌,一些注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各篇论文没有采取统一的行文格式,只要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尽可能不改变发表当时的原貌。

历史,作为人类的经验教训,以多重多层的形式存在着。如果将历史作为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近代日中关系”也将会在人与人之间呈现出

种种的面貌来。我想,以本书中的考察和思考为原点,今后继续将之作为主题,不断地研究下去。

最后,对热情支持我以这种形式出版的研文出版社、山本实氏衷心地表示感谢。如果没有山本氏的支持和努力,本书大概是很难完成的,在此特笔为识。

野村浩一

1981年3月

## 译后记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政府的主导下积极地吸收欧洲的文物制度,一时间,全国上下,街头巷陌,到处洋溢着一种舶来文化的气氛。与此同时,近代西方的伦理逻辑也渗透到了近代日本人的心灵之中。经过了短短二三十年的努力,在亚洲诸国纷纷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大潮面前,唯有日本,实现了“富国强兵”,保持了国家的独立自主。这些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富强以后,自然会思考一些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自己是凭借了什么样的力量源泉富强起来的?今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它的前进道路是什么?然后还有,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它应该担负的使命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与一个民族的未来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日本当然也不例外。

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在实现了“富国强兵”,保持了国家的独立,登上了自封的“东方世界的指导者”的宝座以后,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它所应该担负的使命又是什么呢?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日本

人自身是在一种什么样的伦理逻辑之上来认识自己富强起来的原动力、摸索自己民族的前进道路、探求自己民族应该担负的使命的呢？这就是野村先生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一书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若省去一切细节不谈，历史发展的结果告诉我们，富强起来的日本，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侵略之路。这条侵略之路，可以说是一条在“解放亚洲”这一使命的幌子下的侵略道路。由于地缘关系，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渗透、武装侵略的首要目标，当然就是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凭借着强大的武力，以“日韩合邦”的形式，轻而易举地吞并了朝鲜，接下来，展现在日本面前的就是中国大陆了。日本，与中国这一巨大的文明之间，有着割也割不断的血络。面对迎面扑来的中国这一大课题，在近代的日本，从政治家、革命家、知识人直至商人、浪人，他们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自身的知识良心、耳目嗅觉，形成各自的认识，这种认识就是本书所称的中国认识或中国观。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国观，特别是知识阶层的中国观，其主要类型有哪些？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在这些中国观的形成过程中，其主体——人的思想、行动的轨迹是如何的？这种种的中国认识中，其缺陷、误区又在哪里？这也是野村先生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一书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正像野村先生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讲的那样，他所选择的对象主要是活跃在近代中日关系舞台上的知识阶层的群像。在野村先生刻画的群像之中，除了大隈这位被称为“投机商”、“肥后的俗物”的政治家以外，其他人的中国认识、中国观似乎都具有一种相近的特点——尽管这一特点在各人身上有着强弱明暗的不同——那就是，一方面，对中国的历史文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中国的命运前途抱着极大的关心和期望，另一方面，在祖国日本的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政策面前，又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妥协、屈服。换句话说，他们几乎都在中国与日本这两块夹板之间寻求着、苦斗着、挣扎着、品尝着那种“被撕裂般的”痛楚，力图寻找到一个支点，能够奋身脱出。其结果，强者脱身而出，将一直只注视着中

国社会变动的目光转向了自己的祖国日本，认识到若要建立真正稳定亲善的中日关系，日本自身的革命是不可或缺的，并从而为此努力，建言献策；弱者难以自拔，在混沌不清的形势中，出于所谓“保全中国”的“目的”，转而为帝国日本的势力渗透而出谋划策，滑向了其他的方向。这是我译完野村先生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一书后留下的最深的、难以忘怀的印象。

近代日本知识阶层的这种中国认识、中国观，如果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日本人这一特殊的立场上来看，可以说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现象，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因而，不得不说，野村先生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给我们画出了近代日本知识阶层中国观的肖像，真实、公正、没有偏见。其实，从中也可以看出野村先生本人的中国认识、中国观来。

野村先生在本书的一开头阐发国民使命时说，“国民使命”与一个民族的未来是联系在一起的。野村先生讨论了各种类型的日本国民的使命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孙中山先生的中国使命观来，“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虽然孙中山先生时代的强盛的概念与几乎一个世纪以后的我们今天的概念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在我国朝着日益强盛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国人民，难道不应该再次思考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的使命吗？

刚才两处提到建言献策、出谋划策，一看似乎啰嗦。但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选择决定前进方向，尤其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之时，站出来建言献策、出谋划策，其言、其策、其谋、其略，其善恶优劣姑且不论，这一事本身不就是一种伟大吗？

若要问翻译完这本书后有什么感想的话，那么，以上这些片断、零碎



的想法就算是吧。

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译文以外,在得到原作者同意的前提下,译者还作了以下一些留意:

一、为了使当时的历史状况、历史感觉更加鲜明,对作者引用的明治、大正时期的原文,基本上按照清末、民国初期的文风进行了翻译,而对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尾崎秀实、橘朴的文章,则基本上按现代汉语的风格进行了翻译。

二、同样的历史事件,遇到中日两国的称法不同的情况时,为了使野村先生的原文风貌不失,仍用日文的称法,必要的情况下,通过“译者注”的形式,引出中国的称法。如: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等等。

三、与第二点相类似,一些日文的专有名词,若强译成中文,则恐失去其原有的感觉,故保留日文的原文,通过“译者注”的形式加以说明。如:炬燵、浪花节、修罗场等。

四、为方便读者查找,中国、日本以外的西方人姓名,除著名人物如黑格尔、康德等人外,其他的一些人,则根据核对结果,通过“译者注”的形式,将之附于中文译名后。

在翻译过程中,自然遇到了许多难点,原著者野村先生以及天理大学的挚友村尾进先生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对译文作了纠谬批正,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学锋

1997年6月

记于京都市比叡山麓野田墅